

竺摩法师及其佛教文化与教育事业

(1954-1990)

DHARMA MASTER CHUK MOR AND HIS WORKS

ON BUDDHIST CULTURE AND EDUCATION

(1954-1990)

陈慧倩

CHAN HUI CHENG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ULY 2017

**竺摩法师及其佛教文化与教育事业
(1954-1990)**

**Dharma Master Chuk Mor and His Works
on Buddhist Culture and Education (1954-1990)**

By

**陈慧倩
CHAN HUI CHENG**

本论文乃获取文学硕士学位（中文系）的部分条件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July 2017**

摘要

清末，大多佛教僧侣素质不佳，信众多倾向烧香拜佛不解佛理，让佛教予人“迷信”的刻板印象。清末民初之际，一批佛教居士与高僧积极进行佛教改革以一洗佛教颓势，继而催生了现代化的佛教教育，有先见之明的出家人也走出寺院，通过办理佛教杂志及走入人群宣扬佛理。个中目的，不外乎把佛教导返正信之途，以及鼓励人们信解佛教教义。本论文所研究的竺摩法师(1913-2002)虽然未及参与以上的改革，但因为求学于闽南佛学院而亲近了中国佛教重要的佛教改革家太虚法师(1890-1947)及其弟子，亦曾两度担任太虚的弘法侍录，接触了太虚一派的改革理念，并于1954年来马后积极推广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事业。身为马来西亚少有的知识僧人，竺摩是推动本地佛教走向知识佛教一途的关键人物，勤于弘法之余亦勤于笔耕，为佛教界留下了不少的文字。与此同时，竺摩也精于诗书画，因此也通过文章与诗书画接引文教界人士与普罗大众学佛。他亦曾担任马来西亚佛教总会首任主席长达12年，领导创办马来西亚佛学院并护持它持续办理，让本地佛教界得以就近培养弘法僧才。本论文探索竺摩所处的时代，以及他在马来西亚所办的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等事业，进一步梳理出竺摩在相关领域的贡献，以及他所秉持的原则与理念。

关键词：竺摩法师 佛教 文化 教育 马来（西）亚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most of the Sangha were of inferior quality, while Buddhists tended to burn incense and did not understand Buddhism, let the stereotype of Buddhism to superstition. Between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People's Republic, a group of Buddhist and Sangha actively carried out Buddhism reform to revitalise Buddhism, which led to modernisation of Buddhism education. The Sangha with foresight also stepped out of the monasteries and preached Buddhism through Buddhism magazines and into the crowd. The purposes of the activities above were to guide Buddhism back to the orthodox path, as well as to encourage people to understand and believe in Buddhist doctrine. Dharma Master Chuk Mor (1913-2002) did not participate the above reform, but he was able to get close to the important Buddhism reformer Dharma Master Taixu (1890-1947) and Taixu's disciples owing to study in Buddhist College of Minnan. He also served as Taixu dharma talks' recorder twice, contacted the reform concepts of Taixu, and actively promoted the Buddhist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areer after his arrival at Malaya in 1954. As one of a handful knowledgeable Buddhist monks in Malaysia, Chuk Mor is a key figure in promoting Buddhism to the way of intellectual. He was diligent in preaching and writing, leaving a lot of words for the Buddhist community. Meanwhile, Chuk Mor was also proficient in poetr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thus through the above media he attracted and guided the people from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ircles, and general public to learn Buddhism. He also served 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Malaysian Buddhist Association for 12 years, led to found Malaysian Buddhist Institute and made effort to sustain it, so that local Buddhist community can nurture Sangha and talents who can propagate dharma. This thesis is going to study

the era of Chuk Mor, and his performance in promoting Buddhist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Malaysia, to further sorted his contributions, principles and ideas in the related fields.

Keywords: Dharma Master Chuk Mor; Buddhism; Culture; Education; Malaysia

谢词

与佛教的缘分，从来都没有很深厚，因此硕士论文的选题，是跟黄文斌老师讨论一番后才订下的。在老师的鼓励与安排之下，这个佛学初学者就这么带着薄弱的佛学基础，开始了硕士论文的撰写。

为了取得竺摩法师的著作与相关资讯，免不了数次的北上槟城收集资料与进行访谈。次数多了，对槟城也多了一分熟悉与亲切。由于每回暂住槟城，都获马来西亚佛学院安排住宿佛总大楼，因此傍晚时刻都会抽出一段时间到附近的海边散步，回程途经三慧讲堂，顺便欣赏黄昏中的讲堂景色，若恰巧碰上讲座时段，就索性留下来听讲，结束后再走回住处休息。回顾一直以来的田调过程，印象深刻的还有访谈适逢冬至，继而获邀留在讲堂午餐、受访人贴心地协助扫描数十页的纪念刊，以及在学籍即将结束、论文却还没有进展的某一天，厚脸皮地赖在师父的茶座前多待了一会才离开……过程中得到的配合与包容远远超过预期，是四年硕士生涯的动力来源。

感谢，为这本论文提供指导与制造最多机缘的黄文斌老师，以及发出将近两年奖学金，让我能安心步入佛教人物研究之路的心灯佛教学术基金会与负责人吴俊震先生。其后，要感谢因本论文而长期受本人搅扰的继传法师，还有继程法师、显恺法师、空广法师、蔡春明居士、郑浩千居士、曾天耕居士、吕吉生居士；不时提供建议或协助找寻竺摩法师著作的杜忠全老师、陈明彪老师、萧永龙；读书会的翁丽珠学姐、彭静怡、孙小惠学姐、叶汉伦学长、郑文德学长、蔡素娴、张一文学长；后期接触的开谛法师、继群法师、弘冰法师、槟城菩提中学赖文祥校长、侯坤宏老师、阚正宗老师，论文考委劳悦强老师与陈爱

梅老师，还有拨空陪伴我跑了其中两趟访问的父亲陈德荣先生与母亲钱明月女士。

感谢，时时在生活中给予激励与支持的师母吴慧珍女士、林志敏老师、叶秀清老师、马凌香学姐、陈慧娴学姐、吴怡玉学姐、黎翠雯、罗慧倩、朱英华、官远程、唐宝丽、张期钧、陈进强、陈颖洁、陈进家、李婉君，以及在期间过世的祖母王亚露女士。

鸣谢名单随着日子渐逝而越来越长，自己也越发诚惶诚恐。希望本论文的完成，足以回报大家的倾力襄助。

论文核实书

本论文竺摩法师及其佛教文化与教育事业（1954-1990）为陈慧倩亲自撰写，
是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学位取得之学位论文要件。

此证

(黄文斌副教授)
指导老师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日期: _____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日期：14.07.2017

硕士论文提交

此证陈慧倩（学号：12ALM07906）在中华研究院中文系黄文斌副教授指导之下，经已完成一此题为**竺摩法师及其佛教文化与教育事业（1954-1990）**的硕士学位论文。

本人亦了解拉曼大学将以 pdf 格式上载本硕士学位论文至拉曼大学资料库，供作拉曼大学教职员生及社会人士查阅使用。

此致

（陈慧倩）

论文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除已注明出处之引文外，本论文其余一切部分均为本人原创之作，且未曾在此前或同一时间提交拉曼大学或其他院校作为其他学位论文之用。

姓名：陈慧倩

日期：2017年7月14日

目次

摘要.....	i
Abstract.....	ii
谢词.....	iv
论文核实书.....	vi
论文提交书.....	vii
论文声明.....	v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意义.....	6
第二节 前人研究综述.....	9
一、 竺摩法师传记.....	9
二、 竺摩法师的贡献.....	10
三、 竺摩法师与太虚法师思想的传承.....	12
四、 竺摩法师与文化艺术.....	15
第三节 研究方法.....	16
一、 文献分析.....	16
二、 田野调查.....	18
三、 口述历史.....	19
第四节 章节介绍.....	20
第五节 论文撰写面对的难题及不足之处.....	21
第二章 竺摩法师之时代背景与思想的形塑.....	22
第一节 竺摩出家前后的佛教大背景：教内教外的相互冲击.....	23
第二节 中国大陆修学时期：兼容传统与现代化作风.....	32
第三节 港澳旅居时期：实践中增强信念与成长.....	38
第四节 槟城定居时期：担任领导的思想成熟.....	47
小结.....	63
第三章 竺摩法师与佛教文化的推广.....	66
第一节 文字般若.....	69
一、 创办佛教杂志.....	69
二、 流通经典与请藏经.....	78
第二节 讲经弘法.....	80
第三节 诗书画弘法.....	87
小结.....	98

第四章 竺摩法师与佛教教育的推广.....	100
第一节 槟城菩提中学.....	103
一、菩中办学模式及竺摩的责任.....	103
二、培植正确价值观念与宣扬佛理.....	106
第二节 槟城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	112
第三节 马来西亚佛学院.....	118
一、马来西亚佛学院的发展面貌.....	119
二、对佛学院学生的叮咛与期望.....	134
小结.....	142
第五章 结语.....	144
引用文献.....	150
附录.....	165
附表一：马来西亚佛学院面授课程编排表.....	165
附表二：1990年前毕业于佛学院的出家众名单及动向.....	170
附表三：1990年以前修读佛学院期间或毕业后出家的学生名单.....	174
继传法师访谈录（一）.....	176
继传法师访谈录（二）.....	178
继传法师访谈录（三）.....	182
继传法师访谈录（四）.....	186
郑浩千先生访谈录（一）.....	191
郑浩千先生访谈录（二）.....	197
继程法师访谈录（一）.....	200
曾天耕先生访谈录（一）.....	210
吕吉生先生访谈录（一）.....	214

图表

表一：太虚有关基督教的言论.....	29
表二：竺摩法师历年书画展.....	92
表三：菩提中学毕业刊赠言内容.....	107
表四：《初中佛学课本》第一册目次.....	109
表五：《初中佛学课本》第二册目次.....	109
表六：《初中佛学课本》第三册目次.....	110
表七：马来西亚佛学院全职教员一览表（1970-1990）.....	126
表八：马来西亚佛学院客座教师一览表.....	128

表九：马来西亚佛学院 1972 年至 1990 年毕业生人数统计.....	132
表十：竺摩的毕业刊赠言及文章.....	134
表十一：马来西亚佛学院学生操行项目.....	139

第一章 绪论

竺摩法师¹(1913-2002)俗名陈德安,祖籍中国浙江乐清。他年仅 11 岁²(1924)即出家,与太虚法师(1890-1947)一派有极深渊源,而他的思想亦受师长们影响颇深。1938 年以前,竺摩生活于佛教饱受内忧外患威胁的中国大陆,于 1938-1954 年之间到港澳两地生活,见证了日本攻陷香港的恐怖时期。在这样的衰世乱世中,他极力推崇大乘佛教“由出世而入世”的思想,也曾在中国大陆与港澳地区积极参与抗日活动(卢友中,2010:48)。1951 年,竺摩在澳门创办《无尽灯》³(简称“灯刊”);1954 年,竺摩因协助办理槟城菩提中学(简称“菩中”)而南来马来亚。竺摩因四处弘法无法兼顾灯刊的发行,曾委任超尘法师(1917-)与隆根法师(1921-2011)等人先后在香港、新加坡与槟城负责主编。

南来后,竺摩积极发展本地佛教,被尊为“(近期)大马(汉文系)佛教之父”(释继程,1996:10)或“大马汉传佛教之父”(释继旻,2010:49),曾于 1959 年领导创办马来亚佛教会(《南洋商报星期刊》,1959:11),此组织于 1973 年改称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简称“马佛总”),灯刊也自此被纳入马

¹ 法名默诚,字守志。“竺摩”乃其日后根据“竺法兰”和“迦摄摩腾”各取一字凑合而成。见卢友中(2010),《雁荡山僧:竺摩法师传》(修订版),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页 22。

² 由释竺摩编述,释继程整理的〈竺摩法师简谱初稿〉所载之竺摩年龄皆为虚岁。为避免引起混淆,本文所标示的竺摩年龄皆以实岁计算。

³ 灯刊的刊期自面世以来,经历了几次的变化,即从港澳时期的不定期刊物(1951 年),变成季刊(1952 年 4 月,第 1 卷第 3 期)、双月刊(1954 年 7 月,第 3 卷第 4 期)、月刊(1955 年 10 月,第 5 卷第 1 期)。1956 年 11 月之后(第 6 卷第 1、2 期合刊),因主编超尘法师即将前往越南弘法,灯刊因人手不足而暂时停刊。此后,灯刊编辑部迁槟,于 1957 年 5 月 30 日出版第 6 卷第 3 期,以季刊形式出刊,半年后再改成双月刊(1958 年 1 月,第 7 卷第 1 期),期间因竺摩至檀香山弘法一年而短暂迁至新加坡,1958 年冬迁回槟城,1959 年由马来亚佛教会弘法组接手出版,改成季刊,期数重新从第 1 期(1959 年 6 月)开始计算。随后再改成双月刊(1962 年 2 月,第 12 期),1964 年 2 月 1 日(第 24 期)后暂时停刊,后在金星法师等人的坚持下复刊,以季刊(1964 年 5 月 1 日,第 25 期)形式出版。刊期的不断变化,在在反映出办一份佛教刊物的艰难。

来亚佛教会体系中，成为佛教会的官方杂志。此外，竺摩也领导创办了马来西亚第一座以讲经说法为主的寺院——三慧讲堂（1965年3月落成，1966年4月8日开幕）与马来西亚佛学院（1970）（释竺摩、释继程，1984：26-37；《星报日报》周刊，1966：9；《觉世》，1970：1），多年来担任的职位有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主席（1959-1971）、三慧讲堂住持（1965-1997）、佛学院院长（1970-2002）及《无尽灯》社长（1951-2002）。经竺摩皈依的在家佛教徒超过五万人，亲自剃度的子弟也有135人（卢友中，2010：189），马来西亚“继”字辈的出家人多为其弟子，其中包括马来西亚佛学院院长继程法师（1955-）、教务主任继尊法师（1965-）与三慧讲堂住持继传法师（1960-）等人。根据继程的说法，竺摩一生无私发展佛教，由他亲自创立的三慧讲堂与人生佛教中心等组织，也几乎多为佛教徒所共用共有，从不纳为己用或归入自身名下（释继程，1996：27）。早期的竺摩因受信众与其他法师的推重，担任佛总主席长达12年（三届），同时兼任多间寺院住持。1971年（58岁），竺摩因倦勤而缺席马佛总代表大会（释竺摩、释继程，1984：36），间接把主席一职拒予门外。尽管如此，竺摩仍在1972-1997年间被委为监察主任，负责调解僧人的纠纷，可见其在马来西亚佛教界的地位之重。

对海外佛教界而言，竺摩的地位亦很高。圣严法师（1931-2009）曾在第100期《无尽灯》撰文表示本身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时，曾向“白老、竺老（笔者按：白圣法师与竺摩法师）及同在槟城的真果长老，化了一笔不算太小的缘”来请购日译的南传巴利文大藏经（释圣严，1983：11）。另外，星云法师（1927-）与竺摩实际上颇有交情，而星云也在竺摩圆寂后撰文，感念竺摩当年爱护后进之心（释星云，2012：13）。由此可见，竺摩对海外佛教核心人物而言也有一

定的分量。

竺摩一生中最为关注的领域，乃推广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他于1961年写成的〈荡执成智·真空妙有：五十年来的槟城佛教〉⁴，列出了槟城当时的大小寺院名单、通过弘法人物、文化与教育的发展来论述槟城佛教，并在文中特辟一章谈槟城佛教文化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据竺摩所言，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事业分别为“请藏经、办刊物、流通法典”及“兴办佛教学校”（释竺摩，1983a: 18）。由此我们也得以了解，竺摩是以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的蓬勃与否为评断佛教发展的根据。早在1954年，竺摩也曾提到：“但（若）后来你们办学院来为僧教育努力，编刊物来为文化努力，我就当你菩萨来拜了”（释竺摩，1954a: 32）。职是之故，我们大致可以断定竺摩早在1954年或之前，已对佛教教育与文化事业极为重视，而他南来后也投身服务上述领域，同时辅以诗书画来推广佛教文化及接引信众。

1954年也是竺摩南来的年份，此后长居槟城至2002年圆寂为止。然而，本论文研究竺摩的年限是锁定在1954年至1990年，因为1990年后竺摩基本上已经逐渐淡出社会活动并专注个人的潜修。此外，太虚一派的重要师长已在1950年代相继离世，而竺摩此刻所做所想也已基本定型。因此，若要探讨竺摩的行谊与思想，把焦点放置在1954年至1990年是最理想的。

竺摩注重佛教文化的倾向，可通过《无尽灯》不轻言停刊，以及一再迁地出版而看出一些端倪。《无尽灯》取自《维摩诘经》⁵，竺摩对原文的解释大

⁴ 有关文章原刊于《光华日报》的五十周年纪念刊，但流传并不广，复在1983年由《无尽灯》主编继程法师重新排版发表于灯刊上（释继程，1983: 12）。

⁵ 《维摩诘经·菩萨品第四》原文：“维摩诘言。诸姊有法门名无尽灯。汝等当学。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如是诸姊。夫一菩萨开导百千众生。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于其道意亦不灭尽。随所说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无尽灯也。”见姚秦三藏鸠摩罗什译（年份不详），《维摩诘所说经（一名不可思议解脱上卷）·菩萨品第四》，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经》第十四册 No. 475，2016年12月22日阅自

意如下：维摩居士向恶魔说法，要她们在佛法中追求禅定自在的法悦。恶魔归化后，维摩又传授了无尽灯法门给她们，要她们把法音带到魔宫以“点着百千亿的无尽心灯”，使魔子魔孙都不要恋着在世间欲乐中。此外，竺摩也补充说，“无尽灯”的意思是“以一人之法，辗转开导百千万人而无尽，如以一灯而燃多灯，灯灯无尽，光光不绝”（释竺摩，1951a: 1）。以上这段话，让我们得以窥见竺摩期待这份刊物能充分发挥传播佛法的作用，以及其弘扬佛法的宏图大志。

在马来西亚的佛教杂志史上，《无尽灯》算是一份有代表性的杂志，它得以不间断地出版，要归功于竺摩与马佛总总务金星法师（1913-1980）等人的坚持。马来亚在1961年之前原有一份由本宗法师编辑的《狮子吼》月刊⁶，但只出版十多期便停刊，之后仅有《无尽灯》乃于本地发行的佛学杂志，至1972年方有一份由吉兰丹州佛教界出版的《佛教文摘》，然12期后因人事问题也停刊，1978年由马来西亚佛青总会接手复刊（释竺摩，1983a: 18；《星洲网》，2008）。早期佛教杂志维持经营不易，1992年开始，本地才有更多佛学杂志，如《慈悲》、《法露缘》等。在以往佛学资源匮乏的年代，《无尽灯》可说是马来西亚信众重要的佛学传播管道，而《无尽灯》对早期的马来西亚佛教而言，意义也十分重大。再者，竺摩多年来勤于笔耕，所用的笔名有“槟城行脚僧、雁荡山僧、竺园、竹园、竹摩、冷观、慧森”等，到各地弘法后也会把讲稿记录成文字发表在《无尽灯》，因此本佛学杂志保留了竺摩多年来的弘法文章，是了解竺摩的重要一手资料。

<http://www.muni-buddha.com.tw/sutra-buddhism-zen-buddhist-mercy/%E4%BD%9B%E6%95%99-wiki/facebook/facebook-14/T14n0475.htm>。

⁶ 佛学研究者学愚指出，慈航法师曾于1940年代在南洋创办《人间佛教》杂志。笔者暂时查无更多有关《人间佛教》的资料，故另标示于此。详见学愚（2011），《星云大师如是说、如是行：人间佛教》，香港书局，页12。

另一方面，1954年南来的竺摩，乃应槟城菩提学院之邀前来担任导师，并兼任菩提中学佛学班老师，可谓与本地佛教教育有着极深的渊源。1964年，竺摩卸下菩提学校佛学班老师一任，同年筹设三慧讲堂，旨以现代讲学及组织的方式来弘扬佛法，同时终其一生都以马来西亚槟城三慧讲堂为长居之地（释竺摩、释继程，1984：14-26）。三慧讲堂随后也成立佛法研修会（1968）、慧堂印经会（1970）等，协助推广佛教教育与佛教文化。竺摩十分看重正统的佛学教育，自马来西亚佛学院创办后，他也曾担任院长多年（1970-2002），并往往在关键时刻护持佛学院。

继程透露，竺摩在马来西亚佛教界活跃的时间约有三十年，即1950年代至1980年代初期，过后的活动渐渐从对外而对内，除少数寺院活动，已少在大众场合出现（释继程，1996：10）。另外，竺摩在1990年之前曾因健康问题数次辞《无尽灯》社长与院长职而频获挽留，但参与度与投入度已大不如前；在1983年，他就自嘲本身为“挂名社长”，之后则在1990年的佛学院会议上自称“挂名院长”（释竺摩，1983b：1；释竺摩，1990a）。由此看来，竺摩在1980年代早已不打理灯刊事务，仅管理佛学院院务，然而，竺摩在1980年代后期坚辞院长一职不获批准，他遂安排继程担任副院长管理院内事务。随后从1990年开始闭关三年，也算是步入了晚年的自修生活（释继传，2014）。职是之故，我们认为竺摩应是在1990年左右正式淡出佛教界领导层。

竺摩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发展本地佛教文化与教育，因此本论文将通过《无尽灯》、纪念刊、特刊，以及口述历史等资料，从中发掘与探讨这段时期内竺摩的佛教文化与教育事业的贡献。竺摩一生所为，大致在南来马来（西）亚定居之后逐渐定型。这也是本论文的研究年份以1954年竺摩南来之后，至1990年

竺摩淡出佛教界领导层为年限的主要原因。

第一节 研究意义

在马来（西）亚佛教发展史中，竺摩占据了一个极重要的位置，除担任各佛教团体领导者多年，也让马来西亚佛学院在面临经济危机时站稳脚步，时任院长的竺摩曾在 1973 年庆祝生日⁷，并把收到的贺仪，用以协助佛学院度过难关（释竺摩、释继程，1984：39）。期间，竺摩发表的讲经文章有《地藏经讲话》、《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话》等，已由三慧讲堂结集成册出版；至于刊登在《无尽灯》的文章，更是超过了百篇，至 1980 年代后期，才鲜有文章刊登。若据竺摩的说法，以上的文章都是文字般若⁸，“使其未信令信，未善令善”（释竺摩，1951a：1），让佛教文化得以广泛宣扬。在这个时代里，以兼顾推广佛教文化与教育，同时又涉及中华文化与华文教育的竺摩，堪称为马来西亚华人文教界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有关竺摩的研究，虽有论及竺摩在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的表现，但一般多是通论，鲜少深入的研究。换言之，竺摩在以上两个领域的表现，尚未得到研究者的全面关注。因此，竺摩的佛教文化与教育事业研究，尚有待填补。

其二，竺摩有两项事迹十分值得注意：（一）1954 年，时任菩提小学名誉校长的王弄书居士（1893-1964），不远千里把竺摩从香港请来槟城协助推动佛

⁷ “……共收贺仪（马币）四万三千多元。三日內筵开八百多席，除费用外，余款三万七千三百九十一元二角，悉数移捐佛总主办之马佛学院，充作教育基金。”摘自释竺摩编述，释继程整理（1984），〈竺摩法师简谱初稿〉，收入释继程主编：《大马佛教研究》第一集，槟城：马佛青总会佛教文摘社，页 39。更多有关竺摩法师寿庆详情，见〈竺摩法师花甲荣寿特辑〉，《无尽灯》季刊第 61 期，1973 年秋季，页 12-21。

⁸ 文字般若：凡是佛所说的一切教法，或是佛弟子所说的一切言教，不论是声教或是文字所印刷的经典，都称为文字般若。详见释竺摩鉴定，陈义孝编（1988），《佛学常见词汇》，台北：文津出版社，页 95。

教教育；（二）1955年，来自马六甲的金星为筹组马来亚佛教会一事，曾好几次北上槟城，邀请竺摩担任筹备会领导人。以上二事显示竺摩似乎是当时的一时之选，故引起笔者好奇：“为什么是竺摩？”，因同时期尚有很多高僧大德，如金星、金明法师（1914-1999）、伯圆法师（1914-2009）等人也极有学识及能力。竺摩之所以能成为“一时之选”，想必在佛教界的发展上，有其个人的特长与魅力。这是引发本人进一步研究竺摩的动机之一。

其三，竺摩早在大陆时期，已曾亲近天台名宿谛闲法师（1858-1932），同时也与印顺法师（1906-2005）同出于太虚门下。竺摩就读闽南佛学院期间已受太虚赞赏，毕业后曾在太虚到各地巡讲时，随团侍录讲记。在大陆期间，竺摩也曾受学于两种不同制度的佛学院，接受了传统制的小座复讲⁹及现代制的通俗演讲训练（释竺摩，2003：6）。以上的受学经验，对他往后的弘法经历而言，助益颇大。同时，也因为竺摩融合两者之长来推动本地佛教文化与教育，对马来西亚佛教文教史而言，是富有承传意义与开创性的。

其四，除了通过弘法接引大众，竺摩还通过其中一项世法（世间学问），即本身“诗书画”三绝的优势，另开“方便道”与信众交流（夏美玉，2010：183-187）。至迟自1943年起，竺摩已有开书画展的经历（释竺摩，2003：12）。早期抵马后，也曾分别于1954及1956年办义卖画展，资助菩提中学科学室设备、佛教文化事宜、筹募佛教教育助学金及印无尽灯社丛书。早期的《无尽灯》也特辟一栏〈无尽诗草〉多年，刊登读者的诗作，而竺摩和读者或信众的唱和诗，也会不时发表在〈无尽诗草〉，其中包括了文人管震民（1880-1964）等人。

⁹ 亦称“讲小座”。根据净空法师的说法，有能力作小座复讲的学员必须具有三种条件：记忆力好、理解力好、品德好；同时还需掌握“戒、定、慧”三学，“持戒”就是守规矩，修定、开慧。到自己智慧开了，这才可以正式出去讲经。详见净空法师（2013），〈净空法师：复讲不可以加自己的意思，这是“戒、定、慧”三学〉，净土释疑网，2013年7月23日阅自<http://foxdw.com/v2/cms/detail/?newsId=4611&classId=29>。

由此可见，竺摩的朋友群中的确有一些文艺分子，这与竺摩早年欲接引知识界分子学佛的心愿是相应的。在本地出家人当中，仅有伯圆以书画著称，因此竺摩“诗书画”三绝的才华，可谓是其弘法的特色与优势。

其五，针对 1980 年代以前的马来西亚佛教发展，骆静山这么表示：“总的来说，大马华人佛教的舞台是壮阔的，然而它却缺乏活泼生动的表现”（骆静山，1984：437）。期间，竺摩担任佛总主席多年（1959-1971），在这看似百花齐放的年代里，竺摩以怎样的心态去推动佛教文化与教育，也是极有意思的一种探讨。在此之前并非没有僧人在马来西亚讲经说法，而是他们鲜少以定期或长期的性质开讲。竺摩驻锡槟岛后，却把定期讲经当作必要的法务（姜联招，2002），因此他所带来的影响，相对而言是比较深远的。

综上所述，竺摩弘扬佛教的路径是多面向的，而其弘教的主要方式，在于积极推广佛教教育与文化。因此，本论文将从竺摩推广佛教文化与教育的事业着手，进一步地梳理竺摩推广佛教文化与教育事业之具体范围与概念、探讨其孜孜不倦推动大马佛教的原因及其所作出的贡献与影响。

第二节 前人研究综述

有关竺摩的研究论文，大多偏向单项贡献的讨论，鲜少结合竺摩佛教文教思想进行探讨。接下来，本节将择一些具代表意义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述。

一、竺摩法师传记

卢友中已出版的作品有《雁荡山僧：竺摩法师传》（修订本）¹⁰，卢氏撰写本书时，走访竺摩曾居留之港澳及马来西亚，搜寻了有关竺摩的原始资料及实物，并且展开了多次的访问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卢氏曾编著竺摩的诗集《篆香室诗集》，因此在本传记中经常随手拈来竺摩的诗歌旁证，清楚说明竺摩当时的心态或心境。作者掌握竺摩多年来的活动事项、附载竺摩许多诗文作品，为本论文在竺摩生平方面，提供了清晰的资料。

另一篇著作乃由陈美华及骆政昌撰写之〈竺摩法师传——传承人文道统的诗书画僧〉¹¹。作者陈美华与骆政昌指出，竺摩是将汉语系佛教在马来西亚有系统的推行教育和整合的关键第一人。据本文所言，太虚与著名画家高剑父对竺摩的影响颇深——随侍太虚记录演讲的生涯，让竺摩成长许多；后期的竺摩也通过充满禅韵的诗书画与信众结缘。简言之，本文从竺摩传播佛学的方法（讲经、诗书画结缘等）与演讲的内容等角度，讲述竺摩的个人特色、对马来西亚汉传佛教的贡献及“在地化”的思想。整体而言，作者认为竺摩的弘法仍以佛教的教育为主。

¹⁰ 卢友中（2010），《雁荡山僧：竺摩法师传》（修订版），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¹¹ 陈美华，骆政昌：〈竺摩法师传——传承人文道统的诗书画僧〉，收入《马来西亚与印尼的宗教研究：多向度的图像再现》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政治大学，2008年12月26日，页1-22。

二、竺摩法师的贡献

研究竺摩之贡献的论文，则有一篇硕士学位论文与五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由释继旻（戴丽花）撰写，其中一章标题如下：〈第三章 竺摩的生平及其对马来西亚汉传佛教的影响〉¹²。作者访问了马来西亚的继程法师、继明法师、任雨农、郑浩千、梁国兴、陈义孝，也远至香港访问澄真法师与黎明。此外，作者也配合竺摩的诗与画来进行讨论。释继旻认为，竺摩对于推动人间佛教在港澳地区及东南亚地区的传播与发展，有着历史性的影响。竺摩因深受太虚思想的影响，意会到佛教的发展必须靠教育。透过作者的叙述，可以发现竺摩早在港澳地区，已开始与文人来往。释继旻继而引用继明法师的口述，透露竺摩来到菩提中学后，又能“切中时弊【弊】来给大众开示，及一些启发与辅导。所以，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转引自释继旻，2010：95），让笔者从中窥见竺摩与知识分子或文人的渊源颇深。可惜的是，文中仅提及竺摩从“报章上看到现代年青人的一些问题”，并无进一步说明所谓“时弊”为何，而这也是本论文可以补白之处。

继程法师、演慈法师与傅晴曦的文章，皆于1996年“竺摩法师佛教教育与艺术”座谈会上发表，今收入《竺摩法师佛教教育与艺术》一书中。继程的〈竺摩法师与大马佛教〉¹³，把竺摩对马来西亚佛教的建设分成文化与组织两大层面，各有四个属项；文化层面的建设包括：一、开著书立说之风气；二、开讲经说法之风气；三、开艺文弘法之风气；四、开培僧植材之风气。演慈的〈谈经说

¹² 释继旻/戴丽花（2010），〈第三章 竺摩的生平及其对马来西亚汉传佛教的影响〉，载于《竺摩与达摩难陀对马来西亚佛教的影响》，未出版学位论文，台湾：玄奘大学，页47-98。

¹³ 释继程（1996），〈竺摩法师与大马佛教〉，收入梁秀霞主编：《竺摩法师佛教教育与艺术》，槟城：三慧讲堂印经会，页9-29。

论话人生》¹⁴，则通过竺摩自中国到海外的弘法历程，说明竺摩因应时间的长短与听众的根机弘法，故在各地弘法时也会有不同的特色与贡献，同时也举例说明竺摩自少年时期已是一位“勤奋读书，治学严谨”的人。竺摩弘法有三个方面，即讲说经论、专题开示与通俗演讲。其中讲经论的比重，又以“经多论少”，对一般信徒所讲几乎都是“经”，因经重说理，有助于启信修持，所讲的“经”以简短者多，或选讲其中一品；讲“论”的对象则是佛学院的学生，因“论”重析义，对佛理有认识者较易明了。一般上，竺摩选讲的经文都具人生哲理，而他也经常通过讲经内容发挥人生佛教的真义。傅晴曦的文章题为〈竺摩法师对佛教教育的贡献〉¹⁵，从竺摩授课菩中讲起，再根据年代谈及竺摩建立讲堂、掌管佛学院的事迹，以及简述竺摩住持的寺院，在结论处则强调竺摩“默默耕耘、实事求是”的风格（页45）。傅氏文章论述的单位（菩中、讲堂、佛学院），皆与本论文相似，惟该文篇幅太小、所述事迹亦有限，尚有许多待发挥的空间。

杜忠全与释学山撰写的会议论文〈竺摩法师对大马汉传佛教的贡献——以马佛学院对斋堂佛教化之影响为考察目标〉¹⁶，从弘教的角度探讨竺摩对斋堂佛教化的影响。据本论文作者的研究，马来西亚佛学院开办之后曾面对学生来源不足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竺摩积极投入招生工作，部分佛道不分的斋堂逐渐转向正信佛教之途，或由在家道场转向出家佛教团体。另一篇同场的论文为释继旻撰写的〈竺摩法师对马来西亚佛教的影响〉¹⁷把竺摩的一生分成四个阶

¹⁴ 释演慈（1996），〈谈经说论话人生〉，收入梁秀霞主编：《竺摩法师佛教教育与艺术》，槟城：三慧讲堂印经会，页30-41。

¹⁵ 傅晴曦（1996），〈竺摩法师对佛教教育的贡献〉，收入梁秀霞主编：《竺摩法师佛教教育与艺术》，槟城：三慧讲堂印经会，页42-45。

¹⁶ 杜忠全、释学山（2010），〈竺摩法师对大马汉传佛教的贡献——以马佛学院对斋堂佛教化之影响为考察目标〉，收入郭莲花、梁秋梅合编：《回顾与前瞻马来西亚佛教》，八打灵再也：马来西亚佛教学术研究会，页171-181。

¹⁷ 释继旻（2010），〈竺摩法师对马来西亚佛教的影响〉，收入郭莲花、梁秋梅合编：《回顾与前瞻马来西亚佛教》，八打灵再也：马来西亚佛教学术研究会，页151-170。

段，分别是在家时期(1913-1924)、修学时期(1925-1935)、港澳时期(1936-1954)与驻锡槟城时期(1954-2002)。简述竺摩的一生后，作者先通过竺摩的著作与艺术创作等论竺摩的风格，再谈竺摩讲经授法、办学授课、建寺造塔、诗书画度众的贡献，并在结语处指出办僧伽教育是竺摩佛教事业的重点。姜联招〈汉传佛教高僧对槟榔屿人文建设之贡献——以妙莲、竺摩为主的探索〉¹⁸把妙莲法师时期归为将槟榔屿佛教导向正道的第一阶段，继起的竺摩则属第二阶段代表人物，而本地的学佛风气建基于竺摩频密全马各地弘法，同时勤于笔耕于《星槟日报》(已停刊)及《无尽灯》，彰显出“文以载道”的实际功能。

以上文章皆直接从竺摩个人的作为着手，勾勒出竺摩对马来西亚佛教的贡献，但却鲜少具体谈及竺摩以怎样的方式推广以上各方面。本论文的撰写，亦意在进一步探讨竺摩推广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的说法与概念。

三、竺摩法师与太虚法师思想的传承

以竺摩与太虚师生关系为主要论述方向，并作进一步探讨的亦有一本著作与三篇论文。何建明所著之《人间佛教与现代港澳佛教》上下册¹⁹，优点是从太虚开始研究，比较能清楚地看到竺摩所继承的脉络，也梳理了弘一、太虚等佛教前辈的事迹，并于随后谈竺摩与香港的深厚因缘。何氏收集了许多战前与竺摩有关的港澳佛教资料以及竺摩撰写的文章，竺摩部分战前文章甚至没有被收录在三慧讲堂于2004年的新版《篆香画室文集》中。本书以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为起始，以及随后抵步的竺摩在港澳掀起的学佛风气，同时也谈及竺摩在港

¹⁸ 姜联招(2002)，〈汉传佛教高僧对槟榔屿人文建设之贡献——以妙莲、竺摩为主的探索〉，原发表于“槟榔屿华人事迹”学术研讨会，2013年3月13日阅自<http://www.penangstory.net.my/chines-content-c-paperabstract.html>。

¹⁹ 何建明(2006)，《人间佛教与现代港澳佛教》上下册，香港：新新出版公司。

时期所参与推动的佛教教育，对竺摩在港澳佛教时期的活动及佛学思想，有较深入的研究。此外，作者亦列举竺摩在澳门所讲的《维摩诘经》与《金刚经》，认为竺摩通过前者阐扬救世适应现代发展的人间佛教思想，通过后者解释佛教的空不同于道家和世俗的空无之理，说明佛教并不是厌世的。最后的结论，是竺摩与太虚一样，都通过教化众生行“菩萨行”来庄严净土或人间净土。

何氏另有一篇长文〈竺摩法师与中国现代佛教〉²⁰，收入纪念竺摩百岁诞辰的《慧海明灯》中。本文的范围设定在 1938 年之前（竺摩南渡港澳的年份），说明竺摩在南渡前受太虚等人的影响，奠定了其往后弘法的基础。本文对早期的佛教发展做出了很好的梳理与分析，看到了当时现代佛教的三个重要特征为：一、积极救世的人生佛教，二、能适应科学化时代之要求并能补充科学之不足的智信佛教，三、建设超越东西方文化的世界佛学。

随后，何氏根据竺摩 1938 年之前的文章，说明竺摩当下的四点体会：一、僧伽素质低落与民间对佛教的误解，导致了佛教的衰落，二、理解“一切皆空”非消极迷信的思想，三、每个时代佛教存在的形式都有不同，佛教的“因缘和合”、“救世救民”教义对当时的人类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四、认同开办现代僧教育。此文对竺摩在 1938 年之前的思想探索，让笔者对竺摩的弘法方向先有了一个基础的概念——竺摩日后积极推广佛教教育与走入民间弘法的观念，在他南渡港澳前已然萌芽。在数千里外的南洋生活，竺摩面临的挑战是否与早期一样，则是本论文可以再深论的课题。

陈秋平〈人间佛教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发展——以太虚大师及其学生

²⁰ 何建明（2012），〈竺摩法师与中国现代佛教〉，收入陈松青编：《慧海明灯》，香港：新新出版公司，页 17-26。

在马来（西）亚的活动为研究脉络》²¹，则提到早期马来（西）亚佛教的发展都比较迷信，或是仙佛不分，幸而在众多法师的弘扬下，渐渐走向知识佛教的道路，同时具体说明太虚的弟子慈航、演培、法舫、竺摩与马来（西）亚人间佛教的传播，其中论及竺摩功绩占最大篇幅，主要叙述竺摩南来后筹组马来亚佛教会、三慧讲堂、马来西亚佛学院的事迹，并根据佛学院创院宗旨兼重出世间法与世间法，印证竺摩的办学理念中有着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痕迹。至于夏美玉〈太虚大师对竺摩法师之影响与启发〉²²则把竺摩的一生分成三个时期：（一）中国求学；（二）弘化香港、澳门时期；（三）驻锡马来西亚时期。文中举例说明太虚和竺摩在前两个时期的交游，也提到竺摩在澳门主编《觉音》时期，每一期都有太虚的文章与其近况专文，而两人也有书信往来，可见两人深厚的师生情谊。太虚圆寂后，竺摩与太虚冥冥中的因缘还包括参与了太虚在泰国、香港、槟城的舍利塔入塔大典或设立，而竺摩南来后所作之事都与太虚相似。以上两位研究者都认同，竺摩的行为或思想中带有太虚的人间佛教/人生佛教的精神，而夏氏的文章也把竺摩所撰之〈“人生佛教”摸象——序人生佛教真义〉（1975）摘要说明，具体提到竺摩怎么去理解“人生佛教”。

竺摩无疑已继承了太虚的理念，但在“因时制宜”方面，夏氏只提到竺摩南来开荒初期，把本身于内地及港澳的专文束诸高阁，改而为槟城菩提中学编写较为浅白的《初中佛学课本》，并没有进一步讨论竺摩如何因应本地的社会民情与佛教发展，在本地推广与实践“人生佛教”。针对这一点，本论文会在各章节根据竺摩的各个事迹，作补充说明。

²¹ 陈秋平（2009），〈人间佛教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发展——以太虚大师及其学生在马来（西）亚的活动为研究脉络〉，《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3期，页31-37。

²² 夏美玉（2006），〈太虚大师对竺摩法师之影响与启发〉，《新纪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页29-61。

四、竺摩法师与文化艺术

以竺摩的诗歌为主题进行探讨的，仅有潘筱蓓的会议论文〈竺摩法师诗歌意象内涵与禅理〉²³。该文指出，竺摩的诗歌属于僧诗系列，透露佛学的禅理或禅思。潘氏通过竺摩笔下的自然界意象，如：“月”、“水”、“云”、“山”、“花”、“叶”，配合文学理论与佛教典籍（《金刚经》、《炉香赞》等），进一步说明竺摩藉以上自然界意象寄托佛学的意涵。以上种种字眼带有自性空净、佛性洁净、诸法无我等意涵，印证了竺摩的诗歌中有着“将禅理意象化”，或“意象禅理化”的美学特色。

研究竺摩艺术观的论文有三篇，即郑浩千〈佛教与艺术〉²⁴与夏美玉〈浅析竺摩法师佛教艺术观〉²⁵及〈竺摩法师的修禅经历与画里禅机〉²⁶。两者书写内容相近，皆通过分析竺摩的诗书画作品，说明竺摩的作品的确蕴含深厚的禅意，同时也说明竺摩被《华严经》“五明”²⁷一词启发，认为“艺术”有极大的感化力，因此选择以艺术为弘化的方便。郑氏文章的特点，在于他征引竺摩的文章内容作印证，也顺带提及竺摩的艺术观和学画的机遇。夏美玉首篇文章的特点，则在于她也翻看了竺摩的文字出版品，了解他的文字数量远远超过诗书画作。最后的结论，乃竺摩不是佛教化的艺术家，而是理解艺术、善用艺术，并且成

²³ 潘筱蓓（2016），〈竺摩法师诗歌意象内涵与禅理〉，收入《传统、递进与发展--2016 马来西亚中国古典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金宝：拉曼大学，2016年11月，页263-273。

²⁴ 郑浩千（1996），〈佛教与艺术〉，收入梁秀霞主编：《竺摩法师佛教教育与艺术》，槟城：三慧讲堂印经会，页46-51。

²⁵ 夏美玉（2010），〈浅析竺摩法师佛教艺术〉，收入郭莲花、梁秋梅合编：《回顾与前瞻马来西亚佛教》，八打灵再也：马来西亚佛教学术研究会，页183-192。

²⁶ 夏美玉（2011），〈竺摩法师的修禅经历与画里禅机〉，收入《第二届马来西亚国际佛教研讨会论文集》，八打灵再也：马来西亚佛教学术研究会，页181-192。

²⁷ “五明”一词出自《华严经》：“菩萨求法当于何求？当于五明处求”。所谓“五明”，包括佛学（内明）、语言文字（声明）、逻辑（因明）、医学（医方明）、美术，工艺，科学（工巧明）。

功以艺术作为弘法工具的佛教僧侣，但却不鼓励出家弟子学习艺术。夏氏第二篇文章主要通过竺摩的人物画进行讨论，先大略讲竺摩画画的特点，再配合竺摩自小的学坐禅、禅观教理基础的经历进一步论述，亦强调禅的体验是画出富含禅机画作的先决条件。

综上所述，有关竺摩的研究大多以以上四项为主题，让本论文得以在以上文献的基础上，从文化与教育的角度切入，研究竺摩一生的作为，从中了解竺摩多年来所做所想及背后原因。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论文所使用和参考的资料，主要来自槟城三慧讲堂、槟城菩提中学与马来西亚佛学院的图书馆馆藏。接着，就是实地考察竺摩曾驻锡的寺院、学校，了解有关单位的规模与发展概况，并通过到访竺摩曾赠送题字的寺宇，了解竺摩与以上道场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通过采访数位出家法师与在家居士，进一步得知竺摩在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方面的贡献。

一、文献分析

第一类资料乃原始资料。这些资料为本论文对竺摩多年来所思所做这一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与讯息。有关资料收集自槟城三慧讲堂、菩提中学与马来西亚佛学院。通过造访以上三处，笔者获得了竺摩许多一手资料、菩提中学毕业刊、以及马来西亚佛学院多届的毕业刊。本文主要底本为《无尽灯》中竺摩多年来所发表的文章，同时辅以竺摩的亲笔文章与贺词等一手资料及作品集《篆香画室文集》等材料展开论述。《篆香画室文集》为三慧讲堂印经会出版

的竺摩作品集，1995年另有一套由台湾巨龙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竺摩长老佛学全书》，唯《全书》所收录的竺摩文章相对《篆香画室文集》为少，故两者中又以《篆香画室文集》较为重要。

另外，澳门曾分别在2008年（第69期）、2009年（第73期）与2012年（第85期）出版三本以竺摩为主题的《文化杂志》，杂志中收录了多篇竺摩与师友们的文章，以及小部分的亲笔稿。《文化杂志》刊登的师友文稿，透露竺摩与佛教界重量级人物如星云等人的来往事迹，撰写文稿者亦多与竺摩同期或有密切往来，竺摩早期书画与弘法表现也可通过此杂志所刊登的相关文章得知一二。至于竺摩活跃佛教界时期的新闻，除了可以参考《无尽灯》，也可以查阅新加坡国家图书馆²⁸的旧报章扫描档。有关新闻扫描档记载了竺摩多年来的贡献与活动内容，相关材料再次印证竺摩的确非常积极推广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

第二类资料乃后人或同道对竺摩的回忆文章，让笔者得以通过以上文章掌握竺摩的大小事迹，而以上文章大多收录于2012年出版的《慧海明灯》中。本纪念刊收录的大小故事，亦为笔者本次的研究提供了最大的便利，除了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竺摩与其他人的交情以及竺摩的为人，也能通过他人对竺摩的回忆，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发现竺摩重视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的努力。

第三类资料乃前人研究，包括前述的传记与竺摩研究的单篇论文。除此之外，还有相关年代的佛教发展研究，如：白玉国《马来西亚华人佛教信仰研究》、陈秋平《移民与佛教：英殖民时代的槟城佛教》等资料。笔者阅读相关著作的成果，是得以对早期佛教发展有一个初步概念，继而针对性地展开分析与整理。其他有关竺摩的会议论文（陈美华与骆政昌撰写）与学位论文（释继旻撰写），

²⁸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旧报章扫描档线上查询：<http://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efault.aspx>。有关网站让读者在线上免费阅读大部分旧新闻，少部分需研究者亲自到柜台查询。

亦由笔者亲自到访台湾中央研究院及台湾玄奘大学收集而来。

二、田野调查

实地考察竺摩曾驻锡或任住持的道场，包括槟城三慧讲堂、槟城菩提中学、马来西亚佛学院及一些佛教道场。到访以上单位的目的，主要是了解该单位目前的发展近况，以及收集与竺摩有关的资料。

在三慧讲堂，笔者得知有关道场仍继承竺摩的理念，以及不定期举办佛学讲座及佛学班等活动。另一方面，笔者也在三慧讲堂继群法师带领下参观竺摩法师文物馆。该馆收藏竺摩多幅画作与书法作品，部分书画由信众捐回予文物馆展出，该馆亦不定期更换竺摩画作与书法作展示用途，可见竺摩的书法与画作为数颇多，当中亦不乏其他书画家如李抚虹（1902-1990）或出家众如伯圆与星云写予竺摩的书法作品，可见竺摩早期在书画界相当活跃。

访槟城菩提独中的目的，主要是参访图书馆，以及参观毗邻的菩提学院，实地了解竺摩曾服务的佛教单位。后期，笔者亦在菩提独中赖文祥校长的协助下，取得了菩提学院的一些历史材料，如《庆祝释迦牟尼佛二千五百年圣诞纪念特刊》（1956）。纪念刊中刊出了当时的董事名单及学生的文章，而菩提中学的成立背后，实际上蕴含着佛教界长老与热心人士深厚的慈悲心与愿心。到访马来西亚佛学院的目的亦基本相同，该院目前已移至毗邻新建的马佛总大厦上课，笔者亦得以在事务主任显恺法师的安排下到该院同栋的资料中心查找资料，通过该校历届毕业刊查找竺摩多年来的贡献及了解佛学院的变迁。

此外，笔者亦参观怡保三宝洞与金马仑三宝万佛寺（两者皆非竺摩住持的道场），查看竺摩赠予有关道场的门联或字画。实际造访有关道场后，发现有

关佛教道场通常也保有伯圆题字的匾额或门联，让笔者对两者在书法上的成就及名气先有了基本概念。

三、口述历史

槟城三慧讲堂住持释继传法师为本论文主要的受访人物。继传自 1986 年亲近竺摩，亦是竺摩属意的继任住持。笔者已四度访问继传，通过口述了解竺摩对弟子们的期盼与三慧讲堂属下各单位的发展概况。笔者访问的另一位出家师父为释继程法师，他于 1970 年代后期亲近竺摩，亦是现任马来西亚佛学院院长，并曾在 1981-1983 年出任《无尽灯》主编。通过与继程的访谈，笔者更了解竺摩的材性、品德、对马来西亚佛学院的贡献事迹，并发现竺摩早在 1980 年代初期，就已渐渐放手下一辈接任手上的工作。

在家弟子方面的受访人物则有郑浩千先生（1948-）、曾天耕先生（1939-）与吕吉生先生（1949-）。郑浩千在中学时期已向竺摩学画，并在竺摩的协助下筹得出国深造的经费。在郑氏深造期间，竺摩曾要求郑氏留下一些画作；若有善信捐款予佛学院，就以郑氏画作相赠，两人亦师亦友的情谊也维持到竺摩圆寂为止。郑氏与竺摩的互动，展现了竺摩推动知识分子学佛的局部效果与意义。

曾天耕与吕吉生皆是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的中坚分子。曾氏自研修会在 1968 年成立之时亲近竺摩，并自 1974 年担任三慧讲堂周日义校校长至 2011 年，但仍每周日回校关心校务。吕吉生则于 1985 年参与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目前是三慧讲堂成人佛学班讲师之一。两人的谈话内容，透露竺摩于日常生活中鲜为外人所知的轶事，并重现了研修会、周日义校的历史与变化。

第四节 章节介绍

本论文在章节安排上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论述研究动机、研究范围、研究成果回顾、史料介绍、研究方法及章节介绍。

绪论之后，为本论文的第二章。第二章从竺摩出生前五十年（1870）的佛教大背景开始讨论，继而了解清末民初的风波，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了竺摩，同时也尝试通过竺摩与太虚及画家高剑父等师长的往来，了解竺摩早期思想的形成。另一方面，本章也将讲述竺摩莅马前后，马来（西）亚的佛教发展概况，冀从中了解竺摩法师站在怎样的基础上推动马来（西）亚的佛教教育，同时也通过他在本地的交游与种种作为，发现此时此地的竺摩基本上已达到了本身思想的成熟期。他南来后所积极参与的领域，也都在推广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

论文的第三章则通过竺摩秉持的“文字般若”、弘法、诗书画等传播佛学的管道，进一步了解他背后的用意。本章与佛教文化相关，因此也会梳理出竺摩与僧俗二众在佛理上与诗歌上的交流。此外，竺摩的书画也十分有特色，其书法更被誉为“才子字”（释继程，1996：15），通过有关书画，可大体了解竺摩书法以及画作的内容，进一步发掘其传播佛教文化的概念。

论文的第四章讨论竺摩在佛教教育方面的事迹，主要讨论的单位为槟城菩提中学、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以及马来西亚佛学院。三者中，佛学院僧俗皆收，最后的目标是培养弘法人员，以及住持佛教的人材。对不同根性的信众，竺摩的说法有佛理深浅之别，但却有一些始终坚定的原则，衬托出竺摩其人的材性与可贵。

结语的部分，主要是总结竺摩多年来积极推广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的努力

以及原因。纵观竺摩的著作与说辞，他努力宣传佛理及积极培养佛教人才，除了是回应时代的需求，也是以早年佛教衰落为前车之鉴。对于信众与学生的要求，则是以品德先行，同时也希望他们能把自己的佛教信仰建立在对佛教的理解之上。有了正解正行的信众，佛教才有望正向发展。

第五节 论文撰写面对的难题及不足之处

本文虽然仅针对竺摩推广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两方面进行讨论，但竺摩一生中在这两个领域为佛教所做的事，还有很多值得再讨论。此外，竺摩一生著述颇多，碍于笔者阅读与整理资料的能力有限，因此本论文的撰写实际上无法臻至完美，也免不了挂一漏万。

此外，在查找实体或纸本资料的过程中，也多受限于地理因素，仅能从槟城三慧讲堂、马来西亚佛学院与槟城菩提中学查找，无法实地考察竺摩曾生活的港澳区，以及采访当地的出家众。庆幸的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曾出版三册以竺摩为主题的《文化杂志》，勉强填补本论文于这方面的不足。

第二章 竺摩法师之时代背景与思想的形塑

竺摩法师一生的行踪可依其居住地分成三个阶段，即中国大陆（1938年之前）、港澳（1938-1954），以及马来西亚槟城（1954-2002）。本论文以居住地划分竺摩的一生，乃因三地不同的生活环境及际遇，对竺摩的思想起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认为这三个阶段是竺摩思想的形塑时期。

近代中国佛教革新派灵魂人物太虚法师，是竺摩密切往来的师长，对竺摩的影响最大。在佛教发展衰落的年代中，太虚最为人知的事迹乃进行佛教改革、创办《海潮音》及推动现代化佛教教育等，也一直提倡佛教要走进人群。竺摩在佛教改革方面的表现并不如太虚，但作为马来西亚佛教界少有的知识僧人，竺摩南来马来亚之后在佛教教育与佛教文化事业方面的表现十分亮眼。他曾担任的重任计有《无尽灯》创社社长（1951-2002）、菩提中学佛学教师（1954-1964）、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创会主席（1959-1971）、三慧讲堂创堂住持（1965-1997）及马来西亚佛学院创院院长（1970-2002）；期间也因个人声望及贡献受肯定，而被委托担任多家寺院或斋堂的住持。南来多年，竺摩也以“诗书画”三绝闻名，并以以上三种才学进行方便弘法，接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学佛。综上所述，我们见到竺摩一生所致力重点，也都在推广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

竺摩在推动本地佛教界发展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其于澳门创办的《无尽灯》随其脚步先后在香港、槟城、新加坡编辑出版，最后于1959年落脚槟城。《无尽灯》让马来亚有了宣传佛教文化的杂志，而他于1965年在槟城创立的三慧讲堂，也让马新有了第一座佛教讲堂。至于在1970年成立的马来西亚佛学院，更是圆满了当时佛教界期许自行栽培佛教人才的心愿。以上事迹皆显示，竺摩对

佛教教育与文化的重视，一如太虚。

第一节 竺摩出家前后的佛教大背景：教内教外的相互冲击

20 世纪前后的中国佛教曾面对数个重要的问题，这些发生在竺摩出家之前（1924 年以前）的事件及问题，在日后仍持续发酵。当时佛教可谓内忧外患，教内的冲击主要是（一）僧材凋零，（二）居士佛教的兴起；教外冲击则有（一）外界欲藉寺庙产业办学的意图，（二）科学与基督教对佛教的威胁。对佛教仍抱有希望的僧俗二众，通过种种努力重振佛教，致使佛教文化与教育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在将这些问题叙述如下。

教内首个冲击，乃僧材凋零。1909 年，太虚在杨文会居士（杨仁山，1837-1911）创办的祇洹精舍求学半年，之后因为精舍经费不足停办而离开，太虚后来回忆起这短暂的学习时，指出当时的精舍有别于其他借办学保寺产的学校，是以教育佛教人才为目标（释印顺，2011：24；释太虚，年份不详），而杨文会之所以要办学校，则是因为“比丘无常识，不通文”（转引自欧阳渐，2000：587）。通过杨氏对佛法研究模式的观念，可进一步知其对出家人的看法：

仆但劝人学佛，而不劝人出家，因出家者虽多，而学佛者甚少也……近时僧众有负盛名而未达佛意，竟作人天师表，受徒千百……（杨文会，2000：450-451）

依杨氏的说法，佛教徒可以学佛但不必出家，因出家者虽多但学佛的却很少，僧众当中亦有僧人本身不甚了解佛理却有很多弟子。以上皆间接流露出杨氏对

出家人评价之低。

尽管一般的出家人素质不佳，但当时的出家僧众中仍有一部分是有抱负的。1912年，仁山法师（1887-1951）、太虚等人已见出家僧众素质参差而积极推动改革，可惜与保守派僧人起了冲突以致无功而返。在当时僧徒多不看经，也未受正式教育的情况下，居士团体打破了长老们只在寺院给出家众讲经的常规——在1915与1917年，北平居士开了邀请法师讲经的先例，两次邀请谛闲法师为居士讲经（释东初，1974：94-97；蒋维乔，2004：277）。据此，蒋维乔及陈荣捷在各自的著作中强调保守派长老守旧的同时，也称许他们有贡献；这些僧人除了利用本身或寺院的声望来领导与启发僧俗二众，也曾以实际行动表现了对佛教的深刻信仰（蒋维乔，2004：278；陈荣捷，1987：71-72）。然而，直到1940年，时下僧众仍不见进取：

小庙里和尚专替死人做做所谓佛事，他们的行为更不必曰；大庙里和尚也只坐在家中念念哼哼，那济世度生的事业，寻不到丝毫……（杨寅官，1940：16）

僧众尚且如此，一般受教育不高的信众就更不用说了，连太虚出家第一年（1904）也是抱着想通过受戒、读经、参禅等得到神通的心态，出家动机并不正确（释太虚，1987：265）。除了少数的知识分子，如杨文会及其学生欧阳渐（欧阳竟无，1871-1943）等人，一般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们信仰佛教，大多神佛不分。这样的情况亟需透过教育来改善，只可惜太多出家人不识佛学，无法扫除此积弊已久的大问题，遂引起杨文会等人的不满而急于通过自学改善情况。

1922年，欧阳渐与吕澂（1896-1989）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梁启超及其他相当具权威的学者也在此地讲学（陈荣捷，1987：78）。欧阳渐曾引经据典，力证僧俗之间没有主从关系，只要具备相关才学、修行，居士也能住持正法（潘桂明，2000：848，852）。由此可见，有学识在家居士的气势之盛，已然在出家僧众之上。不过，太虚曾表示住持佛法之责在僧众（释印顺，2011：51），竺摩也曾在其文章及演说中坚持“出家众住持佛法，在家居士护持佛法”。为达致此目标，竺摩常在文章中说明推动僧伽教育或佛教教育来培养弘法人才的重要意义，同时强调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出家人只要“僧相具足”都应受到尊重（释竺摩，1972a：9），太虚与竺摩师生俩对此事看法基本一致，而两人对此事的观点特别值得注意，因这是竺摩往后努力培植佛教人才的主要理据之一。

教内的第二个冲击来自居士佛教的兴起。清末时期的中国佛教可谓僧才凋零，然而我们却发现学问的在家居士对佛教产生重要的贡献，故我们可以称为居士佛教的兴起。当然，居士佛教的盛行，固然在某程度上说明当时大多僧侣的素质不佳，但无可否认的，其中仍有一些有德学以及受尊重的大师，如印光法师（1861-1940）等人。至于居士佛教兴起或缔造近代居士佛教新面貌的代表人物是杨文会。他于1870年代开始大规模印行佛教经籍（陈荣捷，1987：77），促成了经典的流传，并创立了金陵刻印处（1866）与祇洹精舍（1908），精舍停办后²⁹复有佛学研究会（1910）。金陵刻印处被认为是奠定近代佛教发展的主要基石，而祇洹精舍的办学模式则是后来其他寺院所借鉴的对象（潘桂明，2000：837-844）。以上所述的经典流传、刻印处、精舍与研究会，皆为佛教文

²⁹ 祇洹精舍开办时间约一年，精舍停办的原因有二说法：一、无学生来源；二、经费不足。详见欧阳渐（2000），〈杨仁山居士传〉，收入杨文会撰、周继旨校点，《杨仁山全集》，合肥：黄山书社，页587；释太虚（年份不详），〈学生教员与法师方丈〉，《太虚大师全集》网，2014年3月3日阅自http://tx.foyan.net/book/Article19_024.html。

化与佛教教育发展的重要体现所在。在经典流传方面，直到 1907 年才有另一个上海的佛教徒重印日本大藏经，而梁启超、蒋维乔（1873-1958）等信仰佛教的知识分子则于 1923 年才出版《续藏经》。杨文会印行经书的做法，足足比他们早了数十年（陈荣捷，1987：77）。

居士佛教的兴起，让当时年纪尚轻的太虚获得了一个学习机缘。太虚自 1909 年春天起于祇洹精舍求学半年，在古文和诗歌方面的知识有所增长，其他的科目也包括《楞严》与英文（释印顺，2011：24）。后来，太虚也成了佛教界的领袖，领导中国佛教的革新及促进世界佛教的发展。竺摩乃太虚的学生，曾两次（1933 与 1935 年）担任太虚的弘法侍录，并与太虚门下的弟子们来往密切，故竺摩日后致力于佛教文化事业及佛教教育事业的努力，基本上受太虚及师长们的影响颇深。

以上事项乃中国佛教教内因时势所趋而形成的变化。来自教外的冲击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外界欲藉寺庙产业办学的意图，第二个是西洋文化崛起而带动的科学与基督教的发展。清末至民国年间与庙产相关的事件，包括庙产兴学风潮及“管理寺庙条例”的发布。佛教界所熟知的两宗庙产兴学风潮先后在 1898 年及 1930 年³⁰发生，分别由张之洞（1837-1909）与教育学者邵爽秋（1897-1976）所极力推动（释东初，1974：73-74）。两次的庙产兴学风波相隔三十余年，但期间各地大小执政单位觊觎佛教物产，以及破坏佛教寺院佛像等事件不断发生（释东初，1974：75-78、141-142）。张之洞《劝学篇》（1898）乃寺院院产受威胁的源头，然其文章的用意原为借佛教与道教产业重振儒学，并无灭掉佛教

³⁰ 邵爽秋倡议庙产兴学之前的风波，有冯玉祥下令在河南毁寺逐僧（1927 年 11 月），而薛笃弼提出“改佛教僧寺为学校”（1928 年）之后，邵爽秋于同一月份提出了具体的庙产兴学方案，在 1930 年再次提呈获得国民党教育组批准办理。见释乐观〈不平等的“管理寺庙条例”该取消了〉，《无尽灯》第六卷第 1、2 期合刊，1956 年 11 月 1 日，页 3；释印顺（2011），《太虚大师年谱》，北京：中华书局，页 158、164、203。

或道教的意图³¹，但部分居心不良者却借此名义霸占寺产。故对寺院僧众而言，征用寺产无疑影响了他们的权益。

章太炎（1869-1936）在 1908 年书写《告佛子书》（原题《敬告十方佛弟子书》），呼吁僧徒自办学校发扬佛教，而满清政府要经过日本真宗插手等风波后，才下诏保护佛教，令佛教僧徒在各省县成立僧教育会自动兴学、自护寺产（释太虚，1987：2-4），此时寺方办学的主要目标只为保护寺产。1913 年 1 月 8 日，八指头陀寄禅法师（1852-1913）以“各省占寺夺产之风仍炽，而中华佛教总会尚未得政府批准”北上向政府抗议不果，当晚回寺即圆寂³²。其诗友熊希龄（1870-1937）跟进处理，寄禅未竟的心愿——《中华佛教总会章程》才获审定公布（释印顺，2011：36）。为保护寺产而成立的中华佛教总会，到了此刻才总算受政府承认。

1913 年至 1921 年，北洋政府颁布《寺院管理暂行规则》（1913）、《管理寺庙条例》（1915）与《修正管理寺庙条例》（1921）。制定条例的原意，是要杜绝别有用心者以兴学或其他冠冕堂皇的名义强占寺产，但在实际层面上反倒让佛教继续面对冲击。郭华清（2005）曾通过比较以上三条例，具体叙述北

³¹ 张之洞在〈外篇·设学第三〉中指出，当时中国境内佛道寺观数量不下数万，而佛道寺观物业都是由布施而来，应当为公共财物用以改作学堂、重整儒风。所谓的庙产兴学，并非要求寺观交出所有财物，而是提拨十分之七，院方仍保有十分之三的财物管理权，参与的寺观也可据其田产多寡，获得朝廷嘉奖。详见张之洞（2008），《劝学篇》，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页 75-76。中村元指张之洞的建议让“长年酣眠于安乐状态中的寺院…真不啻晴天霹雳”；认为僧人因寺产荒废修行的则有释东初，谓“前人之所以置产，以供众修道，今人有了寺产，竟忘其修道，而忙于寺产。所以寺产反为障道的因缘……无怪清廷要提拨寺产，民国以来，要庙产兴学，所以寺产一直困扰佛教的僧徒。”详见【日】中村元等著、余万居译（1993），《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册，台北：天华，页 526；释东初（1974），《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台北：东初出版社，页 99-100。

³² 寄禅法师圆寂的说法有二，一说为抑郁而死，另一说为在冬天夜里意外中煤毒身亡。另外，在满清末末，曾有一场逐僧夺产事件，由寄禅与虚云长老（1840?-1959）、本忠禅师（1866-1936）等人向光绪帝请愿获得成功。详见释竺摩（1983），〈荡执成智·真空妙有——五十年来的槟城佛教〉（写于 1961 年），《无尽灯》第 99 期（1983 年春季），页 15。

洋政府并非真心诚意解决寺产问题，他认为有关条例界限模糊，内容苛刻³³，是“为政府摧残宗教提供借口”，之后更强行解散中华佛教总会（页 23-27）。太虚于 1915 年的条例颁布后，曾尝试进行佛教改进运动，而 1921 年的条例修正后，太虚则认为佛教“尚能消极维持”（释印顺，2011：51，80）。不过，佛教的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保障，以下为一名佛教居士的回忆：

降及民国肇兴，狂妄之徒，目为迷信，藉兴学为烟幕，逐僧夺产，恣意破坏……近如民十七年邵爽秋提倡庙产兴学……邵氏当时提议庙产兴学的口号是：“打倒僧阀，解放僧众，划拨寺产，振兴教育。”时政府已有采择施行之意，大师乃将其修正为：“革除弊制，改善僧行，整理寺产，振兴佛教”……（陈静涛，1939：6）

据上所述，邵爽秋于 1928 年倡议庙产兴学，幸太虚向政府力争，才让风波得以暂时平息。1930 年，由于邵爽秋再次提倡，庙产兴学风潮再度掀起，引起佛教僧俗一致反对，结果是庙产兴学的建议终在 1931 年取消（释印顺，2011：203、208）。抵抗庙产兴学的成果，乃确立了改革僧伽制度与促进佛教教育等方法，除了能保护寺产，也是重整佛教的重要管道。中国第一所正规的佛教教育学院——武昌佛学院（1922）也在佛教改革与庙产兴学风潮炽烈之际成立，随后更有了享誉一时的闽南佛学院（1925）与汉藏教理院（1930）。

教外的第二个冲击，来自基督教与科学。为抵抗当时提倡科学、反对宗教的思潮，欧阳渐提出了“佛法非宗教非哲学”的说法保护佛教（潘桂明，2000：

³³ 苛刻的内容包括：官府可以随时借口公益事业占用寺产，同时可以插手寺庙财产及僧道继承问题。

847)。欧阳氏在 1923 年提出此观点，太虚在此年代前后也曾针对佛学与基督教，以及佛学与科学撰写了多篇文章。值得注意的是，竺摩的文章中也有比较佛教、基督教与科学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明显与欧阳渐及太虚所处的时代有关。

《太虚大师年谱》记录了基督教于民国年间的发展：

(1922 年) 8 月，天池寺僧坦山来访；叹息匡庐佛地，乃今盛传耶教，不闻三宝之音（释印顺，2011：90）。

以上一例当然不能代表西方宗教在全中国的发展面貌，但佛教发展衰颓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发生，而匡庐在耶教（基督教）传入后“不闻三宝之音”的说法，让我们得以了解基督教传入对中国佛教的影响颇大。张金德的硕士论文整理了太虚自 1913-1945 年间对基督教的言论，笔者再从中节录以下数点言论（见表一）。

表一：太虚有关基督教的言论

篇名	年份	内容
〈佛法导言〉	1915	耶教之爱是我执之爱
〈天神教之人界以上根据〉	1924	天神教不能了知其实，唯有超出天神之佛独知之
〈人生观的科学〉	1924	唯有高等宗教乃能破除劣等宗教，唯佛教乃能摧破一切宗教，融收一切宗教
〈敬告亚洲佛教徒〉	1925	彼天神之身，在科学之推证与哲学之批评上，先已失其根据

资料来源：节录自张金德（2007），《太虚批判基督宗教研究》，未出版硕士论文，厦门：厦门大学，页 46-48。

太虚的前两则引文挑出了基督教的弱点，第三则引文说明佛教是更为高等的，第四则引文则以科学对照基督教，并指基督教“失其根据”。太虚以上所

述，均为了回应时代的需求，以及反击时代对佛教批评。然而，基督教虽来势汹汹，但此西方宗教仍给佛教带来了正面影响。诚如太虚所言，基督教严谨的组织精神，给予他很大的启发和借镜改进佛教（释太虚，1938a: 4-5），而竺摩亦在同一年（1938）的文章中，亦以西方宗教青年会的蓬勃发展激励佛教青年，希望佛教青年能以“新青年化的佛教”，救济“中国贫弱而老年化的佛教”（竹摩，1938: 7）。

第四则引文以科学对比基督教的价值，但也并不代表太虚对科学完全认同，太虚的〈论天演宗〉指出，科学的进步会在世界上引起争斗（释太虚，年份不详）。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太虚则提到人们早在欧战时期已经感觉到科学昌明导致的“屠杀人类的利器”越来越猖獗，而这种现象会影响大家的和平生活（释太虚，1940）。此文透露太虚一代对科学的忧虑在“欧战”时期已有迹可循，而太虚所指的欧战当为1914-1918年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1879-1942）与胡适（1891-1962）等人批评迷信化佛教，而当时也有着“以科学代替宗教”的呼声，因此中国现代佛教其中一个特征乃“适应科学化时代之要求并能补充科学之不足的智信佛教”（何建明，2012: 18）。上文曾述欧阳渐于1923年提出了“佛法非宗教非哲学”的说法，太虚实际上也于此时撰写了〈人生观的科学〉（1924），主要强调佛教是“人生”而非“人死”的。欧阳渐与太虚以上的言论，皆被认为是1923年2月至1924年杪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来自佛教界的两股力量（喻静，2010: 96）。

在〈人生观的科学〉中，太虚也批评“狭义科学”的不足在于它无法“扩充其心觉以得全宇宙之诚验”，继而强调佛教的瑜伽学（或称“止观学”与“静

虑学”）才是“广义科学”，优点在于它能“扩充感验以至圆满”。太虚说明佛教比狭义科学更胜一筹的主因，在于“感验”二字，而宗教家特别之处也在于他们有着超越常人的“内心特殊感验”而又有能力教示他人获得感验的方法。在诸多宗教中，尤以佛教为高等宗教，能摧破与融收一切宗教（释太虚，1924）。太虚此文，说明了佛教才是圆满的科学，而它的地位更是高于其他宗教之上的。自此之后，太虚也不时比较科学与佛教的价值，常常倾向于强调佛教的优点或前瞻性是远远超前西方科学的：

科学重在实际经验，不落玄想，佛学亦是脚踏实地渐次修证，不尚空谈。

佛学所说者，胥为从实际经验中得来，他所说的宇宙人生、因缘业果种种变化，要皆净智所见；故佛学非科学而亦是科学（释太虚，1929）。

由智而信，智信一致，非基督教等盲从之信仰，而不违于哲学科学之推究实验……（释太虚，1937a）

科学物理学，竟走通了唯识的宇宙观，我们佛学者，固然惊异，然使现代物理学的科学者，知道了二千年前，已有从不同迹径上，更加精奥地实证，且说明了的法相唯识学，其狂喜又当何若（释太虚，1937b）？

要言之，太虚认为不管基督教或科学，与佛教相比都有不足佛教之处，而竺摩往后在这一方面的言论，基本上与太虚的看法相同。另一方面，在太虚的反击过程中，笔者发现太虚及当时改革派佛教的重要思路，在于强调佛教是智信、是科学的。此“智信佛教”立场，也为往后的“知识佛教”预留了更大的发展

空间。

以上所述民国前后的佛教大事，太虚刚好都参与了，先在1909年入读祇洹精舍半年，复于后期的庙产兴学等事件落幕前后，积极开办现代式的佛教学院。在1924年出家的竺摩，也正好赶上了这个时代，得以在1930年开始接触太虚、新式的佛教教育与佛教文化传播方式等，为他往后主编佛教刊物及办理佛学院的因缘埋下种子。另一方面，竺摩和太虚共同坚持的信念，是出家人当为众人之首，而竺摩对基督教与科学的看法中也有着与太虚相同的说辞。我们可以据此判断，竺摩虽然出生于中国佛教面临内忧外患的年代后期，但却受生活于忧患年代的太虚影响颇深。事实上，竺摩出生的年代，正好是中国佛教面临忧患及革新的年代。

第二节 中国大陆修学时期：兼容传统与现代化作风

上文已详述居士佛教、佛教典籍的流传与刻印事业的兴起，以及佛教教育转型的缘由，而竺摩的老师太虚亦曾是其中的参与者。太虚无疑是塑造竺摩思想最深的人，次之则是芝峰法师³⁴、弘一法师（1880-1942）等人。目前已有长文专论竺摩与三位师长往来细节³⁵，然而因三位师长对竺摩往后的发展实在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故本节仍会择要论述竺摩与他们三人的互动、太虚与现代化佛教

³⁴ 于中国大陆解放前夕还俗，俗名石鸣珂居士（1901-1971），1962年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详见佚名（年份不详），〈中国佛教协会大事年表〉，中国佛教协会网，2014年3月14日阅自 <http://www.chinabuddhism.com.cn/js/hb/2012-03-15/465.html>。

另一方面，竺摩的剃度师父，为白云法师（约1895-1985）。据卢友中的说法，白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批斗与打击，竺摩法师嘱咐其俗眷陈松青把白云从宁波接到乐清生活，并不时接济之。白云圆寂后，竺摩写了多副挽联，其中一副为：“亲教感恩深，十年侍奉，每聆法音开茅塞；参方惭德薄，万里询游，骤闻恶耗益凄其”，详见卢友中（2010），《雁荡山僧——竺摩法师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页207-208。

³⁵ 详见夏美玉（2006），〈太虚大师对竺摩法师之影响与启发〉，《新纪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页32-58；何建明（2006），《人间佛教与现代港澳佛教》下册，香港：新新出版公司，页302-311。

事业及竺摩的活动领域。

学者冉云华表示，太虚可能是对中国佛教现代化影响最大的人物，他所设想的现代中国佛教改革方法仍在他圆寂后被沿用。至于太虚理想中的现代佛教，包括僧人重视时代趋势以及新宗教教育机构的建立，同时以学术出版、报刊宣传弘扬佛教，与知识界的领袖人物建立友谊等（冉云华，1990：221）。具体的工作则包括在1920年创办《海潮音》佛教杂志，1922年创办武昌佛学院，1927年担任闽南佛学院院长，并自1917年往来多国游化弘法或参访（释印顺，2011：28、70、86、153）。可见，太虚自1910年代后期已开始有系统地积极推动本身所设定的现代化佛教。

芝峰为太虚门下五比丘³⁶之一，佛学、诗文能力杰出，思想敏捷，而芝峰实际上也是竺摩的师叔³⁷，因此两者的关系可说相当密切。太虚许多重要的学术讲稿，也都由芝峰记录（于凌波，1994：312-314）；弘一也赞赏芝峰的文字能力，曾邀请芝峰为他所写的佛学歌词撰文注释（卢友中，2010）。芝峰在1928至1932年间担任闽南佛学院教务主任，大醒法师（1899-1952）则为当时的事务主任兼代理院长，佛学院在两人合作之下声誉日隆。此外，芝峰也曾主编《海潮音》与《现代佛教》（于凌波，1994：314）。

竺摩在12岁那年担任芝峰的闭关侍者，同年由师祖万定和尚（1872-?）携往拜见弘一；芝峰与弘一，可谓竺摩出家初期重要的指引老师。竺摩简谱载，芝峰曾在1925年闭关时教授竺摩古文诗词、《始终心要》、《永嘉证道歌》等。后两者都在说明修行的正确方式，《始终心要》主要通过天台宗的“三谛”——空、假、中，来谈道心，《永嘉证道歌》篇幅较长，谈的内容相对《始终心要》

³⁶ 其余四人为法舫法师、大醒法师、会觉法师与法尊法师。

³⁷ 竺摩的师父白云法师，与芝峰是同门师兄弟。详见何建明（2006），《人间佛教与现代港澳佛教》下册，香港：新新出版公司，页304。

多，但也强调“本源自性天真佛”、“心藏无价珍”（释惟觉，年份不详；释宣化，年份不详），所强调的分别是道心与智慧或佛性都是本身所具有的，不必外求。对当时年纪尚小的竺摩而言，这些教导无疑培育了他对佛教的学识，亦巩固了竺摩后期对佛教的信心。

1930年，芝峰嘱咐当时正在宁波观宗学社接受传统讲小座训练的竺摩，转学至现代化通俗演讲训练的闽南佛学院（释竺摩，2003：5），让竺摩因此有机会亲近太虚，也曾与印顺法师及东初法师（1907-1977）同窗。竺摩19岁那年（1932），太虚在闽院演讲，让全体同学自由笔记，竺摩的笔记为太虚所赞许，并嘉勉竺摩“思法笔雅，为少年之秀，若能多习禅，广培福寿，则前途不可限量”（释竺摩，2003：4-6），这说明竺摩在学佛方面有其天赋，而太虚对竺摩的能力也是十分肯定的。至于闽院给学生们作笔记和通俗演讲的训练，则让竺摩受益颇大。曾经听过竺摩演讲的永惺法师（1925-2016），也认为他讲经内容丰富生动（转引自何建明，2006：599），而竺摩弘法后，也会把讲稿整理成文章发表在佛教杂志上，让佛教义理不受时空限制继续流传。

竺摩自闽南佛学院毕业后，曾两度受太虚嘱咐随行至潮汕（1933）与闽粤（1935）一带侍录；至港澳后，竺摩曾编辑《觉音》（1940-1941）、创办《无尽灯》（1951），南来马来亚之后则担任佛学院院长与创办三慧讲堂。观其一生致力的事业，可谓与芝峰及太虚的工作相类。芝峰与竺摩先后为太虚记录、整理讲稿，竺摩更曾被太虚称赞为“少年之秀”，其能力应与芝峰颇为接近，太虚对竺摩也可说是刻意栽培。在1934年（22岁），太虚让竺摩与武昌法师（生卒年不详）代座讲半部《金刚经》，也在1935年让竺摩在中国佛学会上海分会讲演佛理。太虚圆寂后数年，竺摩曾赋诗一首：“昔年杖履曾追随，如坐春风

乐有余；一别天涯成永诀，忍挥双泪读遗书”（释竺摩，1953a：13），跟随太虚左右的日子，竺摩看来是很欢喜自在的，他对太虚的认同也在此诗中流露无遗。

1933年，竺摩随太虚往潮汕讲学侍录的行程结束后，则随芝峰到武昌佛学院，芝峰讲课兼任《海潮音》主编，竺摩则担任研究员与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编译员。1934年，芝峰辞去主编一职，往宁波办白湖讲舍，竺摩随行办学（释竺摩、释继程，1984：8）。在竺摩的心中，芝峰有着极高地位，赴澳门后曾称芝峰和大醒为“佛教革命的老前导”，希望他俩能多供稿予《觉音》，鼓励后辈多写文章，而大醒在回复给竺摩的书信中这么表示：

你说“我公与芝叔等既为佛教革命老前导，如今亦不肯写作，放弃一切，则后辈之热力，恐亦难持久也”。在你的老叔，要相当负担这个责任。在我，是不敢当（释大醒，1940：30）。

“老叔”，指的正是芝峰，大醒实际上也表达了对芝峰的器重与赞赏。以上的回复正值抗日战争之时，竺摩坚信“写作”对佛教发展有重要意义，以上事例再次让我们看到竺摩对文字的重视，而竺摩往后办《无尽灯》，也是因为他非常相信“文字”的效用。

竺摩20岁前后几年，都跟随在有才华又能干的芝峰身旁学习，对他的成长不无助益；其中，又以求学闽南佛学院为竺摩生命中重要转捩点。曾在宁波观宗学社求学的觉光法师（1919-2014）透露，观宗寺的学风严格，除了不易接触太虚的新佛教思想，学僧也“被管教得不能随便动”；另一方面，由于太虚的

思想过于新式，以至于全国寺院的长老几乎反对他提倡的佛教革命（转引自何建明，2006：579-580）。然而，闽南佛学院却录取了不少来自观宗学社的学僧，而竺摩的转学也代表了弘法愿心的转变（何建明，2006：305-306）。继程则认为，早期的传统训练与生活，让竺摩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佛学思想，而这也是竺摩往后的修持较为倾向“信愿”法门的主因，若参考太虚的文章，会发现竺摩的思想比太虚更传统一些（释继程，2016）。

回顾竺摩青少年期间，曾经历一年的经忏生活、至少两年的传统佛教教育学僧生涯，以及往后的行事作风与“先相信佛理后求证”等讲经内容，笔者认同继程的说法。但是，传统与现代兼容除了是竺摩的特质，也应是时势使然。原因在于佛教固然需要革新，但也需保留传统，才能持续正向发展。至于传统或现代思想中哪个比重较多，就得看个人的倾向与选择了。提到传统与现代兼容，也应谈谈弘一——竺摩身边一位以严格持戒广为人知的师长。弘一于1918年（38岁）从生活多彩的艺术家转为苦修实行的出家人，同时对太虚佛教革新运动也颇为支持（何建明，2006：381），从而可知弘一对佛教的现代化也持正面看法。竺摩年方12岁（1925），首次拜会弘一就已拜倒在地，获弘一书写“息恶行慈”³⁸四字赠送（释竺摩、释继程，1984：3），此后两人会面的次数甚少，但仍有书信往来，可惜有关书信都已在战争仓皇逃走时遗失（释竺摩，2003：10）。不过，至澳门接编《觉音》佛教杂志的竺摩，不仅仍与弘一保持联系，也通过书信向其讨教；弘一也曾在1939年闭关时，破例为竺摩即将出版的《维摩诘经》题写书名（释竺摩，1940a：34），对竺摩的关爱明显可见。竺摩《觉音》专刊中如此描述弘一：

³⁸ 有关弘一赠送竺摩的文字内容，另一说法为“发菩提心”。详见释竺摩（2003），《行脚过千秋》，收入《篆香画室文集》第26册，槟城：三慧讲堂印经会，页4。

编者自民国十三年³⁹的春天在永嘉初初和他见了一面，那清癯慈和的瘦影始终浮动在我微弱底心灵。无怪乎受了他的感化的人，曾对他发出“安得千古不坏身，永住世间刹尘劫”（丰子恺语）的呼声（释竺摩，1941a：2-3）！

不论老派新派，新僧旧僧……听到他的名字，肃然起敬，见到他的风仪，欢喜赞叹（释竺摩，1941b：31）！

由此可见，弘一虽以持戒修己为重，但他身边的人也因他的精神与理念而受感化；第二个引文中的“不论老派新派”，更能说明佛教界敬仰弘一的程度。另外，竺摩撰写的〈弘一律师的“先师”〉，讲述了弘一所景仰的藕益大师（1599-1655）之行为特色。两位大师唯一的不同，在于藕益是大声疾呼改变，而弘一则是以缄默、“艰苦卓绝的行动争取别人的同情”，以及“暗示感化的警觉”（释竺摩，1941：32），尽管两人性格不同，但目标一致，都是以改善佛教及身边的人为主。竺摩既然是借弘一写藕益，他对弘一的观感也不知觉地通过文章表露出来：藕益是以身作则、操行坚贞、如法修持，而弘一基本上也符合了以上三点。

要言之，太虚、弘一、芝峰等人，把青少年时期的竺摩导向了兼容革新与传统的路上，在强调世俗化的同时也注意行持，也让竺摩有机会直接或从旁参与现代化的佛教文化与教育事业。在中国大陆生活时期，竺摩身边总是围绕着众多才学相当的师长，让竺摩有许多参照的对象。竺摩本身也在1930年代担任

³⁹ 竺摩于同一期《觉音》另一篇文章（〈弘一律师的“先师”〉）记录为民国十四年（1925）。确实的年份，应当为民国十四年。

太虚的侍录，并在专门研究佛学的单位（闽南佛学院及武昌佛学院）待上一段时间，学习的机会总是不少。故，竺摩在中国大陆时期的经历以及学习的际遇，在其一生中可说得上是一个较美好的时代。

第三节 港澳旅居时期：实践中增强信念与成长

1933年，太虚往潮州弘法，竺摩也随行侍录，并以其字“守志”，为太虚记下了一篇名为《佛法与救国》的讲稿。讲稿内容显示当时中国处于国难中，太虚提出了“因缘生义”、“无自性义”及“大悲心义”三个佛教教义，说明大家应该共同维护国家的安全（释太虚，1933），而这篇讲稿也说明了竺摩跟随在太虚身边时，曾接触过相关的救国救世概念。自1933年之后，太虚也有不下十篇呼吁佛教徒保卫国家的文章或演讲，其中一篇演讲的内容指出，僧尼参与救护队除了是爱国的表现，也是佛教救世精神的体现，“使佛教徒能够在佛教的立场上，来舍己利人，去服务于人群、社会和国家”（释太虚，1939）。

1936年7月，中国训练总监部下令把僧侣编入壮丁队受军训以组织抗战。太虚提出反建议，让僧侣改受救护队训练以符合佛教慈护生命的宗旨。这项建议获得当局批准，全国佛教组织渐次成立僧人救护队，太虚则在1937年11月指导汉口正信会成立“抗战救护队”（释印顺，2011：266、274；陈永革，2003：247）。竺摩本身也在积极护国之列，可是却在前往武汉参加僧侣救护队途中不慎误入战区，幸紧急中躲藏起来，经历了二十余分钟炮火交战的虚惊，总算安然无恙。最后虽安然抵步，也加入了救护队，但一度被敌军包围而仅能紧急逃

命，无法成功击退敌军，竺摩自剖“心伤万分”。1938年，竺摩与慧云法师⁴⁰甫至广州即遇上日军空袭，旋即与慧云搭火车至港，翌日广州落入日军手中（释竺摩，2003：9-10）。抵达香港后，竺摩和墨禅法师（生卒年不详）积极参与成立香港佛教救济难民会，为难民提供衣被、粮食和住所，竺摩亦被推选为驻会干事（何建明，2006：34）。在此年代前后，竺摩的一篇文章透露了本身决定参与抗战的过程：

热烈的感情压制我的一切，于是我就想在中国为和平奋斗而抗战的时期中，去过一种比较有意义的生活，与大乘佛教的精神既不相背，同时亦尽个人救国比较切于实际的一分天职。就在这个前提下，我和老同学们去参加过民大受训……（释竺摩，1991a：72）

在不违背大乘佛教精神下尽救国的“天职”，是竺摩当时参与抗战的一大原因。二战期间，他在香港期间曾每早见到街边都是尸体的惨况（释竺摩，2003：13）。有过以上的经验，竺摩对“和平”的体验十分深刻，而所谓的和平则要靠宣扬宗教来达致。多年后，竺摩撰文表示：

全世界人类深恐和平决裂，战争爆发，则人类将趋于毁灭……只有人类的道德力量，方足以阻止核子武器之应用，挽救生灵的涂炭；而佛教的慈悲和平的教义，必于此有绝大的贡献（竹园，1962：1）。

⁴⁰ 1939年还俗，俗名林子青居士（1910-2002），曾著多部佛学著作。详见佚名（年份不详），〈林子青居士〉，佛教书籍网，2014年3月14日阅自<http://www.fjzjg.com/files/article/html/2/2847/17123.html>。

根据竺摩的文章，1960年代的世界依然带有不明朗及动乱的局势，而经历过惊心动魄场面的竺摩，在多年后对佛教教义所能起的作用也仍抱持信心与期待。与此同时，竺摩也颇为关注世事，频频南下北上或至国外讲经说法。竺摩对佛教生起信心的根据，除了累积自早年修学生涯及师长们的指导，也不得不提他于澳门时期大病的经历。

二战的爆发，让竺摩回想起避难前后的不顺遂与业障深重，并在自传中形容那段日子是“放浪形骸”的（释竺摩，2003：16）。何建明进一步解释，所谓“放浪形骸”，是因为竺摩于澳门主要打理的《觉音》和研讨班，都已在这段日子中停刊或停办，相较之前较为闲空，而竺摩实际上还是边修养身体，边与文人往来（何建明，2006：473）。不料，竺摩却在1945年患上大热症，医生曾表示难有起色，竺摩此时放下万缘，在连续七天专诵观音圣号后，竟梦见大士放光治疗而病愈。竺摩的病愈让医生觉得不可思议，而竺摩亦从此更加用功诚信（释竺摩，2003：16）。

同年，竺摩也遇上了另一奇妙体验，于梦中获地藏菩萨指示：“南方世界，汝有千万可度之机……”，而此经历也明确指引竺摩，他度众的因缘在“南方”。自获得地藏菩萨指示后，竺摩不问世事，努力自修，后来又在定境及梦境中分别获得太虚及印光的指引：太虚希望竺摩能回到丛林，印光则鼓励他走入人群，再次指出“南方世界”是竺摩的弘法机缘所在（释竺摩、释继程，1984：12；释竺摩，2003：16-17）。竺摩以上的经历，在现今科学发达的时代而言，可说是相当奇特玄妙，而壮年时期的竺摩，也鲜少向一般信众提起此事。不过，竺摩往后的勤于修行及获得的体验，却也让他后来对佛教越发诚信。以上所述，也为竺摩之南来缘由，留下了一段传奇事迹。

竺摩大病前，还有一项特别际遇，让他往后更容易走进人群弘法。1939年春，竺摩被邀请到澳门功德林佛学研究班讲课。那年冬天，他宣讲《维摩经》时结识了前来听经的岭南派画家高剑父⁴¹（1879-1951）。竺摩从小习字，此时才因高剑父之建议而从之习画（释竺摩，2003：11）。竺摩从高氏习画的重要意义，在于促成了竺摩往后以诗书画为宣扬佛法的其中一个管道，常通过诗歌、书法及画作与信众交流或结缘。不过，竺摩更重视的是艺术的功能，曾以赵子昂画马变马为例，说明若能多画佛，则个人的内心能“和佛相应、清静”，也曾表示书画“可以使人心境幽雅、美化、清静、舒适”（释竺摩，1981：9；2003：90）。高剑父从事东西洋绘画的研究，画风融合传统绘画与日本画、西洋画的表现技法，如重视立体感、着色大胆等（焦点，2011：58）。本地书画家萧遥天（1913-1990）比较高剑父和竺摩的画风时，认为竺摩的确承续了高剑父“具有旧素养，而不因袭旧圈套”的作画风格⁴²（萧遥天，1956：8），而竺摩对高剑父的评价中，有一段话亦颇有意思：

其生平最得力的，当然是在艺术革命的教育，一生的精力耗消乎此，而一生的成功也正在乎此……他一生的苦心孤诣，努力不息，才有今日……（释竺摩，2003：95）

高剑父一生劳劳碌碌，画风新旧交融，是为了艺术的革命。然而，竺摩甚少对

⁴¹ 高剑父除了是岭南画派创立者之一，也曾任两广总督、参与革命活动指挥黄花岗革命战斗，民国后才回乡过艺术革命生活。详见释竺摩（2003），《行脚过千秋》，槟城：三慧讲堂，页92。

⁴² 萧遥天如此讲述竺摩的画风：“竺摩的画，所难能者，是他紧跟剑父先生之后的一派革新气象，具有旧素养，而不因袭旧圈套。李宝泉述剑父先生论画的主张，谓‘要写真的，要动的，要力的，要紧张的，要有意义的，要出于自然的，因为要写真的，当然就与逸笔草草底轻描淡写的精神相反了；因为要紧张的，当然就与出于无意而注重闲暇的精神相反了；因为要出于自然本身的，当然注重写生而放弃今不如古的观念。’这些观念，竺摩的造诣实在无惭师训。”

于艺术风格或画风发表意见，仅强调艺术能美化个己的人格以及群众的人格，其功能与佛法的理论相近（释竺摩，2003：91）。说到底，竺摩习画，除了培养个人修为，也因为艺术的目标与佛法的理论是不相悖的。

1940年，竺摩在澳门接编《觉音》杂志长达一年余，以个人之力负责编排、校对及送稿的工作，发行的部分则请他人帮忙（释竺摩，1940b：32），1941年10月竺摩因健康问题停编《觉音》。编辑《觉音》期间，竺摩仍与太虚、芝峰、弘一等人保持联系，在讲经时遇到疑问，也会向太虚与弘一请教，并把回函刊登在《觉音》。因此，《觉音》于那个纷乱年代在澳门的出版编辑，除了让佛教知识得以在港澳佛教界推广，也让中国大陆与港澳佛教界能互通消息。

只身在澳门生活，没有师长在身边的竺摩，于此关键时刻独立接触、摸索佛教各个领域。他在澳门不仅首次接编杂志，也开始主讲经论。1939年讲《维摩经》，就是竺摩的初次体验，用竺摩的语气来说，就是“始终由我个人搭上‘咁靚嘅’（笔者按：这么漂亮的）黄绸海青和红衣来负责讲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为始”（释竺摩，1939a：3）。生活于港澳区的日子，可说是竺摩最大的成长期。

1951年，竺摩在澳门创办了《无尽灯》，希望能通过此佛教杂志宣传佛学。1952年，竺摩为灯刊发展前途计而迁至人才较多的香港居住。1953年，明常法师（1898-1970）邀请竺摩到香港鹿野苑栖霞佛学院任教。由于竺摩当时已安排好翌年到槟城与檀香山的行程，故而曾尝试向明常推辞此邀请，但在明常一番说辞后打消念头。明常指佛教重因缘，因缘来了就先把佛教教育办起来，万一竺摩另有因缘离开香港，也自有其他有缘人来接棒，竺摩亦因而首次担任教

务主任⁴³半年（释竺摩，年份不详 a）。实际上，竺摩重“因缘”的思想，早在 1939 年已有所体现，竺摩当时因同学们需要研究唯识，以及澳门功德林打佛七需要一人讲经等种种机缘，而答应讲《维摩经》（释竺摩，1939a: 3），而此作风也通过竺摩南来后出任佛教界领导，以及不辞辛劳到处弘法的众多工作中一再表现出来。当然，竺摩之所以愿意到处弘法，也与他深信传播佛教教义可以改善社会风气有关。

太虚门下对竺摩产生影响的弟子还有法舫法师（1904-1951）与大醒，而法舫乃促成竺摩南来马来亚的重要人物。两位师长也曾主编《海潮音》，惜早在 1951-52 年间相继离世。竺摩曾在《无尽灯》撰文悼念两人，通过悼念词或悼文内容，可见两人推广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的特质，也可见竺摩对两人之崇敬。1950 年，法舫至槟城讲学，鼓励槟城菩提学院王弄书居士等人办佛教中学，同时邀约竺摩同来槟城协助办学。在法舫推荐下，王弄书把竺摩从香港请了过来，可惜推荐人法舫在 1951 年病逝，让应邀来马的竺摩感慨不已（释竺摩，1983a: 21；释继传，2013a）。

竺摩印象中的法舫，是致力于佛教文化教育的工作者、佛教的杰出人才，他认为法舫有能力继承太虚遗志，印顺亦曾指出众人曾期望法舫能再磨练数年后，负起领导佛教的责任（释竺摩，1951b: 11；释印顺，1951: 12）。对于法舫的离世，竺摩十分感叹：

法舫法师是致力于佛教文化教育的工作者：他这二十多年以来……始终没有离开佛教文化和教育的岗位……堪能继承虚大师遗志者，首推舫法

⁴³ 有关竺摩的职务，有两个说法，亲笔手稿与简谱的说法为“教务主任”，竺摩自传的说法为“副院长”。笔者认为亲笔手稿比较可信，故采用亲笔手稿的说法，竺摩当时出任“教务主任”一职。

师……不幸竟随虚大师之后而去世了，真是令人伤心不已（释竺摩，1951b: 11）！

竺摩对法舫有高度评价，赞赏他积极推广佛教文化和教育。对于曾在闽南佛学院担任事务主任的大醒，竺摩也十分赞赏。1953年，竺摩在悼念大醒的文章上，引述了大醒曾说过的一句话：

要想佛教兴盛，我们僧众应要教养兼顾！但近代中国的僧众，已只有养，而没有教（转引自释竺摩，1953a: 14）。

叙述至此，太虚门下弟子所致力方向，无疑首推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另一方面，大醒在管理僧教育学院的同时，也参与编辑《海潮音》，竺摩更据此说明教育与文化是“不相离性，不能分家的”（释竺摩，1953a: 13）。这点可证明竺摩脑海早在此时已深植这种概念，而竺摩也在1970年兼任马来西亚佛学院院长与《无尽灯》社长，挑两大梁于一肩。

竺摩在脱离师长们生活的港澳地区取得了成长的机缘，频频讲经说法、办杂志、担任教务主任等。何建明在其著作《人间佛教与现代港澳佛教》中曾提及一点：“（1950年代初）太虚大师的门弟子如印顺、演培、续明、隆根等等，都在香港，为何香港各道场开办佛教文化事业不邀请他们，而都来邀请竺摩法师？”，继而叙述演培法师（1917-1996）等人当时在香港逗留的时间只有一至两年，还没有真正融入香港社会；而印顺在香港则居无定处，也和演培、续明等人忙于编辑《太虚大师全书》与《太虚大师年谱》，很少参加社会弘法活动，具体说明了他们的发展与竺摩不同的原因（何建明，2006: 276-277）。太虚的

学生当中，印顺与竺摩早期许多方面的特质与经历甚为相近。我们将进一步分析，竺摩如何在众多才学相当的出家人中“脱颖而出”继而邀请南来，并以印顺的际遇作一个案例说明。

竺摩于秋季开课后才到闽南佛学院，印顺则比竺摩再迟一学期（1931年2月）才到闽南佛学院当插班生。竺摩20岁（1933）即跟随太虚赴潮汕讲学为侍录，后发表《六祖坛经书志学之研究》一书译文于《现代佛教》（前身为《现代僧伽》），又以“昙伦”别号发表〈无著的学说〉、〈苏东坡的佛教思想〉译文及武院之讲稿〈唯识学上的种子义〉于《海潮音》⁴⁴，其简谱载：“从此时起，以致【至】今日，誉满僧林，四众共仰”（释竺摩、释继程，1984：7）。这时的竺摩不仅已有能力发表佛学文章，更凭此获得了出家众与在家众的认同，至港澳之后又相继获得接编《觉音》⁴⁵与创办《无尽灯》的机会。对于竺摩接编《觉音》一事，当时的编辑对他颇有信心，在第12期的〈编后话〉这么表示：

以他的才学来负本刊主编之责，是绰有余裕的。以后我们想在他的指导下，充实内容……（释满慈，1940：28）

其时，竺摩也不过27岁，但他的才学已然获得他人肯定。担任主编，无疑让竺摩与僧俗的交流机会增加，同时也相当频密地与港澳信众及文人往来。相对于竺摩成名之早，印顺在1941年，才因教学于四川合江法王学院而有了“导师”的外号。然而，早在学僧时期，大醒已发现印顺讲学的才能，并于1931年8月初介绍印顺至涌泉佛学院讲课（释印顺，2009：16）。据《太虚大师年谱》

⁴⁴ 佛学刊物，创刊于1920年，1950年移至台湾发行。

⁴⁵ 佛学刊物，1938年3月于香港创刊，原称《华南觉音》，期间曾停刊数个月，第十期复刊后改称《觉音》，第十三期编辑部迁往澳门。

所载，太虚于 1931 年 2 月已在闽南佛学院讲授“大地宗地图”（释印顺，2011：207），但印顺则迟至 1934 年才正式与太虚碰面（释印顺，2011：编者附言页 1）。无论印顺与太虚见面的确切日子为何时，竺摩无疑较印顺更为频密亲近太虚，他自闽南佛学院毕业后，已赴潮汕及闽粤为太虚侍录。

尽管印顺亲近太虚的时间较晚，但他和竺摩一样，在佛学研究方面也有天赋。他在 1932 年上学期回到闽南佛学院后，即应大醒之吩咐为同班同学讲课。实际上，印顺此时也不过刚出家近两年。1934 年，印顺奉太虚交待，往闽南佛学院教授《三论玄义》；1936 年再应太虚之命到武昌佛学院指导三论研究（释印顺，2009：16；佚名，年份不详 a）。竺摩与印顺早期的交游圈子都与太虚有关，在佛学方面皆有天赋，而印顺也在法舫一再催促下离开中国大陆。

虽然印顺及竺摩都与法舫有联系，但两人在香港的交游却大异其趣——竺摩于 1938 年到澳门，1952 年迁港，居港澳期间因编辑刊物与喜爱文学而频频与信众及文人交流，讲经内容也被认为丰富生动。至于印顺，则自 1949 起居港三年，曾在其自传中写成了一章〈香港与我无缘〉，也在自传中透露个性使然而仅在僧团自修，不与居士们打交道；即使给信众讲经，也因为本身口才一般而引不起听众的兴趣（释印顺，2009：41-47）。竺摩与印顺之后分别长居马来西亚与台湾，除了可用佛教用语“因缘不同”来解释，实际上也和两人在香港时的交游与性格差异大有关系。印顺此时已在僧团中大有名气，曾被道安法师（1907-1977）称为“虚门四杰”⁴⁶（释道安，1951：10）之一，但却不喜频密接触信众；竺摩则因编辑刊物之利以及本身交游广阔，与僧俗二众的关系可说比印顺来得好。相较之下，竺摩的个性更适合办佛教中学的工作，而这或许也是法舫引介竺摩南来而非印顺的原因。

⁴⁶ 其余三人为法尊法师、法舫法师与芝峰法师。

旅居港澳期间，竺摩目睹了基督教在当地的蓬勃发展。之前曾述，竺摩在1938年激励佛教青年追上西方宗教的发展步伐，但他往后除了借基督教的发展来勉励佛教徒自强，偶尔也会对基督教有一些批评的文字。1950年代，因殖民地统治之故，香港是基督宗教的重镇，而新中国成立前后，香港的一个基督教丛林曾收留很多内地的佛教出家人，然后“劝导和帮助他们还俗”，继而改信基督教（转引自何建明，2006：591、620-621）。太虚对基督教的观感无疑曾影响竺摩，但竺摩日后借基督教来谈佛教，或有意无意以耶教的发展激励佛教徒办教育的作风，可说与基督教长期以来对佛教的威胁脱不了关系。

港澳时期的竺摩，已没有师长在旁让他亦步亦趋，许多师长亦相继圆寂。这个时期，竺摩算是踏入了个人的实践与成长期。港澳生活期间，竺摩先是积极抗日救世，继而逐步接触弘法、办《觉音》，再者是生大病的奇遇，都为竺摩往后的弘法机缘添上了几笔传奇意味。至于之后积极弘法、再办《无尽灯》、办教育等，虽说是为了培养人才、为了对抗基督教的发展、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实际上也都是竺摩重视因缘与入世精神的体现所在。

第四节 槟城定居时期：担任领导的思想成熟

如前所述，竺摩于1954年南来是为了协助办理佛教中学。不过，南来马来亚初期，竺摩应无长久居住的打算。他曾表示本身“浪迹靡定”，而三慧讲堂住持继传法师亦透露，竺摩原本只计划过来当佛学老师，外缘也没那么多，后来金星法师邀请竺摩组织马来亚佛教会，他才逐渐在马来西亚生根（释竺摩，

1957a: 1; 释继传, 2013a)。可以想见, 竺摩是在马来亚法务渐重后⁴⁷, 才决定以槟城为根据地, 在此“南方世界”开展其将近五十年的弘法与修行之路。来马后, 竺摩因其才学能力之故, 也先后担任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主席与马来西亚佛学院院长, 其思想在此时已逐渐步入成熟期。

谈起马来西亚正信华人佛教之始, 许多佛学研究者必定以妙莲法师(1824-1907)于1888年南来后为起始。妙莲随后在槟城创建极乐寺⁴⁸, 建筑过程长达15年之久(释本忠, 1923: 7), 至1906年方建竣。据释开谛(2010)的说法, 1888年之前(本地)的寺庙并没有讲经宏扬佛法的记录(编者序页3)。骆静山亦指出正统的华人佛教在极乐寺创建后才出现: “有实学的名僧, 讲经说法……把佛陀的信息传递给广大的华人群众”, 而竺摩也认同极乐寺成立的意义在于它促成了讲经论道的法会, 这也是直接造就了槟城成为全马佛教重心的重要因素(骆静山, 1984: 435; 释竺摩, 1983a: 15)。此外, 《槟城鹤山极乐寺志》中也有一段记载: 自妙莲、得如法师(1855-1902)、本忠法师(1868-1935)讲经后, 信众们更倾心于探索佛教义理、诚心向佛或“流连宾主问答, 谈因说果”(释宝慈, 1923: 88)。简言之, 讲经说法乃当年极乐寺予人的重要印象。

不过, 由妙莲等人带来的正信佛教, 在20世纪初却难以在全马来亚民间广泛传播, 原因在汉传佛教信仰不纯、佛教界不团结及出家人不足等问题。早期马来亚华人社会的组成结构与中国原乡不同, 大多为劳苦阶级、教育程度不高,

⁴⁷ 竺摩的法务, 包括领导创办马来亚佛教会并当上第一任主席(1959), 而他于1951年在澳门创办的《无尽灯》, 也已随着他弘法的足迹于1957年迁至马来亚出版。

⁴⁸ 极乐寺乃早期槟城管理得较为有系统的寺院, 当时乃福州涌泉寺下院。大多到槟城的法师, 都与极乐寺或其上院福州鼓山涌泉寺, 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其中包括长期驻锡的本忠法师(1868-1935)、志崑法师(1885-1964)、伯圆法师(1914-2009)、真果法师(1905-1995)、明德法师(1895-1961)、广馥法师(1920-2006)等人; 短期逗留的则有虚云法师(1840?-1959)、圆瑛法师(1878-1953)等人。

信仰方面也是佛道混杂的。僧人南来多为人们办祈福度亡的法事，但很大程度却是因应贫苦华侨的精神需求而存在。开谛法师（1964-）也从另一角度进行评论，认为早期让人们有精神寄托的出家人是可敬的（释开谛，2010：64）。尽管极乐寺乃本地正信佛教的源头，然而佛教因早期民间积弊难除、佛法知识贫乏，能长期弘法的僧众也不多，因而极乐寺虽在上世纪初已出现在槟城，仍无法改变整个大环境，以往在本地生活多年的华人也仍多处于迷信或道佛不分的阶段。另，早期一篇文章也道出佛教自中国传来时原本就不健全，而马来亚佛教也因为原乡传统而混杂了其他仪式，再者佛堂上也摆上了鸡鱼鸭等供品（沈西屏，1940：6），故一般信众无法分辨佛、道，是可以理解之事。以上弊端在多年后仍未被完全扫除，而我们也仍可以通过西方研究者或本地出家人的文章找到人们道佛不分的叙述（释伯圆，1959：无页数；Victor Purcell，1967：119）。

针对汉传佛教不纯的情形，竺摩及学者王仲厚（生卒年不详）曾根据信众的情况进一步分析，认为弄不清教理的佛教徒，才是马来亚佛教发展的软肋。两人认为应通过传扬佛教教义把人们引入正途，王仲厚更直接说明佛教刊物有着“宣扬佛教文化而启导人心”的重要意义（释竺摩，1956：2；王仲厚，1957：2）。因此，于1959年落脚槟城的《无尽灯》就在此时扮演了吃重的角色。隆根法师曾指出“灯刊是星马佛教唯一的佛刊”（释隆根，1963：17），其早期读者除了锁定僧俗二众，《无尽灯》也特开辟一栏〈无尽诗草〉刊登竺摩与马、新、泰、印尼文人与信众的唱和诗，其中的文人包括管震民、黄晚香（1911-?）等人。在佛学作品方面，除了竺摩的演讲稿与文章，以及解答信众疑问的《佛学问答》一栏，也偶有圣严法师、演培与王仲厚等人的来稿，《无尽灯》当时可谓备受众星拱照，自然也在这南方国度中具有极大影响力与号召力。

佛教界作出的另一项与文字相关的努力，乃成立佛学书局，此书局于 1963 年 1 月由隆根、竺摩、广馥法师（1924-1996）及清亮法师（1924-2010）合资开办，“宗旨在弘扬佛法，普及佛化……目的在流通佛经，为推行佛教的文化事业而服务”，竺摩也希望人们通过多读佛书化除对佛教的误解。此书局后来于 1964 年迁至新加坡，由隆根独资经营（释隆根，2001：86、89；《无尽灯》记者，1963：29）。通过竺摩办杂志和佛学书局的做法，我们已得以进一步了解，竺摩十分希望同属佛教文字性质的《无尽灯》和佛学书局可以扫除佛教长久以来的弊病。

相较全马的佛教环境概况，竺摩当年居住的槟城无疑较为得天独厚⁴⁹。不过，最具代表意义的极乐寺始终仍只是槟城一地的寺院，仍无法为马来亚各地提供很好的沟通平台，佛教界也仍未有团结一致的概念。《无尽灯》读者陈与新在 1955 年投函记述槟城佛教界的来宾及动态，无意中透露了槟城佛教界的近况：

国际的教友接二连三地经过槟城，访问教情，因此，在寂寞的槟城佛教圈里，又激动了一番热潮（陈与新，1955：29）。

据此可以得知，当时极乐寺虽引进了不少出家众，但槟城的佛教活动，或是积极参与活动的僧俗二众，可能都是同样的面孔，才会让以上引文作者有着“寂寞的槟城佛教圈”的感叹。

⁴⁹ 槟城早在 1906 年就有了正信佛教象征意义的极乐寺，1914 年建立了洪福寺，1925 年资金雄厚的居士团体槟城佛学院成立，1939 年菩提学院成立，而菩提学院办理的菩提小学（1946）与菩提中学（1953）也为槟城佛教界带来了另一番新光景。菩提小学的建立，让槟城佛教界对佛教教育有所醒觉，团结起来发起组织“槟城佛教徒维护菩提学校委员会”，推选槟城有名望的出家人如志崑法师（1885-1964）、真果法师（1905-1995）、本道法师（1898-1987）等与菩提学院诸居士等十一人为常务委员（《菩提特刊》编辑部，1947：32），而菩提中学更是成就了竺摩来马的因缘。

以上所述皆为槟城的佛教界情况。在马来半岛而言，佛教发展也曾有过短暂的火花。早期本地佛教界曾在太虚访问马来亚后⁵⁰，积极加以推广新佛教运动，但因为干部操持太急、无恒心，加之旧派势力太大，所以不见成效。因此，曾有人这么表示，“说新佛教运动曾在马来亚发生过嫩芽是可以的，但说它是夭折也不为过”（沈西屏，1940：7）。可以想见，早期应领导教众的马来亚出家人，也有着分派的矛盾与冲突，而佛教界此刻的主要问题就是不团结。1954年间，竺摩本着佛教界应团结为由，叮咛当时的主编超尘法师在取稿方面以弘扬佛理为主，避免人身攻击或会引起争议或笔战的文章，以免大家因为争执而伤了和气（释竺摩，1954b：27）。佛教界和谐与否对当时的佛教发展而言是一大障碍，而这也是竺摩多年来最为关心的一点。至于竺摩维护佛教界和谐的方法，笔者认为应当是“忍”——他常向信众及学生灌输“忍”的观念，并将“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合在一起讲：

佛听了很为感动，同时也很欢喜，认为自己过去所修的“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大乘行门，如今也有人⁵¹在实行了（释竺摩，1959：4）。

至于忍能感化人心的事迹，竺摩举例过去中国一大丛林住僧千人，甲僧失款后坚指是乙僧所为，乙僧有口难辩，为平事端忍受此罪名离开寺院。后来甲僧发现款项未失，恳求乙僧回寺，而乙僧也因为本身难忍能忍，被众人所景仰（释竺摩，1973c：41）。可见在竺摩的观念中，为了佛教界的融合与团结，对教内

⁵⁰ 原文所记为1920年代。笔者翻查《太虚大师年谱》，确定太虚抵达星洲的日期为1926年9月2日。释印顺（2011），《太虚大师年谱》，北京：中华书局，页145。

⁵¹ 本引文中的“人”，为佛陀的弟子旃陀。在一次的洪水泛滥灾难中，旃陀大难不死，到村外求得许多食粮回村救济灾民。灾民闻有食物，纷纷跑来抢食，旃陀在混乱中被挤断了一只手臂，但见灾民有食，自己也忘了痛苦。

的同仁忍一时之气是必要的。

马新佛教界在 1928-1958 年之间的僧众很多，但都聚居在各佛教道场中，所以很少有自立的寺院；加之交通不便，僧侣之间极少与没有深交的僧侣互相造访，许多出家人往往在这里居住数年后就回乡。在马来亚佛教会成立之前，本地佛教界虽有出家人，有教徒，但却是“一盘散沙”（释寂晃，1984：36，释金明，1959：5；释广馀，1959：12）。战后，英殖民政府实施华侨居民登记证，由于出入境受限制，很多僧人才决定长期居留并买地建寺。这么一来，又变成寺多僧少了。这时期的佛寺数量增加，引起英殖民政府的注意并有意加以管制，金星及金明法师辗转获知此消息，认为应在此时组织马来亚佛教会来反对此事，并到全马各州宣传筹组马来亚佛教会的必要（释寂晃，1984：36）。获金星邀请出面领导筹组马来亚佛教会的人选正是竺摩，并在 1957 年之前开始筹备此组织。不过，竺摩期间出国，筹办进度也因此而耽搁，至竺摩在 1958 年年杪回槟才重新启动筹办工作，而马来亚佛教会最终于 1959 年 4 月 19 日成立，佛教界的团结情况也有所改善。前文提到的〈荡执成智〉中，竺摩列举的槟城大小寺院名单里有“白衣堂”、“祥云菴”、“宝月宫”和“青龙宫”等，部分道场已由出家人住持（释竺摩，1983a：14）。继程补充，当时马来西亚佛教的寺院力量还是相当单薄的，因此竺摩也接引了许多“斋堂”加入⁵²，壮大佛教的力量，而马来西亚佛教界有斋姑出家，其实都是竺摩发挥的力量（释继程，2016）。

马来亚佛教会成立之后，本地佛教的弘法、文教等事业，才出现更有系统的规划，如接手《无尽灯》的编辑出版工作，组织弘法团和创立马来西亚佛学

⁵² 斋堂除了加入马来亚佛教会，也在 1970 年代的马来西亚佛学院成立时，把子弟送到学院就读，而这都是竺摩等长老的功劳。详见杜忠全、释学山（2010），〈竺摩法师对大马汉传佛教的贡献——以马佛学院对斋堂佛教化之影响为考察目标〉，收入郭莲花，梁秋梅合编：《马来西亚佛教回顾与前瞻》研讨会论文（页 171-182），八打灵再也：马来西亚佛教学术研究会。

院等，而竺摩亦担任马来亚佛教会主席长达 12 年（1959-1971）。在这期间，竺摩除了频频在《无尽灯》上发表文章，也积极通过言语来弘法，多年来南下北上跑遍多地说法。在这个道佛不分的时代中，竺摩的努力更能让人体会其希望能通过勤于弘法，让佛法更加普遍民间的用意。马来亚佛教会在 1959 年成立后，也于同年组织星马弘法团，竺摩为该团团长。该团有 34 人，包括中国、锡兰、泰国等不同国籍的法师以及歌咏队工作人员到各地弘法，“弘法地点不是体育场，便是公共大礼堂，听众有数千人，情绪殊佳，弘法收到意外效果”（释伯圆，1959：无页数）。由此可见弘法团的效应，以及信众对弘法团的热切期望。

马来亚佛教会尝试以更通俗的语言及方式宣扬佛学，而这也与金明对佛教会“团结去做弘法利生的工作”的期待相一致；另一方面，佛教会也成功集合了众人的力量，在佛教界推动许多活动（释金明，1959：5-6；释竺摩等，1966：23）。此外，马来亚佛教会也曾分别恭请默如法师（1905-1991）、演培及超尘来马弘法⁵³，并在 1962 年由隆根、金星、金明、寂晃法师（1920-2011）等组织为期三星期的中南马六人弘法团（释隆根，2001：85），1968 年由竺摩率团至砂拉越与吉兰丹巡回弘法等活动。不过，竺摩仍惋惜人才不足，许多更重要的工作，如以英文弘法等工作仍无法推展（《马来西亚佛教总会 50 周年特刊（1959-2009）》编委会，年份不详：36；《无尽灯》编辑部，1963：33）。

马来西亚佛教的特色，乃汇集了北传、南传与藏传佛教，其中又以南北传佛教的发展较为兴盛，而南传佛教弘法的语言以英文为主。吉隆坡十五碑乃著名的南传佛教根据地⁵⁴，出家僧侣也多用英文宣传佛理，这与竺摩指英文弘法工

⁵³ 三位法师到马来亚弘法的年份分别是 1960 年（默如法师），1961 与 1963 年（演培法师），与 1961 年（超尘法师）。

⁵⁴ 19 世纪末，在铁道局工作的斯里兰卡人，成功向英政府申请位于吉隆坡十五碑约两英亩大的土地兴建佛寺。获批准后，他们即刻推动建寺计划，并于 1894 年 8 月 25 日进行动土礼，是斯

作无法推展的说法似乎存有矛盾。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虽然有使用英语来宣传佛教教义的人才，但毕竟还是少数。竺摩希望汉传佛教法师能以英文弘法，而竺摩本人也曾经于 1960 年在锡兰佛寺巴利文学校周年纪念会上演讲。再者，其笔下的南传佛教（小乘）与北传佛教（大乘）在教理上主要有利己与利他之别，而南传佛教的出家人，大多只宣传南传佛教教义，故竺摩提倡“以英文弘法”，应是指由北传佛教法师或弘法员同时宣传南北传佛教教理。早期的《无尽灯》（1958 年 1 月），也已经特别聘请英文编辑处理英文佛学文章，尽管篇幅相对之下比中文佛学文章少得多，但已可见当时仍由竺摩任社长的《无尽灯》已开始采取行动，把传播佛理的对象扩展至受英文教育的佛教徒。

随着时间渐逝，以及 1949 年之后可以自由进出中国大陆的出家人大为减少，逗留在本地的青年僧人也逐渐迈入老年，因此自行培养本地出家人，已是佛教界需迫切解决的问题。僧侣来源受限与老年化，让马来西亚佛教发展在 1960 年代面对另一阻碍，下以槟城为例说明此问题：

按槟城已是僧荒，如今既已加添这些法将⁵⁵，今后佛教可望有番大大发展云（《无尽灯》编辑部，1964：27）。

自中国大陆解放后，交通断绝，南洋出家风气未开，因而极乐寺的住僧没有新增，大多为旧住的老年人了。以后寺僧的来源，只有希望在南洋获得

里兰卡在海外建设的第一座佛寺；后因具备佛殿、菩提树和佛塔，而被称为“佛教大寺院”（Buddhist Maha Vihara）。达摩难陀法师（Dhammananda, 1919-2006）于 1952 年从斯里兰卡来到这座锡兰佛寺，并于 1960-1970 年代积极到全国各地弘法。作者不详（年份不详），〈佛教大寺院历史〉，十五碑周日佛法学校网站，2016 年 3 月 22 日阅自 <http://www.bisds.org/site/佛教大寺院历史/>。

⁵⁵ 笔者按：当时有六位法师先后从台湾到此弘法，即善归法师（？）、续明法师（1918-1966）、希性法师（？）、真光法师（？）、性悟法师（？）、瑞源法师（？）。其中的希性、瑞源与真光皆是从福建鼓山涌泉寺到台湾的法师。

解决，否则即要出现寺大僧少与后继无僧的困境（释隆根，2001：69-70）。

本地佛教虽在外来出家人长期驻锡之下而渐有起色，但佛教发展最为兴盛的槟城在1964年已现缺乏佛教僧侣的问题，其他州属“后继无僧”的情况恐怕更不乐观了。

由于马来西亚佛教会成立初期就有许多参与筹组的出家人与居士皆来自槟城，因此继马来西亚佛教会总部设立在槟城之后，马来西亚佛学院也于1970年在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建筑的三楼开办，而这也是佛教界长老们为解决僧源不足所提出的对策。竺摩被委为佛学院院长，并在佛学院成立初期与董事长真果法师（1905-1995）专程南下招生或筹募佛学院经费（释继程，2016）。这时的竺摩，可算是完全走到了太虚一派的路子上去了。马来西亚佛学院当时成立的宗旨为“办学兴教、培植主持佛教、弘扬佛学的人才”（释竺摩，1976：5），教学科目包含现代科目与佛学课程，而竺摩也自1970-2002年担任马佛学院院长，惟在1990年逐渐把马佛学院的管理权力释出。佛学院获得居士黄荫文（1899-1988）、陈少英（1911-1984）等人从旁协助，同时招收僧俗二众的学生。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出家众与弘法人员不足的问题，继后也有一批在家学生修读课程后发心出家并投入佛教事业的推展工作。自马佛学院毕业后，部分学生也往台湾、香港等地升学。截至1990年，学生深造的院校包括台湾华严专宗学院、福严学院、圆光佛学院，以及香港珠海大学等（陈延进，1990a：19），出路颇广。

相较西方宗教在本地的发展，佛教在马来西亚因为缺乏有系统与大规模的推动而相对缓慢。然而，通过以上所述，马来西亚佛教当时的局面虽然“缺乏生动活泼的表现”（骆静山，1984：436），眼前也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

却是当时教界人士上下一心合作而得的珍贵成果。至于竺摩个人在这方面的努力，则是在 1965 年创建三慧讲堂，1966 年开光，讲堂开光前后接引了相当多的信众，因当时在马星只有这一间讲堂，以致于“每逢周日讲经，座无虚席”。讲堂的周末念佛会也提供机会让弟子或素质比较好的信众学习公开演讲，出家前的唯悟法师（1949 -）与马佛青前会长梁国兴居士（生年不详）也曾被竺摩安排在念佛会给大家讲课（释竺摩，1983c：10；释继传，2013a；释竺摩、释继程，1984：26-28），竺摩栽培弘法人员的用心也经由此安排体现出来。

纵观竺摩多年来的活动，虽然他总是在众人推选之下担下重任，却往往不负众望，非但是过程中的主要执行者，也是最有力的推动者；而他曾弘法之处，更有信徒因而发心建立寺院，马来西亚丹绒马林的“佛宝林”，即是一例。通过竺摩的简谱，也可见其南来后，即马不停蹄在马来亚各地进行弘法活动。另外，也有一些道场或斋堂把寺院住持一任托予竺摩，或邀请他担任导师；吉隆坡宝林法苑，便是在 1960 年请竺摩担任导师，而竺摩多年来亦多次往返该地弘法或主持皈依等仪式。1971 年，当时的住持演智法师（？-1971）于临终前数日召集护法百余人，并在大众前委托竺摩担任住持（释竺摩、释继程，1984：37），可见竺摩当时的声望与深得人心，而这种声望是竺摩多年来默默耕耘累积而来。在早年交通不便的年代，要这么舟车劳顿是十分累人的，若非全心付出，恐怕很难坚持那么多年。至于本地唯一受政府承认的马来西亚佛学院，自成立至后期的维持，更是有赖竺摩的付出。竺摩与马来西亚佛教较为重大的发展事项都甚有渊源，因此谈起二十世纪的马来西亚佛教，必不能不谈竺摩。

基本上，早期马来亚有知识的僧人并不多，故而彼此更能惺惺相惜，合作无间。竺摩在本地的交游，很大程度上也能看得出他对弘法的倾向，因此接下

来的部分，笔者尝试通过竺摩对几位法师的评价，包括金马仑的演本法师（1872-1957）、马六甲的金星及台湾的白圣法师（1904-1989），进一步了解其宣传佛教的理念。

观乎竺摩多年来的文章，在南洋僧人而言以演本最受其尊重。演本晚年出家，俗名尤雪行，号惜阴。出家前曾编刊物、任圣约翰大学教授，与弘一是同事兼同门；在上海编《佛学浅说》之类的著作，经印光审定后，也广泛流传海内外。竺摩透露其编成的书流传很广，让很多读者因而相信佛教，影响可比《海潮音》（释竺摩，1957b：15）。演本曾短暂驻锡槟城，也曾在菩提学院讲经；二战结束后即敦促菩提学院复办义学（陈秋平，2004：181），后于1945年至金马仑三宝万佛寺任住持至圆寂，由本道法师（1898-1987）继任住持。曾有人这么说：“弘一法师有儒者气，印光法师有佛者心，而演本法师兼有儒气佛心”，《无尽灯》主编梵影法师（生卒年不详）也表示，像演本这样的德学，星马佛教似乎找不到第二人（释梵影，1957：28）。尽管驻锡槟城的时间不长，演本之后始终在马来亚生活，曾和1954年来宾的竺摩有过不下二十封的书信往来，其中跟教内事与《无尽灯》编务相关的至少有六封。演本圆寂后，竺摩撰写了一篇名为〈哭演公！哀佛教〉的悼念文章，深切表示他对演本离世的哀痛与惋惜。文中也透露演本圆寂前半个月，曾在一星期内给竺摩寄去手书六封，提示《无尽灯》取稿的意见，也从《大藏经》亲手抄出六千多字的经文，并加按语，请竺摩发表在《无尽灯》。如斯的长者，让竺摩深刻体会“（演本）为佛教做文字宣传的工作，真可以说做到献出最后一个呼吸为止”（释竺摩，1957b：15-16）。

演本让竺摩深感愧疚的另一举动，是其于1955年在病中仍牵挂竺摩所协助的《太虚大师全书》经费筹款事宜（马星地区）。竺摩指出，演本于金马仑的

筹款数额，所得的数目“竟与怡保相等”，而竺摩两个月前寄给演本有关筹款的信，更获得演本珍而重之摆放在书桌正中昭告来者，而演本也把所有“过手的净资，都拿出去做功德，而多半用为印经”（槟城行脚僧，1955：25）。至于两者频密的书信往来，以及演本对竺摩的实际支持，都实在地展现了两者的交情。竺摩与演本先后驻锡菩提学院，两人之间的来往与交游实际上也只有短短三年，但具深厚个人涵养及热诚的演本圆寂后，却让远在槟城的竺摩在接获消息时“不禁为演公哭！为佛教哀！”（释竺摩，1957b：15-16），让人们深切体会这位高僧的离世，对佛教界而言无疑是重大的损失，而演本在竺摩心中的崇高地位也更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本章曾提及竺摩乃应法舫之邀来到马来亚办理佛教中学。当时与他俩有交集的出家人为怡保东莲小筑的胜进法师（1891-1974）与三宝洞的宗鉴法师（1916-1981），以及马六甲香林寺的金明与青云亭的金星。在一次的演讲上，法舫如此透露：

我这次到怡保来，是为了亲近两年不见的胜进与宗鉴法师以及看看诸君，并参观这怡保唯一的佛寺（释法舫，年份不详）。

法舫指的“唯一的佛寺”，乃胜进创建的东莲小筑，大致可见当时怡保佛教发展的状况。竺摩在另一篇文章则提到法舫与金明金星两位法师的交谊：

他们两位（金明、金星）与法舫法师亦颇要好。曾几次来信邀游该地，以忙于奔跑，至今未能践约……（槟城行脚僧，1955：25）

他们四位既同时与竺摩及法舫相熟，在竺摩南来后的动态中也曾见他们的名字，故彼此的理念应当相近。在竺摩努力推广佛教事业之时，他们也曾共同推动数项工作。之前提及，金星特邀竺摩领导筹备佛教会，但竺摩敬重志崑法师（1885-1964）名望，因此改请志崑出任筹备会主席，本身则与胜进、金明与振敏法师（生卒年不详）共同担任副主席，并由金星担任总务（《南洋商报》，1957：11；释竺摩、释继程，1984：16），主要推动者的任务由竺摩负责执行。筹办马来西亚佛学院时，竺摩、金明、金星、宗鉴与胜进也是十一名筹委中的成员（释继程，1996：23）。四名长老比竺摩早离世，笔者暂查无竺摩是否对四人有追悼文章⁵⁶，不过在竺摩简谱中，对金星的离世有最长篇幅的文字：

七月⁵⁷，创办佛总主要发起人之一的金星法师圆寂，师闻噩耗，甚为痛惜！以师任佛总主席十二年间，金星法师亦任总务达六七年之久⁵⁸，为此一全国性之佛教总机构，奔走各州，联络教友，不遗余力，任劳任怨。后任弘法主任，各地巡回弘法，无一不与其会，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彼逝世时，师以堂院发生特别事故，未克亲睹遗容拜吊，不胜遗憾（释竺摩、释继程，1984：50）。

金星与金明乃同门师兄弟。金明接任竺摩为佛总主席长达24年，而金星终其一生担任的职位虽止步总务与弘法主任，但其贡献并不能仅以佛总的职位来下定论。

⁵⁶ 笔者已翻查多年来的《无尽灯》，并无刊登竺摩对以上出家人的悼念文章。

⁵⁷ 笔者按：简谱上所注日期有误。金星法师是在一月圆寂的。

⁵⁸ 笔者按：简谱上所记，金星法师总务年限有误。在竺摩主席任内，金星亦担任了三届（十二年）总务。从第四届至第六届，担任弘法主任。

金星离世后，《无尽灯》刊有一名蔡炯松居士对金星的追忆文。文中提及，金星 20 年来每周五天不间断在马佛总分会演说佛理，坚持不向外化缘，不做死的功德；圆寂前一个月还抱病到佛学院讲《四十二章经》与《八大人觉经》。金星对于佛教发展不遗余力，除了特地北上槟城请竺摩领导组织佛教会，也曾努力安排太虚于战前到来本地（蔡炯松，1980：31），可见金星的眼光与用心。至于金星请竺摩出面领导，自己退居总务的气度，与竺摩负领导之实，但却转请志崑出任筹备会主席的做法是一样的。

笔者认为，金星离世前为佛教发展孜孜不倦、抱病讲课的态度，对比演本圆寂前仍对竺摩交托之事念念不忘的关心，都是让竺摩感念在心的举动，也是与竺摩理念相同之处，因此竺摩才会在这两位出家人圆寂后，有着深刻的感慨。金星全心钻研佛教经典，同时每天向游客香客讲佛法，并善用自己的语言天分，“逢西洋人讲西洋话，逢中国人讲中国话”（蔡炯松，1980：31）。金星和竺摩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不看与佛学无关的书籍报纸，但因金星本身另有语言天赋，因而这并未在其弘法路上构成明显的障碍。

本节要谈的最后一人是来自台湾的白圣，乃槟城极乐寺第四任住持。在佛教界，因台湾的“中国佛教会”之故，白圣曾是一名具争议性的人物，由于无关宏旨此不赘谈。然而，竺摩在白圣圆寂后撰文追忆，对白圣的评价全是正面的，认为他不仅在马来亚佛教会成立的过程中出力颇多，也是促成佛学院成立的关键人物之一，并多次在佛学院讲经授课。文中也曾提及白圣在晋山担任极乐寺住持前夕，有人传发很多不利于他的传单，但他都“大量能容”置之不理（释竺摩，1990b：43-44）。据继程的说法，竺摩一向不公开讨论教内的是非，即便是继程要求竺摩口述录音以记录历史，竺摩最后也不了了之，同时也不公开辩

解别人对自己的误解或影射。竺摩的这种做法，继程以“厚道”名之（释继程，2011：11）。这种做法与白圣的态度也很接近，而竺摩为教界和谐而“忍”的原则，基本上也可从中窥见一二。

竺摩不仅不在公开场合讨论佛教教内的事情，对弟子也尽量不论人长短，同时也鲜少撰写人物专文。因此，竺摩在以上三位出家人离世后的言语文字，相较之下就非常难得，这也透露了竺摩本身的才性。然而最重要的，还是竺摩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他对本身所敬佩的出家人之关怀重点，全都与他本身曾推动的领域，或是所挂心之事相关。竺摩日后举办画展所得，或是处理果仪或贺仪的方式，也与演本雷同——1950年代的画展所得捐给了佛教中学升学金与印刷《无尽灯》丛书；往后的果仪或贺仪，也大部分捐给了马来西亚佛学院。根据目前可见的资料，竺摩每次捐给佛学院的金额大多超过一万元，捐给其他寺院的建筑基金、赈灾或施药所的金额，却不超过一百元（南洋商报，1954：5，1962：15，1970：19，1976：12，1981：8）。捐款金额的多寡，也再次说明竺摩一生所注重的领域，都在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事业方面。

然而，相较演本与金星圆寂前仍关心佛教事务，竺摩在圆寂多年前即已逐步淡出佛教总会与佛学院管理层的作法，似乎又与其理念有相矛盾之处。担任佛总主席12年后，竺摩于1971年因“倦勤”而卸任（释竺摩，释继程，1984：36），也早在圆寂12年之前的1990年释出佛学院管理权。然而，若再细看竺摩担任佛总主席（1959-1971）与佛学院院长（1970-2002）的年份，竺摩其实在1970年已身负两大重任，既要领导佛教总会，也要管理佛学院。这对刚起步的佛学院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至于竺摩弃佛总而取佛学院，或更能说明在两者间，他更倾心于推广佛教教育。第二个原因，乃当时的马来西亚佛教界已逐步

成熟，也有人选足以担当佛教界的领导之责，而竺摩本意不在领导佛教界（释竺摩，2003：26），故较能安心退下主席一职。相对而言，在佛教界最有能力办学的，恐怕非竺摩莫属，而竺摩也全力以赴，不领职薪发展佛学院，因此才会在1980年代后期总是无法辞掉院长一职，以至于在1990年院务会议上自嘲“挂名院长”。

至于竺摩坚持辞掉佛学院院长一职，年纪老迈体弱或是其中一个因素，但应该还有其他原因。第一个原因乃栽培接棒人，竺摩自始即很关心青年，并且总是鼓励有能力的弟子继续深造佛学，年青人是否能及时栽培好，是竺摩极为挂心之事。1990年，竺摩安排了副院长人选后才闭关，而此副院长人选即竺摩的弟子继程。继程早年曾任教佛光山东方佛教学院（1980），并于同年获得圣严印可教导静坐（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年份不详），也是少数获得竺摩允许学习书法的弟子⁵⁹，是一位相当有才华的法师。当年的继程，年约35岁，正值壮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选⁶⁰；1997年，在竺摩的安排下，三慧讲堂也选出了接任住持继传⁶¹，于37岁之龄接任。据继传的说法，竺摩退位后，就完全放手让继传处理院内的大小事宜（释继传，2012；2013b）。笔者认为，竺摩对继任者给予了百分百信心，而他也得以在其有生之年顺利交棒。至于第二个原因，是想要研读自修。竺摩曾于1954年透露，《无尽灯》让他忙得无法静心看经和静坐，是很大的损失（释竺摩，1954c：27）。相同的，佛学院的工作，以及同时间的多项弘法工作，也让竺摩忙得不可开交，在1990年之前，竺摩仅一度闭

⁵⁹ 竺摩曾认为，书法写得好，名气变大了，就会有信众索字，若无法适时婉拒，就会疲于奔命，影响修行。详见释继灯（2012），〈永怀慈范〉，收入陈松青编：《慧海明灯》，香港：新新出版公司，页80。

⁶⁰ 由于人事变更，继程于1998年退任佛学院副院长，但在竺摩圆寂后，于2002年开始担任佛学院院长。

⁶¹ 继传接任住持前后的详情，可参本论文附录〈继传法师访谈录（一）〉与〈继传法师访谈录（二）〉。

方便关百日（1962年），两度闭关百日（1979与1980年），一度方便禁足（1983年）（释竺摩、释继程，1984：24、48-49、56）。以1979年至1983年之间较为频密的闭关或方便禁足，其急欲闭关进修的心情已比以前强烈。竺摩于1993年的出关致词则清楚交代一切，说明本身多年来的弘化工作太多，“未曾放下万缘做心地功夫”，也有太多著作未曾整理，所以想乘着闭关的机会，完成以上二事（释竺摩，1993：164）。据此可以了解，竺摩坚持辞掉院长一职后随即闭关三年，也与他晚年想好好自修与修养的意愿有关。

定居槟城时期，竺摩虽然没有经历中国或港澳般的佛教与时局大背景，但各地汉传佛教面对的问题其实非常类似，因此竺摩所做之事也沿用以往的做法，极力推广佛教教育与文化。这时期的竺摩也领导创办了马来亚佛教会，并跻身本地佛教领导层，对其个人而言可说已进入思想发展的成熟期。通过竺摩与以上数人的往来，我们得以了解竺摩个人的材性基本上与他们相近，除了大度能容，也积极栽培接班人并为教奉献，自此为马来西亚的佛教的发展付出了最大的心力。

小结

早期中国佛教界开始注重佛教教育与文化的源头，在教内教外的冲击。竺摩的老师兼中国的佛教改革家太虚，也曾在佛教居士杨文会的祇洹精舍求学半年，初步接触了走在出家人前头的现代化佛教教育。由居士办的祇洹精舍以教育人才为重，但寺院办教育却仅仅为了避免庙产被接管，后来在太虚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方才成立了正规的佛学院。科学与基督教的崛起，也给当时的社会

与佛教带来了一些冲击，故太虚也曾针对以上两者与佛教撰述了相当数量的文章。作为中国佛教重要的思想家，太虚在栽培竺摩之余，也给竺摩的思想带来了明显的影响，以至于竺摩往后的文章与行为举止，也承继了太虚在以上各方面的观念。

尽管早年已有具备学识的高僧或居士努力改善佛教，大部分出家众的素质于多年后仍没有改善，因而一直被民众所厌恶，而普遍受教育不高的信众更是神佛不分。所幸的是，竺摩在中国大陆时期，因身边总是有着德学兼具的出家众与在家居士，在佛学上的稳健成长有目共睹，其中以太虚、芝峰、弘一等师长对竺摩的影响最为重要。太虚一直提倡僧人应是入世的，所以竺摩也在日军侵略中国或港澳时，积极投入了抗日活动，期间也接受邀请说法、办刊物、担任教务主任等，深受港澳信众欢迎，最后被法舫引荐至槟城菩提学院与中学任佛学导师。竺摩当时虽年纪尚轻，但他对佛教教育与文化能振兴佛教的期待，也已在师长们的潜移默化下萌芽。至于太虚与竺摩对出家人应始终处于住持地位的看法，以及基督教在香港的蓬勃发展对佛教的影响等，也是竺摩藉以自勉积极推动佛教的其中一个原因。重视因缘的作风，则让竺摩频频在马来西亚及国外弘法，也为马来西亚佛教界完成了很多开路的工作。

俗语说：“创业易，守成难”，但创业或创下基业，又岂是那么简单的事？若非真正抱有热诚，要在诸多不便的年代，劳心劳力处理各大小事宜，真的不容易。竺摩办刊物、组织佛教会、巡回弘法等，在当时也的确掀起了一阵学佛风气，而这些事情，竺摩是一做就做了超过十年。尽管多年来都有许多人在身旁护持协助，如演本、金星、白圣、隆根、黄荫文、陈延进等人，但多项历史记录可证明，竺摩常常都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也总是前线中的一人。至此，

已可见竺摩努力通过多个管道，如：弘法、办佛教刊物、佛学院来推动佛教发展的用心。

至于当时已经成立的马来亚佛教会，亦成功凝聚了一些力量，但对马来(西)亚整体而言，这一股力量依然是少数。再者，要在少数中找到理念相同的人，更是艰难非常。值得肯定的是，深获竺摩尊重的出家人，都在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事项上不求回报地贡献，他们与竺摩倾心倾力于发展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的决心是一致的。

第三章 竺摩法师与佛教文化的推广

上一章我们已详述竺摩法师接触佛教文化与教育事业，是受其导师太虚法师深感此时代佛教必须进行改革而积极推动佛教文教事业之影响。竺摩南来后，曾在 1961 年撰文指出佛教文化事业乃“请藏经”、“办刊物”、“流通法典”，而佛教教育乃注重在兴办“佛教学校”（释竺摩，1983a: 18）。基本上，本章遵循竺摩对佛教文化事业的思路，探讨他对这个领域的想法及其贡献。

竺摩曾在 1972 年感叹中国佛教多年来的宣传偏重在布施建寺、念经拜忏等功德，却很少宣传兴办佛教教育与推行佛教文化事业的功绩（释竺摩，1972b: 8）。以上种种言论，皆说明竺摩认为佛教事业之发展，应该侧重佛教文化事业与教育事业的建设。

佛教文化与教育应是一体的，实在难以非常明确地分割，研究竺摩的个案尤其如此。为方便论述，本章先谈竺摩与佛教文化的部分，主要探讨竺摩南来后积极推广佛教文化的三个领域，即办刊物及流通法典、讲经弘法及诗书画弘法。通过有关领域的分析，能让我们更加了解竺摩对佛教文化的观点。

首先，我们先略述这些领域在竺摩心中所代表的意义。其一，办刊物、流通法典等文字般若。这些佛教文化事业皆与文字相关，同时也是竺摩认为最重要的佛教文化事业。根据通一法师（生卒年不详）于 1935 年《石火集》⁶²的宣传文章，当时的佛教学者分成两派，一派主张修禅净，另一派则强调从“文字般若”证“实相般若”⁶³，文中隐指他本人及竺摩乃属于后者（转引自何建明，

⁶² 竺摩与通一诗歌合集。

⁶³ 实相般若：窥见心性，彻证实相的智慧。详见释竺摩鉴定，陈义孝编（1988），《佛学常见词汇》，台北：文津出版社，页 16。

2006: 218)。由此可见，竺摩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是从事“文字般若”以证“实相般若”的佛教工作者。1951年，竺摩在其创办的《无尽灯》创刊号表示，最高境界的实相般若源自于对文字般若的观照（释竺摩，1951a: 1）；而竺摩自创刊号一直至1980年代中初期仍不时在灯刊发表文章，可证他多年来始终拥护与重视文字般若的佛教事业。竺摩认为，这种以文字宣扬佛教的工作，乃“佛教文化事业”重要的一环。

其二，讲经弘法。佛教文化需要被广泛宣传，而竺摩理想中的宣传方式，分有“讲经说法”的口头宣传与“编刊杂志”的文字宣传，其中以文字宣传的收效比较大，因可以吸引有知识者协助厘清一般人对佛教的误解（释竺摩，2009: 49）。然而，竺摩同时亦认为“讲经弘法”也是宣扬佛教的重要方式之一。澄真法师（1917-2015）曾指出：“……席不暇暖的到处弘经演法；这才能造成隋唐间盛极一时的黄金时代……法门中善于演说佛法的人才太少，该是佛教衰落的主因之一”（释澄真，1955: 30），这些见解正好是竺摩认同口头弘法也一样重要的注脚。通过声音传播的佛理虽然只能让一时一地的信众受益，但这种弘法利生的工作对每一时期的佛教发展都很重要，因“佛法无人说，虽慧莫能了”（《大智度论》），故必须持续鼓励。笔者认为，口头上的讲经弘法，其学习时间相比佛学院上课学习佛教教育为短，而且内容也较为浅白，故学习效果比不上传授专门佛教教育的佛学院。由于竺摩秉持着“虽慧莫能了”的观念，故依然很勤快地到处弘法，并把讲经弘法的内容写成文字稿，发表在《无尽灯》或结集出版，这对佛教文化的推广可谓有很大帮助。

其三，竺摩以诗书画三绝闻名，同时也经常通过诗书画与信众结缘，走入人群进行方便弘法。诗书画弘法除了是艺术活动，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

竺摩却用以推广佛教文化，接引信众及知识分子学佛，已把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合而为一。他的画以佛像居多，更曾说“画佛变佛”，也引“书能养心，画可适性，诗词歌曲，可以怡情”说明艺术能陶冶性情，都是修养佛法的初步工夫（释竺摩，1981：9；2003：69）。竺摩写诗、写书法、作画的目的与一般艺术家或书画家不同，背后有着向知识分子宣扬佛教及保留中华文化的深远的意义；而他既以诗书画宣扬佛教，因此我们将之纳为研究他推广佛教文化事业的一部分。

上一章我们曾提及，太虚及佛教改革派的思路，在于强调佛教是智信、是科学的；而竺摩也曾在定境中获得印光指引，要多走入人群弘法。纵观竺摩讲经弘法、办刊物的作为，乃有意识地把佛教导向知识、智信的路上；至于他积极创作诗书画，除了希望信众可以通过创作或欣赏艺术作品，契合个人喜好，继而提升各自的文化素养，也以方便门接引各个阶层的信众学习佛教、信仰佛教。出家人与知识界人士往来，并非自竺摩开始；而太虚早在1910年代就已结识知识界领袖人士，对其佛教改革有很大的帮助——让佛教更能面向社会，同时也是保护佛教利益的社会力量，而这群知识界人士也曾在太虚被冠上“革命党嫌疑犯”身份时，帮助太虚安然脱身（冉云华，1990：221，228，235）。至于竺摩交游群当中较为特别的例子，是接引了本无宗教信仰，也鲜少发表诗作的《星槟日报》主笔黄荫文进入佛门。黄氏和竺摩有了数年往来后，于1959年皈依佛教；并于1969年6月从《星槟日报》退休后（《无尽灯》记者，1963：29；黄荫文，1969：21），大力协助竺摩办理马来西亚佛学院长达十数年。由此可见，佛教文化传入知识界后，可以产生正面的意义与影响。吸引或培养有知识的佛教徒，可说是竺摩走入这三个领域的重要目标，佛教才更有望走向正

信之途，并摆脱“迷信”的刻板印象。

第一节 文字般若

在文字般若方面，竺摩曾创办佛教杂志，以及推广经书的流通。

早在澳门时期（1940年初春），竺摩就曾接编第十二期的《觉音》杂志，然在1941年10月因健康状况而停办（觉音社，1940：4；《觉音》编者，1941：80）。至十年后（1951年8月），竺摩复于澳门另办《无尽灯》，然而为灯刊发展计，及编辑人手等问题，灯刊在同年年杪迁往香港（1951年12月）、槟城（1957），期间因竺摩至檀香山弘法一年而短暂迁至新加坡，1958年冬迁回槟城，由马来亚佛教会弘法组负责编辑与出版事宜。来马初期，竺摩曾表示要加印五百份《无尽灯》到南洋，引导知识界的人士理解佛教（释竺摩，1954a：33），由此可见竺摩欲借《无尽灯》传播知识佛教的期盼。

竺摩努力推广文字般若，让佛教文化更普及民间。竺摩的弟子继程法师透露，在1960-70年代，本地佛青领袖若对佛学有兴趣，就只能参考竺摩的书（释继程，2016）。因此，竺摩在佛教经书方面的流通，也有着极大贡献，而竺摩在自己请购《大正藏经》之余，也曾和其他出家人联合资助圣严订购经书。

本节就以上两方面，对竺摩在文字般若方面的努力与传播的内容再作论述。

一、创办佛教杂志

演本法师和竺摩的书信往来中，曾提到“尊刊（笔者按：《无尽灯》）之流布于南洋各地，正如久旱之遇甘霖沛降也”（释演本，1957：18），让人深切体会到当时佛教文化事业在南洋编辑出版的意义。

然而，竺摩仍曾惋惜《无尽灯》迁槟出版后，因数个因素⁶⁴而素质下滑，本身也早在马来亚佛教会于1959年接办《无尽灯》后，仅帮忙筹款而鲜少理会编务，主编一职也在多年内更迭了数次。不过，在1983年的文章中，仍寄望刚任主编的继程把刊物办好（释竺摩，1983b：3），我们也因此得知晚年的竺摩对灯刊仍有所期许。继程回忆本身在1981-1983年期间担任主编时，灯刊行政方面的事务都由佛总处理，而竺摩因已卸下佛总主席多年，因此也没有在继程主编时期提供意见或叮咛（释继程，2016）。虽说竺摩已很久不管编务，但仍持续在《无尽灯》发表文章，灯刊自1951年至1983年的期数都可见竺摩的作品，故竺摩对《无尽灯》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至于《无尽灯》的创办，至少有三个意义：（一）传播正确的佛教文化；（二）接引知识分子信佛；（三）团结佛教教众。

首先，我们先探讨传播正确的佛教文化。竺摩1951年在澳门创办《无尽灯》，刊名概念取自《维摩诘经》内容，希望能“以一人之法，辗转开导百千万人而无尽，如以一灯而燃多灯，灯灯无尽，光光不绝”，期望灯刊可以通过文字把佛教文化传扬开来，并强调文字很重要（释竺摩，1951a：1）。竺摩晚年回忆办《无尽灯》的缘由时，曾希望灯刊可以让炮火后的佛教文化沙漠重现绿洲（释竺摩，1983b：1）。早期的灯刊获得多方大德来稿，包括：默如法师、星云法师、圣严法师、王仲厚、金明法师、黄荫文及陈少英等人，竺摩至各地讲经说法后，也会让随行的弟子、僧众或信徒代为笔录，再刊登于《无尽灯》。笔录

⁶⁴ 竺摩认为有三大因素导致《无尽灯》素质下滑：（一）相较香港，槟城文化水准不足；（二）少向外间征稿；（三）编辑人员不足。详见释竺摩（1983b），〈我与无尽灯〉，《无尽灯》第100期，1983年夏季，页3。

《无尽灯》于1956年秋至1957年年初期间，一度因为香港方面编辑人手不足暂时停刊，当时已身处槟城的竺摩曾因本身接下来行迹未定，主张《无尽灯》随主编超尘法师的脚步暂时移至越南，但不获赞同，后来在教界人士建议下于1957年移至槟城出版。详见〈本刊迁槟赘言〉，《无尽灯》第6卷第3期，1957年5月30日，页1。

的做法虽承续自太虚一代，但竺摩对文字弘法能带来的长久影响，明显深具信心。下为竺摩发表在创刊号的文章内容：

讲经法会或学术演讲会，都只能有利于一时一地的少数听众……其法会外之“未生信者”和“未生善者”，则需要文字刊物之传递，使其未信令信，未善令善……文字刊物多量地产生，亦为现代时势和现代思潮所必须（释竺摩，1951a: 1）。

出席弘法会或讲座者，大多对佛教已经有一定的认识，竺摩以“已生信者”与“已生善者”名之（释竺摩，1951a: 1）。然而，竺摩明显更挂心“未生信者”与“未生善者”，让人看到竺摩对于“一时一地”的不满足，以及欲把佛法传播到远处，甚至是未来的用心。

灯刊初办的宗旨乃“三根普被”，意即“利钝全收”，故选稿的标准，分为有学术价值的论著、通俗佛学文章，以及有文学价值的传记（释竺摩，1983b: 3）。《无尽灯》已在1959年交由佛总弘法组负责编辑，但竺摩对灯刊的文章依然有所留意，发现好作者、好文章时更不吝惜给予赞美与鼓励。圣严曾表示其著作《戒律学纲要》的完成，有赖灯刊与竺摩的推动，而有关著作的第一篇绪论自1962年6月1日（第14期）在灯刊上发表。圣严回忆，竺摩翌年方便禁足时看到了其中两篇，随即转去十元美金予圣严，也打算替圣严印刷流通那两篇文章；竺摩更承诺，若圣严的著作完成后无经费出版，他也愿意资助，让圣严在从事研究戒律初期获得了很大鼓舞（释竺摩，1965a: 2；释圣严，2002），此一事迹也让我们看到了竺摩对学术论著的重视。另一方面，竺摩南来槟城前

曾短暂停留泰国，并把泰国行程所见所闻记录成〈南游寄语〉在灯刊上连载多期。文章性质虽属游记，但却通过文字让读者更了解泰国的佛教发展，间中也穿插讲述中国的佛教，以及华籍出家人在泰国的事迹，在今天而言可谓是记录历史及佛教发展的重要文献。

再者，竺摩早期在《觉音》上说明，编发佛教杂志是想厘清社会对佛教的误会，并对佛教起好感（释竺摩，1940b：32），加之佛陀的教育原则乃契理契机，因此佛陀每次说法都是观机施教的（释竺摩，1960：5）。故此，除了刊登佛学文章，《无尽灯》也曾特辟一栏〈佛学问答〉回应读者的问题。〈佛学问答〉雏形初见于1953年4月14日出版的《无尽灯》，乃〈佛学座谈会〉的笔录文章，记录的答问与学佛相关，部分也谈及当下现象，如：“学佛既然有如是好处，何以现在眼见许多出家学佛的人都很不像样……”（释竺摩，1953b：26）。

根据笔者手上的资料，〈佛学问答〉以正式栏目初次登场，是在1956年11月1日，而此栏目第二及第三次出现，却在相隔数年后的1959年6月30日，即迁至马来亚出版的首期《无尽灯》，才开始频密地不定期出现，大多由竺摩解答信众的问题，间中也会以“竺园”、“竹园”、“雁荡山僧”等笔名主持有关栏目；在1962-1963年主编灯刊的隆根法师，也偶以“中观”笔名替此栏目的读者解决疑难。最饶有趣味的，乃竺摩也选答小信众的问题。《无尽灯》曾刊登一名“素珊小童”向竺摩提问的问题，如：（一）起初佛出生的时候，已知道自己是佛了；那么佛为什么等到二十九岁才出家呢？（二）我有时很自私，脾气很暴躁，不能专心一志地做功课，那时“静坐”，就可以解决一切了吗（释竺摩，1968a：16）？如上所述，小信众、年长信众，都是竺摩回应的对象；所

提问的问题，有深有浅。由于每个人的程度不同，因此灯刊特辟此栏，很明显是为了解决各个程度信众的疑问，让他们更加理解佛理。竺摩对信众的鼓励，也很能说明他对研究佛学的想法：

多研究佛理，通达佛理，从现在小小的力量，养成将来大大的能力，就有法子对付他（笔者按：对佛教有误解的人），拔除他误会佛法的劣根，播入他长养菩提的胜种（释竺摩，1968a：18）！

除了平民百姓，有识之士也对佛教存有误解，因此竺摩曾在香港佛教青年会的讲座上点名批评胡适，指胡适“戴着有色眼镜，误看佛学”（释竺摩，1967：6）。因此，要根除人们对佛教的误会，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要自己先了解佛理。不分年龄阶层培养对佛教有所理解的信众，是佛教的当务之急，而这也是竺摩最大的目标。

至于出版灯刊的第二个意义，乃接引知识分子学佛。1954年，尚在香港出版的灯刊已有马来亚读者，同时也报道槟城与怡保的佛教动态。竺摩南来后也曾嘱咐主编超尘法师加印500本灯刊寄到南洋，以派送给普通学校青年员生、文化机关，以及政府职员，引导知识界人士理解佛教（释竺摩，1954a：32）。值得一提的是，灯刊在1954年的发行量已达1500份（释松泉，1954：30），竺摩却要求超尘在此基础上再加印500份到南洋派送，所占的比重相当大，竺摩对南洋知识界人士的期望也可见一斑。迁移至马来亚出版前后，竺摩也经常通过灯刊与国内外信众或文人作文字上的交流与诗歌唱和，当中较为有名的包括骆清泉（1907-1966）、管震民、黄晚香等人。在1951年之前，较有名气的佛

教杂志乃太虚所创办的《海潮音》（1920年创刊），杂志中有诗歌的唱和。竺摩在《无尽灯》中也作类似的编排，栏名〈无尽诗草〉，1962年在台湾创刊的《狮子吼》，也有“诗抄”或“诗叶”的栏目。换言之，诗歌的唱和在早期佛教界中，似乎是一个常见现象，竺摩只是延续佛教界一贯作风与信众或出家众交流。诗歌作品中，有者乃竺摩为画作自题，有者则是竺摩有感而发的内容，但都颇有佛理的意味，撷取两首如下：

春来处处百花香 弹指秋光叶又黄 冥想千林皆摇落 合从这里悟真常

（释竺摩，1954d：21）

何日此身得自由 回头又是百年秋 人生荣悴驹过隙 世事悲欢雁寄邮
诗酒有情方有恨 色空无相始学愁 今宵禅月清如许 性海孤明一叶舟

（释竺摩，1963：21）

〈无尽诗草〉所刊登“致竺摩”或“和竺摩”的诗作之多，可知其颇受知识界人士或出家众欢迎。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当初很普遍的现象，在今天已是一去不复返之景，显得格外珍贵。这种情况与当今的时局有关，本地中小学不再指导古典诗歌创作，诗歌唱和的风气也已不如昔日兴盛。

除了诗歌唱和，灯刊也刊登了多位知识分子及信众的来稿。上文提及的黄荫文曾撰〈我们佛徒怎样才不枉活一生〉（第14期）、〈佛诞年年同庆祝佛法时时靠自修〉（第26期），新加坡作家洪铃子（1943-）撰〈我所认识的佛教〉（第13期），檳城菩提义学义务教师的吴人俊（？-1976）也曾撰〈佛陀给我

们几点重要的启示》（第 44 期）。吴氏的文章点出当时人们对佛教的错误观点，也说出本身对佛教的信心所据：

记得七八年前，有一位信基督教的朋友到我家坐谈，她看见我家里有一间佛堂，供奉着佛菩萨的圣像，非常惊讶的问我道：“你是拜佛的吗？”我说：“是的。”她说：“你是个大学毕业生，为什么也跟世俗的人去信佛呢？”我觉得很好笑！近代一些中国人，有一种崇拜西洋的毛病，无论什么东西都是西洋的好，连西洋的宗教，也是好的，摩登的。其实，我们如果对佛教作一个客观的研究，我们就发现它的教理，是比任何其他的宗教更圆融无碍，精微博大，而且很合理化，科学化……（吴人俊，1969：7）

在竺摩南来前，吴氏已是槟城菩提小学义务教师与虔诚佛徒，但其文章尝试说明佛教的真正价值，也在无意间达成了竺摩对佛学研究者的寄望——拔除他人对佛教的误解。

办佛教刊物的第三个意义，还包括团结佛教教众。以下乃竺摩回应信众面对团体内部纠纷的解决方案：

补救之法，先以佛理，慈悲感化，尽量劝喻，勉其牺牲小我，为顾全大局，言归于好；因佛会的组织，重在精神团结，群策群力，方易于推动弘化工作……但万一不受劝喻，亦只好随缘由他另设炉灶（释竺摩，1969：14）。

先释放善意，是竺摩的首个选择，主要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团结；但若真的没办

法言归于好，也只能随缘了。我们曾在上一章提到，竺摩个性厚道，不希望与别人起争执，因此竺摩的个性也已经通过他给信众的回答中获得充分展现。

表面上看来，竺摩并没有特别规划灯刊朝团结教众的方向努力，但是教界似乎都对佛教刊物都有此要求。举例来说，《华南觉音》（《觉音》前身）初创时，达灵法师（生卒年不详）曾呼吁大家“多写些‘感化性’及‘时代性的’，少写‘激急性’为妙”（释达灵，1938：9），学者何建明查看同时期的《人海灯》，推断达灵的说法在于提醒《华南觉音》的编者和作者们不应过于激进，而造成佛教界的不团结（何建明，2006：102）。竺摩担任灯刊社长时候，对来稿的言辞也有所要求，1954年竺摩南来槟城时，还特地从槟城写信给首次主编灯刊的超尘，嘱咐他避免刊载是非文章，以免因言辞过激而破坏了佛教界的和谐，但该期《无尽灯》偏偏出了一篇“攻击人的文字”，让远在槟城的竺摩，不得不另写一篇长信提醒超尘取稿的标准，而竺摩当时也因灯刊“谈论是非”备受他人责怪。竺摩前后两篇长信所提点的取稿标准，目的也在于避免佛教圈内的互相争论，以致在教事上“互暴其短”，破坏团结，或让人们们对佛教产生反感（释竺摩，1954a：32；1954b：27）。以上不同时代的引文，都凸显了佛教杂志能团结教众的意涵。

与此同时，南传与北传佛教文化的相互交流，是竺摩一直所期待的事，也希望大家不要分别大小乘（释竺摩，1954e：20）。《无尽灯》迁槟后曾刊登美籍苏曼迦罗法师（Ven. Sumangalo, 1903-1957）的两篇中文演讲稿，以及一篇英文稿（1957、1958），灯刊于1959年交由马佛总弘法组接手编辑后，也增加了英文栏目，刊出了锡兰与美国法师的英文文章（1959），泰国僧人为法法师（生卒年不详）也在第三期（1959）与第六期（1960）发表了翻译的中文文章。

多源的文章、竺摩的亲自答问或文章撰写，以及诗歌的唱和，是灯刊的特色。灯刊早期曾外销至缅甸、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地，在1954年的发行量已达1500多份，读者多来自香港，其次为澳门、南洋，再其次为台湾、锡兰等国（释松泉，1954：30）；自第5卷第1期起，《无尽灯》改成每月出版，发行量也逐渐增加（佚名，1955：3）。不过，灯刊的影响到了后期越见减少，由马来亚佛教会接手出版九年后（1959-1968），编辑透露灯刊的销路“依然在二千册左右”，读者增幅显然不太理想。同时，编者也感叹马星两国佛教徒并不少，但有兴趣阅读灯刊的人已经不多，因大多佛弟子倾向拜忏、念佛诸法会及赠医施药等福利慈善事业，虽然服务精神很好，但会主动请购佛经与阅读杂志的就寥寥无几了（《无尽灯》编者，1968：40）。我们无法得知当时的马星教众没有兴趣阅读灯刊的确切原因，但竺摩曾透露槟城当时的文化水准不比香港，而中国佛教多年来的宣传也有偏差，导致人们偏重布施建寺、念经拜忏等功德，对于办学校或文化事业的功德反而没有兴趣（释竺摩，1972b：8，1983b：3）。人们大多偏向修“福”，鲜少主动修“慧”，让我们更能理解竺摩期望信众信解佛理的背后原因。

到了1979年，灯刊的印刷量仍在一千五百至两千册之间，但其中三分之二赠送给寺院及信徒，三分之一乃订户，每年收费三元。早期的灯刊曾外销至其他国家，如新加坡、印尼、港澳、台湾、泰国、美国、澳洲等地（张居士，1979：35），而马来西亚三慧讲堂与马来西亚佛学院资料中心，至今仍保存大部分期数的灯刊。虽然《无尽灯》的影响到了后期越见减少，但作为文字般若，灯刊的确已如竺摩所愿，跨越地理时空的限制，传到了异时异地。

二、流通经典与请藏经

民国前后最早有意识地流通佛教经典的人乃杨文会。当时佛教面对寺产兴学的危机，为了复兴佛学活动，他在 1866 年成立金陵刻经处，1897 年又以自己住宅为收藏经版与佛经流通处，从事刻印与流通佛经工作，1907 年在刻经处设“祇洹精舍”作为佛学进修学院。

竺摩也曾努力在本地推动经典的流通，曾与隆根、广馀法师、清亮法师合资于 1963 年 1 月 12 日创立的槟城佛学书局。隆根及竺摩异口同声表示，设立书局主要目的在流通佛书或经书，兼营佛门各种法物用具，隆根进一步指出，此局的设立可让本地修学佛学人士更容易取得佛书。另一方面，该局已临时准备一本有着二百数十种书目的目录，公众或佛教徒只要来函索取，就会把书寄上。竺摩认为，多读经书有四个好处：一、使人心境趋于慈和；二、能体知宇宙人生缘起性空的真理，减少一切倾轧，安定社会秩序；三、斩除烦恼；四、使人化除对佛教的误解。当时的新闻报导也指出，书局初步计划也包括自行刊印佛经及通俗佛书，并呼吁星马佛教徒向负责人提供需要的经书名单，槟城佛学书局可协助刊印（转引自《无尽灯》记者，1963：29）。可惜的是，此盛况在槟城仅属昙花一现，因其余三位法师法务繁重，有关书局在槟城创立一年四个月后，由隆根迁至新加坡，易名“南洋佛学书局”继续经营（释竺摩、释继程，1984：24-25；释隆根，2001：86-88）。

此外，在香港于 1955 年筹款出版《太虚大师全书》时，竺摩不仅本身大力资助，也热心在星马两地募款（槟城行脚僧，1955：25-26）。除了筹款捐资印书，竺摩也曾为自己及后进请经。竺摩曾在 1961 年表示自己请购了一部《大正藏经》（释竺摩，1983a：18），圣严则透露本身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时（1970

年代初期），获得竺摩、白圣法师及真果法师（1905-1995）资助，成功请购日译的南传巴利文大藏经（释圣严，1983：11）。由此可见，竺摩一直参与推动经典的出版与流通，若他人需请购经书，也会热心给予资助。

另一方面，灯刊编者在1968年左右已发现马星佛弟子多倾向参与佛教仪式或活动，主动阅览佛教书籍的人已越来越少，因此竺摩住持的三慧讲堂在1970年成立基金会印经书的决定，可说是因应时势而生。由于当时市面上流通的佛学书籍十分少，因此都将竺摩的文稿编辑成册流通，后来印刷品渐渐普遍，则开始印刷更多的佛书免费赠与大众。竺摩所讲《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讲话》，曾获星云好评，称其“通畅易晓，实为弘扬佛教最好教材”，并代台北佛教文化服务处，请求竺摩同意在台北影印流通该书（释星云，2009：180）。此外，竺摩也曾募印本身的《维摩经讲话》、《南游寄语》、《正觉的启示》等，至1972年，三慧讲堂已印赠经书二万七千册，其中七千册乃于1972年再版竺摩《普门品讲话》、《佛学问答第一集》、《地藏经讲话》、《佛教问题座谈》赠送结缘（释竺摩，1983a：18；释竺摩、释继程，1984：38）。

对于佛学书籍流通的最佳场地——图书馆，竺摩也自有一套想法，除了希望图书馆能流通经书，也希望能安排馆长或时代名流等人给大众演讲，或是指导大家阅读经书的方法，让图书馆的规模可以越办越大，并开放给信众借阅，让大家有经书可读，认识真正的佛学（释竺摩，1964：20；1990c：90；年份不详b）。以上可谓竺摩演讲中出现频率较少的图书馆言论，但有关言论却又是极有道理的。以笔者曾到访的寺院附属图书馆为例，该寺前任住持属早期南来的僧人，因此也收集了好一些颇有历史的特刊或书籍，但负责接待的法师表示，目前已经很少人来借阅佛学书本了。通观现在的图书馆，尤其是位处市区之外

的佛教图书馆，大多都乏人问津，门可罗雀。若如竺摩所说，真能有馆长或时代名流长期驻守图书馆办活动或指导阅读经书，图书馆的功能的确是可行的。

话说至此，我们得以了解竺摩注重“文字般若”，正因为文字乃知识之本，可以突破时空与地域的限制流传下来。因此竺摩除了自己写文章，也资助他人请藏经。佛法义理高深，一般大众自行阅读的效果可能有限，因此竺摩才会建议图书馆请来馆长指导阅读，而竺摩本身也身体力行，经常到处弘法。竺摩弘法利生的事迹，将于下节说明。

第二节 讲经弘法

口头弘法在竺摩心中的地位，较文字为低，因弘法所影响的范围及人数有限；但作为住持佛教的出家人，弘法的活动还是得持续进行，原因在于没有人讲解佛理，信众就没办法理解佛法。1954年到访泰国后，竺摩曾表示：

各寺舍，约共有僧伽三四十人，除纯果法师能讲讲佛法，其余的都是过应赴经忏的生活……暹罗的大乘佛法，不能从华寺华僧众宣传，把它建立起来，我认为是华僧居暹最感遗憾的事（释竺摩，1955a：23）。

竺摩惋惜泰国的华僧不能宣传大乘佛法，而这种感叹的背后反映出“佛法需要人来宣讲”的道理。因此，竺摩也曾在1972年提出自己的心愿，是“要到没有佛法，或佛法流行不广的地方去宣扬佛法，使佛法普及一切偏僻的地方”（释竺摩，1972c：23-24）。职是之故，竺摩任佛总主席期间，也曾率团至砂拉越访

问与弘法（1968）。在讲经方面，竺摩也几乎是逢请必到（释继程，1996：12），只要有信众提出邀请，竺摩就会答应前往。

竺摩的弘法内容重视契理契机，而他积极讲经说法，也带动了多地的学佛风气（何建明，2006：215，释继程，1996：12）。信众指出，竺摩讲经时从通俗的语言讲至甚深真理，而竺摩本身也透露在准备讲经内容的过程中需别出心裁：

如他讲《维摩诘经》时，先强调这部经不但文词美曼，内容亦极精到和透辟，叫大家不一定专当佛经来听，要当国学来研究，意味就比较亲切了（刘悦禅，1954：20）。

讲时因为要通俗化，又要有点兴趣，不想听众把它当作催眠术，所以终喜东拉西扯，串插了许多因缘譬喻入去……其他枝枝节节的问题也顾不了（释竺摩，1962a：39）。

对于刚接触讲经弘法的信众，竺摩则这样勉励：

未曾听过佛法的人，初听始终是有点隔膜的，要化除这隔膜，需要自己发足诚心，耐烦一点，多听多想，听多了，想多了，趣味就会来了（释竺摩，1958：7）。

综合以上三项引文，可以发现竺摩讲经时会考虑信众的情况及心理，也知道该从何着手讲经。由此可见，为让信众更能理解佛理，竺摩的确费了好一番工夫，

让信众更容易通过其讲经弘法来了解佛学内容。很大程度上，这也代表了他对弘法的重视。

演慈法师（生年不详）曾针对竺摩的弘法形式作分析，结论为以下三种形式：一、讲说经论；二、专题开示；三、通俗演讲。竺摩移锡槟城后，在各地弘法多以通俗演讲为主，在特定道场或佛学院才讲经与论（释演慈，1996：36-37）。至于讲经方式，竺摩认为应采取新的方法，包括言语力求通俗、采座谈会方式提出问题及反复申论（释竺摩，1961a：1）。据以上的说法，竺摩会根据信众的类别选讲不同的题材，并以新式的方法讲经，而这种倾向与竺摩曾在闽南佛学院上课的经验很有关联。竺摩大多演讲内容，也被记录成文字刊登在灯刊上，让弘法的内容通过文字，再散播到异时异地。

竺摩刚到槟城时，曾给灯刊主编写信，透露他接下来除了要在菩提学院讲课，每个星期也要进行通俗演讲，或许也需要到其他学校、监狱、麻疯院弘法（释竺摩，1954a：31-33）。1954年期间，竺摩每个星期一下午四时至五时讲《维摩经纲要》，星期三和星期五晚上七时半至九时讲《金刚经》，朔望日下午三时则在洪福寺讲《法华经普门品》（刘悦禅，1954：20），讲经活动的确颇为频密。

〈《善生经》与人生佛教〉，是竺摩以《善生经》及人生佛教的关系为主题而讲的。竺摩列举人生佛教的三大特点为：一、佛教是人生的非人死的；二、佛教是伦理的非乖伦的，并非因出家就不要父母家人；三、佛教的三个中心论点为（1）施設适应现代时机，有益于现实人生的佛教（2）适应现代人生组织的群众化，当以大悲大智为群众的的大乘佛学为中心，施設契时设机的人生佛教（3）适应重征验，重秩序的现代科学化的学术思想，以圆渐的大乘法为中心而

施設契合时机的佛学（释竺摩，1965b：7-9）。竺摩此次演讲明确标示出人生佛教的中心论点，其于1975年撰写的〈“人生佛教”摸象——序人生佛教真义〉，也显示他的理解与太虚所言是一样的（见释太虚〈人生佛学的说明〉（1928）、〈人生佛教开题〉（1944）、〈人生之佛教〉（1946））。

人生佛教提倡大乘佛教的精神，以利他为主。针对大小乘佛教的重要性，竺摩曾表示现今的时代应以小乘的利己道德为本，大乘的利他精神为重，并把利他精神推展到社会上（竺摩，1938：7）。基本上，竺摩两者兼容，但明显可见他较倾向大乘佛教的修行，而竺摩终其一生除了努力自修，也积极为佛教服务，并努力走进人群，通过诗书画接引信众，亦根据社会现实所需而给信众开讲，所做之事已符合了大乘佛教的精神，以及太虚对人生佛教的构想。

在其他通俗演讲方面，竺摩弘法时或文章中常批评的对象是科学、西方物质文明或是基督教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其对社会发展的关心。其中，又以科学或物质文明的发展最令竺摩担心，常常提到要发挥佛教的特质来“补科学的不足”（释竺摩，1961a：4）。竺摩在灯刊最早提到“科学”、“原子弹”等字眼，是在1957年：

（竺摩法师开幕词）……这个斗争猖獗的时代，人类已从思想斗争闹到物质斗争，科学的武器，给予人类无限的威胁与忧虑，原子弹可怕，氢气弹可怕，死光更可怕！我们要消灭这些可怕的东西，唯有提倡佛法慈悲和平的道理（《无尽灯》记者，1957：30）。

在此之前，缅甸的法亮法师已在灯刊提到“现在是原子时代，也即是人欲横流，

酒绿灯红的恶浊时代”，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对应方法（释法亮，1956：23）。不过，竺摩则在一年后（以上的引文），提出了要以慈悲和平对治科学。自此，竺摩频频在讲词中关注科学与物质文化对社会及人心带来的负面影响，到了1971年仍在谈论：“科学的进展，战争的升级，也带给人类许多悲惨的痛苦，原因在科学愈发达，物质文明愈进步，道德反而愈低落，人类的精神生活亦愈贫乏……”（释竺摩，1971a：5），竺摩对科学及物质文明的关注，至此已长达14年。

通览竺摩的文章，他经常希望能通过佛教让四众⁶⁵相处融洽、人心向善、世界和平，而能带领人们走向这一目标的佛教精神与文化，则不外乎“慈”与“忍”，并特别点名“慈、忍”展开论述：

慈与忍的两种用心，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极为重要，故没有一个真正的佛徒，不做这两种工夫的……（释竺摩，1966：32）

以上乃竺摩对时弊的关注，以及他所强调的对应工夫乃“慈”与“忍”。竺摩认为，“慈”乃‘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中普爱的慈，在这慈中找不到“阶级的分别，种族的隔离，肤色的优劣，地域的界限”（释竺摩，1970a：1），而这种不分种族、肤色、地域的慈，也是“止息战争，建立和平的最好的美德”（释竺摩，1968b：23）。

从佛教的观点而言，竺摩倡扬“忍”是因为佛教的菩萨行者修习法门时若不能忍，所修的功行便容易退失（释竺摩，1968a：16）。从俗世的观点而言，为一个大场合或是为顾全局面而忍，也的确能带来正面影响。在这个拥有多元

⁶⁵ “四众”为出家男众、出家女众、在家男众，在家女众。

种族的国度里，大家肤色不同、文化不同，当然更容易出现见解不同的情况，竺摩认为有一个方法可以避免冲突：

以佛教“忍人所不能忍”的大智大忍，如能推行实践，还怕各民族、各党派，再会发生不愉快的冲突吗（释竺摩，1970a：2）？

1970年正是马来西亚发生种族冲突事件翌年，在此关键年代提到“忍”、民族、党派，正显示竺摩法师更加确定“忍”能化解斗争与冲突，无论对出家众或在家众而言，都能受益。

尽管提倡慈与忍，竺摩并不盲目地以慈忍待人，而是视事情的合理性作定夺。此外，他认为与知见不正的人论辩，或是不平则鸣，不仅是佛教徒应做的，也是所有宗教徒应该实践的（释竺摩，1961b：16）。综上所述，竺摩虽以忍为主要的感化要素，但也认为需要慈与智慧的存在，才能相辅相成。竺摩对慈忍的界定，除显见其爱教护教之心，也明确表达他希望在这个急速变化的社会中，通过“慈忍”感化人心的心愿。竺摩针对科学的发展与马来西亚民情而强调佛教的“忍”与“智慧”，也可谓是“因地制宜”了。

竺摩莅马后十年间（1954-1964），除了在1957年终到美国檀香山弘法一年，其余时间不时在吉隆坡、丹绒马林（Tanjung Malim）及昔加末（Segamat）等地讲经说法，一俟槟城菩提中学假日，复又赶往新加坡讲经。当时位处偏远的霹州丹绒马林“佛宝林”，便是因竺摩到来讲经后，才由信众们自发建成的道场（释竺摩、释继程，1984：14、22）。“佛宝林”建立的背后意义，显然比一般寺院更加重要，竺摩认为此寺院除了位处霹州与雪兰莪州交界处，也方便

附近的小埠如美罗（Bidor）、仕林河（Slim River）等地的居民到来学佛（释竺摩，1977：16），落实其想让佛法普及的心愿。以上各例，除说明竺摩在各地的说法行程频密，也再次印证了竺摩对弘扬佛法的决心、坚持与努力，而竺摩注重走入人群、入世的精神也在此体现出来。

有趣的是，由于缺乏管理经验，竺摩在其住持的三慧讲堂（1965）成立前，曾透露本身对于寺务并没有多大兴趣（释竺摩，1954b：27）。因此，三慧讲堂的成立与竺摩的住持讲堂，严格来说可谓竺摩从事佛教文化传播路途上的另一个里程碑。讲堂筹建期间，《星报》曾提到了三慧讲堂肩负着佛教民众讲堂与专修学校的双重任务（《星报》社论，转引自《无尽灯》，1963：17）；讲堂成立后，灯刊〈佛教新闻〉栏目也引用竺摩的话，表示佛法不是普通的宗教学术，所以要通过广泛阐扬，让人们理解，让佛法普及，因此需设立讲堂宣扬佛法（《无尽灯》编辑部，1966a：25）。至于三慧讲堂属下的单位，包括佛法研修会（1968），慧堂印经会（1970）、周日义校（1974）、竺摩法师基金（1984）等，也曾邀请其他法师主讲三慧讲堂的星期日讲座⁶⁶，寂晃法师与黄荫文分别在1966及1967年在三慧讲堂进行通俗演讲，其他曾到三慧讲堂主讲的也包括白圣、悟一法师（1922-2003）、陈延进（1904-2001）与继程等人，而以上数人的演讲文字也被发表于《无尽灯》。

据信众的说法，三慧讲堂于1968年成立的佛法研修会，吸引很多会员“每星期日都来三慧讲堂，一起研修佛理，听恩师（竺摩）教诲”（林鸿裕，2012：91）。三慧讲堂也有一个“周末念佛会”，三慧讲堂现任住持继传指出，念佛会由竺摩定期带动，若他出国则由其他出家人来弘法；有时，其他弟子也在竺

⁶⁶ 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大厦落成后，此讲座移至佛总进行。详见〈筹建会主席竺摩法师致词〉（1975），《光华日报》地方新闻（1975年4月18日），第三版。

摩在场的情况下轮流演讲弘法（释继传，2014）。他补充，当时的念佛会也曾经栽培了一些有潜质的弘法人员，如梁国兴居士等理科大学的学生，而未出家前的唯悟法师也曾是念佛会的佛友。对于弟子们，竺摩也鼓励他们多练习演讲，但不必事先让他知道内容，他若有空会到场旁听给意见。继传在1986年到三慧讲堂亲近竺摩，当时讲课不普及，很多信众都涌过来听课，而当时也只有三慧讲堂有能力自行打佛七。竺摩的弟子中，目前也仍有相当多人在国内国外弘法（释继传，2013a）。

三慧讲堂于1974年成立至今的周日义校（儿童班），早年也因槟岛当时极少道场开办儿童班，而接引了很多孩子来学习。但是竺摩鲜少在周日义校讲课，仅担任董事长一职而已（释继传，2013b）。三慧讲堂毗邻的马来西亚佛学院（1970）开课后，三慧讲堂曾提供住宿以便利学生，作为院长的竺摩也常常在学生自习时间，从三慧讲堂步行到佛学院督促学生的学习情况。这是竺摩对佛教教育的关心，我们将留待下一章再作叙述。

第三节 诗书画弘法

在佛教界，竺摩以“诗书画”三绝著称，常常通过以上三者走进人群中弘法，接引大众信仰佛教。其抄写的《心经》，也已被台湾故宫博物馆收为馆藏，可见其书画价值之高。

与竺摩同期的马来西亚出家人之中，只有伯圆法师亦能书能画。马来西亚美术研究者锺瑜对两人的画风评价如下：

（竺摩）上人之绘画风格承高氏之岭南遗风而不固守一家，设计题材广，以书画娱情养性。另一位佛教长者伯圆【圆】法师，喜作四君子，笔法如其人，温文儒雅（锺瑜，1990：102）。

尽管两人的画风各具特色，但竺摩与伯圆在马来西亚美术史中的定位，也只是业余画家级别（锺瑜，1990：102）。不过，锺氏随后提到竺摩“以书画娱情养性”，却无意间切中竺摩坚持书画弘法的原意，下文会针对这点再作讨论。本地书画家郑浩千与研究者夏美玉（生年不详）曾观察与分析竺摩的画作，皆觉得其作品带有禅境或禅机，而夏美玉则进一步指出竺摩的人物画绝大部分与佛教有关（郑浩千，1996：48；夏美玉，2010：183-192，2011：191）。以上三位研究者已针对竺摩的画风与特质个别提出专业的意见，本节接下来亦会采用其他专业书画家或文人的观点来评价竺摩的诗、书、画，继而探讨竺摩以诗、书、画弘法的用心与意义。

竺摩曾透露本身对书画的爱好仅仅是出于兴趣，没有什么研究，但知道中国画的两个中心重点是线条和神韵（《无尽灯》编辑部，1966b：26）。他写给郑浩千的信函中，则透露写书法应先写条幅再写大中堂，从易入繁（郑浩千，2012：191），对书画技巧实际上应该还是有所了解。然而，根据锺瑜指竺摩通过书画“娱情养性”，以及竺摩本身的“爱好书画”的说法，竺摩似乎更重视艺术所能创造的清净境界。

竺摩与艺术的关系颇有“游于艺而进于道”的意味。他曾指出，艺术是宗教的前奏（释竺摩，2003：69），人们从事艺术活动的当儿，都会自动净化与美化眼前的境界，而诗歌与绘画就有这样的特点。这是竺摩推崇艺术的重要原因，

也曾表示艺术有真善美的本质，因此越是乱世，就越应该谈艺术（释竺摩，1971b: 32-33; 1981: 8-9; 年份不详 c）。对于诗歌，竺摩有如下说法：

我觉得诗的无邪情趣，是表现高度艺术化的真境，与佛学上的荡执成智，迁恶为善，亦可息息相通……称为诗人是不容易的，他必先有高尚的品性，优良的举止，然后他所作的诗，才能弘扬诗教，移风易俗，振衰起颓……心境的思想美化了，表现于行为上的礼仪，亦必是温柔敦厚，正大光明，无形中把社会虚伪丑恶的一面汰除了（释竺摩，1971b: 32）。

在竺摩的观念中，当一个人的艺术水平达到了高度的境界后，他的行为举止同时也是正面的、美好的，故在此前提下，竺摩也强调有素养的艺术家应该受到宗教徒的尊重（释竺摩，2003: 70）。竺摩的观点，乃从艺术水平、个人修为，再论一个人的作品风格，说明艺术与个人修为有着互相影响的关系。与此同时，也有人通过竺摩其人，来评其诗、书、画作。对竺摩的画作给予好评者，包括了近现代书画家梁永康（1939- ）、李抚虹，以及曾于槟城钟灵中学执教的吴白鹤（吴鹤琴，1913-1969）和萧遥天等人：

囊【曩】者弘一大师雄于文而以诗书画为接众生之方便法，今能继其绪者，舍竺公其谁欤（梁永康，1991: 1）？

其所为画画，凡山水、花鸟、走兽、虫鱼、蔬果、人物、佛仙、莫不毕治。书则挺秀拔俗、独具风格。若诗与文、清缜可喜，有如其书与画，又莫不自发性灵，而乱离之思想，时有流露，是亦性情之所使然也（李抚虹，1991:

3)。

溯连年频观书展，均一时知名之作……中非无真意细腻之笔，非不曲尽形容之妙，惜乏一派清雅气；从知书画艺人格表现，临摹可以手灵，而不能神至耳。竺摩上人，苟不深于禅，何能得此脱尘之静感（吴白鹤，1956：7）？

竺摩法师的诗画，也入于艺术与宗教浑忘【忘】的境界……我尤喜欢竺摩的诗画，舍其造诣不论，他的人便太可爱了。那么清癯如鹤，明澈如水，不就是一首诗一幅画么？知其人而赏其诗其画，尤觉其中有无穷内涵之美（萧遥天，1956：8）。

以上四人中，居首的梁永康认为竺摩是继弘一法师之后有能力以文章以及诗书画接引信众的唯一一人；其余三人则通过竺摩其人反观其诗书画，对竺摩作品的评价颇高。李抚虹认为其作品具有个人风格，吴白鹤根据本身多年来参观书画展的经验，认为竺摩的书画以佛教为主，内容清雅、脱尘，足以反映其人格表现，萧遥天则认为竺摩的作品兼具艺术与宗教的境界。由此可见，尽管学者把竺摩归为业余画家（锺瑜，1990：102），竺摩诗书画三绝的才华，还是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赏，而他的作品实际上贵在展现了个人的修为。三慧讲堂竺摩法师文物馆中也展出了竺摩其中一幅颇有意思的作品：

受尽天下百般气 养就胸中一段春

竺摩此对联所蕴含的气度不一般。由此可说明，艺术水准除了和个人修为相辅

相成，也有着互相循环互相影响的关系。竺摩通过诗书画推广佛教文化，继而希望诗书画影响大众修行的用心，也可见一斑。

其次，竺摩通过精湛的画艺与自成一格的书法，更加亲近人群与信众。夏美玉指出，竺摩选择艺术，是因为艺术“能方便感化众生”（2010：185）。因此，竺摩看重艺术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它能契合信众的根机与喜好⁶⁷，依据出自《华严经》：

“菩萨求法当于何求？当于五明处求”。五明包括佛学（内明）、语言文字（声明）、逻辑（因明）、医学（医方明）、美术，工艺，科学（工巧明）。所以作为大乘佛教徒，为了方便应世，为了广度众生，除了要研究佛学之外还要研究世间一切学问（释竺摩，2003：68）。

据上所言，为方便应世与广度众生，应要研究世间的学问，其中包括了“工巧明”，而竺摩的诗书画处于这一范围中。许多信众曾向竺摩索取字画，而他早期精力尚可的时候，都会尽量满足信众的要求（郑浩千，2015b）。现今许多寺院也仍见竺摩的对联，以下乃竺摩题予怡保三宝洞的牌楼对联：

三圣在望迷途可畏急须披甲冲锋出

宝山已近佛法庄严切莫踌躇徒手归

字字句句，都透露竺摩的心声以及对信众的期许。其住持多年的讲堂，也处处

⁶⁷ 夏美玉已有专文讲述竺摩的艺术观，该文同时也说明了竺摩主张艺术与佛法有相通处，以及坚持艺术不能取代宗教，因艺术的感悟是刹那的，而佛教的修行是永恒的。详见夏美玉（2010），夏美玉，〈浅析竺摩法师佛教艺术观〉，收入郭莲花、梁秋梅合编：《回顾与前瞻马来西亚佛教》，页183-192。

皆有其字画，诗歌则多见于《无尽灯》及其他刊物。若从文教界及佛教界的角度出发，竺摩的书画可谓十分出色，而他多年来办的书画展也都获得参观者的大力支持，展出所得经费多用于推动佛教教育与佛教文化或充作佛教书籍印刷费（见表二）。

表二：竺摩法师历年书画展

	画展名义	地点/年份	备注
1	留别画展	澳门/1943 年秋	-
2	出国书画展览会	香港/1954 年春	-
3	个人书画展	曼谷/1954 年 4 月	展出在港澳期间所作的作品，以佛教为题材。 作品原本一律不标价，但第二天展览时有信众要求购买，故于第三天标上价格。结果画作被定去二十多幅，字联全被购置一空。
4	竺摩大师书画展	槟城/1954 年中秋	为期三天。 共获得款项近万元，捐助菩提中学科学馆购置设备，并编印《无尽灯》丛刊。
5	-	新加坡/1956 年 4 月 ⁶⁸	展出 300 件画作，减除成本及开销，尚余 11987.15 元。 捐 1,000 元予南洋大学，余款则由佛教教育金及无尽灯社丛书各得其半。
6	书画欣赏会	夏威夷/1957 年	-
7	竺摩法师书画展	悉尼/1976 年 11 月	为期三天。 展出书画诗联一百二十多帧，书画作品被抢购一空。展览所有收入全部捐给澳洲佛教组织，用于发展佛教事业。
8	竺摩法师与青年画家郑浩千居士书画联展	新加坡/1983 年 8 月	61 幅书画作品，除 6 件标为非卖品外，其余均被抢购一空。一半捐给佛教教育慈善机构，一半充作出版书画专集印费。

资料来源：整理自陈心耕（2012），〈竺摩大师艺坛履痕〉，收入《雁荡·岭南情缘》，香港：新新出版社，页 8-9；《南洋商报》（1956a，1956 年 4 月 28 日），〈竺摩法师捐画款千元昨日托本报转献南大〉，新加坡（一）第 5 版；*The Straits Times* (1956, April 14). Painting by priest is ‘elegant’, Page 7.

竺摩的书画展收入多捐给佛教团体，或作印费用途，足以说明诗书画对竺摩而言，说到底还是与佛教事业有关联。竺摩若没有办画展，也会通过鬻卖书

⁶⁸ 《雁荡·岭南情缘》标示为 1955 年 2 月（陈心耕，2012：9），竺摩演讲稿的说法是 1955 年 4 月（释竺摩，年份不详 d）。笔者根据《南洋商报》报道，更正为 1956 年 4 月。

画协助佛教界的发展，他曾以此方式在 1961 年协助筹募澳门佛教界兴建佛教教堂的费用（佚名，1961：11）。

多年的书画展中，以 1954 年的泰国书画展转折最为特别。当年的书画展原本只展出竺摩的作品，但在信众的要求下开放购买结缘，并在短时间内被购去多幅字画，可见竺摩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的确为信众所喜爱。当年的画展结束后，一名学生参观者陈楚云把自己参观画展的心得记录了下来：

我今天读书回家，跟弟弟和爸妈去听经，也去看画展……我最钟意的：……
三是“六根清净图”，写弥勒化世的布袋和尚，肉坦【袒】相见，写得很肥，坐在布袋里，前面拖的五个小孩，后面还有一个跟尾，用力地在推……
（陈楚云，1954：30）

陈楚云年纪虽轻，但对赏画似乎也颇有心得，一连描述了最钟意的六幅画作，但上段引文只撷取陈氏对“六根清净图”的描述。“六根清净图”是竺摩往后画得相当频繁的题材，夏美玉（2011）曾列出竺摩不同时期以布袋和尚为主题所画的“六根清净图”至少有十幅之多（页 187），而竺摩也曾为其中一幅布袋和尚画作题诗：

苍苍眉额思迢迢，大任乾坤一袋包。无限众生无限愿，泪痕和梦到终宵。
（释竺摩，2005：200）

竺摩在诗中流露了对众生的悲悯之心，而夏氏和陈氏皆引述了竺摩对这幅画的解释，意指布袋和尚修行好，不受六个小孩所代表的色、声、香、味、触、法

所干扰。年纪尚轻，不曾接触水墨画的陈楚云进一步透露，本身不太能理解菩萨的游戏三昧，只觉此画很有人生意趣（陈楚云，1954：30）。这么说来，竺摩的画作实际上是雅俗共赏的，懂画之人自然懂得竺摩画功高下，不懂画之人，也能从中获得一些灵感或启发。这也未尝不是竺摩通过诗书画展走进人群引渡众生的用意。

与此同时，竺摩乃应菩提学院邀请而来，其于1954年抵槟时尚无佛教会，因此在槟城的行动，自然就得靠菩提学院众人的支援而获得助力进行。竺摩抵步不久就筹备画展筹款⁶⁹，下为1954年竺摩开画展的目的与参与筹办的筹委名单：

为资助菩提学校中学部科学室设备，及其他佛教文化事宜，拟举行书画义展筹款：选锺文贤、李华春为推动股正副主任，骆清泉胡呈祥为布置股正副主任，届时将出版特刊，选管震民为特刊股主任……（《无尽灯》编辑部，1954：31）

骆清泉、管震民及其他筹委皆为文教界颇有名望者，此画展可谓竺摩正式与槟城知识文教界的往来之始。除了管震民，以上筹委会名单各人也曾在1956年前后，担任槟城菩提中学的常务委员（佚名，1956：26），让我们了解当年的文教界人士也为菩提中学出力不少，而竺摩得以通过书画深受文教界欢迎与支持，菩提中学当是其中一大因缘。

至于在1956年展出的书画，少数作品订价30元，大多数书画价格订在50

⁶⁹ 竺摩早期曾挥毫与作画，以筹募佛教高等教育奖学金，第41期《无尽灯》（1968年9月1日）刊有竺摩鬻卖书画润例。“润例”，乃请人作诗文书画的酬劳标准。

元与 100 元之间，而竺摩花费极大心血的作品，标价则在 250-1500 元不等。他表示，本身提倡艺术大众化，而当年的展览也主要是为佛教教育作功德，同时与佛教界人士联络感情，所以展会的作品价格并没有订得太高，好让爱好公益者及一般佛教徒都有能力订购一两幅（《南洋商报》，1956b: 6）。竺摩希望通过平民价格与信众结缘，也说明了他想接引一般大众的用心。

不过，竺摩认为佛教徒或是出家人应该以佛学为主，世学为辅，因此兼学佛法与世法时，应以佛法为主流，每日用二分时间来学习，世法作为副业，用一分的时间来学习⁷⁰（释竺摩，1954f: 7）。针对学习世学的最终目的，竺摩有一句极有意思的话：

且世间满腹经论的饱学之士，何止千千万万，我们即使学得一点学问，又何足以与他们竞赛，反而有失自己的身份（释竺摩，1990c: 16）！

出家人有自己的责任，故重点还是得放在佛法上，此或为竺摩多年来通过诗书画作方便弘法时所秉持的原则，而他也曾说大乘佛教以度人为先，若不做应做的事，也是犯戒的表现（释竺摩，1970b: 7）。换句话说，通过艺术接引信众，也是实践出家人义务的一种方式，因重点在接引信众，而非沉迷其中。

在诗歌方面，竺摩的诗歌虽多见于灯刊及其他刊物中，然而在研究者的收集下，目前已结集出版成《篆香室诗集》。诗集中的诗歌，有者乃竺摩自题，有者乃竺摩赠他人之诗，也有者乃竺摩为本身的道场或他人的道场所题写的字句。诗集中可见竺摩赠与本地知识分子的诗歌，如〈访绿天庐管公震民承惠诗集多册〉（页 64），〈次韵答晚香作家郢政〉（页 71），〈酬陈延进居士〉（页

⁷⁰ 学习佛法及世法的时间分配，乃由竺摩根据《瑜伽菩萨戒本》的说法提出。

126) 等。后两者——黄晚香与陈延进曾在马来西亚佛学院服务，其中又以陈延进的服务年限较长，职务也较重，曾担任佛学、华文科教师，也曾是佛学院的教务主任。竺摩写给陈延进的诗，就带有勉励意味：

自唯入山恐不深，难从浊世觅知音？拈花已负如来意，托钵徒伤行者心！

万叠阴霾遮慧日，千层瘴气失慈霖。为怜象教衰微甚，忍辱含辛挨到今！

（释竺摩，2005：126）

以上诗歌的写成年份暂不可考。然而，通过诗歌内容，笔者推断应当在陈氏担任教务主任期间，竺摩赞叹陈氏为衰微佛教的努力付出，而这也可以证明竺摩对知识分子的重视。

通过诗书画，竺摩无形中与多位文人雅士和信众有多番交集，也常应信众的要求挥毫或画画一幅赠与，而竺摩与海内外书画名家及教内高僧曾有书法的相互赠与，其中包括弘一、于右任（1879-1964）、高剑父等人。在三慧讲堂新建筑于1970年代改建时，竺摩曾通过本地书画家郑浩千，请台湾书法家如梁寒操（1899-1975）等人为讲堂题字（郑浩千，2015a），让大家通过书法与三慧讲堂结缘，而竺摩也曾送曹全碑帖给弟子继明法师（1948-）与继程，鼓励两人练字。不过，竺摩反而不鼓励出家弟子学诗画，原因在于一旦以这种方式弘法，便需要投入极多的时间来回应信众的要求（郑浩千，2015a；释继程，1996：15；2012：64；释继灯，2012：78-80），故竺摩认为并不是每个出家众都适合采用诗书画弘法的方便道。

在诗书画方面，本地书画家郑浩千先生实际上得益自竺摩不少。竺摩曾在郑

氏年少时给予指导多年，而郑氏至今仍感念在心的，是竺摩在其升学面对经济困难之际（1969年），协助郑氏举办个人画展筹升学费用。除了替郑浩千的画作题字补景，竺摩也找来多位本地书法家为郑氏的画作题字，还亲自订购了郑氏的一幅画，而郑氏最终也筹足了升学费用赴台深造。竺摩常鼓励郑氏多请教台湾书画家，也曾引荐郑氏认识当地爱好书画的悟一法师。郑氏回忆道：

他（悟一）也常办“粥会”，出席者有八十多岁的钱穆、梁寒操、郎静山、马寿华、李石曾等人，而我只有二十多岁，跟他们一桌吃粥。后来，我也因为悟一法师的介绍，而与这些学者名家相熟了。他们之中也有很多人认识竺摩法师（郑浩千，2015a）。

竺摩对郑氏的帮助不仅于此，详情可参本论文与郑浩千的访谈内容（郑浩千，2015a）。竺摩在郑氏赴台后不间断地书信往来，亦师亦友的关系也一直维持到竺摩圆寂为止。

郑浩千于1969-1974年留学台湾，竺摩则自1970年开始担任马来西亚佛学院院长。通过与郑氏的访谈，笔者得知竺摩担任院长后曾要求仍留学台湾郑氏留下一些画作，若信众捐款给佛学院，竺摩就会以郑氏的画作为回礼，有时也会在信中要求郑氏多画一些寄回檳城（郑浩千，2015a）。竺摩致力于通过诗书画推广佛教文化的努力，至少在郑浩千的身上看到了正面的效果与意义。所谓“效果”，乃竺摩获得了昔日栽培的弟子通过画作回馈；所谓“意义”，乃郑氏此举可谓为马来西亚佛教教育贡献了一份力。

不过，到了1974年，已经61岁的竺摩在灯刊发启示通知各界，表示其法务

繁忙，年事已高，故不再一一回应各方索写书画的要求，但仍会择要回答询问佛学问题者（释竺摩，1973a: 15）。竺摩在1969年已与其他长老及居士着手筹备创办马来西亚佛学院事宜，自马来西亚佛学院在1970年开课后，他一直担任佛学院院长，到1990年才淡出管理层。笔者认为，马来西亚佛学院的成立与维持消耗竺摩不少心力，因此才会婉拒索取字画的要求，但竺摩同时却选择保留解答佛学问题的的工作，由此亦可见竺摩的确以佛学的传播为主要重心。至于竺摩通过诗书画推广佛教文化，甚至是佛教教育的努力，到后期已渐见效果。

小结

竺摩曾经感叹早期佛教的宣传偏向修“福”，因此人们都误会佛教是迷信的，也忽略了修“慧”实际上更为重要。因此，竺摩在推广佛教文化事业时，也同时带有其他期望：通过文字，让正确的佛教文化流传下来，纠正人们对佛教的看法；通过讲经弘法，让佛教文化能被宣扬到更远的地方。因此，竺摩办刊物、印刷经书流通，也不辞辛劳南下北上，或是远至国外弘法，让身边的人对他有了“为法忘躯”与“逢请必到”的印象。竺摩为传播正确佛教教义的努力，已通过以上两个方面展现出来。另一方面，个性厚道的竺摩也曾对《无尽灯》取稿标准有所要求，以免在佛教界中引起争论，破坏教界的团结。

与此同时，竺摩通过诗书画筹款，推动佛教的发展。他也通过诗书画与信众交流，让信众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修养身心，也让他们通过此管道更亲近佛教，并在无形中藉着诗书画把大家一步步推往“知性”的领域。以上种种，除了能修正人们对佛教的偏见，也鼓励大家通过个人的修行，以及对教理的了解，对

佛教产生更深厚的认识与信心，让佛教得到更好的发展。竺摩身边，也因此聚集了好一群知识分子或文化界人士。这批知识分子，不管在提升佛教形象方面，或是推广佛教发展方面，都给予了竺摩极大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竺摩“跨界发展”，他的画作更为人们赞赏的却是作品中反映了他个人的修为。无论如何，竺摩写诗、写书法、写画，其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传播佛教文化。

第四章 竺摩法师与佛教教育的推广

上一章我们探讨了竺摩法师如何推广佛教文化事业及其贡献，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其对佛教教育的推广与贡献。推广佛教教育不仅是近现代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重大的事情，也是佛教回应西方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近现代佛教教育的发展，从中国到南洋，竺摩是一位见证者，也是一位推手。换言之，竺摩不仅通过文化传扬佛法，也非常重视佛教教育的发扬。他一生从事的佛教事业很多，晚年时都一一放下，而马佛学院是他于1970年创办以来出任院长至1990年才卸下职务，但仍保留院长名义至圆寂为止。

竺摩重视佛教教育乃受其恩师太虚法师的影响。清末民初出家人对佛教知识的贫乏，以及当时发生的庙产兴学等事件，促使当时的佛教界大德极力主张办僧教育工作。太虚所想所愿，是把佛教学术化，竺摩因出家后亲近太虚多时，因此也受太虚对以上事项的言论及实践影响颇深。竺摩认为“研究佛法，是佛弟子最重要的工作”，因研究佛法的人一旦多起来，佛法就会跟着兴盛，而他也多提及佛教“信智并重”，并指出信仰建筑在理智之上（释竺摩，1971d: 3, 1954g: 26, 1968b: 23-24）。为了获得所谓的“理智”，研究佛法的确是最重要的工作，而培养研究佛法人才的场所当属佛教教育机构。对于竺摩而言，办理专门的佛学院或普通的佛教学校都一样重要（释竺摩，1972b: 7）。竺摩在马来（西）亚曾领导或协助办理的佛教教育组织主要有三个，即槟城菩提中学（1954）、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1968），以及马来西亚佛学院（1970）。下文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这三个组织。

此外，竺摩对佛教教育的推广不仅在佛教教育机构，也曾设立两个基金资

助贫寒的佛教子弟深造，一为“马来西亚佛教高等教育奖学金”，另一为“竺摩法师基金”，不过笔者目前所得的相关资料十分有限，因此仅在本章前言略作交代。

竺摩于 1950 年代中期开始筹备设立“马来西亚佛教高等教育奖学金”⁷¹。他认为，以马来西亚当时的条件，要办学是很困难的，因此希望通过创设奖学金，以最经济的时间和财力为佛教和社会培养人才。此升学基金由竺摩发起筹备，首笔金额由竺摩捐出在新加坡画展中筹获的叻币五千五百元⁷²，一名在家信众陈居士随后也捐出叻币四千五百元，凑足一万元的整数。在筹得以上两笔捐款，并征求了足够的基本委员后，马来西亚佛教高等教育奖学金于 1960 年正式成立。有关升学基金初时资助优秀而贫寒的佛教子弟升读大专学校，不过自 1970 年开始仅供专修佛学的学生升学之用，以培植佛教青年新血（释竺摩，年份不详 d；《无尽灯》编辑部，1964：27）。由于此奖学金成立二十多年后的金额所增不多，因此在真果法师建议下，于 1981 年转由三慧讲堂承办。1982 年扩大办理为全国的佛教教育奖学金，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也曾在 1983 年为此奖学金筹款。后来此奖学金已在 1993 年将余额（马币 17 万）全数捐予马来西亚佛学院教育基金（释竺摩，1983d；《马来西亚佛教总会 50 周年特刊》编委会，年份不详：44）。

1984 年，竺摩设立的第二个基金为“竺摩法师基金”，隶属三慧讲堂。现任住持继传法师透露，竺摩还在世的时候，会把部分贺仪捐给基金会，该基金会早期也配合狮子会帮助病患者。目前每年拨款予马来西亚佛学院约一万元，

⁷¹ 1972 年改名马来西亚佛教教育奖助学金，1982 年改名马佛教高等教育奖学金委员会。两次的更名，都与奖学金的章程或管理层更动有关。

⁷² 竺摩在多篇文章中，皆记载有关画展在 1955 年举办，不过现有的文献（《南洋商报》）却记载竺摩在 1956 年办画展，故本段落暂且略去筹备年份。

佛学院以外的申请者则获一千元奖助金，偶有自然灾害，也会拨款救灾（释继传，2013b）。由此可见，竺摩创立的基金都与推动佛教教育有关。

如上所述，竺摩设立佛教高等教育奖学金的决定，源自 1950 年代马来西亚佛教教育欠缺发展条件。“财力”固然是佛教教育发展条件之一，然而办学最重要的助力仍在僧俗弟子的观念，可惜当时的僧俗弟子多以应赴经忏为重、轻视教育，有些前辈甚至认为佛教只讲修行而不鼓励弟子求学。竺摩因而痛心人们本末倒置：“不学哪里知道修行呢？”，同时感叹缺乏人才，让佛教教义无法深入民间（释竺摩，1962b：12）。十年后（1972），竺摩依然忧虑佛教的发展，并指出异教学校或教会的蓬勃发展给佛教带来威胁。他透露，宋明之后的佛教教义没有人研究，缺乏宣传，忽略佛教教育，造成佛教缺乏人才，是佛教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因此佛教最需要的工作是办专门的佛学院或普通的佛教学校，并刊行佛经杂志以纠正以上偏差。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异教学校林立，孩子们若进入这些学校就读，就会对佛教产生疑惑，与家庭里的佛教观念相异。竺摩认为，有佛教学校的地方随时可见蓬勃气象，没有佛教学校的地方，虽然也有人烧香拜佛，但始终掺杂了迷信的成分，因此若有能力应多开办佛教学校（释竺摩，1972b：7-8）。马来西亚教育体系下的佛化学校，1952 年在槟城成立了菩提中学之后已没有再增加⁷³。至于培养佛教专才的佛教学校，在 1970 年竺摩曾领导创办了位于槟城的马来西亚佛学院，隶属马来西亚佛教总会。

竺摩于 1954 年因协助办理菩提中学南来，在菩中教导佛学课十年后，因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事务无暇教课而迁往三慧讲堂（释竺摩，1985a），再由三慧讲堂青年信众组成佛法研修会，由竺摩与黄荫文担任导师，而竺摩则在两年后担

⁷³ 马来西亚佛教会曾筹备雪州菩提学校，详见〈佛教消息〉，《无尽灯》第 2 期（1959 年 9 月 30 日），页 46。但此校最后并没有办成。

任马来西亚佛学院院长，黄氏也从旁协助打理教务与院务多年。竺摩与以上各个教育组织的渊源不一，但他仍不时开示各校学生或成员，相关单位出版的特刊也刊出竺摩的贡献或寄语，因此竺摩也在各个单位留下了不少演讲稿与文字。本章将通过竺摩对各教育机构的贡献，以及演讲词、特刊等资料，进一步地探讨他对佛教教育的看法。

第一节 槟城菩提中学

马来西亚的佛教华文小学有两所，即马六甲的香林华文小学与槟城菩提华文小学，至于佛教中学方面，仅有槟城菩提独立华文中学与菩提国民型中学。因此，菩提学校可说是马来西亚唯一拥有中小学的佛教教育机构。

槟城菩提中学设立的因缘，与竺摩亦师亦友的法舫法师有密切的关系。法舫于 1950 年建议槟城信众开办中学，并邀当时仍在香港的竺摩一起前来办学，但法舫不幸于 1951 年圆寂，徒留竺摩一人于 1954 年前来，故竺摩在菩中担负的责任与办学模式，是本节首要论述的课题。其次，竺摩曾针对办理佛教中学的意义，这么转述法舫的话：“佛教中学对宣扬教理才起作用，办小学不过使学生种点善根而已”（释竺摩，2003：97-98；释竺摩，1961c：30）。因此，本节所要论述的第二个课题是竺摩在中学宣扬的教理内容。

一、菩中办学模式及竺摩的责任

我们首先谈谈菩提中学的办学模式，以及竺摩扮演的角色。1952 年，菩提中学以职业班的模式开始运作，1953 年在胡文虎（1882-1954）资助下有了六间

课室；1954 年获批准注册，职业班学生转入初中部，第一届毕业生也得以于同年参加政府会考，成绩冠全檳（尘砂，2003）。该校于 1962 年因政府的教育政策分为菩提独立中学与菩提国民型中学，而初中部与高中文理科纳入菩提国中体制，独中仅剩高商班。1999 年，独中重新招收初中一学生，并共用同一校园直至菩提国中于 2009 年迁校（王增文，2014），目前原校址仅剩菩提独中。两校至今日属保有佛教色彩的国中与独中，皆把佛学课纳入必修课，而菩提独中的学校周会与仪式仍保留佛教特色（陈秀丽，2013；佚名，年份不详 b）。如上所述，菩提中学面对的最大转变乃两校在教育体制上分家，但是仍同处一校园办学，而竺摩在 1965 年 3 月即迁往三慧讲堂居住，故菩提中学的分家对竺摩而言影响不大，竺摩多年来给学生的讲词与毕业刊寄语，也都以两校学生为对象。因此，有关竺摩与菩中（独中与国中）的所有往来细节，我们将全统一于此节进行论述。

竺摩来马后，曾开画展为菩提中学筹募科学馆设备（释竺摩，1970c: 17；《无尽灯》编辑部，1954: 31）。其在菩中的身份为“佛学课教师”，在 1958 年把自编的讲义以笔名“释慧森”名义结集出版（共三册），命名《初中佛学课本》⁷⁴。1960 年，菩提中学全校共有学生七百余人⁷⁵，高初中及商科各班每周有一节“佛学常识”，多数由竺摩负责讲解（释竺摩，1983a: 19）。1956 年，众多高僧与居士上下一心，为菩提中学购得地皮建造礼堂（《无尽灯》编辑部，1956: 17），因此菩提中学可说是在佛教界各方的大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1963 年，台湾《菩提树》主编朱斐随访问团来马时曾到访菩提中学，故我们可通过

⁷⁴ 竺摩于 1958 年之前都是担任初中佛学课程老师，而菩提中学于 1958 年才增办高中班，故此时仅有《初中佛学课本》；笔者手上的资料，竺摩并没有编订出版《高中佛学课本》。

⁷⁵ 菩提独中网页资讯，学校校舍竣工日期为 1959 年 12 月，1960 年开课的学生人数为 600 人。详见《校歌与校史》（重修版），菩提独中网页，2015 年 3 月 23 日阅自 http://phortay.edu.my/?page_id=53。

其文章一探菩中当时的面貌：

该校因系佛教创办，对学生品德之陶冶，都以佛陀之教化为依据而施行……

课室内均悬有教主释迦牟尼佛像，走廊中也到处可以见到佛陀生活之壁画。

学术竞赛中亦列有佛学论文为其项目，藉此鼓励学生向佛之志（朱斐，1965：82）。

以上所述，道出菩中当年的气象与光景。该校除了把佛学课列为必修课，也有佛学论文竞赛，学生们能接触佛教的机会十分多。在社会学科方面，菩中学生的表现也很亮眼，除第一批初三生于1954年参与政府会考成绩居全槟中学之冠，竺摩也曾称菩提中小学与马六甲的香林学校为“全马佛教的姐妹花，每年考试成绩优良，为吾教增光不少”（释竺摩，1970d），说明当年的佛教学校的确办得很出色。

另一方面，竺摩担任菩中佛学导师的十年内，该校仅出版了三本毕业刊（1959-1961）⁷⁶。值得注意的是，竺摩虽曾担任该校的佛学教师，其名字及照片并没有出现在菩提中学毕业刊的任课导师栏目中，但菩中全体教师合影及所有班级的团体照中⁷⁷，却处处可见竺摩的身影，而且皆被安排于前排中间的位置。通过毕业刊，我们了解竺摩虽没有参与管理学校，但他与菩提中学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他迁往三慧讲堂后，也曾通过开示或主持皈依仪式与该校保持往来，同时也继续给毕业生写题词。因此，竺摩编写的课本、演讲词以及各届毕业刊

⁷⁶ 该校1954-1958与1962-1964年度毕业生人数不足，没有出版毕业刊。详见编者（1959），〈编者的话〉，《槟城菩提中学初中第六届毕业纪念刊》，槟城：菩提中学第六届毕业班，页71；编者（1965），〈编后话〉，《槟城菩提中学国民型 独立型毕业纪念刊》，槟城：菩提中学国民型 独立型毕业纪念刊委员会，无页数。

⁷⁷ 竺摩没有参与1960年毕业刊团体合照，但却为毕业刊写了一篇文章。

寄语，都蕴含着他对该校中学生的寄望，以及他希望向学生传达的讯息。我们将在下文再详述。

二、培植正确价值观念与宣扬佛理

竺摩认为，菩提中学作为一所佛化的社会学校，其任务乃“从佛教文化教育的熏陶中，为国家社会鼓铸学德兼备的优秀人才”，同时也希望毕业生可以如校名般，发菩提心，积极服务社会（释竺摩，1961c: 30），间接透露了他期待佛化社会学校可以为国家与社会培养人才。同时，也因为学生们年纪尚轻，因此竺摩对他们灌输的观念也必然的较为浅白，勉励词则大多偏向敦品励学，其中一段让笔者尤为印象深刻：

学问好固是一件幸事，但若未能敦品、缺德，往往被人唾弃，弄到“英雄无用武之地”，坎坷一生，穷愁潦倒的很多；反之，有品行有信用的人，就使他学问差点，也容易找到事做，得到人们的敬重（释竺摩，1959a）。

对学生的要求，竺摩以品德为第一顺位，其次才是成绩。他曾说过：“一切学问以道德为基本，有德才重学，无德学不重”，不过他也强调，两者不宜相距太大，因若没有求知而力行，行为常常是趋向盲目的（释竺摩，年份不详 e；年份不详 f）。另一方面，在 1959 年菩中第二学期开学致词中，竺摩特别对功课不好的学生提出“忍耐”的概念，叮咛他们运用冷静的头脑寻求补救的方法。竺摩补充，此时提“忍耐”与当时华文教育好事多磨的处境有关，并强调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有静心忍耐以求渐次改善。不过，竺摩也同时说明，若无

高度修养的智慧，不容易做忍耐工夫（释竺摩，1959b）。综观上文，竺摩最为注重的几个面向，当属品德、忍耐与智慧。

至于竺摩多年来在菩提两校的毕业刊题词与文章，内容也相当一致，都勉励毕业生要多学佛学与实践佛学（表三）。

表三：菩提中学毕业刊赠言内容

	毕业年份	毕业班	毕业刊题词或文章内容
1	1959	初中第六届	题词：为学为人 其利无尽 ⁷⁸ 文章：〈苦学与力行〉（为菩提中学第六届毕业生写）。勉励毕业生“学以致用”，达到“解行并进，智悲双运”的境界。
2	1960	高商第一届 初中第七届	无题词 文章：〈把握时机，自强不息！〉（高商初中毕业合刊题辞）。勉励毕业生把握时机努力。团结同学们互助合群，再把这种精神带到社会上。
3	1961	高商第二届 初中第八届	题词：征衣扑朔木兰勇 柳絮飞扬道韞才 肯让前贤专二美 及时努力铸将来
4	1965	国中与独中毕业班	题词：负笈菩提忽数年 一趟相聚亦前缘 课余尚忆求真谛 觉有光明照大千 备注：页 37 刊有校园照，竺摩曾于本年在校内作佛学开示。
5	1967	国中与独中毕业班	无题词
6	1969	国中高中第八届 独中高商第十届	题词：知也无涯生有涯 十年窗下见灵葩 斑斓一枝华而美 不撻才情信可夸 文章：〈永恒的聚会〉（赠菩中毕业生）。借用佛理说明，精神常在一起就是永恒的聚会。最后勉励毕业生学习世间知识之余，也要多学佛学。
7	1971	国中高中第十届 独中高商第十二届	无题词 备注：竺摩与庄汉良居士各捐五十元，款额最高。
8	1975	国中第十四届 独立第十六届	题词：菩提十载树榿榿 学士成林事可嘉 不撻才华惊迭出 埋头接厉顶呱呱
9	1976	国中高中第十五届 独中高商第十七届	题词：恭俭持己 慈爱及众 学以致用 其乐融融

资料来源：整理自菩提中学毕业刊

竺摩早期曾提出以戒学修养品德，以定学训练身心，再以慧学掘发理智（释竺摩，1990c：10），而竺摩给菩中学生的演讲词及毕业刊题词的范围也不出叮

⁷⁸ 原文为甲骨文字体。感谢李国正教授协助辨认内容。

吁大家培养品德、训练身心与修养智慧，让我们得以从中发现竺摩的教育理念始终如一。

此外，竺摩对菩中学生也曾有过一番苦口婆心，在开课日给学生讲话时谈起求学的不易：一为学问不易，因学问无穷难学尽；二为好的求学环境不易，顺带提及菩提中学的设备媲美香港东莲觉苑的佛学校，要学生珍惜此求学机会。与此同时，竺摩也提醒同学们不要跟随时代潮流，以为学生与教师地位平等而轻慢侮辱师长，并希望学生们可以由智生信，对佛教的信仰要有真理作为后盾（释竺摩，1954h）。竺摩对学生提到的“由智生信”，实际上与太虚及佛教改革派早年宣扬佛教是“智信的、科学的”，甚至是“佛教超越科学”的说法相呼应，让我们了解其对中学生信仰佛教的过程有所要求，亦不离法舫“办佛教中学宣扬教理”的目标。至于竺摩宣扬的教理内容，目前可考的乃其自编的《初中佛学课本》三册。

《初中佛学课本》于1958年出版。据竺摩的说法，由于当时没有完整的佛教教科书，此套课本乃其在法务匆忙中完稿的讲义，并没有作有系统的叙述，只是在上课时随意向同学介绍的佛学常识而已，并寄望此书能作抛砖引玉之用（释慧森，1958：（编者附记）页1-2）。本套课本的特色乃深入浅出并举例讲解课文，同时于每一课文之后设计数道问题。每一册课本都有三至四个主题，而笔者已根据课本内容把课文划分成几个部分，呈现在每一册目次的图表中。下表乃第一册的目次。

表四：《初中佛学课本》第一册目次

一	第一课	教主的生长和出家
	第二课	出家的动机和背景
	第三课	由访道到成道
二	第四课	缘起和人生观
	第五课	缘起·互助·无我
	第六课	平等的理趣
	第七课	慈悲的扩展
三	第八课	四圣谛的教授
	第九课	修习基本的圣道
	第十课	正当的思想和生活
	第十一课	修学六度的菩萨道
四	第十二课	三藏圣典的结集（上）
	第十三课	三藏圣典的结集（下）

以上“表四”是《初中佛学课本》第一册内容，以“缘起”、“业力”为主轴，内容较浅易，所设计的问题，大多都能在课本中找到答案，旨在让学生进行复习。此册以佛陀的一生为起始内容，并以佛陀没后的三藏结集为结束。

表五：《初中佛学课本》第二册目次

一	第一课	构成佛教的要素
	第二课	学佛宜先净心
	第三课	心意识的研究
二	第四课	人生的恶浊和净化
	第五课	因缘与果报
	第六课	不做十种恶业
	第七课	根本烦恼和随烦恼
	第八课	十善和善心所法
	第九课	四大与五蕴
	第十课	佛教徒的类别
三	第十一课	教团生活的准则
	第十二课	皈依三宝是学佛的开端
	第十三课	在家学佛男众的模范人物
	第十四课	在家学佛女众的模范人物（上）
	第十五课	在家学佛女众的模范人物（下）

“表五”为第二册的内容，以“意”为主轴、兼谈“业”与内心的清净。课文（第二课及第三课）有一些难度，所谈的内容与“意”相关。在问题练习部

分，开始有一些特别设计的问题，要求学生另举新例来说明课文中某些佛学知识及引导学生反思，如：

- 一、第二课：你觉得自己的意识清净吗？
- 二、第七课：你觉得自己哪种烦恼最多？
- 三、第七课：你能坦白地说出你的烦恼吗？
- 四、第九课：试举一个新例说明四大！

表六：《初中佛学课本》第三册目次

一	第一课	五乘的教育法
	第二课	佛教的十法界观
	第三课	业力的面面观
	第四课	业力学说的价值
二	第五课	苦的探究
	第六课	乐的追求
	第七课	世界的机层组织
三	第八课	修学三种般若
	第九课	学佛的目的与任务
	第十课	五法的学习
	第十一课	菩萨的四摄法
四	第十二课	真如与无明
	第十三课	烦恼与菩提
	第十四课	生死与涅槃

“表六”为第三册的课文内容，以业力为主轴，指导人们怎么修善，怎么远离烦恼，同时把“涅槃”定为此套课本的最后一课，而业力与般若乃本册主轴。

综观三册《初中佛学课本》内容，竺摩编著的课本有四个特色。其一，以“缘起”、“心”、“意”与“业”为核心论点，强调业果会随着生命流转，希望学生们能从心态上完善自己，警惕他们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及言行举止。“缘起论”鼓励每个人互相帮助，也指出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公平升堕的机会，只要愿意向善，无论目前的情况多糟，都有改善的可能；反之，若不为善，就有下

堕的可能。每个人所做的事，也会为自己带来不同的业果（释慧森，1958a: 14-18, 21-22; 1958b: 31-32）。

其二，竺摩经常强调的重要修行是“忍”，“忍”必须有智慧在背后支撑。不过，竺摩在本套课本中极少提“忍辱”或“忍耐”，而是在第三册中的第三部分强调“般若”，或智慧的重要性（释慧森，1958c: 42, 44-45），意在劝勉同学们需观照自己的内心，培养自己的智慧，因为智慧乃日后处事的重要依据。

其三，竺摩两度从佛学的观点强调佛学的智慧与价值非科学或哲学所能比拟。竺摩以科学的说法来比对佛教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继而结论出科学现在看到的東西，佛教在很久之前已经看到了。同时，他也从佛教的角度让学生了解世界，并再次强调佛学的真理与智慧，不是普通科学家和哲学家所能揣测的（释慧森，1958c: 28-33, 56）。笔者推想，竺摩此举的目的是让学生对佛学产生信心，相信佛教的价值是科学无法取代的，让他们在当时物质昌明的年代，还能坚信佛教的信仰。

其四，强调如何修行。第三册第三部分谈的是如何修行，第十一课谈的是“四摄”（布施、爱语、利行、同事），通过以上四种方式与他人相处、沟通，搞好人际关系，摄受众生。竺摩认为，如果本身修行佛法，但说的话不能感动别人或使人相信，一定是自己没有学好或做好四摄法（释慧森，1958c: 49-50）。

竺摩也在最后三课讲解佛法特殊的词汇，如：真如与无明、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槃，并说明无住涅槃最有价值，“永远是在积极的进取，为了利乐众生，广建净业……”（释慧森，1958c: 56, 61），以上种种十分符合竺摩的实际作为，也更突显了竺摩欲为大众服务的倾向。

若把此册内容，比对第一册第二部分，我们得以发现竺摩编排的课文前呼后应，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佛法体系：从缘起论而互助，继而突出四摄的意义以及竺摩以“利他”为先的观念。若究其原因，或与当时的社会风气越来越败坏有关，因此竺摩常把利他精神、慈悲等挂在嘴边，希望能让大家通过实践利他、慈悲，来改善当时的情况。

上文曾述，竺摩并没有参与菩提中学校务，因此他比较有充裕的时间规划菩中的佛学课程，也能体现出他对佛学体系的看法。他所推广的中学佛教教育，最后的重点回归到佛教常强调的行、解之上。最基本的做法是要先培养好的品德，甚至认为品德居于学问之上，也灌输中学生要有“互助利他”的观念，而这也是竺摩由始至终表现出来的行为。另一方面，竺摩寄望学子可以“由智生信”，也在课文中强调佛学的价值比科学还要高。竺摩对佛教充满信心的表现，进一步让我们知道佛教徒不仅要诚，更要了解佛理，因“了解”才是信心的重要来源。然而，竺摩在菩中仅负责宣扬教理与协助培养社会人才，培养更多佛法研究人才的计划，要在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成立后才有了初步的面貌。

第二节 槟城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

挥别菩提中学，竺摩于1965年3月迁往位于槟城邦咯律的三慧讲堂。讲堂于1966年开光，并于1968年4月6日成立“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成立的契机与讲堂早期的周末念佛会及周日讲经有关。这两项固定活动在当时吸引了许多青年男女来参加，于是就集合了青年们筹组“佛学研究会”。黄荫文当时认为，这个组织应该研究和修行并重，竺摩因而建议取名“佛法研修会”，获

得了大家一致认同。早期的会员年龄限制在 18 至 40 岁,1980 年代放宽至 65 岁。在家众与出家众皆可参与有关组织,会员人数曾高达千人,属下有弘法组、康乐组、福利组、出版组等,较为后期才成立的则有研修组等组别(曾天耕,2016;吕吉生,1993:22,2016;郑达亿,1993:23)。竺摩曾如此简述研修会的性质:

本会向来都是以弘扬佛法,提供佛教青年们适当的消遣活动,与听闻佛法的机会,以及做一些社会慈善福利工作,同时也是以栽培佛教人材为旨趣(释竺摩,1983d)。

研修会的焦点多置于佛教之上,并以栽培佛教人材为旨趣,与菩提中的宗旨相较已有所不同,竺摩可说已踏入了推广另一阶层与年龄层佛教教育的阶段。有关组织早期的活动,都由导师(竺摩及黄荫文)及顾问轮流讲解佛学,但是竺摩与黄氏在马来西亚佛学院于 1970 年成立后被委任为院长与教务主任,已无暇带动研修会,只好让资深会友教导资浅的会友(释竺摩,1983c:10)。这么看来,竺摩与研修会的频密互动不超过两年。但是,此研修会自成立以来都以竺摩为导师,也一直在三慧讲堂活动并多次护持讲堂,也在竺摩的同意下创办了盛极一时的三慧讲堂周日义校(1974)栽培年幼的一代,故研修会基本上可说是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因此仍有记述的必要。

曾天耕乃研修会创会时期的成员,多年来曾任弘法、总务、主席等职(1968-1978),同时也是三慧讲堂周日义校创校校长(1974-2011)。他透露,研修会的活动在每个星期日进行,固定的活动有弘法练习,让研修会成员自设演讲课题,在一个小时的时段中练习演讲,主要目的是锻炼理事的口才。每周

弘法练习人数不定，有时一人，有时二人。曾氏表示，竺摩法务繁重，不会常常参与监督研修会的弘法练习，但竺摩若在讲堂中，研修会成员都会恭请竺摩出席，竺摩有时也会在旁聆听。此外，研修会也另外安排一个晚上，让资深会员教导年轻会员《佛学入门手册》（曾天耕，2016），佛法知识也因而得以传承。

不过，星期日固定的弘法练习环节，到了后期已经取消。1985年左右加入研修会的吕吉生表示，他们已经没有安排固定时间练习弘法，但三慧讲堂弘法主任会安排人选在讲堂的周末念佛会上弘法，负责弘法者需自行准备讲题与讲稿。竺摩若在讲堂也不一定到场监督，而是通过房里的扩音器听他们的演讲内容。至于该会的弘法组，多年来曾主办周日佛学讲座、座谈会、静坐班，佛学班，也在1988-1993年之间，共办了八届的研修班（郑达亿，1993：23）。曾氏与吕氏异口同声表示，竺摩并不会干预研修会的活动，理事会成员可全权规划活动与演讲主题（吕吉生，2016；曾天耕，2016）。

研修会早期的活动也包括供僧、团拜、康乐组的佛曲演唱、户外活动，以及福利组的慈善布施活动与“结缘队”等。至于“结缘队”，则会另定一个晚上练习法器及唱诵《阿弥陀经》等经文，若往生者家属来邀请，他们就会去助念结缘。吕氏透露，结缘队的存在曾于1980年代引发一件有趣的事。那时的研修会曾一度取消年龄限制，以接引更多人学佛、研究佛理，而此举果然吸引了很多新会员，但是却以老人家居多，经查询后才发现老人家们意在结缘队，希望本身往生后能有人到府诵经。这么一来，就远远乖离了研修会的宗旨，因此理事会又把会员年龄限制到65岁，并规定会员参与研修会的活动（曾天耕，2016；吕吉生，2016）。老年信众此举，让我们深切体会培养正信正见的重要。竺摩

曾说过：

因为佛法是实践道德的学问，研究了这门学问，还要实行这门学问，才能获得实际的效益……只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这是现阶段佛教青年所需要的作法，应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地努力求进，在佛教青年阶层中沉着修学而生起领导作用（释竺摩，1983e：82）。

诚如竺摩对研修会成员的叮咛，若佛教青年认真学佛修行，就能在佛教中起领导作用，而研修会成员也的确在三慧讲堂许多活动方面曾有优异的表现，三慧讲堂周日义校就是其中一例。当时，研修会已成立数年，理事也渐渐冒起了教育年幼一代的念头，并在征得竺摩的同意后开始筹办佛学班，而竺摩也欣喜讲堂中即将有老中少三代的信众。佛学班的筹备工作曾因三慧讲堂装修（1974）而延误一段日子，不过正式开课之后迎来的却是惊喜，因该校从初办的两班三十余人，逐渐增加到十班三百余人，高峰期有五百多名学生。前来报名的学生人数远远超过预期，规模直逼一些正规小学，“佛学班”也因而获得竺摩赐名为“三慧讲堂周日义校”（曾天耕，1978：1；2016）。

周日义校学生的入学年级从启蒙班（相当于幼儿园）至高中一，当时教授的科目有佛学、马来文和英文，佛学课程方面曾采用《佛学入门手册》，以及金明法师编的佛学课本等。教职员有些来自研修会，有些则通过熟人推荐，皆义务指导学生（曾天耕，2016）。周日义校创办三年后，该校学员在全国佛学考试、全国绘画比赛都获得佳绩，也曾参加卫塞节的佛教歌舞剧（释竺摩，1977b）。

多年过去后，如今三慧讲堂周日义校的规模因周边的道场及佛学班数量增

加而逐渐衰退，但经过多年的耕耘，周日义校的学生长大后都会参加研修会。研修会目前的成员中，约百分之七十是义校学生（曾天耕，2016；释继传，2013b），也可算得上是完成了培植佛教接班人的任务了。周日义校早年曾出版七届毕业刊（1978-1984），取名《慧苗》。毕业学生也在刊物中表达了对周日义校老师的感恩之情：

虽然讲堂里义校的设备并不是很俱全，但老师们孜孜不倦的教学精神，是值得我们效学及赞赏的……牺牲一周仅有的一天的休息时间，为的是义务为国家建设与培养一批批的新生，循循善诱的传达人类崇高的旨意与学识……（心皈，1980：19-20）

义校当时的设备不全，但其规模却从初期的“佛学班”，发展成高峰期有五百多名学生的“周日义校”，义校老师们的确功不可没。竺摩曾给前三届的毕业刊撰写文章，强调“般若智慧”的价值，以及叮咛学生们要有正理正行，也要修善行（释竺摩，1978a：6，1979a：4，1980a：3）。竺摩给年少学生灌输的观念，范围亦不出修炼智慧与修行，再次印证了竺摩对这两者的重视。

研修会成员除了对周日义校大力护持，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十分亮眼，当时卫塞节、大庆典等许多活动的义工，大多来自研修会；而担任义工的意义，除了能服务人群，也能藉此与人互动，体验佛法。此外，他们曾在讲堂内举办多项比赛，如佛学常识笔试比赛、佛教故事讲述比赛、佛曲歌唱比赛等，也曾主办佛学训练课程，同时派员参加槟城卫塞节庆祝委员会所举办的佛教作文比赛、佛学常识口试比赛、绘画比赛等，经常载誉而归。然而，由于早期研修会的成员多属年青人，因此其活动曾经偏向年青人的团康，后来藉由成立佛学班

提升佛学的认识与修持，以符合研修会的宗旨（吕吉生，2016）。

不过，早期的特刊中只见“佛学班”的一条记录（1984），以“佛法研修班”名义办的活动反而更为频密，前后曾有八届（1988-1993），分别由沈顺成居士（继藏法师）、继如法师、继传法师、继仁法师、继禅法师、郑扬东居士、继尊法师、继证法师负责讲课，每届研修班上课期限从三周至十二周不等。另一方面，该会研修组也曾在1988年举办两次“实际问题研究”，设定讨论主题，并由一位出家众主持讨论过程（银禧纪念刊编委，1993：29-36）。以上两种活动都符合了研修会的主旨，而我们也得以了解尽管竺摩没有干涉研修会的活动或课程设计，但研修会成员都表现得相当独立，在研究及修行方面的表现也是值得赞赏的。至2016年，研修会在周日的活动尚有瑜伽班与成人佛学班，佛学班分别由继群法师、余锦畅老师和吕吉生老师负责指导（吕吉生，2016）。

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与马来西亚佛学院相隔两年创立，作为马来西亚当时最有才学的出家人，竺摩无疑是领导佛学院的最佳人选，因此竺摩自1970年开始，已无暇带领研修会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这批年轻人依然能自律持续活动，实际上也源自竺摩的身教与包容，而曾氏与吕氏也对这一点感念甚深。马来西亚佛学院成立后，竺摩的包容与身教的范围也从佛法研修会扩大到马来西亚佛学院，竺摩与佛教教育亦自此有了更深的渊源。

第三节 马来西亚佛学院

竺摩对于佛教的发展尝有以下叙述：

（锡兰、暹罗、缅甸）的寺院内，多有附设佛教的教育机构，注重向新学比丘灌输佛教的基本知识……反观我们中国大陆过去的大丛林里，只有禅堂和念佛堂，而很少有学院性的教育设备，义学不振，所以使佛教日走下坡了（释竺摩，1979b：39）。

过去的佛教，疏忽了佛教的教育工作，所以弄得今日的佛教教育，师资人才奇缺，专门的佛教学院与普通的佛化学校，寥寥无几。这是一幢憾事，也是当前佛教一个最严重的问题（释竺摩，1971c）。

归根究底，了解佛理的出家人人数不足，影响了佛教教育甚至是佛教的发展。不过，因为前述的财力和人力等因素，马来亚早期的寺院恐怕没办法自行办教育。因此，竺摩南来后最致力发展的佛教教育组织，乃办理全国性的马来西亚佛学院。

马来西亚佛学院开办的议案早在1959年被通过，但未见实行。1961年，有关议案被重新提起并通过，但多年后仍无法成事，主因在大家皆顾虑院址与学生来源问题。至1969年，马佛总位于槟城的大厦建竣，三楼部分房子可作上课用途，遂由马佛总筹办佛学院，翌年正式开办（释金明，1973：37-38），而佛学院四大发起人为竺摩、真果、黄荫文及陈少英。

竺摩自1970-2002年担任马来西亚佛学院院长，但早在1987年已不在马来

西亚佛学院授课，也曾在 1990 年的院务会议中自嘲本身已当了两年余的“挂名院长”（释竺摩，1990a），然而仍在 1989 年为佛学院募得一笔款项，复于 1990 年至 1993 年闭关。另一方面，根据继程法师的文章，马来西亚佛学院在竺摩坚持下聘请其为副院长，代理竺摩处理院务（释继程，2012：64），但并无注明上任年份。笔者对照马佛学院毕业刊（2010-2012），证实继程乃于 1990-1998 年间担任副院长（佚名，2012：37）。大致推断，竺摩或早在 1990 年（77 岁）已卸下院长担子，故本节以 1990 年为竺摩淡出佛学院管理层的年份，也以此年份作为本论文的研究下限。

本节的书写主要依据佛学院毕业刊与竺摩的演讲稿，藉以窥探佛学院于 1970-1990 年间的发展面貌，并根据竺摩的演说及文字，分析与归纳他对马来西亚佛学院毕业生以及佛教专科教育的展望。

一、马来西亚佛学院的发展面貌

隆根曾指出，本地缺少僧侣的源头要追溯到 1949 年中国大陆出家人无法南来及南洋的出家风气不盛，寄望南洋能自行解决寺僧来源，而灯刊也曾在 1964 年提及“槟城已是僧荒”（释隆根，2001：69-70；《无尽灯》编辑部，1964：27）。佛教发展最为兴盛、僧侣最集中的槟城在 1964 年已现缺乏佛教僧侣的问题，其他州属的情况就更加不乐观了。

不过，马来西亚佛教总会成立后（1959），于同年通过了马来西亚佛学院的议案，可说是缺少僧侣的对应方案。另一方面，竺摩也指出当时人们的观念，都是把钱化去念经拜忏，大多无法了解佛教教育文化对佛教发展的重要意义；而这种现象更反映出办教育的急迫性（释竺摩，1970e）。然而，因硬体设备等

原因，马来西亚佛学院到了 1970 年才正式开课。本地佛教界在 1949 年至 1969 年间，将近二十年无法全力培养僧才，或是槟城或全马僧荒问题恶化的其中一个因素。

竺摩曾指出创办马来西亚佛学院的宗旨，乃“办学兴教、培植主持佛教，弘扬佛学之人才”（释竺摩，1976：5），竺摩推广佛教教育的目的也进一步提升至培养主持的佛教人材。不过，办佛学院在当时而言并非易事，该院第二任教务主任陈延进曾这么表示：

星洲曾有佛学院之设，但不久即停办，香港亦有善信，倡办佛学院，但虽有教师，有经费而无学生。台湾更有不少佛学院，仅办数年即停。我院创办至今，已阅十七寒暑，越时越久，越能吸引生徒，校务发展，有目共睹，此在大马佛教史上，可说是空前盛事（陈延进，1987：21）！

香港及台湾等地办佛学院尚且有失败之例，可见在马来西亚办理佛学院也是一项不容易的工作，而经费及学生来源是两大难题。由于入读的面授班学生免收学杂费⁷⁹，马来西亚佛学院经济委员会需自行筹款找办学经费。根据马佛学院第一届毕业刊，暂定 1973-1975 的经费总额为十万元，筹集办法为广征各类董事、临时特别捐助、举行法会及举行书画义卖展览（佚名，1973a：15）。1970 年第一届的佛学院开办三年学制的初中与高中各一班⁸⁰，1972 年开办预科一班（学

⁷⁹ 马来西亚佛学院之后在佛教总会委托下，开办函授班，但函授班课程是收费的。根据马佛学院第二届毕业刊，页 40，函授班学生全科每月收费五元，单科三元。未出家前的继程法师（周明添）曾在函授班中级组考获最优的成绩。

⁸⁰ 初中与高中班同期收生：1970-1972（第一届），1973-1975（第二届），1976-1978（第三届），1979-1981（第四届），1982-1984（第五届），1985-1987（第六届），1988-1990（第七届）。

制一年），1973 年增办深造班⁸¹一班（学制三年，后来改成一年）（佚名，1973b: 9）。

但是，在政府毫无经费资助的情况下，马来西亚佛学院每增办一班都是一笔额外的开销，也是沉重的负担，竺摩也多次指出办学经费是佛学院最大的隐忧。为了筹募办学经费，首任董事长真果不仅自己出钱，也曾和总务祥空法师（1919-1992）、财政清亮法师在 1976、1980、1986 年间为佛学院办的筹款法会到处募款（陈延进，1987: 22）。曾任马来西亚佛学院教务主任、副院长与顾问的黄荫文⁸²则透露，“如一九七三年没有得到院长竺摩法师将其六十大寿所收贺仪三万七千余元（笔者按：马币，下同），全数转捐本院，则本院或早已面临‘关门大吉’的危机了”（黄荫文，1976: 34）。三万七千余元在现今尚算一笔可观之数，在 1973 年更可说得上是一笔巨款了。竺摩给予佛学院的资助不仅于此，陈延进在连续三届的毕业刊中也指出：

本院院长大法师，不特不取分文职薪，前年寿诞且捐助一万二千元，亦并亲自协助董事会筹款，尤以星洲方为多（陈延进，1985: 20）。

本院院长竺摩大法师，不特不取分文职薪，且每次寿诞，多献捐本院，大力协助董事会筹款，而以星洲方面为多（陈延进，1987: 22）。

⁸¹ 深造班/进修班共开四届：1973 年（深造班，三年制），1976 年（进修班，一年制），1981 年（进修班，一年制），1988 年（一年制）。

⁸² 黄荫文也曾在佛学院开办初期，把所应得的津贴全数捐回给佛学院，并捐出八十大寿贺仪一万元予佛学院与人生佛学中心。详见佚名（1982），〈大马佛学院庆祝十周年〉，收入马来西亚佛学院第四届毕业刊编辑委员会编：《马来西亚佛学院高初中级第四届附进修级第二届毕业刊》，页 99。另，由于佛学院经费紧张，教职员仅领取半服务津贴，皆抱持服务心态教学。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二日至十三两日，启建千佛吉祥万缘法会，藉筹教育基金……筹得款项十四万元以上。竺公院长该时适法体欠安，留星治疗，但于病中，在星募得贰万元以上……（陈延进，1990a：20）

竺摩多年来不取职薪，还为了佛学院的维持出钱出力，而陈延进于两届毕业刊中的说法改变——从“前年寿诞且捐助一万二千元”变成“且每次寿诞，多献捐本院”，除捐献更为频密，竺摩1989年病中筹款之事例，也更显见竺摩对佛学院的关心。继程担任副院长期间，竺摩也曾转捐贺仪给佛学院，解决了佛学院的困境：

书记跟我商量，佛学院快发不出老师们的钟点费了，因为现款（petty cash）已经快用完了……竺摩法师刚好就办寿宴，我的印象中，好像有两万多元贺仪。师父就直接把贺仪转给佛学院，解决我们的困境（释继程，2016）。

看来，竺摩总是在紧要关头护持佛学院，但他本身于1990年的院务报告中反倒表示“本院经费全由董事会负责，故20年来，不忧经济问题”（释竺摩，1990d），不仅表现了不居功的个性，也充分表现了事过境迁不执著的修养。

除了捐助学校经费，竺摩也曾在学院开办初期，与白圣法师、真果、明德法师（1895-1961）及龙辉法师（1912-1971），在学院招生方面出力不少。根据佛学院毕业刊，早期学生有的来自沙叻秀法华菴、芙蓉常明菴、怡保静莲菴等斋堂，竺摩也曾在马来西亚佛学院首届毕业礼上谈到：“不论全马各菴堂或普通学校出身，只要有相当程度的，皆可投考入院，接受佛的教育”（转引自佚名，1973c：127-128），说明马来西亚佛学院也接受菴堂子弟报读。早期招生不

易，竺摩曾说过：“办佛学院的风气未开，要法师们亲自出马招生，才从怡隆甲柔等地拉到四五十名女生，但到今天开学，尚有十多个未到……”（释竺摩，1970f）。以下顺带略提菴堂或斋堂对佛学院开班初期的影响。

初时来到马来西亚佛学院报读的学生，有出家人、带发修行的斋堂子弟及在家人。这些斋堂子弟多蒙竺摩特别照顾，除了在开学时亲自到有关道场把学生接到槟城，也在学期结束后把学生送到北海火车站回返各自道场，并承诺到这些斋堂弘法，部分斋堂也因而淡化民间教派色彩，转为正式的佛教道场（杜忠全、释学山，2010：173-181）。继程也指出早期佛教的道场不多，能够真正以“寺院”的力量或名义来给予支持的，大部分还是在斋堂，因此也把她们接引入佛教（释继程，2016）。佛学院招收斋堂弟子虽说是因为佛教本身的力量不够，但反倒让我们看到了竺摩及一众法师的愿力，让早期夹杂着道教或是民间信仰的斋堂更加亲近佛教，也更体现了佛教慈悲平等的精神。

法师们除了需在佛学院开课初期奔波招生之外，还需费心安顿学生的住宿。马来西亚佛学院早期的宿舍不多，只能让外坡女学生留宿、男学生外宿，槟岛及附近的威省区学生则必须走读⁸³，但由于佛学院院址就在竺摩的道场三慧讲堂隔邻，故竺摩曾让多达二十余位男女学生在其讲堂内寄宿（陈延进，1987：22）。另一方面，住校学生每晚都会有自修课，第一届毕业生演慈法师这么说道：“尤记得，每天上午师父都会到院上课、巡视，到傍晚自修时，也常探视学生自习，置身其中深深感受到院长对学生的亲切和关怀”（释演慈，2012：33）。陈氏与演慈的说法，都说明竺摩已投注全副心力在佛学院，晨昏皆往佛学院走动。另外，其弟子继灯法师（生年不详）刚接任佛学院舍监时曾对寄宿生严厉训话，但竺摩在一旁却看得连连摇头，私底下向继灯说道，寄宿生年纪轻、离乡别井，

⁸³ 学生只在学校上课，但不住宿。

应该用柔和慈爱的态度引导，才能勉励她们努力向学（释继灯，2012：74）。

早期的办学经费、学生来源等，虽说都有佛学院及佛总的团队协助，但竺摩的大力支持、对后进的爱护，以及于众多细节处的默默付出，是让马来西亚佛学院得以茁壮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至于佛学院师资与课程设置，也是学校经费与学生来源之外的另一办学难题。竺摩曾表示太虚在1944年左右把研究佛法的程序分成普通教理院与专修教理院各三年，然而竺摩的想法却是普通、专宗与比较研究各三年，才能“把佛法研究通达”，但竺摩也强调“这也不过是一种理想……能否实现，很难预测”（释竺摩，1954f：7）。笔者暂无法找到太虚于1944年的相关说法，但根据《太虚大师全书》所见，太虚最早的僧教育概念在1923年初秋完成，佛学院的部分依次为学戒部两年、大学部六年、研究部四年，共十二年。至1938年，太虚仍提起僧教育系统应以十二年为修学年限，但已修改为习律二年、学教七年（普通研究四年，专深研究三年）、修证三年的三个阶段。无独有偶，太虚也强调这是“未能即时实现的理想”，不多不少透露了办佛教专科教育的难度（释太虚，1923；释太虚，1938b）。在课程设置方面，竺摩和太虚亦有相似之处。1954年，竺摩在香港栖霞佛学院的欢迎会上表示，应有“比较研究院”三年，以便能认识各宗教义而融会贯通（释竺摩，1954f：6）。竺摩补充：

今太虚大师应运而生，力唱八宗平等之说……（释竺摩，1939b：10-11）

我是系属佛教的，不属哪一宗，因我觉得佛教不应有宗派（释竺摩，1955b：21）。

依照以上引文，由于竺摩的目标乃“融会贯通”，实际上还是依循太虚不分宗派的概念而来。

另一方面，上文的课程设置虽说乃竺摩在 1954 年所说所想，但马来西亚佛学院成立后的课程时限，依然与竺摩多年前的想法相同。马来西亚佛学院的修学年限，是预备班一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深造班三年（后因学生需求，在 1975 年之后改成一年）。根据附录表一，佛学院教授的课程涵盖佛教数个宗派，包括《弥陀经》、《观无量寿经》（以上皆净土宗经典）；《中论》（三论宗）；《六祖坛经》、《圆觉经》、《维摩诘经》、《金刚经》（以上皆禅宗经典）；《法华经》（天台宗经典）；八识规矩颂、唯识三十颂（唯识宗经典）。其弟子继仁法师（生年不详）曾这么说道：

竺摩长老精通汉系佛教各宗派学说，然而他从不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定位于任何宗派。他曾经这么对弟子说：“如果有人问您是那一宗派弟子时，应该回答说：我是佛陀宗的弟子”……所以长老在办学之初，拟定佛学院课程的时候，就规定各宗派学说为基础佛学内容；各宗派所依据的经典都是研究的对象（释继仁，2012：37）。

因此，以上课程的编排，与竺摩不分宗派的理念是相符合的。

此外，第一届的初中班（1970-1972）三年来皆有“佛学常识”一科，至中级⁸⁴则上“佛学纲要”科；第二届的预备班与初中班（1973-1975）亦有不同名目的“初级佛学”或“佛学入门”；第三届初中（1976-1978）课程总数普遍上

⁸⁴ 后来改称“高中”。

比第一届来得少，初中和高中皆已不上“佛学常识”或“佛学纲要”，高中前两年改上“中级教术”。然而，除了以上各科（佛学常识、佛学纲要、中级教术）可见程度高下之外，观乎初中、高中与进修班（深造班）多年来的课程内容，似乎亦没有竺摩所期望的普通、专宗与比较研究各三年。究其原因，师资也是佛学院一直以来面对的问题，竺摩曾感叹很难引进外国法师，某年好不容易引进的法师，却又因为各单位间的协调不当而徒有“弘法员”的名义，未能以合格教师的身份授课，有能力的教师却又因个人的理想而志不在佛学院（释竺摩，1975a；1985b）。佛学院开办前三届，在佛学院服务的出家人仅有寥寥数人（见表七）。

表七：马来西亚佛学院全职教员一览表（1970-1990）

	任期	出家众	在家众
1	第一届 1970-1972	院长：竺摩 副院长：白圣 ⁸⁵ 佛学教师：觉斌	教务主任：黄荫文 舍监：陈少英 佛学教师：陈清源（巴利文念诵教师） 世学教师：华子光、陈延进、黄天英、锺贵云、潘铭英、姚润娣、陈爱莲、黄心耕、陈森贵
2	第二届 1973-1975	院长：竺摩 梵呗教师：继定 佛学教师：觉斌 ⁸⁶	教务主任：黄荫文 舍监：陈少英 世学教师：黄晚香、庄之伟、杨亚六、林景汉、黄天英、陈爱莲、张彦华、姚润娣、黄秀香
3	第三届 1976-1978	院长：竺摩 梵呗教师：继慧 助理舍监：继宣	教务主任兼华文教师：陈延进 舍监：陈少英 佛学教师：黄荫文、林雅凤 世学教师：黄天英、陈爱莲、姚润娣、戴能理 国文顾问：杨亚六、张彦华
4	第四届 1979-1981	院长：竺摩 训育主任/静坐指导/佛学教师/：继程 舍监/佛学教师：继灯 梵呗指导：继慧	副院长兼佛学教师：黄荫文 教务主任/佛学教师/华文教师：陈延进 世学教师：林喜初、黄天英、姚瓔娣、吴凤美 国文顾问：张彦华

⁸⁵ 白圣法师为佛学院副院长，但由于白圣乃台湾籍，笔者相信其长期逗留檳城的日子应该不会太长。佛学院的运作基本上还是要靠其他法师与居士维持。

⁸⁶ 觉斌法师（1920-1989）为台湾籍法师，在马来西亚佛学院教学五年，但其名字未出现于第二届毕业刊上。详见释开谛编（2010），《南游云水情》，檳城：宝誉堂教育推广中心，页 254。

5	第五届 1982-1984	院长：竺摩 佛学教师：继程、继灯 舍监/佛学教师：继仁	教务主任/佛学教师：陈延进 佛学教师：陈少英、李雅花 世学教师：林喜初、黄天英、姚璿娣、吴凤美 顾问：黄荫文
6	第六届 1985-1987	院长：竺摩 (教授科目不详)： 继程、继仁	(教授科目不详)：陈延进、林喜初、黄天英、 吴凤美、许稳养
7	第七届 1988-1990	院长：竺摩 (教授科目不详)： 继程、继仁、继灯、继 禅	(教授科目不详)：陈延进、林喜初、黄天英、 吴凤美、许稳养、吴宝钻

资料来源：整理自马来西亚佛学院毕业刊（第一届至第七届）

在当时的马来西亚佛教界而言，竺摩无疑是负责教学的最佳人选。演培法师更曾向佛学院第三届毕业生表示，竺摩是一位才子，精通佛学和诗书画，学生们能亲近竺摩，是他们的福报（毕业班参访团随团记者，1979：189）。通过表七，可以发现佛学院开办的前三届，佛学课程都由竺摩和三数位老师挑大梁；到了第四届，才有更多法师到佛学院服务，后期加入的“继”字辈法师，也全都是竺摩一支的弟子。谈起进入佛学院服务的机缘，继程表示当时本身仍任教台湾佛光山东方佛教学院，竺摩因佛学院缺少老师而要求他回马教学；继灯则透露本身从台湾能仁佛学院毕业回马后，竺摩请她到佛学院帮忙教授佛学课程（释继程，2012：63；释继灯，2012：73）。佛学院对佛学师资的急切需求可以想见。马来西亚师资难找，从外国聘请来马的导师或本地客座导师，也仅能在佛学院短期授课，“表八”为客座教师一览表。

表八：马来西亚佛学院客座教师一览表

	法师及居士（国籍）	逗留期限	讲授课程
1	金明法师（马来西亚）	不详	唯识二十颂
2	白圣法师（台湾）	1970年7月30日 1970年8月6日 1970年9月16日起	遗教经 八大人觉经 心经
3	金星法师（马来西亚）	1979年12月期间（一个月）	四十二章经 八大人觉经
4	果如法师（台湾）	第五届（1982-1984年）期间	不详
5	超尘法师（香港）	1986年3月17日起逗留一个月	佛教研究法
6	广品法师（新加坡）	1987年2月2日-3月3日	佛学课程
7	传道法师（台湾）	1987年8月17日起逗留一星期 1988年8月8-30日	中观思想、学佛三要 唯识学探源、唯识要义
8	邱宝光居士（马来西亚）	1988年1月7-9日	漫谈佛学的研修法
9	心定法师（不详）	1988年2月22-25日	般若概要
10	演慈法师（马来西亚）	1988年9月5-30日	妙法莲华经要义
11	智海法师（不详）	1990年7月18-25日	八识规矩颂

资料来源：整理自马来西亚佛学院毕业刊（第五届至第七届）⁸⁷；蔡炯松（1980），〈金星大法师圆寂追忆〉，《无尽灯》第87期（1980年春季），页31。

客座教师中，传道法师（约1941-2014）曾提到1987年前来讲课的往事：

最深刻者，莫过1987年，末学首度至马来西亚佛学院授课，年高德劭之竺公上人，竟亲率教职员及学生驾临机场接机，顿使末学惶恐难安、不知所措！经询侍从，方知竺公之尊法道风，一向如此。而当末学为诸生授课，竺公亦亲临教室，随生而坐，以示精进教法……（释传道，2012：15）

侍者所言“竺公之尊法道风，一向如此”，可以想知竺摩对远道而来的法师，皆亲往接待。然而，竺摩与学生坐在一起听法，是更让人敬重的举动，竺摩对讲法法师的重视也更加不言而喻。教课老师难寻，竺摩即便在闭关中也得授课，曾因某老师因病请长假，而在教务主任安排下接了请假老师的好几节课（释竺

⁸⁷ 第一届至第四届毕业刊并没有列出客座教师的名单。

摩，1979c；1979d）。实际上，竺摩当时的健康也出了状况，在闭关期间代课也是不得已的安排。竺摩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叙述如下：

本人来马已廿五年，为弘法事，奔走不停，操作不停，正感心脏衰弱，不时心跳，故欲闭关三月暂图静养……（释竺摩，1979e）

竺摩是因为过于奔波而闭关的，但在关中也不得清闲，可见佛学院在师资方面的确很紧张。因此，竺摩也积极培养及鼓励自己的弟子到外升学归来后，到佛学院服务。截至 2016 年，在佛学院教学的弟子还有继尊法师、继证法师（生年不详）等人；其他的教员尚有开尊法师（生年不详）、章慧法师（生年不详）、显严法师（生年不详）、显律法师（生年不详）等，而以上诸法师皆曾就读于马来西亚佛学院。与早期相较，佛学院的佛学教师阵容无疑增强许多，同时也一再证明，早期佛教界人士毅然开办佛学院培养僧才的眼光是正确的。

早期佛学老师难找，但佛学院在因缘具足下聘得的华文科老师都大有来头，包括曾任福建省府县政人员训练所教席与厦门大学教授的陈延进与诗人黄晚香。至于黄荫文除了曾是《星槟日报》主笔之外，也和陈延进同期于福建省府县政人员训练所任教育主任，后来被擢升为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之后应胡文虎之邀担任报章主笔，才辗转来到槟城，并于 1959 年在竺摩见证下皈依佛教（陈延进，1990b：45；释竺摩、释继程：32）。值得一提的，乃佛学院聘请的两位台湾教师未及在创院开课时赶到，所以黄荫文当初担任教务主任实属救火性质，而竺摩在佛学院开学后的演讲也似乎有弦外之音：“本院的教导主任应由僧尼法师担任……他（黄荫文）是 72 岁的老青年，在所请的法师未到任前，一定要

顶上，可能顶到尾亦难预料”（释竺摩，1970f），可见竺摩对长期师资难寻早有先见之明。佛学院得以请来以上高僧及居士前来服务、讲课，高僧大德们的发心服务固然重要，但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与佛学院管理层的安排也功不可没，而竺摩敬法重法的精神更应记上一笔。

至于佛学院课程编排中，笔者认为勉强说得上符合竺摩期待的，仅有课程中兼容世学与佛学课，而竺摩在闽南佛学院求学时期的课程或也兼容两者⁸⁸。他曾表示学佛的人既要研究佛学，也要学习世俗的学问。至于每日学习时间的分配，要以“二分时间学佛法，一分学世法”为准，因世学仅是弘扬佛学的方便（释竺摩，1954f: 7; 1962b: 11; 1979b: 38），以竺摩本身为例，即是以诗书画的才华融入佛理藉以接引信众。佛学院的世学课程除了长期教授的国文（马来文）、英文、华文、音乐、簿记、历史、书法之外，也曾教授应用文（1970、1973-74、1977、1979）、生物学（1971-1972）、社会学（1973-1975）、文学史（1974、1976、1977）、教育心理学（1976、1979、1981）、唐诗（1989）（见附录表一）。生物学只开课两年即停授的原因不明，但基本上其他世学科目的开办，都可让学生们与社会有所联系，如：社会史、文学史、唐诗等，为他们打下社会知识基础，便利他们日后与社会人士或信众的往来。

另外，作为培养住持佛教人才的佛学院，也有着一门较为特别的课程——演讲，让学生能通过现代化的演讲训练，增强弘法的经验。据第六届毕业生继传的回忆，有关课程每星期进行一次，由同学们轮流上阵练习演讲（释继传，2014），而几乎每届毕业生（1990年及之前）也各办有规模不一的毕业参访兼

⁸⁸ 南普陀网页资料并没有列出竺摩就读闽南佛学院期间（1930-1932）的科目，但却详列了1928年的科目包括佛学与世学，世学科目涵盖中文、外文、数学、历史、教育、艺术，翌年（1929）在弘一法师的建议下，增加佛学科目，删掉一些世学科目。故笔者依推断，竺摩入学时，世学科目仍获得保留，但佛学科目的比例已比往前增加。详见〈南普陀寺志·僧伽教育〉，南普陀在线，2015年4月28日阅自 <http://www.nanputuo.com/nptcz/html/201303/1810454073499.html>。

弘法团，让学生有实地练习的机会。自第四届毕业刊起，也可见院方会每周日安排学生在马佛总属下的槟州弘法会讲解佛理，该院学生也曾往木蔻山监狱弘法。佛学院虽先天条件不足，但管理层在各方面的费心安排是显而易见的，下为竺摩在马佛学院第二届毕业刊所记：

深造班之同学，在学习期间，已能帮助佛总槟州弘法会作通俗演讲；亦有到各中学佛学会，各青年佛学院，青年训练营，及槟城保良局、感化院、大山脚老人院等处实习弘法……亦有首届毕业同学院友，曾被选为佛总之执行委员……如此看来，各班学生虽无赫赫之成绩，但无论如何，弘法的人才，要比未办佛学院时为强（释竺摩，1976：5）。

由此可见，虽然开办深造班经费不菲、毕业生人数屈指可数，但总算是有成效的。继传表示，竺摩会把弟子送到佛学院念书，希望他们将来可以出来讲课，为佛教服务（释继传，2013b），与演讲课设立的目的不谋而合。不过，若再回归到演讲练习这一层面来看，竺摩其实曾强调“住持与弘法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十分希望有德学又有能力弘法的人材可以担当寺院住持的重任（释竺摩，1975b）。至于马来西亚佛学院成立多年来的出家众毕业生人数与去向，可通过表九、附录表二及附录表三看出一些端倪。

表九：马来西亚佛学院 1972 年至 1990 年毕业生人数统计⁸⁹

年份	初中部（三年）	中级/高中部（三年）	深造/进修班 ⁹⁰
1972	18	17	-
1973	-	-	-
1974	-	-	-
1975	11	12	7
1976	-	-	6 第一届进修班
1977	-	-	-
1978	20	12	-
1979	-	-	-
1980	-	-	5 第二届进修班
1981	16	8	-
1982	-	-	-
1983	-	-	-
1984	23 含肄业人数 9 人	6 含肄业人数 1 人	7 第三届进修班？ 毕业刊中仅注明第三届人数，但没有列出名单
1985	-	-	-
1986	-	-	-
1987	28	12	-
1988	-	-	4 第四届进修班
1989	-	-	-
1990	33	12	-
小计	149	79	29

资料来源：整理自《马来西亚佛学院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初高级班，第七、八届进修班毕业刊》（2000-2002），页 33-35。

表九记录了第一届至第七届的毕业生人数。至 1990 年，马佛学院各级毕业生人数分别有 149、79 与 29 名，而 1987 年与 1990 年毕业自初中部的人数已较早期大幅增长，栽培了多名已掌握一定基础与正信佛学知识的弘法人员。

寂晃曾指出 1980 年代中初期的青年僧伽“大多抱独善其身的态度……趋向

⁸⁹ 比照各届毕业刊之后，笔者发现的问题有四：（一）第三届毕业刊，1978 年初中部毕业生仅有 19 人；（二）1984 年毕业刊中并无刊录 7 位深造班毕业生名单；（三）第六届毕业刊，1987 年初中班毕业生人数有 30 人，含肄业人数 3 人，但 2002 年毕业刊却仅有 28 人；（四）部分年份毕业生含肄业人数，一些年份不含肄业人数。

⁹⁰ 马来西亚佛学院自 1970-1972 年开办的级别为初中班（三年）与中级班（三年），深造班（三年）在 1973 年才开办，但深造班于 1975 年之后改成一年制的进修班，并在 1975 年办预备班（一年）；见教务处（1976），〈六年来的马来西亚佛学院〉，《马来西亚佛学院深造班第一届，高初中班第二届毕业刊》，页 14-15。若有必要，学生需先入读预科班方可升上初中。1976-1996 年，级别数目维持不变，但中级班与深造班改称“高中班”与“进修班”。马来西亚佛学院初期学制为三年一届，每三年招收一次新生，1972 年培养出第一届毕业生。

三十年前佛教一盘散沙的情形”（释寂晃，1984：37）。上文已说过第二届的学生已经有能力帮助佛总的弘法工作，而通过笔者整理的**附录表二**，也可以发现毕业生一般活跃于三个组织，即马来西亚佛教总会，马来西亚佛学院及马来西亚僧伽总会⁹¹，这种倾向也可见于**附录表三**。毕业生中，证能法师（生年不详）与继尊等人积极参与马佛总与雪隆分会的组织，在两个组织中担任重要理事职多年，有者毕业后也在本身的道场或是到监狱弘法，有者则带领青少年学习佛法。基本上，都可以说明该院的毕业生除了回母校教学，也积极推广佛教，并投入社会中进行弘法工作，不多不少能改善“独善其身”的情形。附录表二中记录了1990年前毕业于佛学院的出家众名单及动向，名单中的出家人大致上都来自颇有规模的寺宇或道场，其中以“继”与“空”字辈与槟城三慧讲堂有渊源，“开”字辈来自槟城洪福寺。在这种情况下，毕业生至少能回到寺院服务，对佛教的发展而言还是有利的。至于附录表三，则是在家学生入读佛学院期间或毕业后出家的名单，人数也不少，对一所佛学院而言也可说是一种肯定了。

然而，发展至近期，佛学院的毕业生人数似乎有渐趋减少的迹象，但与此同时，该学院也开办了三年制的“周六推广佛学班”，每周六从上午8时上课至中午12时40分。这几年来，马来西亚佛学院也进一步设计其他短期佛学课程或技艺课程，让外界人士可以通过不同的管道接触佛教，包括书法班、素食烹饪班、朝暮课诵班、佛学师资培训班等（马来西亚佛学院网页，年份不详 a；年份不详 b）。以上各个方面，足以体现出佛学院教职员尝试突破现状的努力。

⁹¹ 1995年于槟城极乐寺成立，僧伽成员来自马来西亚主要的佛教流派（Major Buddhist Traditions）。

二、对佛学院学生的叮咛与期望

培养有知识又虔诚的佛徒，是竺摩由始至终的心愿，希望有学问的佛学研究者，要永远当一个虔诚教徒，也曾经叮咛佛学院毕业生，即使在佛学研究上有所成，也不要自居为学者。主要原因，在于若把佛法当做学问来研究，就会忽略了修行，而佛教徒若只是偏向理解一方，对个人或佛教而言都十分危险（释竺摩，1954a: 7; 1982a: 63-64）。解行相应，才是一个真正的佛徒。

根据笔者对竺摩讲词及佛学院毕业刊赠言与文章所做的统计，竺摩给学生说话时，最常叮咛的事项乃重学问，希望他们珍惜光阴努力学习，有能力的则继续升学，以便日后为佛教服务。下乃竺摩刊登于佛学院毕业刊的赠言文章一览表。

表十：竺摩的毕业刊赠言及文章

	出版年份	毕业班	毕业刊题词内容 ⁹²	类别
1	1973	中初级第一届	菩萨多悲智 损恼犹资益 如斫碎栴檀 流芳普芬馥 备注：另有毕业纪念文章 〈佛教的忍育〉（周训与毕业班同学相勉）	强调智慧 与慈悲
2	1976	深造班第一届 高初中班 第二届	象教陵夷不胜情 客怀耿耿寐难成 狂澜孰挽放将倒 佛育昌明赖铎声 备注：另有毕业纪念文章 〈序〉，交代佛学院及马来西亚佛教发展，办学的难处与毕业生出路	靠弘法传 扬佛教
3	1979	高初中班 第三届	学问无止境 岂有毕业时 法门如网孔 罄竹亦难思 玉不琢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义 人生生到老 学到老 教不倦 学不厌 少而学 则壮有所为 壮而学 则老而不衰 老而学 则歿而不朽 遗爱留与人间 何乐而不为 《为学歌》写赠马来西亚佛学院高初中 第三届毕业同学并以为勉	为学

⁹² 感谢郑浩千先生协助辨认题词内容。

			<p>木鱼觉觉 经声历历 人问我诵经何所为 我道是好书不厌百回读 一读再读法喜生 三读四读妄念伏 读至十百千万遍 绿满窗前梅子熟 六度齐修志气宏 纤尘不染清明足 普令法界诸有情 一一闻声得解脱 读经歌奉题</p> <p>备注：另有毕业纪念文章 〈谈办学与兴教〉</p>	
4	1982	高初中级 第四届 进修级第二届	<p>庄严鬘字为谁开 学子纷纷四处来 乞法宁辞千里远 匡时肯使寸心灰 三年弦诵长堪乐 一曲骊歌未足哀 共扶沙盆筹大愿 勤劳期作栋梁材</p> <p>备注：另有毕业纪念文章 〈佛陀的教戒与启导（代序）〉</p>	为学 为教服务
5	1985	高初中班 第五届 进修班第三届	<p>同气连枝各自营 些些言语莫伤情 一回相见一回老 能得几时为弟兄 法昭禅师语借与诸仁共勉也</p> <p>备注：另有毕业纪念文章 〈佛青的基础与修养〉</p>	惜缘
6	1987	高初中班 第六届	<p>晋宋齐梁唐代间 高僧求法离长安 去人成百归无十 后者那知前者难 路远碧天唯冷结 河沙遮日力疲殫 后贤未能谙斯旨 往往将经容易看</p> <p>备注：另有毕业纪念文章 〈以“苦学与力行”为0言〉</p>	为学
7	1990	高初级学生 第七届 进修班第四届	<p>佛陀立教以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其教育之道宜以理喻 以德化 以诚感 应 不得已时始绳之以法 不卜高明 亦以为然否</p> <p>备注：另有毕业纪念文章 〈序〉 〈纪念白公长老〉</p>	教育之道 以慈悲为 本

资料出处：整理自第一至第七届毕业刊

第一届赠言出自《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内容追求的乃真智慧，再以智慧为本而生善法，而有智的人也多是慈悲的，遇到不顺之事，依然能保持本身的特质，甚至能如被砍碎的檀香般，散发芳香，利益他人。第二届赠言，则指佛教的发展有赖“铎声”。铎在佛教多用于庄严的法会，或悬挂于佛堂前，

据闻能获得得以感动人禽的音声清雅的果报（慎言, 2009），引申开来或可视之为竺摩希望佛学院毕业生的音声能感动人心，广为弘扬佛法。竺摩于其他年份毕业刊强调的范围，也依然不出叮咛学生把握机会学习，要求得学问、真智慧，并且具备弘法能力。第七届的寄语则提到了佛教以慈悲为本，提醒毕业生在往后的日子里需保有以上的心态。本寄语后半段的“不得已时始绳之以法”，亦再次体现出竺摩本身的个性与修为。

对于修学佛学的次序，竺摩灌输普通信众的概念依据佛教词汇“信解行证”而来，意即先相信佛理，继而了解之而后依法行持，以上都做到了，最后才能证悟道果。不过，对于“信先行”还是“解先行”，竺摩对一般信众和学生的说法有异。他对信众的说法是这样的：

我们对于佛经所说的言教，都要信实，决不能因自己没有看见，或自己的智识想不通，就生起怀疑，甚至否认（释竺摩，1958：8）。

我们学佛者修行要紧，不必去强索，强索则过于寻枝摘叶，空费时光……功夫做到，问题自然会解答了……先接受信仰，尔后慢慢地去理解去觉悟（释竺摩，1961a：3）。

竺摩认为普通的信众在无法理解佛法的情况下，应该先接受信仰，若无法了解佛理，应先注重行持，日久有功自然能理解通达。竺摩对学生的说法则如下：

凡佛弟子，首要的任务，应是研究佛法，理解教义……；其次就要尊重佛陀的教戒，对佛陀化导的言教，生起正知正见的信仰，对佛陀教戒的规律，能如法实行践履……（释竺摩，1982a：63）

以上引文说明“解”对佛学院学生而言是相当重要的，而这也与竺摩曾提过的“由智生信”概念不谋而合。对一般信众和佛学院学生的说法不同，更能看出竺摩对学生，或是有识之士的期待。

然而，佛徒只有解无行，并不是最理想的表现，因此竺摩曾希望有学问的佛学研究者，要永远当一个虔诚教徒。对于有理智的信仰者，竺摩的态度始终如一，“如果每个教徒，都能把理智与信仰统一起来，那就是佛教的一大幸事”；在为佛学院毕业歌填词时，竺摩写下了“闻思成慧，修持不荒，任重道远长”（释竺摩，1962a：40；1973：4），同时也指出，若一个佛教徒没有实际的实验心得，就不容易对佛法产生兴趣（释竺摩，1979：39）。以上各例都一再说明，理解、信仰与行持，是佛徒一生的功课，也是竺摩对学生与教徒的期许。

行持方面，竺摩认为除了要求自我修行，最好的表现应当是发心发愿或是俗话说的“立志”。发大心乃同情众生的痛苦，发大愿乃上求佛道，也可以依自己所好定下目标，“目标小的人做小事，目标大的人做大事”，最高境界乃行菩萨道大乘行者，大慈悲心自未度而先度人，以利他为先（释竺摩，1985c：76）。在行持方面，竺摩有一个相当特别的概念，即：“学做事、学做人”，应做的事有二，一为弘法大事，另一为生死大事⁹³；另一方面，如果做人做不好，则可能也没法学佛，因做人乃学佛的根本。竺摩列出做人的八项道理为：通情

⁹³ 竺摩并无明确说明要怎么做生死大事。根据有关句子上下文，笔者推测“弘法大事”乃利他之事，“生死大事”乃个己之事，以跳脱轮回为重要目标。

达理、谦恭有礼、互相推爱、诚实守信、谨慎语言、态度和雅、接受规劝、感谢师友。此外，竺摩也强调，如果做人不懂人情世故，做事是很吃亏的，所以做事应合乎人情常理，即不卑不屈、不倨不骄，才合乎中节（释竺摩，1978b，1980b: 26）。竺摩谈的“做事做人”，凸显了佛徒与人相处的重要意义，也是佛法不离人间的另一体现。这一种精神，早已被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成员通过担任义工工作实践，对学生再提此事，也说明竺摩的确很重视人群。

至于自我修行，乃“品德”，这与他对菩提中学学生所灌输的概念是一致的。竺摩曾谓：

佛法是实践道德的文学，特别注重道德教育与品格的修养（释竺摩，1975a）。

品德第一，学问第二（释竺摩，1978b）。

个人学问好固然重要，可是品行差，又缺乏道德心，在社会上，容易遭到物议（释竺摩，1980b: 26）。

一般上，人们多认为只要有好成绩，就可以在社会上无往不利，但竺摩却时时向学生强调品德才是最重要的。据竺摩的说法，所谓品德或品行“重在诚实、信用、忠厚、勤俭等等，及作事以不伤害人为主要”。“诚实”的品格为一切道德的根本，而品德好，也直接影响个人的威仪（释竺摩，年份不详 g: 1982b; 1985c: 75）。竺摩指出佛学院品德训练的依据在佛学院院训及十二项目：佛学院院训为“慈悲勤舍”，蕴含“佛教立教之根本在慈悲、佛教学术的结晶在智

慧、佛教修学之成功在精勤、佛教济世之事业在施舍”的意义。据以上所见，慈、勤、舍，乃修行必备因素，慧则是要通过不懈的学习后才可达到，功能在让人明辨是非，分别邪正（释竺摩，1973b：6，1972d：11-12）。至于佛学院的十二项目则可见下表：

表十一：马来西亚佛学院学生操行项目

	项目	标准	成绩
1	信念	正确坚定	
2	精勤	专勤修学	
3	仪态	端庄适度	
4	诚实	不欺不妄	
5	语言	温文和顺	
6	服务	热诚尽责	
7	乐群	和衷共济	
8	公德	爱护公物	
9	谦虚	虚怀不傲	
10	整洁	整齐清洁	
11	情绪	宁静从容	
12	纪律	遵守规律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一届毕业刊，页 14

佛学院老师将依据学生各自的表现进行打分⁹⁴，级别为“甲、乙上、乙、丙上、丙、丁”，如果有三分之一属丁等，院方会在学期结束时给学生警告，半数列丁等则将被退学。笔者虽无从得知当年的打分是否严格，但通过以上规则，笔者认为佛学院订下的警告及退学底限，其实还算相当宽松。在这方面，竺摩的另一番说辞，似乎可以为此作一注解：

教育之道，要以理喻，以德化，以诚感、至不得已时，始绳之以法……（释

⁹⁴ 继程法师指出，由于此打分制掺杂了主观成分，也很难打，因此后期已经不太注重打分了。详见本论文附录〈继程法师访谈录（一）〉。

竺摩，1984)

竺摩作为一个佛教教育工作者，给学生的是极为宽大的包容心，巧合的是，竺摩在1990年的毕业刊赠言中，也以类似的句子为赠言。对他人，对学生，竺摩似乎都能给予最大的宽容；与此同时，他也希望毕业生能做到这一点。在第一届的佛学院毕业刊中，竺摩被选登的文章，乃〈佛教的忍育（周训与毕业班同学相勉）〉，内容特别提到佛教教育的六度以忍育（忍辱）的意义最深长，文章中列举多例，“慈忍”的表现体现如下：

于受辱时，不但无动于衷，反悯其愚，不懂礼貌，乃大发慈心，愿为教化与救度（释竺摩，1973c：40）。

受辱后还能对对方产生怜悯之感，的确需要很高的修为。因此，竺摩也进一步点出“忍”的意义及价值，告知同学们若不能忍而爆发嗔火，善法种子将前功尽弃（释竺摩，1973c：40）。可惜，学生群中总有表现不良的，故竺摩曾感叹：

初办六七年……学风行仪甚好，颇受院外人士之赞誉；而近年来学生多有不依院规行事……故宜多行仪如法，心境和乐，生活便会安定（释竺摩，1987）。

学生表现不佳的源头，或要归咎于到他们行仪不如法之上，故竺摩中后期一直向学生灌输注重“品德、威仪”，或也与此有一定关系。

再者，马来西亚佛学院强调培养“住持寺庙法师与弘法人才”，对象包含

出家人与在家人（佚名，1973b: 9），主要原因在佛学院的学生来源有出家人、在家人、带发修行者，年纪方面从十二岁至三十岁不等，教育程度也各有不同。此外，上文曾提及竺摩认为出家人不了解佛理，是佛教发展低落的主要原因，而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吕吉生也发现竺摩对出家弟子的要求比较严格（吕吉生，2016），说明竺摩很在意出家人的表现。再者，竺摩对“弘法”二字有其个人标准，认为应由僧众“弘法”，居士负责“宣传”，而竺摩鼓励在家人作宣传工作，是为了填补因缺少僧伽与出家众佛学知识不足而留下的弘法缺口（释竺摩，1978c: 3-5）。由于本地缺少僧伽，竺摩只好把弘扬佛教的期望转到了马星教众身上，同时希望各界多多支持以培养寺庙住持与弘法人材为目标的马来西亚佛学院，让佛学院能持续经营下去。然而，竺摩仍有其底线，认为佛教会总会长应由高僧主持，居士不能越规管理僧制，因佛法僧才是佛教要素，而出家人只要僧相具足都应受尊重（释竺摩，2003: 22、26-30）。言下之意，僧人乃佛教三宝之一，地位不容被居士取代，且应处于领导信众的地位；然由于僧众数量不足，只好在弘法方面作变通，鼓励在家众协助出家众，以期通过“僧人住持佛教，居士护持佛教”的方式，让佛教继续流传下去。竺摩对出家众在佛教界所处的领导地位十分确定，而他频频到处弘法，或是“逢请必到”的做法，除了躬行实践本身对“僧”在这个时期的期许，也积极负起了出家众被赋予的弘法重任。积极培植住持佛法人材，亦是竺摩极力推动这个阶段佛教教育的最大依据。

小结

通过竺摩在各个阶段的做法与文章，我们得以了解每个教育阶段都很重要。竺摩的教育理念十分一致，无论对中學生，研修會青年，或是对佛學院學生，他强调的内容或是佛理几乎相同，但他始终认为住持佛教的人材应以出家人为主，而马来西亚佛学院的宗旨为培养住持佛教与弘法人才，在三个单位中的意义自然最为深远，而佛学院的毕业生也相继投入佛教道场或佛教组织中服务，让马来西亚的佛教发展不致于越来越没落。

追溯源头，竺摩早期鼓励成立佛教学校，与基督教学校林立有一定关系，因此中小学也可说是接引年幼信众学佛的首个阶段。不过，中小学阶段的学生毕竟理解能力有限，套用法舫的话，小学方面只能种种善根，中学方面才能进一步宣传佛理。然而，若我们仔细阅读竺摩设计的课本，他在中學生群中宣扬的佛理范围仍有所局限，所以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的成立或多或少让竺摩实现了培养研究人才的心愿。竺摩也认为，佛法要有人研究才能弘扬开来，若有智慧就会了解佛教，继而对佛教产生信心，信仰也不会轻易动摇，关键全在一个“解”字之上。在当时基督教盛行与科学发展迅速的年代，菩提小学义务教员吴人俊，就是因为对佛教有认识、也有足够的信心，才没有因为友人的谬论而背弃佛教。因此，竺摩总是要求知识阶层较高的佛教徒理解先行，同时叮咛他们不要忽略修行。在这一点上，“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既要研究，也不忘修行，其取名就显得十分有意思了。

至于前文提及的“僧相具足”，则说明了竺摩始终坚持出家人在佛教中的领导地位。从这一角度来看，佛学院的成立可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多年过

去，佛学院在竺摩及众多大德出钱出力的情况下培养了不少毕业生，部分毕业生也回到佛学院或各自的道场服务，基本上缓和了僧众不足的情况。然而，竺摩一方面培植研究人才，一方面却叮咛学生们不要以学者自居，看起来似乎有矛盾之处。对此，竺摩的观念是一旦以学者自居就会忽略了修行；有解无行，与佛教的宗旨不相符。若说佛教需要教育出怎样的人，竺摩由始至终都有十分明确的概念——品德第一，学问第二。不过，因为实践或现实所需，品德与学问的距离不宜相距太远，而竺摩理想中的品德，主要是诚实，而我们也通过这一点看到了竺摩教育学生的用心与可贵之处。

综上所述，促使竺摩推广佛教教育的背景相当复杂，即：基督教与科学盛行、佛教倾向念经拜忏，以及佛教接班人越来越少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若没有佛教教理知识作支撑，信众对佛教的信仰很容易会因外界对佛教的质疑而动摇。简言之，竺摩对接受佛教教育者最大的期望，是研究佛法对佛教产生信心，继而不忘修行不忘人群，让佛教教理广为流传。

第五章 结语

竺摩未南来马来亚之前，曾从太虚法师就学，因此早在港澳时期，就开始循着太虚一派的理念努力推广与宣传“人间佛教”。从中国南来马来亚之后，竺摩依然秉持太虚的理念，积极推广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的发展。套用前文的说法，竺摩认为僧宝是佛教三宝之一，应负起领导佛教的责任，因此他在以上两个方面的付出，实际上是躬行实践本身对“僧”的期许。

在本地，竺摩曾与演本法师过往甚密，也对演本敬仰之至，而《无尽灯》的时任主编梵影法师亦在演本圆寂后撰文，指星马再也找不到好像演本那样的德学。演本晚年出家，在缅甸受戒后来马，但其在事功方面的表现并不明显，推想是年事已高与体弱多病之故。尽管如此，演本在本身的道场中依然坚持阅藏礼佛，而且不管谁来问法都愿意接待，即使在病榻上都会起来回复书信（释竺摩，1957b: 16）。演本固然是竺摩南来后最敬仰的僧人，但纵观竺摩多年来在马来（西）亚所思所做，马来西亚汉传佛教史的发展有赖竺摩大力推动，而竺摩也是至今为止，在佛教文化与教育方面表现最为出色的僧人。

竺摩担任马来亚佛教会主席长达 12 年，在任期间完成几件意义非凡的事：马佛总成立当年（1959），邀得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出席揭幕大典并主持剪彩、成功争取纪念佛陀诞生、成佛与涅槃的日子——卫塞节为全国公假（1962），以及代表佛教界向政府斡旋或争取权益等。此外，在马佛总成立初期，他也曾领导进行全国大规模的巡回弘法。虽然这些大事不是靠竺摩一人之力所能成就，但却是竺摩担任主席期间完成的工作，反映出马来西亚独立初期本地佛教有了新气象。

至于早期曾活跃于马来西亚佛教文教界的僧人，除了竺摩以外，还包括金明法师、镜盒法师（1900-2000）、伯圆法师等人。金明法师在 1951 年创办马六甲香林小学，镜盒法师则于 1992 年创办《慈悲》杂志。在书画方面，能书善画的伯圆亦有相当名气，曾于 2000 年在国家画廊办画展，“禅艺融和”成为他推广佛教的特色（黄文斌，2010：148）。至于弘法方面的工作，除了有以上所述僧人参与，亦有其他出家众在各自的道场中进行弘法活动。不过，以上的出家众都只活跃于特定领域，鲜少如竺摩般跨界推动佛教发展。

基本上，马来西亚佛教各个领域都有出家人在推动，而竺摩与其他出家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积极走入社会，通过文字、弘法、诗书画以及教育等来推广佛教。圣严法师曾在 1967 年针对台湾的佛教杂志和佛教教育发展概况撰写文章，主理两者显得非常不易（释圣严，1967：18）。在本地，先后涉足以上两个领域的僧尼除竺摩外，别无他人，而这种能耐也是竺摩的特殊之处，一般僧众难以企及。竺摩先后主理《无尽灯》与马来西亚佛学院，他要处理之事务必然比其他僧众更多。在法务如此繁重的时刻，竺摩依然答应以诗书画与信众结缘，也频频走动各地弘扬佛法，直至晚年方才淡出佛教领导层。竺摩的表现除了反映出他是当时最具才学的僧人，更重要的是在他心灵深处具备了慈悲利他的力量。竺摩为马来西亚佛学院立下“慈慧勤舍”的院训（卢友中，2010：57），而他一生所为及为人处世的态度，也体现了这些佛教的价值观，尤其是慈悲心。

除了上述所言的“慈悲”，竺摩在生活中贯彻的另一个价值观，是“忍”。无论是对信众，抑或是菩提中学及佛学院学生，竺摩也都曾提到这个观念。他认为，“忍”主要是不让嗔心生起，而“慈悲”亦可“息灭内心的贪嗔之火”（释竺摩，1982c：11）。简单而言，慈悲和忍是形影相随的，竺摩也秉持着以

上两种价值观，在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的推广上贡献良多。

不过，竺摩也强调，“智慧”是“忍”的根本所在（释竺摩，1991b：128）。“智慧”与“慈悲”乃佛教中一体两面最重要的元素。当时以竺摩一派为首的本地僧人与居士也大力提倡“智信佛教”，期望僧俗二众都要对佛教教理有所理解，也寄望他们有能力宣传佛教。竺摩特别强调佛教的“智慧”价值，也许与他早期弘扬佛法时要面对不解佛理的教众及一些年长的僧众认为佛教教育不重要、科学与基督教影响了佛教的发展，以及佛教因多年的积弊而被视为迷信的宗教等问题有密切的关系。

众多修“慧”的途径中，又以能突破时空与地域流传下来的“文字般若”最受竺摩注重。竺摩担任社长的《无尽灯》，堪称是推展佛教文字般若的重要途径。《无尽灯》除了刊载许多高僧的文章（包括演培法师、圣严法师、印顺法师、星云法师等人），亦收录及设有多篇较为通俗的佛学文章与栏目，以接引根机一般的信众学佛。要言之，获得国外僧人支持发表稿件的灯刊，其内容水平有一定的分量，但它也有不少通俗性的文章，可谓雅俗共赏，竺摩无疑于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继程法师曾指出竺摩的佛教著作在1960-70年代的重要意义：“佛青的领袖如果对佛学有兴趣，当时马来西亚就只有竺摩法师的书”（释继程，2016），可见竺摩的著作对本地汉传佛教文字的流传起了重要的贡献。竺摩的著作水平，不仅在马来西亚表现出类拔萃，也可立足于国际，例如，竺摩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讲话》也曾让远在台湾的星云为之惊艳（释星云，2009：180）。

与此同时，竺摩以推广佛教为己志，而他以诗书画弘法的用意也在乎此。除了藉诗书画接引信众、为佛教筹款，也为本地多个道场题字或写门联。迄今

仍可在多地的道场看到竺摩的字画，为人们的心灵带来平和与宁静。在佛教教育方面，竺摩先担任菩提中学佛学教师，继而在讲堂成立研修会，再于两年后出任佛学院院长多年，就是他为了佛教教育与佛教公共事业而努力的最好证明。圣严描述 1960 年代末的台湾佛教教育时，曾透露“僧不易调，读书的僧更不易管”（释圣严，1967：18），说明办佛教教育及培养僧人的不易。因此，竺摩多年来在佛学院教学及对它的多方护持，并期待弟子们可以回到佛学院服务的心态及各方面的表现，皆可证明竺摩为佛教教育与佛教公共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

佛学院后期的师资虽然比以往充足，但其发展至今仍欠理想。竺摩复于 1990 年坚持推荐继程担任副院长，并于之后步入晚年自修的时期。从表面上看来，竺摩在各个方面已渐有疲态；从另一方面来看，却又可以说明在竺摩体力尚可的年代，以上各个领域都曾有过不错的发展。归根究底，当时有学识才干以及能接棒年轻一辈，人数终究有限，因此马来西亚佛教界的许多工作都只能由少数有能力的出家人来执行，其中又以竺摩个人负担了最大的责任。

竺摩曾表示“有德才重学，无德学不重”（释竺摩，年份不详 e），叮咛学生要品德先行。多年来，他都希望可以为社会培育有品德的下一代，为佛教栽培解行并重的接班人，让佛教得以正向发展。在本身的修养方面，竺摩本身也贯彻实践一个原则：无论是教内口角纷争，或是别人对他的误解，他都鲜少发声反驳或掀笔战为自己辩护，为的就是避免教界出现恶言相向的局面，展现了他的肚量与修为。

此外，他也在许多场合通过科学、现代的种种发现，衬托出佛教的价值。竺摩的做法固然明显承续民初佛教界对抗“以科学代宗教”的思路，但更重要

的意义是通过此举鼓励人们对佛理有所认识，并加强他们对佛教的信心。所以，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的推广，也就变得益发重要。

竺摩以僧人身份从事艺术活动多年，完成了多幅独树一帜的“才子字”与充满禅意的画作，但他却于 1974 年公告不再接受索取字画的要求。这里头实际上透露了一个讯息：竺摩的字画是非常受欢迎的，否则他也不必特意发布公告婉拒他人。另一方面，竺摩书画展展出的作品大多被购置一空，说明他已成功在书画界打造出另一个新天地。最重要的意义，还是在于他赋予了书画另一种境界的美感、鼓励艺术大众化，以及亲自诠释了艺术可净化人心的功能。

若仅从竺摩本身推广的佛教文化与教育领域来看，竺摩担任社长的《无尽灯》都有主编从旁协助，早期担任《无尽灯》主编的人选曾有隆根法师、伯圆法师、修静法师等人。至于有能力以诗书画弘法者，始终只有竺摩一人。说到佛学院的持续经营，竺摩身边的陈延进、黄荫文、陈少英、真果及多位客座教师等人可记上一功，但当时似乎就只有竺摩有这个能力长期教学与管理，相较之下更能看出佛学院院长确难为，而竺摩于此关键时刻担当重任的气度更是让人敬佩。

对比马来西亚佛学院与三慧讲堂在 1990 年（竺摩退出社会活动的年份）后的整体发展，我们得以进一步印证竺摩的贡献。与早期相较，马来西亚佛学院的佛学师资无疑已渐渐增强，后期也有部分教师是佛学院的毕业生。前文曾提及佛学院近期的毕业生人数渐渐减少，目前该院正努力让课程多元化，以吸引学生报读。至于三慧讲堂属下的单位，无论是周日义校或是研修会，成员人数也都不比以往，但已经积极策划转型以适应时代的需求（释继传，2013b），并于 2012 年三慧讲堂竺摩长老教育中心落成后，不定期举办弘法会、禅修营或其

他活动接引大众学佛。平心而论，以上佛教组织后期的发展并不如竺摩时期，然而，马来西亚后期渐渐冒起了多个佛教单位（包括马来西亚佛光山丛林佛学院以及槟岛一带的檀香寺等），而这也是造成马来西亚佛学院，以及三慧讲堂属下组织逐渐衰退的因素。人们的选择增加了，当年蓬勃一时的组织受影响也是无可厚非之事。不过，以上种种仍旧说明，竺摩的确在佛教发展贫瘠的年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他所领导的各个组织也在当时达到了全盛时期。

再者，纵观马来西亚出家众多年来的表现，凭借渊博知识与“诗书画”三绝打开弘法之门的竺摩，确实是当年的“一时之选”。若竺摩没有挺身而出努力护持与领导以上单位，马来西亚佛教当年的发展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了。因此，为表扬竺摩曾为佛教付出的贡献，他在1998年获槟州元首赐封“拿督”头衔（《马来西亚佛教总会50周年特刊（1959-2009）》编委会，年份不详：46），可说是实至名归。

竺摩对佛教的认识以及亲身体会，让他对佛教有更深刻的理解与体悟，也对佛教充满信心。他继承了中国佛教现代化改革家太虚的理念，南来后依然在少数教众的配合下持续努力推广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除了印证他为了佛教不畏困难与艰辛的精神，也说明他十分了解以上两者的兴衰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竺摩的理想背后实际上带有着非常清楚的目标，让他得以在早期弘法人员严缺的年代，依然坚定地朝着“为振兴佛教”的方向前进，而所做之事也都以佛教文化与教育为先。受限于本地佛教的大环境，虽然竺摩一生投注了最大的心力在耕耘佛教文化与佛教教育，他所怀抱的理想在目前看来仍有进步的空间；而其曾努力耕耘的种种理想，今日看来正是竺摩之所以超凡出众，与众不同的地方。

引用文献

1. 毕业班参访团随团记者（1979），〈毕业班参访团随行记〉，收入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三届毕业刊编辑委员会：《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三届高初中班附第三届进修班学生毕业刊》，页 189。
2. 槟城行脚僧（1955），〈太虚大师全书之报告〉，《无尽灯》第 5 卷第 1 期（1955 年 10 月 1 日），页 25。
3. 蔡炯松（1980），〈金星大法师圆寂追忆〉，《无尽灯》第 87 期（1980 年春季），页 31。
4. 陈楚云（1954），〈在曼谷参观竺摩法师画展〉，《无尽灯》第 3 卷第 4 期（1954 年 7 月 1 日），页 30。
5. 陈静涛（1939），〈太虚大师与中国佛教〉，《华南觉音》第 7 期（1939 年 3 月），页 6-8。
6. 陈秋平（2004），《移民与佛教：英殖民时代的槟城佛教》，士古来：南方学院。
7. 【美】陈荣捷著（1987），《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廖世德译），台北：文殊出版社。（Wing-tsit Chan, 1953）。
8. 尘砂（2003），〈菩提学院〉，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网，2016 年 9 月 28 日阅自
<http://www.malaysianbuddhistassociation.org/index.php/2009-04-01-01-11-38/2009-04-18-06-17-12/480-2009-10-22-06-42-51.html?showall=1>。
9. 陈心耕（2012），〈竺摩大师艺坛履痕〉，收入《雁荡·岭南情缘》，香港：新新出版社，页 8-9。
10. 陈秀丽（2013），〈菩提独中 佛法教学 育人为先（“独具一格”）〉，槟城菩提独立中学网，2016 年 4 月 20 日阅自<http://phortay.edu.my/?p=426>。
11. 陈延进（1985），〈马来西亚佛学院教务述要〉，收入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五届毕业刊编辑委员会：《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五届高初中班附第三届进修班学生毕业刊》，页 20。
12. 陈延进（1987），〈本院教务概况〉，收入马来西亚佛学院第六届毕业刊编辑委员会编：《马来西亚佛学院第六届高初中班学生毕业刊》，槟城：马来西亚佛学院，页 21-22。
13. 陈延进（1990a），〈本院教务概况〉，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七届毕业刊编辑委员会编：《1990 年马佛学院第七届高初中班附第四届进修班学生毕业刊》，槟城：马来西亚佛学院。
14. 陈延进（1990b），〈缅怀黄荫文老居士〉，收入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七届毕业刊编辑委员会编：《1990 年马佛学院第七届高初中班附第四届进修班学生毕业刊》，页 45

15. 陈永革（2003），《人间潮音：太虚大师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6. 陈与新（1955），〈槟城最近的佛教来宾〉，《无尽灯》第4卷第4期（1955年3月1日），页29。
17. 杜忠全、释学山（2010），〈竺摩法师对大马汉传佛教的贡献——以马佛学院对斋堂佛教化之影响为考察目标〉，收入郭莲花，梁秋梅合编：《马来西亚佛教回顾与前瞻》，八打灵再也：马来西亚佛教学术研究会。
18. 郭华清（2005），〈北洋政府的寺庙管理政策评析〉，《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页23-27。
19. 何建明（2006），《人间佛教与现代港澳佛教》上下册，香港：新新出版公司。
20. 何建明（2012），〈竺摩法师与中国现代佛教〉，收入陈松青编：《慧海明灯》，香港：新新出版公司。
21. 黄文斌（2010），〈禅艺融和：伯圆法师传记评述〉，《亚洲文化》第34期（2010年6月），页148。
22. 黄荫文（1969），〈无标题〉，《无尽灯》第46期（1969年12月20日），页21。
23. 黄荫文（1976），〈忆经验·说实话·勉同学〉，收入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二届毕业刊编辑委员会编：《马来西亚佛学院深造班第一届 高初中班第二届毕业刊》，页34。
24. 姜联招（2002），〈汉传佛教高僧对槟榔屿人文建设之贡献——以妙莲、竺摩为主的探索〉，原发表于“槟榔屿华人事迹”学术研讨会，2013年3月13日阅自<http://www.penangstory.net.my/chines-content-c-paperabstract.html>。
25. 蒋维乔（2004），《中国佛教史》（写成于1928年前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6. 焦点（2011），〈岭南画魂高剑父〉，《国学》2011年第11期，页58-59。
27. 《觉世》（1970），〈马来西亚佛教总会 创佛学院行开学礼〉，《觉世》旬刊第463期（1970年3月21日），第1版。
28. 《觉音》编者（1941），〈编完小言——告别了〉，《觉音》第30-32期合刊（1941年10月30日），页80。
29. 觉音社（1940），〈本刊重要启事〉，《觉音》第12期（1940年？月），页4。
30. 李抚虹（1991），〈篆香室丛刊序〉，《篆香画室文集》，槟城：慧堂印经会，（丛刊序）页3。
31. 梁永康（1991），〈篆香画室文集序〉，《篆香画室文集》，槟城：慧堂印经会。
32. 林鸿裕（2012），〈恩师与我〉，收入陈松青编：《慧海明灯》，香港：新新出版公司。
33. 刘悦禅（1954），〈菩提学院听经记〉，《无尽灯》第4卷第2期，1954年11月1日，页20。

34. 卢友中（2010），《雁荡山僧——竺摩法师传》（修订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35. 卢友中（2010），〈芝峰与《清凉歌集达旨》〉，《温州日报》瓯网，2014年1月23日阅自http://wzrb.66wz.com/html/2010-12/25/content_807658.htm。
36. 吕吉生（1993），〈主席献词〉，《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廿五周年银禧纪念刊》，槟城：三慧讲堂，页22。
37. 吕吉生（2016年9月18日），〈吕吉生先生访谈录（一）〉。（陈慧倩【访问人】）。
38. 骆静山（1984），〈大马半岛华人宗教的今昔〉，收入林水椽、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八打灵再也：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39. 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年份不详），〈佛门人物介绍：继程法师〉，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网，2016年3月28日阅自http://www.malaysianbuddhistassociation.org/images/stories/demo/bd_people_pdf/01_010.pdf。
40. 《马来西亚佛教总会50周年特刊（1959-2009）》编委会（年份不详），〈佛总五十年大事记〉，收入《马来西亚佛教总会50周年特刊（1959-2009）》，槟城：马来西亚佛教总会。
41. 马来西亚佛学院网页（年份不详a），〈周六推广佛学班〉，2017年1月13日阅自<http://mbi.edu.my/cms/?q=zh-hans/node/342>。
42. 马来西亚佛学院网页（年份不详b），〈2017年第三期推广佛学与技艺课程〉，2017年1月13日阅自<http://mbi.edu.my/cms/?q=zh-hans/node/344>。
43. 《南洋商报》（1954年12月28日），〈昨日收到六千三百六十九元五角八分连前累计九万六千零七十元三角八分〉，本坡一第5版。
44. 《南洋商报》（1956a，1956年4月28日），〈竺摩法师捐画款千元昨日托本报转献南大〉，新加坡（一）第5版。
45. 《南洋商报》（1956b，1956年4月16日），〈竺摩法师书画义展参观者众订购者亦多 今日为展览最后一天〉，新加坡（二）第6版。
46. 《南洋商报》（1957年11月23日），〈全国各州释门弟子组织马来亚佛教会团结教徒宣扬教义造福社会〉，马来亚新闻第11版。
47. 《南洋商报》（1962年9月17日），〈吉兰丹佛教会积极进行筹建大觉寺工作各界捐款达二万五千元〉，马来亚新闻第15版。
48. 《南洋商报》（1970年3月13日），〈佛教施诊所召开董事会议上月捐款增至七千四百元〉，新加坡新闻第19版。
49. 《南洋商报》（1976年7月12日），〈世界佛教友谊会星分会卫塞节筹慈善基金二万四千四百余元赠慈善机构千五百元托本报代赈〉，新加坡新闻第15版。
50. 《南洋商报》（1981年3月17日），〈慈善医疗院再获六千余元医药基金〉，新加坡新闻第8版。

51. 《南洋商报星期刊》（1959年4月19日），〈马来亚佛教会今在檳举行成立大会 将由东姑主持开幕礼 各州出席及列席大会会友数逾千人〉，马来亚三第11版。
52. 欧阳渐（2000），〈杨仁山居士传〉，收入【清】杨文会撰、周继旨校点，《杨仁山全集》，合肥：黄山书社。
53. 潘桂明（2000），《中国居士佛教史》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4. 冉云华（1990），《中国佛教文化研究论集》，台北：东初出版社。
55. 沈西屏（1940），〈佛教在马来亚〉，《觉音》第16期，页5-7。
56. 慎言（2009），〈佛门常用法器简介〉，《香港佛教月刊》590期（2009年7月出版），香港佛教联合会网，2016年2月20日阅自
http://www.hkbuddhist.org/magazine/590/590_14.html。
57. 释宝慈辑（1923），〈沙门〉，收入释宝慈纂辑：《檳城鹤山极乐寺志》（出版社资料不详）。
58. 释本忠（1923），〈极乐寺志序〉，收入释宝慈纂辑：《檳城鹤山极乐寺志》（出版社资料不详）。
59. 释伯圆（1959），〈刊前语〉，《无尽灯》第三期（1959年12月30日），无页数。
60. 释超尘（1954），〈编余闲话〉，《无尽灯》第3卷第4期（1954年7月1日），页35。
61. 释澄真（1955），〈演讲是弘法的工具〉，《无尽灯》第4卷第3期（1955年3月1日），页30。
62. 释传道（2012），〈“人间佛教”之菩萨典范〉，收入陈松青编：《慧海明灯》，香港：新新出版公司。
63. 释达灵（1938），〈华南觉音的诞生〉，《华南觉音》第2期（1938年7月1日），页9。
64. 释大醒（1940），〈大醒上人函〉，《觉音》第16期（1940年8月5日），页30。
65. 释道安（1951），〈道安法师讲演词〉，《无尽灯》第1卷第2期（1951年12月15日），页10。
66. 释东初（1974），《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台北：东初出版社。
67. 释法舫（年份不详），〈佛教与社会人心——法舫法师在怡保东莲寺小筑讲（上）〉（释宗鉴笔记），宝莲禅寺网，2014年7月2日阅自
<http://hk.plm.org.cn/gnews/2011122/2011122249269.html>。
68. 释法亮（1956），〈无尽信箱·金边法亮法师来函〉，《无尽灯》第5卷第9期（1956年6月15日），页23。
69. 释梵影（1957），〈南天星陨〉，《无尽灯》第7卷第1期（1958年1月），页28。
70. 释广馥（1959），〈马来亚佛教会成立前后〉，《无尽灯》第1期（1959年6月30日），页12。

71. 释慧森 (1958a), 《初中佛学课本》第一册, 槟城: 菩提学校。
72. 释慧森 (1958b), 《初中佛学课本》第二册, 槟城: 菩提学校。
73. 释慧森 (1958c), 《初中佛学课本》第三册, 槟城: 菩提学校。
74. 释寂晃 (1984), 〈缅怀过去, 瞻望未来〉, 收入《马来西亚佛教总会银禧纪念特刊》, 槟城: 马来西亚佛教总会。
75. 释继程 (1996), 〈竺摩法师与大马佛教〉, 收入梁秀霞主编: 《竺摩法师佛教教育与艺术》, 槟城: 三慧讲堂印经会。
76. 释继程 (2011), 〈侧写竺摩师父二三事〉, 《佛教青年》2011年5-8月号, 页11。
77. 释继程 (2012), 〈万里云天无限情〉, 收入陈松青编: 《慧海明灯》, 香港: 新新出版公司。
78. 释继程 (2016年5月9日), 〈继程法师访谈录(一)〉。(陈慧倩【访问人】)。
79. 释继传 (2012年10月6日), 〈继传法师访谈录(一)〉。(黄文斌、陈慧倩【访问人】)。
80. 释继传 (2013a, 2013年4月8日), 〈继传法师访谈录(三)〉。(陈慧倩【访问人】)。
81. 释继传 (2013b, 2013年1月28日), 〈继传法师访谈录(二)〉。(黄文斌、陈慧倩【访问人】)。
82. 释继传 (2014年12月22日), 〈继传法师访谈录(四)〉。(陈慧倩【访问人】)。
83. 释继灯 (2012), 〈永怀慈范〉, 收入陈松青编: 《慧海明灯》, 香港: 新新出版公司。
84. 释继仁 (2012), 〈竺摩长老对马来西亚佛教教育的影响〉, 收入陈松青编: 《慧海明灯》, 香港: 新新出版公司。
85. 释金明 (1959), 〈马来亚佛教的后顾与前瞻〉, 《无尽灯》第一期 (1959年6月30日), 页5。
86. 释金明 (1973), 〈开办佛学院的因缘〉, 收入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一届毕业刊编辑委员会编: 《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一届中初级学生毕业刊》, 槟城: 马来西亚佛学院, 页37-38。
87. 释开谛编 (2010), 《南游云水情: 佛教大德弘化星马记事 (1888-2005)》, 槟城: 宝誉堂教育推广中心。
88. 释隆根 (1963), 〈编后语〉, 《无尽灯》第23期 (1963年12月1日), 页17。
89. 释隆根 (2001), 《七十自述 (附八十再述)》, 新加坡: 灵峰般若讲堂。
90. 释满慈 (1940), 〈编后话〉, 《觉音》第12期 (1940年2月), 页28。
91. 释圣严 (1983), 〈向灯刊百期致敬〉, 《无尽灯》第100期 (1983年夏季), 页11。

92. 释圣严（2002），〈竺摩长老——大马汉传佛教之父〉，收入《悼念II》，法鼓山圣严法师数位典藏网，2016年7月8日阅自
<http://www.shengyen.org/books-content.php?b=03-11>。
93. 释松泉（1954），〈我为无尽灯服务的经过〉，《无尽灯》第4卷第1期（1954年9月1日），页30。
94. 释太虚（1923），〈我新近理想中之佛学院完全组织〉（原刊于海潮音第4卷第9期），《太虚大师全集》网，2015年4月28日阅自
http://tx.foyan.net/book/Article09_035.html。
95. 释太虚（1929），〈甚么是佛学〉（原刊于《海潮音》第10卷第10期），《太虚大师全集》网，2016年6月2日阅自
http://tx.foyan.net/book/Article01_010.html。
96. 释太虚（1933），〈救法与救国〉（释守志记，原刊于《海潮音》第14卷第1期），《太虚大师全集》网，2016年5月13日阅自
http://tx.foyan.net/book/Article15_010.html。
97. 释太虚（1937a），〈怎样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佛教〉（原刊于《海潮音》第16卷第7期），《太虚大师全集》网，2016年6月27日阅自
http://tx.foyan.net/book/Article13_014.html。
98. 释太虚（1937b），〈新物理学与唯识学〉（原刊于《海潮音》第18卷第4期），《太虚大师全集》网，2016年6月2日阅自
http://tx.foyan.net/book/Article13_053.html。
99. 释太虚（1938a），〈中国需耶教与欧美需佛教〉，《华南觉音》创刊号（1938年9月），页4-5。
100. 释太虚（1938b），〈现代需要的僧教育〉（原刊于《海潮音》第19卷第6期），《太虚大师全集》网，2015年4月29日阅自
http://tx.foyan.net/book/Article09_041.html。
101. 释太虚（1939），〈服务国家宣扬佛教〉（释大慧记，原刊于《海潮音》第20卷第9期），《太虚大师全集》网，2016年5月13日，
http://tx.foyan.net/book/Article15_041.html。
102. 释太虚（1940），〈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原刊于《海潮音》第21卷第11、12期），《太虚大师全集》网，2016年12月21日阅自
http://tx.foyan.net/book/Article19_010.html。
103. 释太虚（1987），洪启嵩、黄启临主编《太虚文集》，台北：文殊出版社。
104. 释太虚（年份不详），〈学生教员与法师方丈〉，《太虚大师全集》网，2014年3月3日阅自http://tx.foyan.net/book/Article19_024.html。
105. 释惟觉（年份不详），〈始终心要〉，中台世界网，2014年3月21日阅自<http://www.ctworld.org/turn/sutra/004.htm>。
106. 释星云（2009），星云法师亲笔信函，《文化杂志》第73期，页180。
107. 释星云（2012），〈慈悲喜舍长老最为尊〉，收入陈松青编：《慧海明灯》，香港：新新出版公司。

108. 释宣化（年份不详），〈永嘉大师证道歌浅释〉，2014年3月20日阅自 <http://boruo.goodweb.cn/books/0514.htm>。
109. 释演本（1957），〈写给无尽灯及其他〉，《无尽灯》第6卷第4期（1957年8月30日），页18。
110. 释演慈（1996），〈谈经说论话人生〉，收入梁秀霞主编：《竺摩法师佛教教育与艺术》，槟城：三慧讲堂。
111. 释演慈（2012），〈愿师父开创的佛教教育灯灯相传〉，收入陈松青编：《慧海明灯》，香港：新新出版公司。
112. 释印顺（1951），〈印顺法师讲演词〉，《无尽灯》第1卷第2期（1951年12月15日），页12。
113. 释印顺（2009），《附录·印顺法师略谱》，《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第23册，北京：中华书局。
114. 释印顺（2011），《太虚大师年谱》，北京：中华书局。
115. 释竺摩（1939a），〈维摩经语体讲录〉（竹摩法师讲于澳门功德林，释满慈记），《觉音》第11期（1939年？月），页3。
116. 释竺摩（1939b），〈太虚大师的融贯思想〉，《华南觉音》第七期（1939年3月），页10-11。
117. 释竺摩（1940a），〈弘一律师无恙〉，《觉音》第15期（1940年7月7日），页34。
118. 释竺摩（1940b），〈答畏因君的一封公开信〉，《觉音》第16期（1940年8月5日），页32。
119. 释竺摩（1941a），〈借花献佛〉，《觉音》第20、21期合刊（1941年2月20日），页2-3。
120. 释竺摩（1941b），〈弘一律师的“先师”〉，《觉音》第20、21期合刊（1941年2月20日），页21-22。
121. 释竺摩（1951a），〈点着无尽的心灯〉，《无尽灯》第1卷第1期（1951年8月12日），页1。
122. 释竺摩（1951b），〈竺摩法师讲演词〉，《无尽灯》第1卷第2期（1951年12月15日），页10-11。
123. 释竺摩（1953a），〈悼一位推动僧教育和热忱卫教者〉，《无尽灯》第2卷第2期（1953年1月22日），页13-15。
124. 释竺摩（1953b），〈佛学座谈会〉（陈心彬记），《无尽灯》第2卷第3期（1953年4月14日），页26。
125. 释竺摩（1954a），〈槟城来鸿〉，《无尽灯》第3卷第4期（1954年7月1日），页32。
126. 释竺摩（1954b），〈南溟来鸿〉，《无尽灯》第4卷第1期（1954年9月1日），页27。
127. 释竺摩（1954c），〈南游寄语〉，《无尽灯》第3卷第4期（1954年7月1日），页27。

128. 释竺摩 (1954d), 〈自题秋林暝坐图〉, 《无尽灯》第3卷第2期 (1954年1月15日), 页21。
129. 释竺摩 (1954e), 〈三谈办僧教育〉, 《无尽灯》第3卷第2期 (1954年4月15日), 页19-20。
130. 释竺摩 (1954f), 〈谈教学方针〉 (在栖霞佛学院同学欢迎会讲), 《无尽灯》第3卷第3期 (1954年4月15日), 页7。
131. 释竺摩 (1954g), 〈正心佛学院开学记〉, 《无尽灯》第3卷第2期 (1954年1月15日), 页26。
132. 释竺摩 (1954h), 亲笔手稿, 〈谈求学之不易〉 (在槟城菩提学校开学讲, 编号6.85), 槟城: 三慧讲堂。
133. 释竺摩 (1955a), 〈南游寄语·九、泰国的华寺与华僧〉, 《无尽灯》第4卷第3期 (1955年1月1日), 页23。
134. 释竺摩 (1955b), 〈南游寄语·一〇、谒僧皇及四僧伽宰相〉, 《无尽灯》第5卷第1期 (1955年10月1日), 页21。
135. 释竺摩 (1956), 〈新希望与新生命〉, 《无尽灯》第5卷第4期 (1956年1月1日), 页2。
136. 释竺摩 (1957a), 〈本刊迁槟赘言〉, 《无尽灯》第6卷第3期 (1957年5月30日), 页1。
137. 释竺摩 (1957b), 〈哭演公! 哀佛教!〉, 《无尽灯》第6卷第4期 (1957年8月30日), 页15-16。
138. 释竺摩 (1958), 〈普贤十大行愿讲话〉, 《无尽灯》第7卷第4期 (1958年5月15日), 页7。
139. 释竺摩 (1959a), 〈三个佛教徒代表了三类佛法〉, 《无尽灯》季刊第3期, 1959年12月30日, 页4。
140. 释竺摩 (1959b), 亲笔手稿, 〈为菩提初中第六届小学第十二届毕业典礼致词〉 (编号M4), 槟城: 三慧讲堂。
141. 释竺摩 (1959c), 亲笔手稿, 〈在忍耐中做工夫——一九五九年菩中第二学期开学致词〉 (编号M8), 槟城: 三慧讲堂。
142. 释竺摩 (1960), 《应机设教的佛陀》 (在锡兰佛寺巴利文学校周年纪念会讲), 《无尽灯》第7期 (1960年12月31日), 页5。
143. 释竺摩 (1961a), 〈座谈方法的研讨〉 (在香港妙法精舍座谈会讲), 《无尽灯》第8期 (1961年3月31日), 页1-5。
144. 释竺摩 (1961b), 〈宗教的时代使命〉 (在吉灵丹佛教会各界宴会中讲), 《无尽灯》第9期 (1961年6月30日), 页16。
145. 释竺摩 (1961c), 〈菩提中学与佛教〉, 《无尽灯》季刊第8期 (1961年3月31日), 页30。
146. 释竺摩 (1962a), 〈普贤十愿讲话〉 (续完), 《无尽灯》第14期 (1962年6月1日), 页39。

147. 释竺摩(1962b),认识求法的意义——在新加坡女子佛学院讲,第15期(1962年8月1日),页11-12。
148. 释竺摩(1963),〈叠前韵酬棉兰诸诗翁〉,《无尽灯》第21期(1963年8月1日),页21。
149. 释竺摩(1964),〈为弥陀图书馆敬祝一言〉,收入《弥陀学校建校十周年暨新图书馆落成纪念刊》,新加坡:弥陀学校董事会。
150. 释竺摩(1965a),〈律学纲要序〉,《无尽灯》第29期(1965年5月1日),页2。
151. 释竺摩(1965b),〈善生经与人生佛教〉(在槟城三慧讲堂讲解),《无尽灯》第31期(1965年11月1日),页7-9。
152. 释竺摩(1966),〈学佛的两种用心〉(在霹雳佛教联谊会讲),《无尽灯》第32期(1966年3月1日),页4。
153. 释竺摩(1967),〈佛教青年的五难与三多〉(在香港佛教青年会讲),《无尽灯》第36期(1967年6月1日)第36期,页6。
154. 释竺摩(1968a),〈佛学问答〉,《无尽灯》季刊第39期(1968年3月1日),页16-18。
155. 释竺摩(1968b),〈佛教的四个优点〉(在诗巫永安亭漳泉公会宴会讲),《无尽灯》第41期(1968年9月1日),页23-24。
156. 释竺摩(1969),〈答心卓居士〉,《无尽灯》第45期(1969年9月8日),页14。
157. 释竺摩(1970a),〈人心向善与民族亲睦〉(在马来西亚芙蓉紫竹亭开光演词),《无尽灯》季刊第50期(1970年12月20日),页1-2。
158. 释竺摩(1970b),〈药师法门讲要(三)〉(讲于香港法雨精舍),《无尽灯》季刊第49期(1970年9月20日),页7。
159. 释竺摩(1970c),〈毋忘母校与佛教〉,收入《槟城独立中学高商第十一届毕业刊》。
160. 释竺摩(1970d),亲笔手稿,〈马来西亚佛教近貌〉(编号2.31),槟城:三慧讲堂。
161. 释竺摩(1970e),亲笔手稿,〈院长致词〉(编号I3),槟城:三慧讲堂。
162. 释竺摩(1970f),亲笔手稿,〈在困难中求进步〉(编号I49),槟城:三慧讲堂。
163. 释竺摩(1971a),〈发刊词〉,《无尽灯》第52期(1971年6月20日),页5。
164. 释竺摩(1971b),〈泰马诗人七届中秋雅集诗选〉,《无尽灯》季刊第54期(1971年12月20日),页32-33。
165. 释竺摩(1971c),亲笔手稿,〈佛教需要办学〉(编号1.79),槟城:三慧讲堂。
166. 释竺摩(1971d),〈序二〉(马来西亚佛学院特刊),《无尽灯》第54期(1971年12月20日),页3。

167. 释竺摩 (1972a), 〈佛会佛像与佛教〉 (丁加奴佛教会开幕致词), 《无尽灯》季刊第 56 期 (1972 年 6 月 20 日), 页 9。
168. 释竺摩 (1972b), 〈办学兴教的重要〉, 《无尽灯》第 57 期 (1972 年 9 月 20 日), 页 8。
169. 释竺摩 (1972c), 〈砂州佛教的开发与弘扬〉, 《无尽灯》第 56 期 (1972 年 6 月 20 日), 页 23-24。
170. 释竺摩 (1972d), 〈发扬智悲普化的精神——珠宝观音古庙开光周年纪念特刊献词〉, 《无尽灯》第 55 期 (1972 年 3 月 30 日), 页 11-12。
171. 释竺摩 (1973a), 〈竺摩启事〉, 《无尽灯》第 62 期 (1973 年冬季), 页 15。
172. 释竺摩 (1973b), 〈院训〉, 收入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一届毕业刊编辑委员会编:《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一届中初级班学生毕业刊》, 槟城: 马来西亚佛学院。
173. 释竺摩 (1973c), 〈佛教的忍育 (周训与毕业班同学相勉)〉, 收入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一届毕业刊编辑委员会编:《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一届中初级班学生毕业刊》, 槟城: 马来西亚佛学院。
174. 释竺摩 (1975a), 亲笔手稿, 〈马来西亚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院长竺摩法师报告院务〉 (编号I13), 槟城: 三慧讲堂。
175. 释竺摩 (1975b), 亲笔手稿, 〈75 年开学讲话上学期〉 (编号I12), 槟城: 三慧讲堂。
176. 释竺摩 (1976), 〈序〉, 收入马来西亚佛学院毕业刊编辑委员会编:《马来西亚佛学院深造班第一届 高初中班第二届毕业刊》, 槟城: 马来西亚佛学院。
177. 释竺摩 (1977a), 〈建立佛堂与宣扬佛化 (佛宝林开光致词)〉, 《无尽灯》第 76 期 (1977 年夏季), 页 16-17。
178. 释竺摩 (1977b), 亲笔手稿, 〈董事长致词〉 (编号K3), 槟城: 三慧讲堂。
179. 释竺摩 (1978a), 〈美丽的慧苗〉, 《慧苗》第一期, 槟城: 三慧讲堂周日义校。
180. 释竺摩 (1978b), 亲笔手稿, 〈78 年上学期开学致词〉 (编号I20), 槟城: 三慧讲堂。
181. 释竺摩 (1978c), 〈谈弘法的难易〉, 《无尽灯》第 80 期 (1978 年夏季) 页 3-5。
182. 释竺摩 (1979a), 〈学佛的正理与正行〉, 《慧苗》第二期, 槟城: 三慧讲堂周日义校。
183. 释竺摩 (1979b), 〈谈办学与兴教〉, 收入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三届毕业刊编辑委员会:《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三届高初中班附第三届进修班学生毕业刊》。

184. 释竺摩 (1979c), 亲笔手稿, 〈79 年上学期开学讲话要点〉 (编号I23), 槟城: 三慧讲堂。
185. 释竺摩 (1979d), 亲笔手稿, 〈79 下学期开学致词及报告院务〉 (编号I25), 槟城: 三慧讲堂。
186. 释竺摩 (1979e), 亲笔手稿, 〈79 年马佛学院开学致词〉 (编号I22), 槟城: 三慧讲堂。
187. 释竺摩 (1980a), 〈怎样修善行〉, 《慧苗》第三期, 槟城: 三慧讲堂周日义校。
188. 释竺摩 (1980b), 〈学习新的五常〉, 《无尽灯》第 88 期 (1980 年夏季), 页 26。
189. 释竺摩 (1981), 〈画佛艺术的三意义〉 (在三慧讲堂周日义校绘佛画展开幕讲), 《无尽灯》第 94 期 (1981 年冬季), 页 8-9。
190. 释竺摩 (1982a), 〈佛陀的教戒与启导〉, 收入马来西亚佛学院第四届毕业刊编辑委员会编:《马来西亚佛学院高初中级第四届附进修级第二届毕业刊》, 槟城: 马来西亚佛学院, 页 63-64。
191. 释竺摩 (1982b), 亲笔手稿, 〈82 上学期放学礼讲话〉 (编号I47), 槟城: 三慧讲堂。
192. 释竺摩 (1982c), 〈改善人心安定社会〉, 《无尽灯》第 95 期 (1982 年春季), 页 11。
193. 释竺摩 (1983a), 〈荡执成智·真空妙有——五十年来的槟城佛教〉 (写成于 1961 年), 《无尽灯》第 99 期 (1983 年春季), 页 12-21。
194. 释竺摩 (1983b), 〈我与无尽灯〉, 《无尽灯》第 100 期 (1983 年夏季), 页 1、3。
195. 释竺摩 (1983c), 〈回忆过去 希望将来〉, 收入《槟城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十五周年纪念刊》, 槟城: 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
196. 释竺摩 (1983d), 亲笔手稿, 〈竺摩法师致词〉 (编号J12), 槟城: 三慧讲堂
197. 释竺摩 (1983e), 〈向研修进军〉, 收入《槟城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十五周年纪念刊》, 槟城: 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
198. 释竺摩 (1984), 亲笔手稿, 〈开学报告与致词〉 (编号I32), 槟城: 三慧讲堂。
199. 释竺摩 (1985a), 亲笔手稿, 〈纪念三位导师〉 (编号M5), 槟城: 三慧讲堂。
200. 释竺摩 (1985b), 亲笔手稿, 〈学佛的基本修养〉 (编号I33), 槟城: 三慧讲堂。
201. 释竺摩 (1985c), 〈佛青的基础与修养〉, 收入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五届毕业刊编辑委员会编:《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五届高初中班附第三届进修班学生毕业刊》, 槟城: 马来西亚佛学院。

202. 释竺摩（1987），亲笔手稿，〈87年度第三学期开课讲话〉（编号I36），
 槟城：三慧讲堂。
203. 释竺摩（1990a），亲笔手稿，〈90年最后一次院务会议〉（编号I37），
 槟城：三慧讲堂。
204. 释竺摩（1990b），〈纪念白公长老〉，收入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七届毕业刊
 编辑委员会编：《1990年马佛学院第七届高初中班附第四届进修班学生毕
 业刊》，槟城：马来西亚佛学院。
205. 释竺摩（1990c），《佛教教育与文化》，收入《篆香画室文集》第13册，
 槟城：慧堂印经会。
206. 释竺摩（1990d），亲笔手稿，〈院务报告〉（第七届，编号I56），槟城：
 三慧讲堂。
207. 释竺摩（1991a），《佛教时事感言》，收入《篆香画室文集》第21册，槟
 城：慧堂印经会。
208. 释竺摩（1991b），《认识自己的哲学》，收入《篆香画室文集》第18册，
 槟城：慧堂印经会。
209. 释竺摩（1993），〈竺公院长出关致词〉，收入马来西亚佛学院第八届毕业
 刊编辑委员会编：《马来西亚佛学院第八届高初级学生毕业刊》，槟城：马
 来西亚佛学院。
210. 释竺摩（2003），《行脚过千秋》，收入《篆香画室文集》第26册，槟城：
 三慧讲堂印经会。
211. 释竺摩（2009），〈海潮音卅岁感言〉，《文化杂志》第73期（2009年冬
 季），页49。
212. 释竺摩（年份不详a），亲笔手稿，〈纪念清巖行者肉身坐化不坏〉（编号
 2.18），槟城：三慧讲堂。
213. 释竺摩（年份不详b），亲笔手稿，〈定慧居佛学图书馆开幕致词〉（编号
 B10），槟城：三慧讲堂。
214. 释竺摩（年份不详c），亲笔手稿，〈艺术的人生〉（编号7.6），槟城：
 三慧讲堂。
215. 释竺摩（年份不详d），亲笔手稿，〈以提倡奖学金来纪念佛诞〉（编号E19），
 槟城：三慧讲堂。
216. 释竺摩（年份不详e），亲笔手稿，〈学生的榜样〉（编号6.79），槟城：
 三慧讲堂。
217. 释竺摩（年份不详f），亲笔手稿，〈勤学力行〉（编号M6），槟城：三慧
 讲堂。
218. 释竺摩（年份不详g），亲笔手稿，〈无题〉（编号I45），槟城：三慧讲堂。
219. 释竺摩等（1966），〈佛教新闻·致陈修信财政部长原文〉，《无尽灯》
 第33期（1966年9月1日），页23。
220. 释竺摩著，卢友中编（2005），《篆香室诗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21. 释竺摩编述，释继程整理（1984），〈竺摩法师简谱初稿〉，收入释继程

- 主编：《大马佛教研究》第一集，槟城：马佛青总会佛教文摘社。
222. 王增文（2014），《校歌与校史》（重修版），槟城菩提独立中学网，2015年3月23日阅自http://phortay.edu.my/?page_id=53。
223. 王仲厚（1957），〈喜《无尽灯》迁槟〉，《无尽灯》第6卷第3期（1957年5月30日），页2。
224. 吴白鹤（1956年3月21日），〈题赠竺摩上人画集〉，《南洋商报》副刊第7版。
225. 《无尽灯》编辑部（1954），〈无尽简报〉，《无尽灯》第4卷第1期（1954年9月1日），页31。
226. 《无尽灯》编辑部（1963），〈佛教新闻〉，《无尽灯》第21期（1963年8月1日），页33。
227. 《无尽灯》编辑部（1964），〈佛教新闻〉，《无尽灯》第27期（1964年11月1日），页27。
228. 《无尽灯》编辑部（1966a），〈佛教新闻〉，《无尽灯》第33期（1966年9月1日），页25。
229. 《无尽灯》编辑部（1966b），〈佛教新闻〉，《无尽灯》第32期（1966年3月1日），页26。
230. 《无尽灯》编者（1968），〈编者的话〉，《无尽灯》第40期（1968年6月1日），页40。
231. 《无尽灯》记者（1957），〈槟城庆祝佛诞特写〉，《无尽灯》第6卷第3期（1957年5月30日），页30。
232. 《无尽灯》记者（1963），〈槟城佛学书局开幕记〉，《无尽灯》第17期（1963年2月1日），页29。
233. 吴人俊（1969），〈佛陀给我们几点重要的启示〉，《无尽灯》第44期（1969年6月20日），页7。
234. 夏美玉（2010），〈浅析竺摩法师佛教艺术观〉，收入郭莲花，梁秋梅合编：《马来西亚佛教回顾与前瞻》研讨会论文（页183-192），八打灵再也：马来西亚佛教学术研究会。
235. 夏美玉（2011），〈竺摩法师的修禅经历与画里禅机〉，收入《第二届马来西亚国际佛教研讨会论集》，八打灵再也：马来西亚佛教研究学会，页181-192。
236. 《星报》社论（1963），转引自《无尽灯》第20期（1963年6月1日），页17。
237. 《星报》星期日（1966年4月10日），〈住持竺摩法师致开幕词〉地方新闻五第9版。
238. 心皈（1980），〈义校与我〉，《慧苗》第三期，槟城：三慧讲堂周日义校。
239. 星洲网（2008），〈继程法师：结集成书传诵·用文字及艺术弘扬佛学〉，2012年3月27日阅自<http://www.sinchew.com.my/node/88553>。

240. 萧遥天（1956），〈竺摩法师画集序〉，《无尽灯》第5卷第8期（1956年5月1日），页8。
241. 【清】杨文会撰、周继旨校点（2000），《杨仁山全集》，合肥：黄山书社。
242. 杨寅官（1940），〈请和尚们“语”我来〉，《觉音》第14期（1940年6月），页15-16。
243. 佚名（1955），〈灯前琐语〉，《无尽灯》第5卷第1期（1955年10月1日），页3。
244. 佚名（1956），〈本校第六届常务委员〉，《庆祝释迦牟尼佛二千五百年圣诞纪念特刊》，槟城：菩提中学，页26。
245. 佚名（1961），〈澳门兴建佛教唯一教堂 澳督拨送风景佳地 澳社呼吁各地佛徒捐助〉，《无尽灯》第9期（1961年6月30日），页11。
246. 佚名（1973a），〈马来西亚佛学院经济委员会组织简则〉，收入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一届毕业刊编辑委员会编：《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一届中初级班学生毕业刊》，槟城：马来西亚佛学院，页15。
247. 佚名（1973b），〈本院之创办，现状与未来〉，收入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一届毕业刊编辑委员会编：《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一届中初级班学生毕业刊》，槟城：马来西亚佛学院，页9。
248. 佚名（1973c），〈各大报章报导：马来西亚佛学院首届学生毕业典礼盛况〉，收入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一届毕业刊编辑委员会编：《马来西亚佛学院第一届中初级班学生毕业刊》，槟城：马来西亚佛学院，页127-128。
249. 佚名（2012），〈教职人员履历〉，收入马来西亚佛学院2012年毕业刊编辑委员会编：《马来西亚佛学院2010年至2012年毕业刊》，页37
250. 佚名（年份不详a），〈印顺导师生平记要〉，慈济网，2014年1月22日阅自<http://www2.tzuchi.org.tw/case/2005mys/html/04/04-2a2640.htm>。
251. 佚名（年份不详b），〈菩提四校〉，檀香寺网，2016年9月27日阅自<http://thanhsiang.org/ch/node/3718>。
252. 银禧纪念刊编委（1993），〈会内活动〉，《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廿五周年银禧纪念刊》，槟城：三慧讲堂，页29-36。
253. 于凌波（1994），《中国近代佛门人物志》第三册，台北：慧炬出版社。
254. 喻静（2010），〈“人间佛教”的先声——梁漱溟、太虚关于佛教入世转向问题的论争（下）〉，《中华文化画报》2010年第12期，页96。
255. 曾天耕（1978），〈序〉，《慧苗》创刊号，槟城：三慧讲堂周日义校，页1。
256. 曾天耕（2016年9月18日），〈曾天耕先生访谈录（一）〉。（陈慧倩【访问人】）。
257. 张金德（2007），《太虚批判基督宗教研究》，未出版硕士论文，厦门：厦门大学，页46-48。
258. 张居士（1979），〈内政部出版局查询灯刊之经过〉，《无尽灯》第85期（1979年秋季），页35。

259. 郑达亿（1993），〈十年回顾〉，《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廿五周年银禧纪念刊》，槟城：三慧讲堂，页 23。
260. 郑浩千（1996），〈佛教与艺术〉，收入梁秀霞主编：《竺摩法师佛教教育与艺术》，槟城：三慧讲堂印经会。
261. 郑浩千（2012），〈说世上未可言妙法 是人间未多见清才〉，收入《文化杂志》第 85 期（2012 年冬季刊），页 191。
262. 郑浩千（2015a, 2015 年 1 月 31 日），〈郑浩千先生访谈录（一）〉。（陈慧倩【访问人】）。
263. 郑浩千（2015b, 2015 年 3 月 21 日），〈郑浩千先生访谈录（二）〉。（陈慧倩【访问人】）。
264. 鍾瑜（1990），《马来西亚华人美术史：一九零零至一九六五》，吉隆坡：正山国际设计艺术集团。
265. 朱斐（1965），〈访问的第三站——马来亚Malaya〉，收入《空中行脚》，台中：菩提树杂志社。
266. 竹摩（1938），〈华南觉音的希望〉，《华南觉音》第二期（1938 年 10 月 1 日），页 6-8。
267. 竹园（1962），〈迎接“佛教卫塞年”〉，《无尽灯》第 12 期（1962 年 2 月 1 日），页 1。
268. *The Straits Times* (1956, April 14). Painting by priest is ‘elegant’, Page 7.
269. Victor Purcell (1967), “Special Aspects of The Chinese in Malaya: Chinese Religion in Malaya”, *The Chinese in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附录

附录表一：马来西亚佛学院面授课程编排表⁹⁵

1970年					
初中一，共17科（3科语文，4门世学，10门佛学）			中级二，共15科（3科语文，3门世学，9门佛学）		
梵呗/音乐/应用文/数学	禪林宝训/书法/华文		禪林宝训/历史		十善业道经
佛学常识/演讲练习	学佛行仪/阿弥陀经		佛教史/学佛行仪/书法		遗教经/普门品/演讲
十善业道经/学音乐	佛教史/历史/国文/英文		佛学纲要/阿弥陀经		英文/国文/华文/音乐
1971年					
初中二，共19科（3科语文，5门世学，11门佛学）			中级二，共18科（3科语文，3门世学，12门佛学）		
阿弥陀经/八大人觉经	佛教史/行愿品/生物学		佛学纲要/普贤行愿品		阿弥陀经/教观纲宗
佛学常识/教观纲宗	戒律学/梵呗/应用数学		佛乘宗要论/八大人觉经		梵呗/音乐/演讲/练习
佛乘宗要论/演讲/练习	华/国/英文/历史/生物学		戒律学/佛教史/历史		英/国/华文/应用数学
	书法		四十二章经/百法明门论		
1972年					
预备班，共13科（3科语文，6门世学，4门佛学）		初中三，共15科（3科语文，5门世学，7门佛学）		中级三，共15科（3科语文，4门世学，8门佛学）	
梵呗 / 音乐	算术/科学	普贤行愿品	教观纲宗/英文	普贤行愿品	教观纲宗/书法
佛学/华文	习字	佛教史/历史	演讲练习/音乐	佛教史/历史	演讲练习/音乐
善生经/健康	英文/国文	佛学常识/华文	生物学/国文	佛学纲要/华文	应用数学/国文
历史/演讲		佛乘宗要论	应用数学	百法明门论	戒律学/英文
		戒律学/书法		佛乘宗要论	

⁹⁵ 表一抄录自马来西亚佛学院网页。除增加学科数目，以及把表中错误及课程重复处以灰色标示外，笔者未对表中内容作其他修改。另，由于课程中的“演讲”乃弘法练习的课程，故列为佛学课，“生活座谈”则暂且列为世学。

表中其他错漏处，暂有：

（一）第二届（1973-1975）课程表不齐全：1973年缺初中班课程，1974年缺中级班课程，1975年同时有初级及初中课程

（二）第四届（1979-1981）课程表：高中班课程有错乱现象——1980年无高中二课程表，1981年却同时出现高中一与高中三课程表。

1973 年							
预备班, 共 11 科 (3 科语文, 5 门世学, 3 门佛学)		中级一, 共 17 科 (3 科语文, 6 门世学, 8 门佛学)		进修班, 共 13 科 (3 科语文, 4 门世学, 6 门佛学)			
佛学/华文	历史/梵呗	普贤行愿品/演讲	八识规矩/书画	金刚经/华文	佛教史/社会学		
善生经/习字	卫生/算术	佛教史/历史/音乐	佛乘宗要论	六祖坛经/中论	国文/英文/音乐		
巫文/英文	音乐	佛学纲要/华文	国文/英文/练习	西洋哲学/演讲	生活座谈历史		
		应用文/生物学	佛学常识/数学				
1974 年							
初中, 共 19 科 (3 科语文, 4 门世学, 12 门佛学)				深造班, 共 11 科 (3 科语文, 3 门世学, 6 门佛学)			
弥陀经/文学史/音乐		弥勒上生经/中级教本/书法		金刚经/起信论		西洋哲学/华文/音乐	
初级佛学/应用文/簿记		佛乘宗要论/国/英/华文		社会学/座谈会		唯识/中论/英文/国文	
唯识学/止观禅要/演讲		唯识三字经/佛学纲要/修观					
1975 年							
初级, 共 12 科 (3 科语文, 4 门世学, 5 门佛学)		初中, 共 15 科 (3 科语文, 4 门世学, 8 门佛学)		中级, 共 14 科 (3 科语文, 3 门世学, 8 门佛学)		深造班, 共 11 科 (3 科语文, 3 门世学, 5 门佛学)	
佛教史	梵呗/音乐	唯识三字经/梵呗	英文/国文	普门品/历史	梵呗/音乐	金刚经	西洋哲学
佛学入门	华文/书法	学佛行仪/佛史	华文/演讲	佛学教本	华文/书法	中论/唯识	华文/音乐
学佛行仪	英文/国文	入门手册/弥陀经	书法/数学	佛教史/唯识	英文/国文	社会学	国文/英文
数学/座谈	历史	劝发菩提心/音乐	历史	学佛行仪	演讲/座谈	起信论	座谈会
1976 年							
中级一, 共 13 科 (3 科语文, 4 门世学, 6 门佛学)		高中一, 共 19 科 (3 科语文, 5 门世学, 11 门佛学)		深造班, 13 科 (3 科语文, 4 门世学, 6 门佛学)			
佛教史/历史	遗教经/梵呗	弥陀经/初级佛学		佛乘宗要论/国文		行愿品/音乐	教育心理
佛学教本/书法	教观纲宗/簿记	唯识学/佛学纲要		弥勒上生经		起信论/演讲	孔孟思想
八识规矩/华文	英文/国文/音乐	中级教本/应用文		修观/华文/演讲		唯识三十颂	止观禅要
		止观禅要/文学史		英文/音乐/书法		人生佛教/簿记	英/国/华文
		唯识三字经/簿记					
1977 年							
初中二, 共 15 科 (3 科语文, 4 门世学, 6 门佛教)				高中二, 共 19 科 (3 科语文, 5 门世学, 11 门佛教)			
历史/唯识三字经		学佛行仪/书法/数学		弥陀经/初级佛学/止观禅要		唯识三字经/佛乘宗要论	
佛史/劝发菩提心		梵呗/音乐/演讲/华文		唯识学/佛学纲要/中级教本		文学史/书法/华/国文	
入门手册/弥陀经		英文/国文		弥勒上生经/修观/英文		应用文/音乐/演讲/簿记	

1978年					
预备班, 共10科 (3科语文, 3门世学, 4门佛学)		初中三, 共11科 (3科语文, 4门世学, 4门佛学)		高中二, 共18科 (3科语文, 3门世学, 12门佛学)	
善生经佛学	华文/音乐	阿弥陀佛经	华文/演讲	阿弥陀佛经/唯识三字经	唯识三十颂/音乐
学佛行仪	书法	佛史/书法	历史/音乐	弥勒上生经/六祖坛经	般若经 /起信论
禅林宝训	英文/国文	唯识三字经	算术/英文	劝发菩提心/止观坐禅法要	华/国/英文/簿记
梵呗/算术			国文	高级佛学教本/修禅/书法	演讲
1979年					
初中一, 共13科 (3科语文, 3门世学, 7门佛学)		高中一, 共15科 (3科语文, 3门世学, 9门佛学)		深造班, 共16科 (3科语文, 3门世学, 10门佛学)	
佛学文选/佛史	音乐/书法	金刚经/佛史	人生佛教真义	六祖坛经/禅修	维摩诘经/因明学
阿弥陀经/梵呗	国英/华文	百法明门论/华文	书法/演讲/簿记	唯识学/中观论	人生佛学/演讲
初级佛学教本	华语会话	唯识学/成佛之道	英文/国文/音乐	起信论/应用文	教育心理学/音乐
佛学入门手册	数学/演讲	中级佛学教本	证道歌	天台四教仪	华/英/国文
1980年					
初中一, 共14科 (3科语文, 4门世学, 7门佛学)			预备班, 共15科 (3科语文, 4门世学, 8门佛学)		
佛学文选/佛史	佛学入门手册	佛学入门手册	华语会话		
阿弥陀经/梵呗/演讲	华文/书法/数学	善生经/百喻经/演讲	华文/国文/英文		
初级佛学教本/华语会话	国文/英文/音乐	学佛行仪/法句经/数学	佛学/梵呗/音乐/书法		
1981年					
初中三, 共15科 (3科语文, 4门世学, 8门佛学)		高中三, 共16科 (3科语文, 4门世学, 9门佛学)		高中一, 共14科 (3科语文, 4门世学, 7门佛学)	
佛史/梵呗/书法	华语会话	成佛之道/唯识学	教育心理学	讲百法明门论	金刚经/佛史
佛学教本/禅坐	劝发菩提心文	佛地经论/佛史	书法/簿记/音乐	人生佛教真义	书法/演讲
唯识三字经	音乐/数学	理趣般若/禅坐	戒律学纲要	成佛之道/音乐	英/国/华文
佛学课本/演讲	英/国/华文	人生佛教真义	华/国/英文/演讲	中级佛学教本	唯识学/簿记
1982年					
初中一, 共16科 (3科语文, 3门世学, 10门佛学)			高中一, 共16科 (3科语文, 2门世学, 11门佛学)		
初级佛学教本	弥陀经/梵呗	佛学入门手册	法华经普门品	佛乘宗要论/音乐	唯识学/簿记
佛法僧义广论	法句经/历史	演讲/音乐/数学	唯识二十颂/佛史	佛地经论/法华经	四十二章经
行愿品/佛史	沙弥律仪	华/英/国文	佛法概论/演讲	中级佛学教本	华/英/国文

1983 年					
初中二, 共 17 科 (3 科语文, 3 门世学, 11 门佛学)			高中二, 共 17 科 (3 科语文, 3 门世学, 11 门佛学)		
初级佛学教本	法句经/数学	沙弥律仪	佛法概论	法华经普门品	佛乘宗要论
佛史/沙弥律仪	佛学入门手册	梵呗/历史	英/巫/华文	唯识学佛地经	四十二章经
佛法僧义广论	巫/英/华文	弥陀经/演讲	法华经/音乐	佛史唯识二十颂	簿记/演讲
		行愿品/音乐	中级佛学教本	中级佛学教本	佛史/音乐
1984 年					
预备班, 共 12 科 (3 科语文, 2 门世学, 7 门佛学)		初中三, 共 19 科 (3 科语文, 3 门世学, 13 门佛学)		高中三, 共 17 科 (3 科语文, 2 门世学, 12 门佛学)	
初级佛学教本/演讲		十善业道经/弥陀经	华/国/英文	普贤行愿品/佛史	高级佛学教本
佛学入门手册/梵呗		普贤行愿品/法华经	中级佛学教本佛史	戒律学纲要/演讲	心地观经
正信的佛教/善生经		戒律学纲要/数学	初级佛学教本/历史	唯识三十颂/簿记	六祖坛经
学佛行仪/音乐/数学		观无量寿经/音乐	佛学入门手册/演讲	佛法概要/法华经	教观纲宗
华/国/英文		禅林宝训/心地观经	往生净土论讲记	大乘起信论/音乐	国/英/华文
1985 年					
初中一, 共 15 科 (3 科语文, 3 门世学, 9 门佛学)			高中一, 共 16 科 (3 科语文, 2 门世学, 11 门佛学)		
初级教本	弥陀经	四十二章经	心地观经	教观纲宗	百法明门论
佛学入门手册	历史/演讲	普贤行愿品	六祖坛经	佛法概论	中国人史纲
八大人觉经	华/国/英文	十善业道经	大乘起信论	佛史/簿记	唯识三字经
普贤行愿品	数学/音乐		高级佛学教本	演讲/音乐	国/英/华文
1986 年					
初中二(甲), 共 15 科 (3 科语文, 4 门世学, 8 门佛学)		初中二(乙), 共 14 科 (3 科语文, 2 门世学, 8 门佛学)		高中二, 共 13 科 (3 科语文, 2 门世学, 8 门佛学)	
中级佛学/佛学		中级佛学/历史		心地观经/佛学	
百法明门论/演讲		百法明门论		六祖坛经/演讲	
阿弥陀经/历史		佛学读本/音乐		大乘起信论	
普贤行愿品/音乐		普贤行愿品		圆觉经/簿记	
四十二章经/数学		阿弥陀经/数学		高级佛学/音乐	
唯识三字经/华文		禅林宝训/演讲		佛法概论	
禅林宝训/英/国文		唯识三字经		华/国/英文	
		华/国/英文			

1987 年					
预备班, 共 12 科 (3 科语文, 3 门世学, 6 门佛学)		初中三, 共 14 科 (3 科语文, 3 门世学, 8 门佛学)		高中三, 共 13 科 (3 科语文, 3 门世学, 7 门佛学)	
初级教本/公民		往生论/佛学		金刚经/圆觉经	
佛学入门/音乐		法句经/心经		六祖 塔 经/佛学	
学佛行仪/演讲		中级教本		中国哲学概论	
八大人觉经		禪林宝训		中国佛教史	
四十二章经		音乐/演讲		人生佛教/簿记	
英/国/华文/数学		华/英/国文/数学		演讲/音乐	
		遗教经/历史		华/国/英文	
1988 年					
初中一, 共 14 科 (3 科语文, 3 门世学, 8 门佛学)		高中一, 共 13 科 (3 科语文, 3 门世学, 7 门佛学)		深造班, 共 4 科 (4 门佛学)	
初级佛学/历史/英文		佛学概论/演讲		大智度论	
四十二章经/数学		西藏佛教史/簿记		楞严经	
百法明门论/演讲		妙法莲华经 英/国文		中论	
佛学入门手册/华		教观纲宗/唐诗/音乐		唯识二十颂	
弥陀经/善生经/国文		高级佛学教本/华文			
佛说孛经钞/音乐		愿发菩提心文			
1989 年					
初中二, 共 13 科 (3 科语文, 3 门世学, 7 门佛学)			高中二, 共 15 科 (3 科语文, 3 门世学, 9 门佛学)		
初级教本/弥陀经			佛学概论/教观纲宗		
基础佛学/历史			中国佛教史/国/英文		
唯识三字经/华文			观无量寿经/法华经		
印度佛教史/数学			高级教本/成佛之道		
普贤十愿/演讲			大乘起信论/唐诗		
国文/英文/音乐			簿记/演讲/乐音/华文		
1990 年					
预备班, 共 13 科 (3 科语文, 2 门世学, 8 门佛学)		初中三, 共 15 科 (3 科语文, 3 门世学, 9 门佛学)		高中三, 共 15 科 (3 科语文, 2 门世学, 10 门佛学)	
初级教本/梵呗	四十二章经	八识规矩颂/数学	普贤行愿品	维摩诘经/法华经	经典介绍/演讲
佛学入门手册	八大人觉经	中国佛教史/历史	大乘广五蕴论	唯识三十颂/静坐	印度佛教史
佛法僧义广论	数学/音乐	基 楚 佛学/演讲	中级教本/静坐	百法明门论	成佛之道/音乐
遗教经/演讲	华/国/英文	印度佛教史/音乐	英/国/华文	大乘起信论	英/国/华文/簿记

资料来源: 马来西亚佛学院网页, 2015 年 1 月 19 日阅自 http://www.mbi.edu.my/de_education/DaySchoolSyllabus.html

附录表二：1990年前毕业于佛学院的出家众名单及动向

序	法号	毕业级别（年份）	毕业后动向	毕业前所居寺
1	释厚贤 （证能）	初级班（1972）	沙叻秀法华庵住持（1975-） 曾任雪隆分会财政（1977-1988）、副财政（1989-1997，2004-2009）、副主席（1998-2000）、委员（2001-2003）、副总务（2016-2018） 马佛总副财政（1977-1979，1980-1982，1983-1985，1986-1988） 马佛总副慈善主任（1995-1997） 马佛总慈善主任（1998-2000） 马佛总联络主任（2004-2006，2007-2009） 马来西亚僧伽总会理事副会长（2010-2013） 马佛总副总会长（2010-2012，2013-2015，2016-2018） 马来西亚僧伽总会理事监察员（2013-2016）	沙叻秀法华菴
2	释厚现 （证实）	初级班（1972）	不详	沙叻秀法华菴
3	释厚根 （证本）	初级班（1972）	雪隆一带弘法 曾任雪隆分会委员（1989-2003）	沙叻秀法华菴
4	释厚莲	初级班（1972）	于芙蓉常明庵协助处理庙务	芙蓉常明菴
5	释厚照 （证空）	中级班（1972）	雪隆一带弘法 曾任雪隆分会弘法（1977-1997）、副总务（1998-2000）、总务（2001-2003） 马佛学院教师（1997-2005） 马佛总副弘法主任（1974-1976，1986-1988，1989-1991，1998-2000） 马佛总副教育主任（1992-1994） 马佛总弘法主任（2000-2003）	沙叻秀法华菴
6	释日明	初中班（1975）	不详	槟城观音寺
7	释日进	高中班（1975）	不详	砂拉越佛教会
8	释会道	高中班（1975）	不详	槟城香严寺
9	释元治	初中班（1978）	不详	槟城佛学院

10	释日贤	初中班（1978）	槟城观音寺负责人 马佛总执行委员（1992-1994） 马佛总补选信理员（1998-2000） 马佛副总总务（2001-2003） 马佛副总财政（2004-2006） 槟城极乐寺开山 118 周年庆 财政（2009）	槟城观音寺
11	释悟诚	初中班（1978） 高中班（1981）	不详	怡保莲胜堂
12	释觉定	高中班（1978）	不详	槟城佛学院
13	释继禅	高中班（1978） 进修班（1981）	马佛学院教员（1988-1996） 怡保定慧居住持	槟城三慧讲堂
14	释继贤	高中班（1978） 进修班（1981）	不详	槟城三慧讲堂
15	释明义	初中班肄业（1978）	不详	不详
16	释继能	初中班肄业	不详	不详
17	释文如	高中班（1981）	槟城蛇庙	槟城三慧讲堂
18	释理宗	初中班（1981） 高中班肄业（1984）	九莲精舍	马六甲
19	释悟常	初中班（1981）	不详	极乐寺
20	释继法	初中班（1981）	不详	槟城三慧讲堂
21	释继庄	初中班（1981） 高中班（1984）	不详	槟城三慧讲堂
22	释悟藏	初中班（1981）	不详	槟城极乐寺
23	释开圣	高中班（1984）	不详	Burmah Road
24	释康谛	初中班（1984）	不详	Burmah Road
25	释锦乐	初中班（1984）	不详	Kuantan
26	释继昌	初中班肄业（1984） 高中班（1987）	马佛总执行委员（1998-2000）	槟城三慧讲堂
27	释继光	初中班（1984）	不详	槟城三慧讲堂
28	释继芳	初中班（1984） 高中班（1987）	不详	槟城三慧讲堂 新加坡佛缘林
29	释继安	高中班（1987）	不详	槟城三慧讲堂
30	释继尊	高中班（1987）	台湾华严专宗学院毕业（年份 不详） 任教马佛学院（1991-） 马佛学院教务主任（1997-） 马佛总弘法主任（1995-1997） 马佛总教育主任（2004-2006， 2007-2009，2010-2012） 马佛总总务（2013-2015， 2016-2018） 马僧伽总会查账（2013-2016）	槟城三慧讲堂
31	释妙祥	初中班（1987）	不详	八打灵再也园林 小筑

32	释慈玄	初中班（1987）	不详	槟城法华严
33	释意空	初中班（1987） 高中班（1990）	槟城法华岩管理人	槟城法华严
34	释自理	初中班（1987）	不详	槟城极乐寺
35	释继应	初中班（1987）	不详	新加坡佛缘林
36	释开祥	初中班（1987） 高中班（1990）	居林佛恩寺住持	槟城洪福寺
37	释继传	初中班（1987）	槟城三慧讲堂住持（1997 至今） 马佛总副财政（2001-2003， 2010-2012）	槟城三慧讲堂
38	释继雄	初中班（1987） 高中班（1990）	1994 年毕业于台湾中华佛学 研究所 还俗	槟城三慧讲堂
39	释继峰	初中班（1987）	还俗	槟城三慧讲堂
40	释智航	初中班（1987）	不详	怡保静莲菴
41	释智文	初中班（1987）	不详	怡保静莲菴
42	释空明	初中班（1987）	不详	昔加末观音堂
43	释妙道	初中班（1987） 高中班（1990）	不详	新加坡法施林
44	释光辉	初中班（1987）	不详	怡保东莲小筑
45	释光定	初中班（1987）	怡保弘法 马佛总副教育主任 （2013-2015）	怡保东莲小筑
46	释章立	初中班（1990）	不详	吉隆坡金龙山万 佛寺
47	释继本	初中班（1990）	不详	槟城三慧讲堂
48	释开弘	初中班（1990）	毕业于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 （1994？） 马佛学院教员（2000-2005）	槟城洪福寺
49	释开贤	初中班（1990）	不详	槟城法宝山
50	释贤观	初中班（1990）	槟城极乐寺开山 118 周年庆 财政（2009） 槟城极乐寺住持（2014-）	槟城极乐寺
51	释开扬	初中班（1990）	居林法雨精舍住持 主持各大专兼中学佛学会生 活营及静修活动 曾受南传戒与北传戒 监狱、戒毒所、感化院布教师 （1990 —1998） 马佛总青年组副主任 （2013-2015）	槟城洪福寺
52	释开根	初中班（1990）	槟城宝誉堂周日学校校长	槟城洪福寺
53	释开宝	初中班（1990）	马佛学院教员（1997-2002） 马佛学院学务主任 （1997-1999，2003-2007）	槟城洪福寺

			舍监（2006）	
54	释开铨	初中班（1990）	不详	槟城洪福寺
55	释真一	初中班（1990）	柔佛彼咯观音寺	彼咯观音寺
56	释章妙	初中班（1990）	不详	吉隆坡金龙山万佛寺
57	释空果	初中班（1990）	至海外问学（1991-1998） 回怡保菩提心服务（1998-）	怡保菩提心
58	释真叁	初中班（1990）	不详	彼咯观音寺
59	释传愿	初中班（1990）	不详（台湾？）	巴生普惠堂
60	释会贤	初中班（1990）	不详	槟城香严寺
61	释真如	初中班（1990）	马来西亚佛教僧伽总会理事 （2013-2016）	彼咯观音寺
62	释永贤	初中班（1990）	不详	槟城东莲阁
63	释空性	初中班（1990）	不详	昔加末观音堂
64	释真贤	初中班（1990）	不详	彼咯观音寺
65	释开恩	高中班（1990）	马佛学院教员（1994-1996） 槟城法宝山释迦僧伽林住持	槟城洪福寺
66	释开照	高中班（1990）	监狱弘法 办大专生佛学营度化青年 加影寂静园创办人及住持 （1999-2006）	槟城洪福寺
67	释开顺	高中班（1990）	全马弘法开示 儿童及青少年生活营弘法 马佛总副青年组主任 （2010-2012）	槟城洪福寺
68	释慧理	高中班（1990）	不详	槟城极乐寺
69	释见智	进修班（1990）	不详	吉隆坡德贤精舍

资料来源：整理自 1972 至 1990 年马来西亚佛学院毕业刊（共七届）；
〈沙叻秀法华庵〉，香港宝林禅寺网，2014 年 6 月 25 日阅自
<http://hk.plm.org.cn/gnews/2010829/2010829204765.html>；
〈释开扬法师简介〉，马来西亚佛教资讯网，2014 年 6 月 26 日阅自
<http://www.mybuddhist.net/cms/damafojiao/fojiaorenwu/fashi/3152.html>；
〈马佛总雪隆分会理事会〉，马来西亚佛教资讯网，2014 年 6 月 25 日阅自
<http://www.mybuddhist.net/cms/damafojiao/zuzhidanwei/fotuansimiao/KLSEL/lishi/3939.html>；释继传，2014；〈第十九届理事会（2016-2018）〉，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网站，2016 年 12 月 28 日阅自
<http://www.malaysianbuddhistassociation.org/index.php/2009-03-31-06-59-03/2009-03-31-07-02-49.html>；〈马佛总雪隆分会改选-明吉法师蝉联主席〉，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网站，2016 年 12 月 28 日阅自
<http://www.malaysianbuddhistassociation.org/index.php/2009-04-01-01-11-38/2009-04-02-04-27-22/1347-2016-04-21-07-41-17.html>。

附录表三：1990 年以前修读佛学院期间或毕业后出家的学生名单

序	法号	在家姓名	毕业级别 (毕业年份)	出家 年份	毕业后动向
1	释继和	谢近和	中级班 (1972) 深造班 (1975)	1974	不详
2	释继仁	谢善玲	中级班 (1972) 深造班 (1975)	1976	获香港华文大学文学士学位, 回马佛学院服务 (1983-2000) 马佛总副弘法主任 (1986-1988, 2001-2003, 2010-2012) 马佛总弘法主任 (1983-1985, 1989-1991、1992-1994, 1998-2000) 马佛总委任委员 (2004-2006) 马佛总执行委员 (2007-2009)
3	释演慈	叶瑞卿	中级班 (1972) 深造班 (1975)	1976	获珠海研究院硕士学位; 任香港罗汉寺及佛教愍生讲堂住持
4	释继慧	梁丽娟	中级班 (1972)	1975	马佛学院教员 (1976-1978) 马佛总副教育主任 (1986-1988) 马佛总文书 (1989-1991) 马来西亚僧伽总会副会长 (2010-2013) 马来西亚僧伽总会理事 (2013-2016)
5	释继恩	李爱贞?	高中班 (1975) 进修班 (1976)	1974	不详
6	释继圆	林少珠	高中班 (1975) 进修班 (1976)	1975	不详
7	释继宣	李瑞丽	高中班 (1975) 进修班 (1976)	1975	南马弘法
8	释继灯	梁惠瑜	进修班 (1976 年 10 月)	1976 7 月	台湾能仁佛学院毕业 (1979 年 12 月) 马佛学院教员 (1980-1984, 1988-1990, 1997-2008 ?), 1980-1982, 1999-? 马佛总副弘法主任 (1989-1991, 1992-1994)
9	释慈行	许稳养	高中班 (1978) 进修班 (1981)	2001	马佛学院教员 (许稳养 1985-2000, 释慈行 2001-2002) 马佛总副文书 (1989-1991)
10	释继欢	符秀娟	初中班 (1978) 高中班 (1981)	1977	南马弘法 创办柔佛新山法霖学苑 (1993) 马佛总副弘法主任 (2001-2003) 马佛总弘法主任 (2004-2006, 2007-2009, 2010-2012, 2013-2015)
11	释继证	暂缺	1981 年到佛学院念书 高中班 (1987)	1985	台湾华严宗学院大学部毕业 (年份不详) 马佛学院舍监 (1991-) 马佛总副教育主任 (1995-1997) 马僧伽总会理事 (2010-2013, 2013-2016)

					马佛总教育主任（2013-2015，2016-2018）
12	释显豪	何显豪	初中班（1987） 高中班（1990）	1987-1990 间	不详
13	释继薰	杨思慧	初中班（1990） 高中部（1993）	1993	马佛学院教员 （1997-2002）
14	释本空	暂缺	1980-1984 年就读 马来西亚佛学院	1986	台湾圆光佛学研究所毕业（年份不详） 马佛学院教员（2003-2008？）
15	释海静	暂缺	第一届毕业生 （1972） *1979 年受具足戒	1979 年或 之前	台湾能仁佛学院进修三年（年份不详） 吉打州慧音法苑住持 槟城亚依淡普华堂住持 吉中美农慧音法苑分苑住持 马佛总副财政（1992-1994，1995-1997） 马佛总副查账（1998-2000） 马佛总副文书（2001-2003） 马佛总财政（2004-2006，2007-2009） 马佛总福利与慈善组主任（2010-2012） 马佛总执行委员（2013-2015） 马佛总副总会长（2016-2018）
16	释静玄	暂缺	1989 年入读初中 进修班（1993）	1993/ 1996 ?	马佛学院教员（1994-1999） 曾为马佛青弘法法师

资料来源：整理自 1972 至 1990 年，2003-2007，共八届的马来西亚佛学院毕业刊；释竺摩编述，释继程整理（1984），〈竺摩法师简谱初稿〉，收入释继程主编：《大马佛教研究》第一集，槟城：马佛青总会佛教文摘社，页 60；〈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网站北传法师资料〉，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网站，2014 年 6 月 17 日阅自

<http://www.malaysianbuddhistassociation.org/index.php/2009-04-30-07-04-26/762-2010-06-11-02-28-53.html>；〈第十九届理事会（2016-2018）〉，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网站，2016 年 12 月 28 日阅自 <http://www.malaysianbuddhistassociation.org/index.php/2009-03-31-06-59-03/2009-03-31-07-02-49.html>。

继传法师访谈录（一）

受访者姓名:	继传法师（简称“传”）
采访者姓名:	黄文斌师（简称“黄”） 陈慧倩（简称“陈”）
日期:	2012年10月6日
时间:	中午12时45分至下午1时10分
地点:	槟城三慧讲堂

黄：感谢继传法师在“海潮汇”大汇演之前抽空接受采访。本次访谈的目的，主要是想了解您与竺摩法师相处的细节，以及您接任住持前后的详情。

竺摩法师请您接任住持的时候，您是否在国外？

传：我在新加坡。在这之前，我在澳洲待了一段日子。

黄：去澳洲之前，您在竺摩法师身边待了多少年？

传：在师父身边不长。我是在1986年来到三慧讲堂，1994年去澳洲。

黄：还没有去澳洲之前，是在佛学院念书吗？

传：是的，当时在佛学院念书。

念完佛学院后，禅修在那时刚好也很热门，因此我想到泰国去禅修。师父建议我到香港念哲学系，因我们可以用马来西亚佛学院的文凭，申请在香港念哲学系。我说，我对读书没有什么兴趣，不想读了。师父就对我说，如果你不读书，也不要再去泰国了，留下来讲堂服务。

师父当时年纪也大了，自己还年轻，才三十岁左右，觉得没关系，就留下来常住帮忙了。

黄：所以，您是在1986年来到三慧讲堂，1994年才去澳洲？

传：嗯，去了澳洲七八个月左右，但师父之后却叫我回来一阵子。当时是想到师父叫我回来，我也想收拾留在讲堂的书本、细软等，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又跑到新加坡去。

那时候，师父的身体就时好时坏了。师父与几位理事及当家继藏法师商量退位事，结果选到我担任住持。之后，理事成员及当家都有跟我通电话，我都拒绝他们。后来师父亲自打电话给我，我不好意思拒绝，就只好回来了。

基本上，师父栽培弟子后，并不会把他们留在身边，会让大家随着自己的兴趣自主学习。这种制度可以成就人，但负责人会很辛苦，要对内对外。由于身边没有人，很难做事，我接任住持后一度觉得非常辛苦。

竺公是在1997年退位，2002年圆寂的。

黄：竺摩法师有没有订下一些规矩，让讲堂的弟子们遵守呢？

传：一般上，寺院都是有规矩的，都要做早晚课，帮忙寺院清洁卫生、煮饭等，生活作息要配合常住定下的规矩。

黄：除了以上所说的，竺摩法师还有订下什么规则吗？

传：我们这里的规矩是：佛友或外面的人往生，我们若有过去帮忙进行丧礼仪式，不能开口跟对方谈红包钱的多寡，而是让他们随喜供养。

陈：师父，您刚刚提到，您想去学禅修时，竺摩法师不支持您的决定。那是否可以说，竺摩法师不重视禅修呢？

传：师父也不是说不重视禅修。

禅修需要先有佛法基础，否则在禅修时遇到瓶颈也不懂得解决。

黄：我看过竺摩法师的记录，他有禅修的经验和体验，但比较倾向信愿，如观音法门、地藏法门等。不过，他很少有禅修方面的文章。

传：因为佛教的修行离不开闻思修，若无佛学的基础，就算禅修也得不到什么益处。把重点放在教育，建立正知正见，有了基础再禅修会比较理想。

*本人（下方签名者）确定以上访谈内容记录正确，并同意授权本采访稿内容可作研究、征引等学术用途。

受访者姓名：释继传

受访者签名：(释继传)

日期：21-11-2016

继传法师访谈录（二）

受访者姓名:	继传法师（简称“传”）
采访者姓名:	黄文斌师（简称“黄”） 陈慧倩（简称“陈”）
日期:	2013年1月28日
时间:	上午11时20分至中午12时10分
地点:	槟城三慧讲堂

陈：这次访谈的主题，是想了解三慧讲堂例常活动的规模。请问继传师，三慧讲堂目前是否有英文佛学班？

传：最近刚好开班了。

陈：之前是没有的？

传：目前刚好开班了，之前是没有的。刚好有位师兄弟懂得英文，所以就开班了。不过，他们是以双语的方式来进行活动的，所以非英文教育背景的人也可以来上课。

陈：竺摩法师没有往生之前，是否负责指导三慧讲堂周日义校的学生呢？

传：周日义校有独立运作的义务教职员组织，不需要师父去管理或教课。师父只是董事长的身份，每年毕业典礼，他就会去致词，偶尔也开示大众。他们若有什么问题，也会请示师父。

黄：周日义校的理事会是怎样产生的？

传：他们有本身的教职员，也有一个校长，会自己去安排教务主任等职务，也会自己想办法去找老师人选。这个传统从竺摩法师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

黄：所以，三慧讲堂只是提供场地而已？

传：是的。

陈：所有教职员都是在周日的时候义务过来帮忙？

传：是的，都是义务帮忙的。

陈：跟以前相比，周日义校现在的规模如何？

传：跟过去比较，现在佛教团体到处林立，所以儿童班的人数就稍微减少了。

二十年前，佛教团体相当少，但现在却增加了很多佛教团体。以目前来说，周日义校的硬体设备已经比以前好，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设备、因缘，慢慢增加学生人数。

现在的竞争激烈，如果办学的观念没有改变，就会被淘汰。因此，周日义校也在调整办学模式。

陈：周日义校的通讯刊物上有“种子班”、“幼苗班”等……

传：这是他们刚调整过的班别。

陈：人生佛教中心又有怎样的发展面貌？

传：以前竺摩法师还在的时候就成立了，当时附属于三慧讲堂。不过有关组织过后另行注册，现在已是独立团体，不再属于三慧讲堂，但三慧讲堂仍借出场地让他们进行活动，但已没有以前活跃。

黄：这个组织现在还存在吗？

传：还存在。在竺摩长老教育中心还没有盖好的时候，他们就来问我可不可以继续借用场地；我答他们可以，没有问题。

黄：他们自己没有会所吗？

传：他们没有会所，以前成立时都用这里讲课。

陈：至于竺摩法师基金会，又是怎么运作的呢？

传：每年拨款一万元给马来西亚佛学院，至于佛学院以外的申请者，则每年获得拨款一千元，包括在大学升学的，每年有十多位学生申请。若有自然灾害，也会拨一些出去协助救灾。每年对外拨款大约三万元。

黄：是否用基金会派发的利息来颁发拨款？

传：不是。

黄：他们有注册成为基金会吗？还是由几个善心人士负责打理？

传：没有注册，但是有成立一个理事会。

黄：平时有去筹款吗？

传：没有对外筹款。

竺摩法师基金会是以本金发放奖学金，在钱方面，理事会会负责想办法。早期竺摩法师还在的时候，每年的庆生，都会把部分贺仪捐给基金会。

该基金会早期也跟狮子会配合，帮助病患者。

陈：那么现在还有跟狮子会合作吗？

传：现在只能处理本地的奖学金申请，没有继续合作了。

陈：竺摩法师曾在《无尽灯》中透露，本身对佛教教育的发展非常担忧，因现在已经进入了“末法时代”，但有些法师又似乎不太认同“末法”的观点。竺摩法师私底下是否有跟弟子们透露更多这方面的担忧？

传：所谓的末法，是佛法不普及。竺摩法师认为，若能让更多人了解佛法，就可以解决末法的问题。

黄：基本上，弘法人员还是不够。

传：马来西亚的确蛮缺乏弘法人员。

陈：竺摩法师在很多道场，如怡保菩提心、吉打佛法林等，都有着“住持”的身份。他在这些寺院中的角色，是否也如周日义校一样，没有在管事的？

传：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主要的负责人，在管理上有问题时就会请示师父。师父会指点他们，但会让他们自行去处理。若竺摩法师有到这些寺院的话，也会顺便讲课。

陈：所以，竺摩法师一生的志愿，也在于为本地栽培弘法人员？

传：是的。创办佛学院也与这个志愿有关系。

陈：那么，他对弟子们的要求也是这样吗？希望他们将来可以出来弘法？

传：是的。师父也会把弟子送到佛学院念书。一般上，他都是希望弟子们可以出来讲课，为佛教服务。以我本身的经验为例，在佛学院读书期间，若有佛教团体需要请人讲课，他老人家会鼓励我们出去讲课，多讲多学习。

陈：早期您的师兄弟有出国深造吗？

传：有的。

陈：那么，竺摩法师会安排每个常住的工作吗？

传：不会，由当家处理，有问题才请示他老人家。

陈：您升座后，竺摩法师跟您的互动是怎样的？是完全放手还是会从旁指导？

传：师父很难得，很难得。他是完全放手的。

我升座那天，他就完全退位了。当天有很多信众供养竺摩法师，我把果仪转交给他，结果他跟我说，“以后不要交钱给我，全部归公家，开张收据就好”。有时候，我去找师父谈一些东西，他说，“你认为对的就去做”，完全放手，因此也曾有人质疑师父的做法。师父回答，“我什么都知道了，不要再问我”，很难得。我跟他的年纪相差四十岁以上，但他退位后，就真的完全放下，退下不管事了。

陈：竺摩法师是否也曾写书法，或画画送给您呢？

传：师父曾送我两幅对联。

黄：这两幅对联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传：给我鼓励，希望我好好为佛教服务。

陈：竺摩法师还是住持的时候，三慧讲堂是否开放外人办生活营？

传：早期的硬体设备不够，都只能供自己用，因此没有开放给别的团体在三慧讲堂办生活营。

*本人（下方签名者）确定以上访谈内容记录正确，并同意授权本采访稿内容可作研究、征引等学术用途。

受访者姓名：释延涛

受访者签名：延涛

日期：21-11-2016

继传法师访谈录（三）

受访者姓名:	继传法师
采访者姓名:	陈慧倩
日期:	2013年4月8日
时间:	上午8时至8时50分
地点:	槟城三慧讲堂

问：请问继传法师，您手上是否有竺摩法师在槟城菩提中学时期的资料？

答：没有。不过师父是自1954年担任菩提中学佛学老师的，所以你可以尝试从菩提中学毕业刊中了解更多详情。师父1954年到来，担任菩提中学老师十年，可能再多查十年的毕业刊，到1975年，资料应该也差不多了。

问：竺摩法师在1954年南来的时候，是属于短期或长期的性质？看竺摩法师当年的文章，《无尽灯》依然留在香港让其他法师代为管理，他似乎来得很匆忙。

答：原本的打算，是过来当佛学老师而已。当时菩提学校要找一个佛学老师，法舫法师就推荐竺摩法师。菩提学校当时的校长王弄书居士，就去邀请师父。师父先到曼谷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塔落成仪式，之后就过来菩提中学了。

后来本地金星长老等人，也邀请师父一起筹备马佛总的组织，之后又选他担任主席。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计划又起变化，师父也逐渐在马来西亚生根了。

问：竺摩法师原本驻锡菩提学院，因为信众太多而搬到附近的竺园精舍。请问您是否知道更多详情？

答：那里毕竟是学校，太多信众来找他，总是不方便。王弄书校长也很帮助师父，就在学校对面找一间房子，联合其他佛友一起来供养师父。

后来信众越来越多，上中下各层次善信都有。师父是佛教界公认有才华的出家众，不只是会讲佛法，在诗词、画画、书法方面都很出色。

问：竺摩法师在菩提中学讲的课多不多？

答：一星期中，每班都有一节的佛学课。

问：佛学院还没有成立之前，竺摩法师会定期在三慧讲堂讲经吗？

答：有，师父每逢星期六定期讲课。海外的长老若刚好来到槟城，就会顺便请他们来讲课。

问：您曾说过，您过来一年后，竺摩长老就没有讲课了是吗？

答：那是佛学院的课。我在那里求学一年后，师父就没有讲课了，但有继续当院长。至于在三慧讲堂，因为有打佛七的缘故，他还是有开示的。

问：所以，竺摩法师在佛学院只讲课到1987年？

答：是的。

问：佛学院成立之后，竺摩法师是否都把平日的的时间花在佛学院，周末则在三慧讲堂讲课？

答：一般都在三慧讲堂和佛学院走动，假期的时候就往新加坡讲课与休息。

问：佛学院的院训是“慈慧勤舍”，那三慧讲堂是否也有相通的理念？

答：那是可以相通的。如“勤”，闻思修或慈慧舍，都需要精勤努力才能得到的。谈到“慧”，听闻佛法有听闻佛法的智慧，思维佛法有思维佛法的智慧，修行有修行的智慧。闻思修的实现也离不开慈悲及施舍或舍掉的学习，所以是可以相通的。

问：竺摩法师很注重弘法人员，那他早期是否有特地开班培养弘法人员？或是把他们送出国？

答：师父没有特地开办培养弘法人员，但会以另一种形式鼓励我们多讲，有机会就讲，从中获取经验，教学相长。上个月 23、24 日，我请了马佛青以前的总会长梁国兴居士过来讲课。他以前也是三慧讲堂周末念佛会的佛友，唯悟法师也曾是佛友。梁国兴曾经透露，“我今天能讲课，是因为竺摩法师有一天突然宣布，下周开始由梁国兴来讲课”；讲了一次，发现自己能够胜任，就继续讲。

问：早期听课的信众有多少？

答：那时候的信众很多。佛教团体也很少，也没有办讲座的课程，所以信众自然就很多了。

问：早期在槟岛一带……

答：当时这里是有很多信众的。现在到处都有寺院和佛教团体，信众就分散了，但那也是一种好现象。

问：您也曾经在三慧讲堂讲课吗？

答：有的。以前都是大家轮流讲，维持相当久的时间。

问：竺摩法师会在场监督或提供意见吗？

答：会的，他如果有空，就会旁听给意见。

问：事先需让他知道内容吗？

答：不必先让他知道。

问：竺摩法师的弟子中，还在弘法的多不多？

答：相当多。

问：多数在国内还是国外呢？

答：国内国外都有。举例来说，国内的有继程法师、继尊法师、继仁法师、继欢法师、继灯法师；国外的，新加坡有继光法师、继闻法师，美国有继如法师。

问：谈到马佛总的职位，我这里有一个跟竺摩法师有关的问题。竺摩法师没有担任主席之后，就转而担任监察主任了。监察主任的任务是什么呢？

答：调解僧众或寺院之间的误会。这个职务是由佛总委任的。

问：三慧讲堂有一个三慧佛法研修会，是否还活跃呢？

答：还活跃的。

问：它是一个怎样的组织？

答：它是让年轻人来学习佛法的一个团体。

问：竺摩法师早期是否有担任导师呢？

答：有的。

问：现在是由您担任了？

答：是的，他们都会安排我每个星期六来为他们讲课，有定期活动。

问：之前竺摩法师也常常替他们讲课吗？

答：早期是有的，后来年纪大了，就放手让我们学习讲课了。现在的会员，能力也不错，资深的会员已经可以给资浅的会员讲课了。

问：所以研修会是三慧讲堂里最活跃的组织了？

答：算是不错了，希望能接引更多年轻人过来学佛。

问：感觉上，槟岛的佛教活动相当活跃，到处都有听经、研修的机会了？

答：现在不只是三慧讲堂在做，其他的寺院或佛教团体也在做。

问：念佛会是怎样进行的？

答：早期讲到周末念佛会，就会有很多信众过来，是由老和尚亲自主持的。先念一部《弥陀经》，然后才来开示佛法。

问：竺摩法师在 1954 年的《无尽灯》透露，王弄书居士等人希望竺摩法师在抵步槟城后，到麻风病院和监狱讲课，但后来竺摩法师的文章就没有对这方面多加叙述了。请问继传师，竺摩法师是否曾到这两个地方弘法？

答：我不清楚他有没有去。但我猜想，应该是有去麻风病院的。现在比较广为人知的，是本道老和尚有去麻风病院。或许你需要查看 1954-57 的《无尽灯》了。

问：接下来这个问题与竺摩法师没有很大关系，纯粹出于我本身的好奇。那就是：最近几年的出家众会不会越来越少？

答：的确是越来越少。

问：我曾听说，1980 年代有很多人出家。

答：也的确是如此。

问：您早期在哪里学佛？

答：早期是在新加坡学佛的，后来就到佛学院读书。那时我有意出家，就被介绍给竺摩法师。当时住三慧讲堂，到佛学院上课。

问：您是什么时候出家的？

答：1986年农历九月十九日。

问：所以，您在佛学院读书的时候，还是家居士，之后才出家的。

答：是的。

问：您在佛学院读了多久？

答：念完了初中部，再念高中，不过没有修读高中部最后一年的课程。

问：竺摩法师常常会说佛法不离世法。所谓的世法，是不是要常常关心时事发展，不要只顾自己？

答：佛法是不离世间法的，面对或处理世间的事情过后，不生起我执，就是佛法了。

问：您觉得竺摩法师对您最大的影响在哪一方面？

答：尽量让弟子去接触佛法，建立起对佛法的正知正见，也让弟子们在修行方法上，有自由的选择。

*本人（下方签名者）确定以上访谈内容记录正确，并同意授权本采访稿内容可作研究、征引等学术用途。

受访者姓名： 释纯传

受访者签名： 释纯传

日期： 21-11-2016

继传法师访谈录（四）

受访者姓名：	继传法师
采访者姓名：	陈慧倩
日期：	2014年12月22日
时间：	上午8时30分至9时20分
地点：	槟城三慧讲堂

问：师父好。我想向您了解竺摩法师早期的生活详情。

太虚大师曾经在1935年授予竺摩法师“大厂”一名。竺摩法师是否曾跟你们提起，为什么太虚大师会授予他这个名字？

答：我们推测，竺摩法师一直跟在太虚大师身边，而大师觉得竺摩法师可以帮自己很多忙，两人的思想又能相应，因此很欣赏师父。但是出家制度中，学生跟门下弟子始终有别，大师赐名，可能把师父当成是自己的弟子了。

问：据何建明先生在其著作的说法，竺摩法师曾承继太虚大师的弥勒法脉。承继弥勒法脉实际上有什么意义？

答：应该是要推动弥勒菩萨的法门。

问：根据继旻法师的论文，竺摩法师的法脉为临济宗。临济宗算是禅宗……

答：临济宗算是禅宗其中一个法脉，原因在于我们的上一代是临济派的，很自然的我们也成为了临济派的传承者。这种派别或身份，是继承自上一代的。

虽然竺摩法师源自临济法脉，但在实际修持方面，师父是修阿弥陀佛净土的。

问：修净土的话，竺摩法师一般是怎么修持？

答：他是念佛、诵经、打坐的。

问：竺摩法师有没有跟您提过，太虚大师不太赞同他写诗？

答：这方面我就不太清楚了，并没有看过这方面的资料。

问：竺摩法师是否从年轻开始就身体不好，一直带病弘法？

答：这方面我也不太清楚。但我开始接触他的时候，他的健康状况还可以，到了1990年代后期，才因上了年纪，体力变差，这也是正常的。

问：在1940年代，竺摩法师在定境和梦境中受太虚大师和印光大师引导，分别鼓励他重回丛林和弘法度众生。我想知道，这个句子里头的丛林与弘法度众生的差别在哪里？

答：大丛林里，是有很多出家人一起生活，一起修行，互相磨练。弘法度众生，有自己的专长，如打坐，讲课等，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强项去接引众生。

问：那是否可以说，太虚大师和印光大师给他的指引，是两条不同的修行之路？

答：进丛林是团体生活，也是一种磨练。通过磨练跟考验，人生的经历变得比较丰富后，再去度众生会比较得心应手。因此，太虚大师和印光大师的指引，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

问：竺摩法师是否曾透露他的“愿”是什么？

答：师父一生的重点，主要在佛学院、开示、著作。因此，可以看出他的愿，在推动佛法的教育。

问：所以，在佛学院成立之后，竺摩法师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这里？

答：那时候负责找学生来源、经费，大部分时间的确都花在这里。

问：您是否曾经上过竺摩法师的课？

答：刚来到的时候，是有的。

问：竺摩法师上课情况是怎样的？会不会比较严肃？

答：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刚开始上课的时候会比较辛苦，因竺摩法师说话有乡音，不容易知道他在讲什么，时间久了才能适应。

问：他会派讲义吗？还是他在讲，同学们在底下抄？

答：我们那时上的是《普贤十大愿》，竺摩法师会按着经文讲解，当时都仍然使用黑板，也在板上写字。

问：竺摩法师当时在三慧讲堂讲经的情况又如何？

答：早期偶尔会请其他法师来三慧讲堂开示；1980年代后期之前，也会每周末在三慧讲堂先念《弥陀经》，然后才开示，也让其他居士轮流讲。

问：既然竺摩法师讲话带有乡音，他早期在三慧讲堂弘法时，是否会有困难？

答：早期会找人翻译。

问：在1990年代之后到退位之前，都没有开示了吗？

答：活动型的开示，如讲座等就没有了，但信众私底下来请教的，还是会给予开示。1990年代闭关，算是步入了晚年的自修生活，对外的活动也减少很多了。

问：实际上，闭关对一个有年纪的出家人来说是必须的修行吗？

答：这是因人而异的，但若能通过闭关来提升一个人的修行，也是很难得的。

问：入关和出关都会有隆重的仪式吗？

答：不一定，看个人。

问：竺摩法师退位前后的生活是否有很大的改变？

答：1980年代，善信来求书法，他还会写给对方。出关后，因为年纪比较大，体力比较差，一天要写的话只能写一两幅，不像以前，可以写大半天。宗教仪轨方面，若弟子可以代劳的话，就让他们代劳，外界请竺摩法师开光，也只派出弟子代表。

问：所以，以上的事情都是发生在退位之后吗？

答：是的，以上事情都是发生在退位之后。

问：黄文斌老师特别交代我询问，三慧讲堂大殿的观音像比佛陀像还要大，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答：这与竺摩法师年青时的际遇有关，可以参考简谱。年青时病中有两次特别的遭遇，与观音菩萨及地藏菩萨有关，因此竺摩法师的道场，都有观音菩萨像及地藏菩萨像，乃个人的特殊感应。当时因为病中念佛号而痊愈，因此对观音菩萨的信仰很有信心。

问：晚年的时候，竺摩法师依然有教打七吗？

答：佛七活动方面，师父依然任主七和尚，但实际事务由弟子代劳。打七的时候，他有时不在现场，退位后多数待在新加坡，但我们照样安排他担任主七和尚，弟子担任主七助理。

问：为什么要到新加坡生活？

答：因那里的外缘比较少，找他的人也没那么多，比较容易休息。他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新加坡佛缘林生活，可以好好调养身体。

问：竺摩法师的弟子名单上，弟子们的外号，有“文”，也有“心”，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答：按临济宗法脉名单，应该是“心”；但早期竺摩法师先用了下一辈的“文”，后来统一使用“心”。

问：至于三慧讲堂周日义校，早期是否曾编辑特刊呢？

答：早期应该是有的。但竺摩法师比较少去打理，由一个校长全权组织起来。

问：竺摩法师在佛法研修会担任怎样的角色？

答：担任宗教导师。

问：是否有定期的活动时间？

答：每个星期天都有活动，目前仍在运作。会员都会到三慧讲堂集合，也会办一些课程，偶尔到也到慈善团体作布施。

问：至于周末念佛会，也是由竺摩法师带动吗？

答：是的，也是由竺摩法师带动。若他不在，则由其他法师或居士来讲课。

问：竺摩法师在马来西亚佛学院还有教别的课吗？

答：有的。

问：佛学院的演讲练习是怎样进行的？

答：它是一节课，大家轮流练习演讲。

问：马佛学院曾经安排学生在每周日下午二时在马佛总讲解佛理，您曾经参与这个活动吗？

答：我的年代已经没有这项活动了。

问：我目前在整理一个名单，即1990年之前，佛学院毕业生的名单和出路，想请问您是否了解他们的状况？

答：继贤法师——竺摩法师很早期的弟子。在香港升学后，到美国生活，目前不在马来西亚

理宗法师——马六甲九莲精舍

继能法师——没有印象

继真法师——槟城蛇庙

继法法师——丹绒马林净莲精舍

继庄法师——丹绒马林佛宝林

继昌法师——怡保般若岩一带的道场

继光法师——新加坡清凉精舍

继芳法师——新加坡（另一个精舍）

继安法师——没有印象

锦乐法师——关丹净业林

康谛法师——台湾

悟常法师——槟城圣光精舍

悟藏法师——吉隆坡

明义法师——怡保中和园妙法寺（文墨园附近）

继应法师——新加坡佛缘林（已往生）

继雄法师——毕业于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后来还俗

继峰法师——还俗

光定法师——怡保东莲小筑

问：菩提中学方面，依然是三慧讲堂的空广法师在教课吗？

答：空广法师的身体不太好，现在是研修会青年团团员负责去讲课了。

*本人（下方签名者）确定以上访谈内容记录正确，并同意授权本采访稿内容可作研究、征引等学术用途。

受访者姓名： 释延寿

受访者签名： 延寿

日期： 21-11-2016

郑浩千先生访谈录（一）

受访者姓名:	郑浩千先生
采访者姓名:	陈慧倩
日期:	2015年1月31日
时间:	上午10时至11时
地点:	郑浩千先生工作室

问：郑先生您好。能否先谈谈您亲近竺摩法师的机缘？

答：我认识竺摩法师应该是在1967年左右。

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仰慕者的身份，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曾在裱画店看到竺摩法师的字画。之后，通过老师介绍而认识与接触竺摩法师，我本身也曾经向竺摩法师求墨宝。过了一段时间，也还是在中学生时期，我就把自己画了的画拿给竺摩法师指点。他如果觉得我画得还可以，就会帮我题字。对我而言，这是一种很大的鼓励。

到了1968年，香港一位老画家吴公虎先生到槟城开画展，我的美术老师吩咐我和另一位同学协助挂画，布置展场。这段日子，我们每天在画展会场看吴公虎挥毫、画画给别人看，后来我和几位同学也拜他为老师，向他学习。几天过去后，这个老师要回香港了，他就对我说，“假如你要继续学画，我可以介绍竺摩法师继续指导你，他是我的同学，我们以前在澳门的时候一起向高剑父学画”。我就很高兴，因当时已亲近师父一段日子，但还不敢开口跟他这么要求。吴老师就写了一封短信，叫我把信交给师父，之后师父就会教我画画了。我把信交给师父后，他就对我说，“好啊，你以后有空就来吧”。从那时开始，我就经常到三慧讲堂拜访师父。

我到三慧讲堂时，若竺摩法师正在忙，就会先拿出一些书、字帖给我看看，他就忙他的事情。他有空的时候，就会在讲堂一角写字画画，叫我在旁边看。

问：所以，竺摩法师忙的时候，就让您自己看书自修，是吗？

答：是的。就把我当成是一个很普通的访客。

问：那您看完之后就离开吗？

答：等他忙完了，就会跟我谈天。在那一段时间，他主要是借我一些资料带回家阅读参考，甚至让我带他的画作回家临摹，我再把自己的画作带回讲堂给他看。除了能学到绘画技巧，师父也会亲自指正。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

问：您中学时期就读哪所学校呢？

答：圣心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当时的校长是赵神父，他知道我很喜欢画画，也很鼓励我。我是美术学会的会长，我们的画就常常被贴在布告栏的小画栏上。当时张大千来槟城展览，校长也是展览的筹备委员。开会办了画展，校长还送了张大千的画册让我参考。当时是1966年左右，我念高中。

问：您的学校有佛学会的组织吗？

答：学校里没有佛学会，我也要到教堂，学英文本圣经。校庆时，大家也要排队到教堂，唱圣歌。我来自佛教家庭，我的母亲也在初一十五也到寺院，但也没有冲突，学校纯粹是受教育的地方。

问：您是否有参加三慧讲堂的活动？

答：没有参加什么活动。当时亲近竺摩法师，是一心想学画。

问：那时候，竺摩法师只有您一位学生吗？

答：是的，只有我一位。

到了1969年，我考上台湾的大学。当时家境不好，所以父亲还不能答应让我去。师父知道了，觉得我被录取了却去不成，十分可惜，就主动提议帮我想办法，要我把平时的画作都带给他看。画作的数量也不少，师父从中挑出画得比较好的画作，也帮忙在画上补几笔。譬如说，我花了兰花，师父就补石头，补景之类的，也主动帮我的画题诗。

那些实际上都只是我的习作。可以说，师父是完完全全在帮我，让我可以办画展筹钱到台湾念书。

问：这完全是您的个人画展吗？

答：是的，个人画展。

问：那时候大概几岁呢？

答：1969年，21岁。当时我只是一个学生，完全没有概念要怎么开画展，也没有经验。竺摩法师打电话给许平等先生，说我要到台湾念书，要开画展筹一点钱，希望他能来替我的画展开幕，许平等也答应了。许平等是当时的槟城中华商会会长，也是许子根先生的父亲。

师父也教我做很多事，教我把画拿到裱画店裱、发新闻、找画展场地等，最后决定在惠安公会展览。他除了帮我题诗，也找了当时的书法家，如陈瑞祥、萧遥天、陈习庭（中医师）、张倬人（儒商）、沈高标（退休老师），以及当时的华校视学官陈异经等人帮我题字。然而，还是以竺摩法师题得最多。

不过，画作看起来就很多样化了，有山水、梅花、竹子、兰花，而我也临摹了竺摩法师的罗汉、观音等作品。开幕那天，竺摩法师还亲自订了我的画，很感人。当时展出的作品有几十幅，并不多。不过，画展还是需要有一张布条的，因此竺摩法师也帮我题了大布条“郑庆龙画展”，还留到现在，是很好的纪念。

问：跟竺摩法师学画，最多也只有一年时间而已，是吗？

答：之前是自己画，自己摸索。跟师父学画，也只是个开始，但那时就画得很多，因为兴趣很浓厚。到了后来，就到台湾念书。

我到了台湾后，也一直给师父写信，从来没有停过。师父回信的速度很快，也在信中寄了一些书法鼓励我，有几十封，我都还有保存。他叮咛我在台湾好好念书，还要在台湾拜师学画，同时也要把诗文还有书法学好。

这一股力量很大，我也透过一些朋友、老师介绍，去看画展，认识更多画家，也拜了几位老师学诗、书、画。这段时间，我可以说是没有中断地进修。在大学时，也趁着假期时间在槟城、怡保、东马等地开画展。

除了鼓励我向学，有时我把书法寄给他看，他也会亲自指导。再晚一点，约1974年后，就是指导诗歌，师父曾送我几本有关诗词格律的书，要我多读古人诗词。这几方面，他一直从旁指导。师父很欣赏苏曼殊，我还在槟城时，他曾许诺，我能背出多少首苏曼殊的诗歌，他就会把诗歌写成对等数量的书法送我。

我还在台湾时，师父有时也会托我办一些事，在信封里放几块美金，五块啊，十块啊，托我去买书，到故宫博物院买一些名家的书寄给他研究。他的澳门同学关万里要买书，也托我买了寄到澳门。即使我到台湾了，和竺摩法师的来往依然很密切。

问：通常都是买什么类型的书？

答：书、画，故宫收藏的古画，都是印刷品或艺术杂志。有刊登唐朝、宋朝的古画。

后来我胆子也大了，打算到香港和其他地方开画展，首次在香港开画展的年份是1970年。师父真的很好，我告诉师父自己要开画展的打算，他就在回信中附上了很多封给朋友的介绍信，请港澳的故知，如：杨善深、李抚虹，协助我开画展。有些则是他已亲自写信知会对方，然后跟我说，“你要开画展，到时打电话给他们就可以了”。

除了香港，竺摩法师也帮忙我在曼谷、雅加达、夏威夷、澳洲等地，托友好从旁协助。师父一直没有停止地从旁帮我。所以也是很感人的。

问：您在槟城的时候，主要是学画。后来到了台湾，才通过与竺摩法师的书信往来学书法与诗歌是吗？

答：实际上，我在槟城已经开始跟师父学书法了，但到了台湾之后会练习得比较多，资料也比较多。在台湾期间，我也跟其他老师学书法和诗歌。师父认为我当时只是一个开始，要多学习，多临摹好的字帖。我去台湾之前，他送我几本字帖，嘱咐我要记得练字。

问：您对竺摩法师哪幅画印象最深刻？

答：三慧讲堂挂了不少他早期的画，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幅罗汉眉毛很长的……长眉罗汉，有一只猴子在攀爬眉毛；以前三慧讲堂还没有装修的时候，是挂在大堂的。第二幅是一个出家人在念经敲木鱼的，第三幅是一幅很大的山水画，挂在阳台，受阳光曝晒风雨侵蚀，这幅画后来的状况好像变得不好了。我好几次在他的画前面跟他合照，现在还有保留。

问：对以上的画印象深刻，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答：这个只是说印象，时常看到那张画，时间久了就有印象。以前我看他画画，印象会比较深。那时候是旧的三慧讲堂，他在走廊现场画兰花、竹子，印象很深刻。

我在台湾念书时，他也送了我一些画，我也挂在台湾的书房中。我这工作室挂着一幅师父送的画，是海上小船航向远处，题款：“浩千仁棣将再之台岛深造涂此赠之。竺摩识”。这是有次我放假回来，师父特地画给我的，别有用心。实际上，师父画给我的画，大多都寓涵深意，但以鼓励向学的意思居多。

后来，我从台湾毕业回来，曾和师父一起联办过画展，地点在马六甲、新加坡、怡保、吉隆坡，前后有四次。

问：联展所得都捐出去了吗？

答：每次办画展的性质都不同。第一次联展在新加坡，约1983年，两人各卖各的，师父将自己的所得用以出版画册。由于师父的人面很广，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联展都能带动我的画作销售量。画展上也有很多出家人到来，托师父的福，有些人买了师父的字画，也买我的字画。

问：在您的印象中，佛学院成立期间，竺摩法师是否有办画展筹款？

答：印象中是没有的。师父有很多弟子、信徒，有些会包一个红包，竺摩法师就会写字画画来答谢。他们都很支持师父办学。

问：在您之后，竺摩法师还有教其他人画画吗？

答：后来在佛学院，师父一位出家弟子邀请我到槟城教他们画画。师父知道了，对我说，“他们要用心研究佛学，不要教他们画画”。

问：竺摩法师不鼓励出家弟子画画吗？

答：不鼓励，担心他们会分心。

问：其他在家弟子呢？

答：在家弟子有跟我学画。竺摩法师鼓励他人学画。

问：自1967年之后，您跟竺摩法师都一直有往来吗？

答：一直都有往来。我到世界各地旅行、开展览，到南美洲、澳洲……到澳洲开画展，也是由师父写信给当地的弟子继明法师帮忙接待。我在三慧讲堂的时候就已经认识继明法师了，到了澳洲后就在继明法师的道场住了一个多月筹备画展。往后到大溪地、夏威夷、巴西等地，我到每一个地方，也有写信给师父。那时候电话不发达，也没有传真，就只能靠写信。

之后，我到伦敦开画展，在当地画了几幅画，航空寄回请师父题字。因为地址写不清楚，也不晓得怎么寄，师父就打电话给我在槟城的弟弟，“你哥哥从伦敦寄几幅画给我，要快的，要用的。我已经题好了，你赶快拿去裱好寄给他”。他很担心我在伦敦会来不及，在写给我的信当中也有提到这些事情。

问：您的文章曾提到竺摩法师曾经参与“中秋雅集”。您有印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现在是否依然还在进行？

答：“中秋雅集”是泰国合艾的李荫桐等诗人与槟城老诗人的交流，这些老诗人已经不在，当时的联系十分密切。发起人是许平等先生，但主要人物还是竺摩法师，他的诗最好，老资格。到了后期，这个雅集就好像没有了下文。

问：三慧讲堂在1965年创办，建筑物在1970年代改建。您对旧建筑有什么印象吗？

答：三慧讲堂的旧建筑，楼梯是木板的。后来我在台湾念书时，师父跟我通信，要我帮改建中的三慧讲堂找名家写对联，我就把题好的对联寄回来。

问：竺摩法师对对联的内容有要求吗？

答：没有特别要求。因为师父请我帮忙找的书法家都是名家，都是很有学问的，包括我的老师梁寒操、刘太希，他们都知道要为佛教道场题什么对联。

问：要求书法家题写对联的过程还顺利吗？

答：他们都很爽快地答应了，大多都认识竺摩法师。如果不认识竺摩法师，就由我再稍作介绍，对方也愿意题字，有些是当场挥毫，有些则约定时间后再回去取。

问：您在台湾待了多少年？

答：我在台湾升学的年份是1969-1974。1974年毕业。

问：在这段时间中，竺摩法师跟您的通信中，是否也有提到佛学院的事情，譬如管理上的问题，或是经费等问题？

答：我放假回来的时候，他会在口头上跟我讲佛学院的事情。

佛学院的确需要筹款，而他比较欣赏我画的“四君子”，会请我多画一些留下来，如果信众捐款了，他就会拿去送他们。所以，我就画了一些。有时候，他也会在信中提到，请我再画一些寄回槟城。

问：所以，您的“四君子”也成了很多人捐款的回礼了？

答：对。有时也会叫我画不同的题材，对尺寸的要求等，也会在信里面提到。

问：在三慧讲堂方面，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也会告诉您吗？

答：他不在信里面写，但是见面时会告诉我遇到什么困难。甚至团体中复杂的问题，法师之间不同的意见，也会告诉我。

问：竺摩法师待人处事的特点是什么？

答：他是文人，很坚持《无尽灯》的出版。但不是每个师父都认同他的做法，会认为这是可有可无的。在佛学院担任那么多年的院长，经费、师资都是问题，主要是竺摩法师有献身的精神，都需要他打理。

他亲近太虚大师那么多年，一向来对佛教人才的栽培非常重视。我觉得他在马来西亚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办佛学院，以及讲经论述。

问：竺摩法师在维持佛教事业上的想法是什么？

答：他认为开创一项事业不容易，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守得住、永续发展。他也希望弟子们能专心研究佛教经典。

问：您在台湾的时候，竺摩法师是否会引荐您亲近其他师父？

答：有的，他有介绍几个爱好书画的师父，如善导寺的悟一法师。善导寺时常有很多活动，悟一法师也认识很多名家和书画界的学者，我也常常去拜访他。他也常办“粥会”，出席者有八十多岁的钱穆、梁寒操、郎静山、马寿华、李石曾等人，而我只有二十多岁，跟他们一桌吃粥。后来，我也因为悟一法师的介绍，而与这些学者名家相熟了。他们之中也有很多人认识竺摩法师。

问：每次举办粥会，都有不同的目的或主题吗？

答：粥会是联谊性质，普通聚餐，无所不谈，没有特定的主题。

问：在马来西亚，诗书画能通的出家人也不多。依您之见，伯圆法师的诗书画如何？

答：认真说起来，伯圆法师的书法写得很好，也会作诗。在作画方面也比较谦虚，会跟竺摩法师或其他人讨教或切磋。

问：早期从中国南来的法师，应该是诗和书法都能掌握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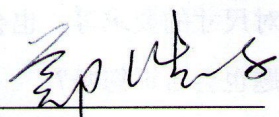
答：还是要看背景，不一定都能掌握的。竺摩法师的弟子中，继明法师的字也写得不错。竺摩法师的字帖，有些送给他，有些送给我。

问：那么，竺摩法师实际上还是不反对出家弟子学书法的，是吗？


答：可能是书法需要花的时间比较少。他每次都会跟我提到继明法师，说他的字写得不错。继明法师每一两年来吉隆坡，都会来找我住几天，到工作室来写字，越写越好。

*本人（下方签名者）确定以上访谈内容记录正确，并同意授权本采访稿内容可作研究、征引等学术用途。

受访者姓名：



受访者签名：



日期

： 8-8-2016

郑浩千先生访谈录（二）

受访者姓名:	郑浩千先生
采访者姓名:	陈慧倩
日期:	2015年3月21日
时间:	下午2时10分至下午3时10分
地点:	郑浩千先生工作室

问：除了您之外，竺摩法师后期是否还有指导其他人画画？

答：印象中好像没有。

问：那么，竺摩法师怎么指导您创作诗歌呢？

答：还没有创作之前，先读古人诗词、背诗词、注重平仄，平仄是最重要的，要押韵，所以他也曾送我一些书。这需要长时间的进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师父把重点告诉我，如格律等，之后都靠我自己练习，请教别的老师，有些习作也请别的老师帮忙修改。

问：您的文章中曾提到，竺摩法师邮寄书法帖到台湾给您，并叮咛选“明朗清劲者”来学习。依您的看法，竺摩法师的书法属于哪一类？

答：竺摩法师的书法综合各家，篆书、甲骨文，隶书、楷书、行书、草书，魏碑等都涉猎。他认为多方面的吸收，是打基础，最后应该能融合在一起。

问：书法方面，除《曹全碑》（隶书），《石门颂》（隶书），竺摩法师都教您练什么字？是否有学习甲骨文与小篆？

答：我是跟从其他老师学习甲骨文与小篆。因为《曹全碑》只是书法入门，让我们把基础打好。

问：那么，继明法师又擅长什么字体？

答：继明法师擅长曹全碑。他很专一，只是练习竺摩法师送的《曹全碑》。

问：竺摩法师担任佛总主席和佛学院院长多年。您是否知道，竺摩法师怎么协调团体中不同的意见？

答：佛教有不同的师承。以佛学院为例，其他人当然也在用人方面有不同的看法，也曾有争论或意见不合的情况，但竺摩法师的原则是用人唯才，以教育为重。不过，在面对异议时，竺摩法师虽会有本身的立场，仍会顾全大局，不会把局面弄得很僵。

问：据您所知，竺摩法师时期，除了伯圆法师之外，书画皆精的法师还有谁？

答：台湾的本慧法师也是诗书画皆通的，原本是辅仁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我在台湾念书时认识他，那时他还没有出家，也曾送我一些墨宝。后来本慧法师出家了，也曾拜访竺摩法师，在三慧讲堂住了一段日子，谈得很投机，后来我也常到台湾看他，他跟竺摩法师的关系也不错。

问：本慧法师是否曾在马来西亚佛学院兼课呢？

答：不清楚，应该是没有的。

另一位法师为晓云法师，是竺摩法师青年时期在澳门认识的，一起跟高剑父先生学画画。后来晓云法师到台湾，创办了一所“华梵大学”，也教一些学生画画。他曾办《清凉画展》，画作以佛教题材居多。

新加坡的松年法师，也是诗书皆通的出家人。我当时和竺摩法师在新加坡联展，他也来支持，买我们的画。他的书法也写的很好，也作诗，但没有画画。

算起来，以上都是和竺摩法师比较有往来的出家人。

问：那么，本地的真果法师和广馥法师等人是否也写书法呢？

答：我对真果法师不了解，广馥法师有收藏书画，但没有写书法。收藏方面，以新加坡龙山寺广洽法师的书画收藏比较多。

问：竺摩法师是否有较敬仰的高僧大德？比如白圣法师与金星法师？

答：我没有见过白圣法师与金星法师，但竺摩法师推崇的是弘一法师，仰慕的是苏曼殊。他喜欢苏曼殊的诗，也曾收藏苏曼殊的扇面。扇面上除了有画，也写了一些字，很珍贵。

问：上次您让我看过一个牌匾，是“天涯别馆”，是您工作室的名称吗？写于何时？

答：是工作室的名称，由竺摩法师题于1980年代。

问：您在工作室挂上了竺摩法师特定的画作与书法。对您而言，是否有什么特别意义？

答：竺摩法师送给我的画都有写上我的名字，有些字画太大的，不能全展示出来。其实都很珍贵。他也曾经送我诗稿，都很有纪念性。

竺摩法师很随和，有时我跟他提到以后要出版诗书画集，需要他题字。他就会预先题很多给我，可以保留到以后才用。目前还有一些没有用过。

问：您于1967年接触竺摩法师以来，是否了解竺摩法师当时或早期的健康状况？会不会一直都很反复？

答：我觉得他的工作量太大，太操劳，都是因为休息时间不足而病倒。有几次还入院，有时是动手术，胆结石等，不过都是小毛病。我去三慧讲堂，竺摩法师会以茶相待，还招待我享用零食，他本身反而不太敢喝茶，因为很难入眠。

问：竺摩法师很操劳，却反而失眠……

答：他总是很挂心手上做不完的事。有时写信给我，提到自己的债务太多，有文章的债务、书法的债务等。工作归工作，竺摩法师之后也会放轻松，谈到一些趣事也会开怀大笑，也会跟我一起到三慧讲堂附近的“素食林”餐馆吃素。

问：早期信众求墨宝，竺摩法师都是来者不拒吗？

答：对。他都会尽量不令人失望。

问：竺摩法师管理佛学院的时候，除了经费上的问题，是否还面对其他压力？

答：竺摩法师的能力太强了，常常得亲力亲为。譬如说，柱子上的对联要怎么放，谁的辈分高，要放哪些字，也只有他能够掌握全局，有时其他人也很难帮得上他的忙。

有几个居士，也是他的弟子，从旁帮忙，但也只是帮小忙。但是，其中有一位黄荫文居士，帮他很多；文笔好，学问好，也当过校长，因此竺摩法师也很器重他。另一位是杨更生（译音），也在佛教义学当过校长，都是教育界的人，吴人俊（许平等太太）也很帮得上忙。这些人都很有学问。

*本人（下方签名者）确定以上访谈内容记录正确，并同意授权本采访稿内容可作研究、征引等学术用途。

受访者姓名： 郑浩
受访者签名： 郑浩
日期： 8-8-2016

继程法师访谈录（一）

编码:	003
受访者姓名:	继程法师
采访者姓名:	陈慧倩
日期:	2016年5月9日
时间:	上午9时10分至上午10时40分
地点:	太平佛教会

问：我的论文主题是竺摩法师的佛教文化观与教育观，恰巧继程师曾在竺摩法师仍在世时，主编《无尽灯》及担任马来西亚佛学院副院长。因此，想先请问您，在您仍主编《无尽灯》时，竺摩法师是否曾给您什么建议？

答：《无尽灯》是我1981年在三慧讲堂闭关时期所主编，主编的时间也很短。两年后出关，我就回到太平佛教会，没有继续主编工作了。那时候的灯刊，其实也已是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的出版物，因此竺摩法师也没有在我主编时期提供什么建议。

问：那么，竺摩法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请您主编《无尽灯》？

答：没有多少人有时间编书，那时候也没有人手，而我刚好在槟城，就让我负责了。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问：那时候的稿源，也是由您自己想办法吗？

答：是的，自己想办法去找。比如说，竺摩法师讲了经，有记录下来，就连载在《无尽灯》，我自己本身也写一些，也会找朋友写一些。我印象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

不过，那时候的《无尽灯》有特别的版位刊登中英对照的文章。我不清楚以前的主编从哪里找到稿件，所以就只能自己想办法。那时候，圣严法师在美国有英文讲稿刊登在《禅》杂志，也寄了很多给我。我发现里头的内容很不错，和禅修有关系，因此就想到要把圣严法师的稿翻译成中文刊登在《无尽灯》。我尝试把稿交给朋友帮忙翻译，但没有下文，所以就决定自己翻译。当时是用字典逐字逐句翻查，然后就发表在《无尽灯》，但我已不记得有多少篇翻译稿被刊登出来。在翻译的过程中，发现有很多内容很不错，所以我就继续翻译，而这后来也变成了我第一本翻译出版的著作——《佛心》。

主编期间，也发现佛教界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密宗的传入等，我就写了一些比较偏向辩论性质的文章。第100期《无尽灯》是我主编以来最重要的期数，有广邀文稿，也编得最好。编完这期没多久，我就卸任主编一职了。就只有这样的因缘，不是很深。

问：《无尽灯》英文栏目的部分，实际上是沿用前任主编的风格，是吗？

答：本来已经有这个栏目，而我自己也想保持。原本还有一些旧稿，后来就自己翻译圣严法师的讲稿。

问：那时候开辟中英对照的栏目，是否有什么特别用意？

答：我也不清楚，接编时纯粹延续原来的面貌来进行。因为当时的人手比较不够，我也只能帮忙看稿、写稿，没有加上什么新栏目。

问：您在编这份刊物的时候，竺摩法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叮咛？

答：没有。处理这些工作的原则，是工作交到谁手上，就由他个人去发挥了。不会限制。竺摩法师那时也不太管这些了，因为他当时已经不是佛总的会长。行销或发行的部分，都是佛总的职员负责处理，我都没有去管。我只是负责看稿、编稿、催稿、自己写稿，然后请人打字再送印。

问：那么，诗歌唱和与佛学问答的栏目也已经取消了是吗？

答：这两个栏目也是早期的内容。不过，在我主编的时候，陈延进博士还是会写一些诗歌让我们刊登，由他负责供应诗歌的稿件和内容。

当时佛学院曾流传“四大天王”的外号，分别是陈延进博士、竺摩法师、黄荫文老师和陈少英老师，因为当时的教务，都由他们四人打理。老院长竺摩法师还在的时候，基本上每届毕业刊都有他的资料。我在佛学院服务的年代，每一届都有毕业刊，有一段年代是每年都出版毕业刊，因为每年都有毕业生。

问：佛学院早期有毕业生弘法团。现在是否还保留此活动？

答：现在没有了，主要是本地学生越来越少，国外学生也越来越少，签证不易，相对来说，佛学院也没有推动得那么积极。学生不多，只能在校内办活动，校外的弘法活动基本上很少。

问：早期佛学院有针对学生的品行打分。请问佛学院是否有具体的打分标准？

答：由老师、班主任负责打分。佛学院早期很注重智育和德育，办学比较传统，所以才有这种打分的制度。后来，慢慢发现这种分数很难打，也有很多主观的因素在里头，所以已经不太注重打分了。

问：收生的标准是否有改变？

答：后期招生，一律是报名者先修读预备班或先修班，后来再渐次上升。早期可能有学生会被插进高班，后来我们发现效果不是很理想。因为学生可能在世俗的学历上比较高，但佛学基础，还是要从预备班开始念，大概要修读七年。如果只读到初中部，就要四年。收生时，都是要求学生写简历，进行基本的佛学考试，以及口试等。

不过，我们没有设立很高的标准，只要来报名的，我们都会接受。有一段时间，一些寺院庵堂送小朋友来上佛学课。慢慢地，佛学院发现她们年纪太小，不太容易管教，之后就规定入学年龄。不过，有些寺院还是把年龄不符的送过来，我们审核后，觉得素质还可以的也批准入学。所以，佛学院没有设立什么标准或学历，有些学历不高的，我们也会接受，尽量开放学习的机会。

问：限制入学年纪时，竺摩法师还是院长吗？

答：原本的章程好像有一些规定，但没有完全照着章程去做，只是后来我们发现有问题，才去执行。实际的状况，还是得再看看佛学院的章程。佛学院行政

上的细节，基本上都是现任的教务主任继尊法师最熟悉，可能你要安排时间去找继尊法师了解详情。

我一向不太管行政上的事，即使早期我当副院长时，也只专心教课，教的课也比较多。后来曾经离开一段日子，再回去时当院长时，已经没有办法再教，因为我国外的事务太多，留在国内的日子太少，现在只是负责指导禅修。我在国内的话，就会去上课，不然就由继证法师去带这门课。继证法师也在佛学院服务了很久，知道很多详情。如果有什么疑问，也可以去问她。

问：佛学院是否也有记录竺摩法师以前教导的科目？

答：可能还是要再翻查当时的课程表。

我闭关的时候，原本就没有教课了。恰好竺摩法师那年到美国旧金山和夏威夷，在佛学院讲了一半的《阿弥陀经》，就由我续讲，而我也在关房中给学生上课。

问：竺摩法师在 1990 年闭关时，他也在关房中给学生讲课吗？

答：没有。那个时候，竺摩法师已经没有讲课了。

问：竺摩法师闭关时，您是担任副院长的。在管理学院方面，竺摩法师有给您任何叮咛吗？

答：没有，在今天看来，他当时可以说已经完全不理事了。

问：他出关后，是否还有替佛学院筹款？

答：好像也没有了。但是那时候有几位皈依竺摩法师座下的三慧讲堂信徒会比较积极，有几位也是三慧讲堂的理事。他们觉得佛学院是由竺摩法师办的，也很愿意护持，就发心加入了佛学院董事会，在募款方面会比较积极。

问：竺摩法师早期成立了佛教教育奖学金，1993 年被划入由马佛学院管理，是否还有在运作呢？

答：教育基金好像依然由讲堂管理。因为这个教育基金不是专给佛学院的学生，也发给一般的学生。这方面要问问讲堂了。

问：以上的资料其实是从佛总五十年特刊中查找到的，但没有说明后续的发展。或许这方面，我再去问问佛总。

答：好，你再去问问他们吧。

问：竺摩法师跟学生的互动多吗？

答：早期很多。一些学生跟他的联系比较密切，后来就比较少。晚年的时候，佛学院的学生也会过来见见师父，带师父到附近散步走走。但因为师父已经没有上课了，因此互动也没有以前那么频密。

问：早期也会有周会吗？

答：后来就比较少看到师父出席周会了。印象中，在我闭关时期续讲《阿弥陀经》，以及师父从美国回来之后，就没有正式在佛学院上课。

问：所以，竺摩法师在 1980 年代中后期就很少在佛学院上课了？

答：是的。那个年代过后，他也很少在大场合出现，可能出席一些寺院的开光仪式或戒会。只有一年，我们在槟城办佛青大会，师父也刚好在槟城，所以就出席。佛青比较早期的时候邀请他出席活动，他若有时间就会过来。卸任佛总主席之后，就没有参加很多大型活动了；基本上，晚年已不参加大型活动。

问：那么，佛学院周会是怎么进行的呢？

答：周会是应该每星期进行的。我不清楚早期怎么安排，但如果我被安排讲话，我就会在周会上讲话。

现在的方式，则是轮流。比如说，院长、副院长、教务主任、舍监等，都会给学生讲讲话，如果没有讲话，就让学生开班会。可能可以向佛学院拿一两年的行事历来看看。

问：所以，早期周训都是老师们轮流讲，不是竺摩法师一个人负责？

答：当时应该也是这样子进行的。

问：您印象中，当时的开学礼以什么形式进行？

答：毕业典礼的话，如果竺摩法师在，就由他主持。开课仪式比较简单，以我本身而言，如果我在国内，我也只是开示一个小时，但我不确定当时他们是否也这么处理。

问：实际上，竺摩法师的健康状况，是否一直以来都比较不理想？

答：他自己的文章所写的，有提到他年轻的时候身体不好，或是有一些灵感。在三十多岁的时候，病得很严重，后来就痊愈了。后来的身体状况，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也没听到有什么大病，但是有动过一次手术，三慧讲堂住持继传法师可能会比较清楚。当时继传师刚出家，一直是师父的侍者。他曾提到，师父有一次动手术，不是很大型的手术，但是麻醉的分量好像太重了，比原定时间迟了一些才醒来，自那时候开始，师父的记忆力好像就受到了一些影响。

问：在 1980 年代，竺摩法师也比较少写字画画了是吗？

答：对。他的活动少很多了，但是他每天还是有做功课。活动的范围就小很多了。他后来活动的地方，都是星马一带他的道场或是我们师兄弟的道场。

问：竺摩法师住持那么多的寺院……

答：其实都没有在管事的。主要在活动的就是监院，类似现在的总务、秘书等，都是他的弟子在当监院。

问：竺摩法师会调派弟子到他住持的寺院协助管理寺院是吗？

答：有些是弟子的寺院，请他去当住持。师父在马来西亚发挥最大的作用，是把很多所谓斋堂，我们称先天教、龙华教，拉到佛教来。在马来西亚很特殊的情况，是后来这些斋姑后来都出家，原因都是受竺摩法师的影响。早期很多佛学院的学生都是来自斋堂。他剃度的很多弟子其实都是斋堂的。举例来说，

当竺摩法师剃度的弟子后来接管斋堂时，就会请师父来住持；或者是，斋堂的第二代出家了，第一代没有出家，但她们还是请师父来住持，自己就变成监院。所以，师父就挂了很多寺院的住持之名。

比较特殊的例子是昔加末的观音堂，师父在国内剃度的第一个弟子是女众，也是观音堂的第二代斋姑。观音堂第一代的斋姑把师父请去当住持，但她反而在比较后期才出家。我们最长的师兄是女众。

问：竺摩法师是在怎样的机缘下接触斋堂弟子的？

答：基本上马来西亚的寺院大部分都是这些斋堂。金星法师他们这一群马六甲的法师认为，一定要有一个佛教总会，同时又觉得要有一个分量比较重的人来领导，而师父是讲经弘法为主，有别一般做经忏的出家人，因此在文教界、在社会上的地位比较高一些。

我们不是故意要分这个等级，但是人家比较看得到有知识的出家人。所以金星法师他们就到槟城来邀请竺摩法师领导。刚才说过，马来西亚纯正的佛教寺院比较少，即使是金星法师那一派开始来的时候，也跟青云亭有关系。早期青云亭也不是纯佛教的，是地方上的寺院，性质很多元化，是华人的中心，也是民间信仰的宗教场所。比较纯，而规模比较大的只有极乐寺。

金星法师他们邀请师父领导后，师父也很谦虚，转请极乐寺的方丈当筹委会主席，师父当副主席。但因为很多文字上的东西师父都懂，而且也结交了很多知识分子，可以在这方面帮他，所以就由师父来推动。但是我们佛教界本身，能够真正以“寺院”的力量或名义来给予支持的，大部分还是在斋堂。佛教的道场不多，所以就把她们接引进来，办佛学院的时候，也发现斋堂把孩子送进来也比较方便，所以就跟斋堂的关系很密切。这些斋堂大部分是女众，在社会上的地位比较不受尊重，不过，师父的人是很慈悲的，所以他跟她们交往时，应该是站在平等的立场，对她们也很尊重，而她们后来也请师父担任斋堂住持。

目前，马来西亚佛教界里，斋堂跟佛教的关系那么密切，以及那么多斋姑出家，其实都是竺摩法师发挥的力量。虽然这些斋堂还是以“堂”、“庵”、“宫”为名，但是里头还是有一些出家人，而这些出家人很多也是里面长大的孩子。这些早期比较偏道教或夹杂着民间信仰的道场，在目前而言性质还不是很纯正，但已经是偏佛教，甚至已有出家人。

问：竺摩法师当时这么做，是否有引起反对的声音？

答：我不太知道实际状况，但应该是没有的。因为当时佛教界最需要的是团结，是人。如果佛总要壮大的话，最需要的就是这些。甚至我们可以说，佛学院要办学，佛总很多经费可能也是从庵堂而来，因为庵堂有蛮多信徒，基本的经济能力还是比较稳一点的。她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依然进行斋教的仪轨，一方面能维持她们自己的生活，在经济方面也可以比较稳定。

早期佛学院的一些经费也靠庵堂。当时的董事长为真果法师，师父跟他两个人专程南下再回槟城，访问的就是这些斋堂，或者到斋堂去招生，看哪个斋堂有小孩需要读书，就把她们带回来。不然的话，就是跟她们筹募佛学院的经费。不过，这些东西师父也不常讲，可能是他身边的弟子会比较清楚。

跟师父出家后，我在他身边的时间很短。我从台湾读书回来，在佛学院教书期间，也是每个星期往外跑，全马走透透。但是，长期待在师父身边的弟子可能会比较清楚这段过程。还有一段时间，继慧法师比较长时间待在师父身边，当时也是师父的侍者，师父出门，也是由继慧法师载送，不过继慧法师不是斋堂出身的，而是信徒的女儿，毕业后在三慧讲堂住一段时间后就出家。继慧法师当侍者期间，师父也比较活跃，可能有一些事情她也比较清楚。现在可能在蛇庙常住，你可以问问讲堂。

问：我们现在把焦点带到讲堂。早期，若有人要求做法事的话，竺摩法师会答应帮忙做经忏佛事吗？

答：讲堂不做经忏法事。但是每年会有几场法会，如点灯、超荐等法会。但是，如果一些道场有法会，比如师父住持的一些寺院，可能就会去，但他本身不做这些东西，讲堂的法会比较正规，不属于我们所谓的赶经忏的那一类。师父的唱诵功很好，拜忏等他都懂，但讲堂有收费的法会，每年只做一次，但形式不像外面有人去世而进行的那种法会。

不过，如果信徒往生了，有时候竺摩法师也会去念念经，但不是别人请他去的。那位信徒可能常常护持佛教、护持讲堂、护持佛学院；贡献比较大的，师父可能就会过去。不过，如果是外面的人请过去进行法会，然后有给红包钱之类的，竺摩法师或三慧讲堂一般是不做的。

问：三慧讲堂办的佛化婚礼是否频密？

答：好像有办过几次，也是有办过几次，由师父主持，但次数不是很多。

问：黄荫文先生说过，竺摩法师在1970年代办了一场寿宴，收到的贺仪都捐给佛学院……

答：师父常常都这样做，往后他的贺仪，也都是捐给佛学院。我担任副院长时期，有一次就是这样：书记跟我商量，佛学院快发不出老师们的钟点费了，因为现款（petty cash）已经快用完了。手上有几张定期存款，但是如果那时提早取出来了，就会少了几十块或几百块的利息。就在考虑要不要拿出来、犹豫不决时，竺摩法师刚好就办寿宴，我的印象中，好像有两万多元贺仪。师父就直接把贺仪转给佛学院，解决我们的困境。这一年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所以我知道，不过师父每一年的贺仪不一定全捐给佛学院。继慧法师应该在那时负责处理，有时候会捐给孤儿院或慈善团体等，一部分是从贺仪中拨出来，一些是基金会的，教育基金，或慈善基金等，数目不是很大，但是贺仪很大部分就直接捐给佛学院。

问：竺摩法师每一年的生日会不会办得很大？

答：不会都办得很大，都是信徒自行在办。因为大家都知道师父的生辰在农历八月，因此正日都会在讲堂办，然后之前之后一个礼拜，可能在吉隆坡宝林法苑办，新加坡则在佛缘林办。这些算是师父的道场，会要求师父过去。师父年纪大了之后，我们都会想，师父年纪大了，要让师父上上下下，很辛苦的。虽然很累，但师父还是愿意过去。一般上，信徒们都会先跟师父商量，再安排时间过去庆生。

问：在您的文章有提到，竺摩法师有一年其实有机会买地扩建讲堂，但没有很积极。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答：在硬体建设方面，师父不是很积极的。实际上，师父五十年代来的时候，开始时候住在菩提学院，而那里又是学校，因此不是很方便，因此信徒帮师父买了“竺园”的小房子。后来信徒慢慢多了，大家就觉得那个地方太小，因此又帮他找新地方。我觉得，师父本身比较偏向文人个性，他不会很主动、很积极地找地方，而是信徒先提出，师父才顺应他们，比较被动，最后才找到讲堂的这块地，前身是美国的领事馆。

买下这栋建筑后，慢慢发现应该要发展得更好。我还在讲堂的时候，三慧讲堂两边都有地，但师父都不积极。想要积极行动的时候，两边的地价都已经很高了。这时候，师父就更不积极了，因为他本来就没有想做得很大，觉得只要有空间办活动就好了。

地价太高，要我们要去筹款买地，能力其实也不是太够了。之后再听到的消息是土地已经被卖掉了，我们若再去买，地价就更高了。现在讲堂左右两边都让医院买去了，一边作硬体建设，一边作停车场。

问：您刚才说，刚开始的时候，师父对买地的决定不是很积极，后来大家却又积极行动了。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转变？

答：其实是讲堂的理事开始变得更积极。师父开始不是很积极，后来大家决定，还是应该要买，不管要不要建，还是要先买下来，但去问价格后，才发现已经涨了。

问：所以，由始至终一直在紧张买地事宜的……

答：都是在家信徒。师父本身也没有说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子。

问：三慧讲堂的部分，基本上只有以上问题。现在，我想再了解，竺摩法师在菩提学院担任导师，他的责任范围在哪里？

答：菩提学院像一个道场，然后在里头办一个菩提学校，竺摩法师是来教书的。后来改制的时候变成国中和独中。菩提学院是一个比丘尼办起来的，跟慈航法师有一点关系，她们觉得应该有法师常住，有一个师父当导师，菩提学院才更有意义，因为它始终是佛教的道场。现在菩提学院好像还有人在住，可能类似斋姑。竺摩法师当时刚好在泰国，她们知道了就去把师父请过来。师父可能在中学教佛学课或中文，后来办到了居留证就长期留下来。来的时候是1954年。

不过，我不太情况当时的情况。可能是先教中文。

问：竺摩法师在1958年出版了《初中佛学课本》，有人指出很多学校采用这套课本。您知道采用这套课本的学校有哪些吗？

答：普通学校应该没有采用，因为这是佛学课本。国外佛教办的学校会采用，一些道场办的佛教学校也有采用。金明法师在马六甲办的小学也有自编佛学课本，但后来由佛青重编。印顺法师也有编过一套，可能是类似的学校有关系，所以编这些课程，方便这些学生学习。

问：竺摩法师担任菩提中学佛学老师，是否有十年之久？

答：我也不知道多久。后来到讲堂后，就很少过去教了。

问：晚期，竺摩法师依然有替菩提学校的学生办皈依吗？

答：现在好像没有了，现在应该是由唯悟法师在处理，学生们现在都过去檀香寺了，以前的确在三慧讲堂。

问：竺摩法师跟菩提学校的往来变得比较少的时候，大概在什么年代？

答：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我在的时候，菩提学校的师生还是有过来皈依。我的师父圆寂后，就没有那么密切了，然后唯悟法师去当他们的董事前，还有一个法师去当董事的，之后才由唯悟法师去接手。

问：竺摩法师的贡献和事迹，基本就谈到这里。现在想再进一步了解的，是竺摩法师和师长们的关系，除了太虚法师，还有芝峰法师以及剃度师白云法师……

答：要参考师父的年谱，还有自传《行脚过千秋》，我们基本上很少再问师父这些事。我们已经是隔代了，就不太清楚这些师长们的事情了。

问：那么，竺摩法师的作息是怎样的？

答：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一般道场的作息，晚上应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他自己会作自己的功课，如地藏忏、《地藏经》、《普门品》等，因为他自己是偏向信愿行的，所以他跟地藏菩萨和观音菩萨的因缘会比较深，而他基本上也是修这两个法门。他应该是每天固定做功课的，如果没有出来大殿，也会在自己方丈寮的佛堂做功课，是很有规律的。

问：竺摩法师曾说，早年在定境中看到太虚大师，大师有意思把他“送进丛林”。实际上，太虚法师对竺摩法师会不会有不同的期待？

答：有几个情况，竺摩法师在闽南佛学院的时候，竺摩法师考到第一名。太虚大师当时回学院会讲课，学生们要作笔记，太虚大师看了之后，觉得竺摩法师的文笔非常好，而且他也是最年轻的，所以太虚也想成就他，因此师父有一段日子是跟在太虚大师身边的。我有一个不是很确定的资料，“竺摩”这两个字好像也是太虚大师给他的，资料来源不是很明确，需要再考证。

师父曾替太虚法师记录弘法讲稿，《太虚大师全集》里一些志明“守志”笔录的文章，就是竺摩法师的手笔。太虚大师晚年的时候，师父跟在大师身边，类似侍录的。我不清楚“送进丛林”的传说，但却听说太虚大师有意送他到日本，竺摩法师也有一段时间学日文，还翻译了两篇日本的著作，现在不晓得这两篇翻译的文章还在不在，但曾经在一些佛学杂志上看到。

太虚法师很有宏观的视野，所以把自己接触的弟子都分派到不同的地方去学——考虑送竺摩法师到日本、法尊法师到西藏，还有法舫法师是要送到锡兰。后来因为战争的关系，竺摩法师的日本求学之行也不成行了。

问：竺摩法师给您最大的影响是在哪一方面？

答：早期我们想出家，可以选择的道场并不多，但一般的道场应该是不会去的。竺摩法师当时在文教界很出名，也很有实力，比如说书画、艺术、佛学方面的造诣。我们这样子说，可能很多人听了会觉得不舒服，但他的确是马来西亚最好的。文化素养、艺术第一，这样的比较，可能是我们世俗的心理，但我们如果是想真正通过佛学、教育、文化方面去学佛的话，就只有选择跟他学。

1960、70年代，佛青的领袖如果对佛学有兴趣，当时马来西亚就只有竺摩法师的书。师父的书，在佛教界方面是唯一的；从马华文坛角度来看，出书的没有几个，而且他的书也是有分量的。所以在文化界，他的影响是很深很广的。

我开始真正学佛是在中学。我听了我们这里一个老师——邱宝光老师的讲课，就开始对佛学有兴趣。当时只是参加佛学会，还没有真正懂。那一年，中五考试结束后，我就跟一个同学很热情地冲上槟城，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青年团的佛友发愿到佛学院求学，于是就帮我们联系，让我们见到竺摩师父，而师父也让我们在那里住几天，去旁听佛学院的课。那时候就皈依了师父，也拿了一些他送的书。当时看的都是他的书。当然，国内当时的书基本只有他的。《佛学入门手册》是佛青跟佛总当时编的一本入门的书，我想竺摩法师在本书的审稿、监督方面也很重要，我也是从这本书入门。我看了很多竺摩法师的著作，觉得他的东西太好了，所以一定是选择跟他出家。

我在《慧海明灯》上的文章，就写了师父对我的影响。但是，我们之后的互动不是很顺，他有他的考量，我也有我的考量，所以，有时候我们谈不来。那时候我也年轻，年轻气盛，那时候也觉得自己了不起，不爱听他的话，也离开他好几次。但是后来因为自己年纪大，带学生带多了，也比较能体谅他当时做决定的原因，以及了解他当时处理事情的方法。

佛教研究学会曾经举办研讨会，继旻法师也有一篇有关竺摩法师的文章。艺术方面的事，可以问郑浩千先生，他跟师父很亲近，也清楚很多事情。我跟师父的关系有点若即若离，因为我们有些理念还是不太相同。虽然他有些思想跟太虚大师相同，比如人间佛教之类的，但是竺摩法师佛学的东西还是比较传统。竺摩法师早期的师父让他接受的是传统天台宗方面的教育，所以法会、经忏方面师父很熟悉，信愿方面也很用功在修。

问：所以，竺摩法师刚好是结合……

答：刚好是在传统跟现代交接的过程，有关佛学思想的东西没有像太虚大师那么先进。太虚大师讲的，我们觉得会比较世俗，竺摩法师讲的比较传统、比较宗教性，印顺导师则是比较理论性的东西。每个同学都有很明显的个性。

他的艺术造诣很高，一般上艺术造诣高的人会比较感性，所以他学的法门也会比较偏向信愿。印顺导师很理性，文章也比较具有批判性。竺摩法师的文章基本上没有批判性的，都是很传统地把佛法讲出来。

后来，我讲竺摩法师很厚道，因为很多人事的东西他都不要讲，觉得讲了没有什么意思。虽然有一些事情可能需要澄清表明，但解释了也只是让别人多讲一些是非而已。所以，《行脚过千秋》里头讲的东西都很正面，批判的东

西都不在里面。这是他的个性，是艺术家的个性，不是把自己放到很高，而是一种很包容的个性，是传统佛教的一种观念。

问：那么，您和竺摩法师的差异，也是在现代与传统的思想方面吗？

答：是的，差异在现代与传统。在佛学院办学方式方面，我年青时会提出一些建议，但是要执行时，就遇到了异议，竺摩法师就宁可放弃执行。我那时就会认为这样不是很好，年青时会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问：看竺摩法师的文章，他很多时候都会想要顾全……

答：是的，他真的没有要去去批评别人。他的文字都很正面。

*本人（下方签名者）确定以上访谈内容记录正确，并同意授权本采访稿内容可作研究、征引等学术用途。

受访者姓名： 释建程

受访者签名： 建程

日期： 6/6/2016

曾天耕先生访谈录（一）

受访者姓名:	曾天耕先生
采访者姓名:	陈慧倩
日期:	2016年9月18日
时间:	上午10时40分至上午11时40分
地点:	槟城三慧讲堂

问：曾天耕校长，您好。这次跟您的访谈，主要是想了解竺摩法师时期，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简称研修会）与三慧讲堂周日义校（简称周日义校）的细节。

我们先谈谈佛法研修会。请问校长，您在哪个年代参与佛法研修会的活动？

答：佛法研修会成立的时候，我就开始参与了。即1968年4月6日的创会日至1978年。研修会早期是属于青年团的活动，会员年龄有限制，因此我满40岁后就被委任为顾问，不再担任研修会的理事职务。

问：能否请校长具体说明研修会成员的年龄限制？

答：当时凡是18岁至40岁者，都可以参加。后来就放宽年龄限制。

问：佛法研修会最初期的成员，大多来自三慧讲堂的周末念佛会。请问研修会跟周末念佛会有关联吗？

答：两者的活动是分开的，周末念佛会是在周末晚上念佛、听佛理等，佛法研修会的活动是在周日早上。当然，也有佛友两者都参与的。

问：那么，您参与的年代，佛法研修会有什么例常活动呢？

答：当时的活动订在每周日的上午九点至十二点，后来有会友觉得时间太早，因此改成下午两点至四点。

弘法演讲是每个星期日的固定活动，另有唱佛曲和播放“短片”，这两项是互相轮替的不定时活动。

问：这几项活动是以怎样的形式来进行呢？

答：我们的活动有很多方面。比如说，弘法演讲的时段有一个小时，让理事会成员轮流上台演讲，每个星期演讲的理事人数有1-2名。若该名成员有能力，也可以一个人讲一个小时。内容题材自订，也有一些成员讲佛教故事。主要目的，是让大家练习口才。

其后，康乐组的活动则是唱佛曲和播放“短片”。所谓的播放“短片”，是我们自行编制短剧或是以对话的方式宣传佛理，并进行录音，然后再播放给会员们听。录音的方式也比较简单，只是用录音机录在卡带上。不过，研修会现在已经没有这项活动。

问：竺摩法师会过问以上活动的内容吗？

答：竺摩法师没有过问活动内容。他对我们都很放心，我们也很有分寸。

问：那么，你们练习弘法演讲时，竺摩法师会在场吗？

答：法师平时都很忙，很少在讲堂，因此不会常常参与。法师需要时间准备自己的讲稿，有时也会画画，但不鼓励我们学画画，因为他觉得画画需要花费比较多时间。

然而，若法师有在讲堂，我们都会恭请法师出席。法师总是说：你们先开始进行吧。法师有时也会抽空出席我们的弘法演讲。

问：您刚刚提到，研修会每星期都有弘法练习。这项练习是否只开放给理事会成员？

答：是的。因为我们的成员有 21 人，每个星期轮流练习，再加上假期，一年下来，大家练习的次数也很有限，因此只能开放给理事会成员练习。

问：研修会原本的宗旨是“研究”与“修行”。那么，当时在研究方面是否都有设定主题？

答：没有设定主题。因为大部分成员都有工作在身，只有星期日才有空过来，都是比较随喜的。

问：会有其他出家众来主导研修会的活动吗？

答：当时没有。当时的出家众很少，也没有佛学的培训课程。

问：除了星期日的活动，研修会还有其他的活动吗？

答：一般上，星期日下午四点后，就是自由活动时间。留下来的会员，有的打乒乓、有的继续讨论或策划下周的节目。因此，研修会也曾举办多届的乒乓比赛，也曾举办登水坝比赛。

另外，我们会安排一个晚上，让资深的会员教导年轻会员《佛学入门手册》，也一方面准备参加由佛总联合佛青所举办的全国佛学考试，时段约一个小时。都是由资深会员自修，然后教导会员。这个晚上的活动开放给有兴趣的人参加，没有限制出席者的身份，但出席者通常都是研修会的成员。

我们还有一个“结缘队”，如果有人往生，其亲属来邀请，我们就会去助念结缘。我们每个星期练习法器，也学习唱诵《阿弥陀经》等经文，练习法器。法器的练习，是由一名出家众指导。“结缘队”属于福利组的活动，有兴趣者就可以参加，当时“结缘队”约有十余人。

另外，例常活动有“新年贺喜团”、参加卫塞节迎佛大游行、卫塞节青年组之各项比赛等。年杪布施则会到老人院、孤儿院、残障团体等等组织进行。

以上算是固定进行的活动，在闲暇之余，我们也会有参访团或户外活动，也有登水坝比赛等，都是康乐组的活动，目前已经很久没有举办户外活动了。我们也有图书组，图书是由图书组的正、副主任，负责处理会员的借阅等事宜。

问：所以，讲堂以前曾提供一个角落供研修会存放书籍？

答：是的，有一个小角落。不过，我们的藏书不算多，有一部分是买的，也有一部分是佛友送来的结缘书籍。

问：我手上只有一本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十五周年的特刊。请问研修会是否曾出版其他特刊？

答：还有一本是《廿五周年银禧纪念刊》，一共两本。在这之前有一本《佛法研修文集》，是把会员写的文章集成一本书，有十多、二十篇文章。当时研修会会员中有好几位是菩提、槟华、钟灵高中毕业的学生，他们都有能力写文章。

问：十五周年特刊中提到当时曾有一份月报。请问您记得月报的出版年份吗？

答：根据特刊内的职员表名单，那是 1982-1983 年。

问：出版的期数多不多？

答：不很清楚，本人已经没有当理事多年了。

问：这份月报有什么内容？

答：是报告活动节目的时间、某项活动后的文章，还有刊登法师的文章等。

问：现在我们来谈谈周日义校。曾校长担任周日义校校长有多长的时间呢？

答：从 1974 年创校至 2011 年。

问：周日义校是在怎样的机缘下成立的？您与周日义校又有着怎样的渊源？

答：我之前曾参与槟城佛学院（安顺律）华文组青年团，是在周日下午两点开始的。槟城佛学院青年团之前已有槟城佛学院华文组周日学校。周日学校是在早上上课，这两个组织的同仁都有联络。当然我也认识他们，也了解周日学校上课情况。后来院方把青年团解散了，保留周日学校至今。

1968 年，有佛友邀我出席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的成立大会。在大会中被推选为弘法副主任。在研修会的活动中，大家都有同感：如今我们有得学佛，我们的子子孙孙也要学佛啊。经过了几年之后，我们就询问竺摩法师，是否可以在三慧讲堂办儿童佛学班。法师欣喜地答应了，认为这么一来，三慧讲堂就有老中少三代的信众了。不过，当时讲堂正在装修，筹备工作因此暂停一些时日。在 1974 年筹备工作开始进行后，佛学班才能正式开课。原本预算开办一、两班的“佛学班”，但开课时来报名的学生（也有预先报名的）众多，人数竟然比一些正规学校的学生还多，不能不增班，结果不得不向法师征求“课室”来用，才能安排学生上课。在开会商讨时，法师开示：佛学班应改名为正，并赐名称为“三慧讲堂周日义校”。

问：周日义校是否曾出版特刊？

答：1978 年年尾《慧苗》创刊号出版，接着每年年底都有出版一本，至 1984 年总共出版了 7 本。这《慧苗》有法师的开示稿，内容是学生的作品居多。

问：周日义校以什么形式上课？

答：义校的上课时间是每周日上午八点半至十二点，一节课约 45 分钟。当年是在地藏殿上课，范围比较小。招收的学生从 6-16 岁，有一个时期也收 5 岁的学生，高峰时期有五百多名学生，因此每个年纪都可以开一班，曾高达 9-11 班。当时要拍合照，都要分成两批来拍。后来学生人数减少，才合班上课。

教授的科目主要有英文、马来文，以及佛学课。起初是由老师把讲义抄写在蜡纸上，然后再油印给学生。由于过程比较繁琐，我们后来就采用英校课本教英文和马来文，佛学课本则使用金明法师所编的版本。年纪较小的班，主要在培养他们对佛学的兴趣。

问：现在的三慧讲堂周日义校有提供载送服务。请问当年也是如此吗？

答：当年交通不便，有些学生远自亚依淡（Ayer Itam）过来三慧讲堂，需要搭两趟车，十分不便。这时候，有人建议提供交通接送，我们也愿意尝试接送。学生人数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出动了 6 辆巴士来接送学生。

问：竺摩法师是否曾指导周日义校的学生？

答：法师的法务多，时常出外（国内、国外）讲经说法。因早期会讲经的师父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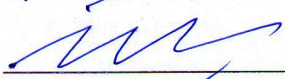
那时，周日的儿童佛学班也很少。法师曾勉励我们，只要把义校办好，就会有人来护持，不愁经济来源。

问：义校的老师大多来自佛法研修会吗？

答：有些老师透过熟人介绍，有些则是佛法研修会的会员。目前研修会理事成员中，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都是义校的学生。

*本人（下方签名者）确定以上访谈内容记录正确，并同意授权本采访稿内容可作研究、征引等学术用途。

受访者姓名： 曾天耕

受访者签名： 

日期： 9-10-2016

吕吉生先生访谈录（一）

受访者姓名:	吕吉生先生
采访者姓名:	陈慧倩
日期:	2016年9月18日
时间:	下午2时30分至下午3时20分
地点:	槟城三慧讲堂

问：吕老师，您好。本次的访谈，主要想通过三慧讲堂的附属团体，了解竺摩法师推动佛教教育的事迹。

答：竺摩法师推动佛教教育，主要是秉承太虚大师对当时佛教的改革而推动的“人生佛教”，因为民国时期的佛教已沦落成“死人佛教”——人往生了才请出家人来做场法事。

竺摩法师南来后，开始带动佛陀教育。当时有一批年轻人接触佛法后，觉得应该在佛法及修持上有所提升，所以与师父进行讨论。之后，就成立了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早期是属于青年人的组织。

后来，有鉴于佛法的学习不应该只属于某一个阶层，所以就把会员的年龄限制放宽。

问：请问您在哪个年代活跃于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是否曾担任要职？

答：我在1985年加入佛法研修会，1987-88年代左右开始担任主席。研修会的章程规定理事只能连任两届，而我也断断续续连任了三、四届。

不过，我是先参加了“人生佛学中心”后，才加入佛法研修会的，接着也在周日义校担任佛学老师。

问：您在周日义校服务了多少年？

答：1988年至2000年在周日义校服务，之后转入弘法工作，目前担任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的成人佛学班老师也有十多年了。

问：您刚刚提到，佛法研修会曾经放宽了会员的年龄限制。请问已经放宽至多少岁了？

答：我担任主席期间，曾一度修改章程，把入会年龄修定无限制。因此，会员人数大大增加，但却发现以老人家居多，经查究获知他们的动机乖离了佛法研修会的宗旨。

问：怎么说呢？

答：我们当时有一个结缘队，主要是为往生的会员助念。这些老人家加入，目的是希望本身往生后，我们会上门结缘。

发现这个现象后，我们把参加年龄限制到65岁，并要求会员必须参加我们的活动。

问：竺摩法师时期，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进行什么活动？

答：大致上我们有例常活动和大型活动。例常活动是每周日有康乐组的佛曲，团康、弘法组的弘法，共修等、福利组的诵经，拜访一些福利机构、出版等。大型活动有会庆，团拜，新春贺喜，供僧等。

问：所谓的福利和出版属于哪一方面？

答：福利方面，我们会到老人院布施、陪陪老人家。出版方面，我们在1990年代出版会讯《晨钟》。早期是属于月刊，后来转成季刊。

问：弘法方面，是否如早期那样，每个星期天都有一次的弘法练习呢？

答：那时我们没有固定的弘法演讲练习，但是我们会在三慧讲堂的周末念佛会上弘法。负责弘法的人自行准备讲稿，然后上台演讲。

问：那是一个怎样的形式？

答：每个周六晚上八点，先念《阿弥陀经》，再由弘法人员弘法半小时至一小时。未出家前的唯悟法师也曾担任过竺摩法师的闽南语翻译。

问：竺摩法师都会在场吗？

答：那个年代，竺摩法师有半年不在国内。他不在时，我们照常演讲。

如果师父在讲堂，也不一定会过来监督，但会通过房里的扩音器，听我们的演讲内容。

问：如果竺摩法师有半年不在国内，念佛会的弘法人选又由谁安排呢？

答：演讲人选一直以来都由三慧讲堂的弘法主任安排，有时也会邀请国内外的学者或出家众到来演讲。

问：研修会目前操作的形式如何？

答：以前的卫塞节、大庆典等，大多数的义工都是研修会成员。后来年轻一批渐渐离开，义工也比较少了，所以就开始转型了。比如说，成立了瑜伽班等，鼓励学员上佛学课及担任义工，让他们通过担任义工与人互动，来体验佛法。

目前研修会有成人佛学班与瑜伽班各三班，佛学班由继群法师、余锦畅老师和我负责指导。

问：与您同期的会员，目前仍在讲课的还有几位？

答：三到四位左右，都在檳城弘法。

问：您与三慧讲堂周日义校的渊源是如何的呢？

答：周日义校以补习为主，佛学为次，早期也有数学补习。我是周日义校的佛学教师，有指定教材以应付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与佛青总会所举办的全马佛学考试，如《佛学入门手册》、《善生经》等。我曾经教导以上的教材，而《善生经》主要是高年级学生的课程。

